

CSSCI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4
2026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主办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4
2026
总第58期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6 年第 4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毛 平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目录 | CONTENTS

2026 年第 4 期（总第 58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10 卷

01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TONGYIZHANXIANXUE YANJIUQIANYAN ZHUANTI

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政治共识”：话语生成、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 杜玉芳 于晨星	5
塑造包容性秩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 郭道久 李 明	21
统一战线的群众逻辑：党的群众工作与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 杨东光	35

统战工作新领域新场景新实践研究

知识功能型统战：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背景下的对象再识别与机制优化	/ 张 可 朱 妍	50
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现实表征、深层困境与引导策略	/ 蒲清平 王嘉欣	63
“十五五”时期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现实困境与突围之策	/ 龙珍罗尔依 崔佳旭	75
“十五五”时期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 蒙 慧 肖丙浩	86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	/ 李国庆	99
“十五五”时期“中国服务”品牌培育：机遇、梗阻与路径	/ 王闻萱	1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内涵要义与原创性贡献	/ 樊士博	1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 魏崇辉 李 玲	136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特征与实践启示	/ 葛英儒	147

- ◎ CSSCI（2025—2026）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博看期刊数据库

02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TONGYIZHANXIAN HUAYU HE XUSHI TIXI GOUJIAN ZHUANTI

坚持正确历史观与防范西方伪史观渗透研究

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现实危害与学理应对 / 赵 超 胡 静 159

国际教育排名中的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生成机制、全球困境与调适重构 / 陈 奇 174

词元层认知战：语义基础设施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及应对 / 夏 晴 郑 亮 190

“词元税”：AI时代西方新型文化霸权的形成机制、深层隐忧与中国应对 / 胡 珂 解 超 203

03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GUOJI REDIAN SHIJIAN DE TONGZHAN GUANCHA ZHUANTI

新门罗主义与联盟交易化互构下美国霸权形态转型及中国应对 / 戴维来 216

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 关成龙 袁 征 233

封三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期刊基本参数: CN50-1215/C*2017*B*16*244*ZH*P*¥20*2090*18*2026-07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6 No.4(Sum No.58) Vol.10

-
- 05 "Political Consensus" as an Iconic Concept: Discourse Generatio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Du Yufang&Yu Chenxing
- 21 Shaping an Inclusive Order: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Guo Daojiu&Li Ming
- 35 The Mass Logic of the United Front: The Party's Mass Work and Improving the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Pattern
in the New Era
Yang Dongguang
- 50 The Knowledge-Functional United Front: Target Re-Identification and Mechanism Optimization amid the Broad-
Spectrum Expansion of Non-CPC Intellectuals
Zhang Ke&Zhu Yan
- 63 Ideational Patterns of New Employment Group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Realistic Manifestations,
Deep-Seated Dilemmas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Pu Qingping&Wang Jiaxin
- 75 Chinese Cultural Data Annotation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trategic Valu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Long Zhenluoeryi&Cui Jiaxu
- 86 Token Economy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Generative Foundations, Value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Paths—A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Meng Hui&Xiao Binghao
- 99 The Token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I Plus Initiative: Technological Implications, Industrial Logic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Li Guoqing
- 111 Cultivating the "China Service" Brand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pportunities, Obstacles and Paths
Wang Wenxuan
- 123 Generative Foundations, Essential Connotations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Fan Shibo
- 136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Iconic and Guiding, New Ideas, New Thinking and New Strategies on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Wei Chonghui&Li Ling
- 147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Generative Logic,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Ge Yingru
- 159 The Erroneous View of Chinese History of Nait ō Kon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Practical Harms and Scholarly
Responses
Zhao Chao&Hu Jing
- 174 Academic Colonialism and Index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 Generative Mechanisms,
Global Dilemmas and Adaptive Reconstruction
Chen Qi
- 190 Token-Level Cognitive Warfare: Semantic Infrastructure, New Challenges to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Responses
Xia Qing&Zheng Liang
- 203 The "Token Tax": Formation Mechanisms, Deep-Seated Concern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New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AI Era
Hu Ke&Xie Chao
- 2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Hegemony under the Interplay of the Neo-Monroe Doctrine and Alliance
Transactionalization: Mechanisms and China's Response
Dai Weilai
- 233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Basic Connotations,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New
Positioning of China-U.S. Relations
Guan Chenglong&Yuan Zheng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政治共识”：话语生成、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杜玉芳^{1, 2} 于晨星²

(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教务部, 北京 100081;

2.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政治共识”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以概念史为视角，系统追溯这一概念从“共同政纲”“共同纲领”“奋斗目标”“基本原则”等历史表达形态，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式概念化、并在统一战线领域深化为标识性概念的演进轨迹，可以揭示其话语生成的内在逻辑。“政治共识”本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与整合下，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所形成的“引导-整合”型稳定认同，具有理想信念共识、价值观念共识与规范准则共识三个层次，是一种具备明确导向性、内在结构性分层与持续演进能力的基础性政治关系。与西方语境中的“共识”不同，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共识”以人民整体利益为价值基础，以“团结-协商”为生成路径，以制度化协商为实践形态，具有鲜明的本土特性。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需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与外交五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夯实共同利益、健全制度体系、厚植文化底蕴、加强共识教育、拓展国际共识，实现政治共识的持续拓展和强化。将“政治共识”从泛化的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既是对西方研究路径的学术超越，更是以中国经验为起点、以人类共同问题为指向的知识创新，极大彰显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向自主建构的内在自觉。

关键词：标识性概念；政治共识；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史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001-16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01

作者简介：杜玉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于晨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杜玉芳，于晨星.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政治共识”：话语生成、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4): 5-20.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显著治理效能。这一良好治理局面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党领导下形成的高度政治共识，即始终将多元社会力量凝聚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共同目标上来，从而确保了社会团结与国家高效运行。当前，社会结构深度分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如何进一步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元中凝聚力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1]在 2016 年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60 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要求：“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2]政治共识在新时代政治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理解中国政治整合逻辑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知识体系由概念编织而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便是充分提炼与阐释在本土历史文化演进及政治实践中生成、又进入学术流通的标识性概念。“政治共识”正是这样一个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在政策话语中频繁出现并逐步演化为统摄统一战线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实践意涵。将其从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深化对其本土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的研究，是建构中国政治自主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环节。

当前学界对“政治共识”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第一，关于政治共识的生成历程与凝聚逻辑。学者们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凝聚政治共识的历史探索与动态演进^[4]，从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视角揭示其整合功能^[5]与治理模式^[6]。第二，关于政治共识的建构路径与实现机制。理论层面，探讨了政治共识达成的现实障碍^[7]、转型期共识凝聚的重要性^[8]以及政治符号的动员功能^[9]；实践层面，关注网络协商对基层社会共识建构的推动作用^[10]与政治共识教育的规律提炼及实践创新^[11]。第三，关于“政治共识”相关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基本沿袭萨托利“价值-程序-政策”的三级划分路径，或将其界定为基本政治价值与秩序的认同^[12]，或指出其兼含价值共识与程序共识^[13]，并构建其教育实践的分析框架^[14]。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如何凝聚共识”的现实议题，在实践路径与功能机制层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政治共识”概念本身的源流演变、话语生成与系统学理建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是在理论阐释上，既有研究大多沿袭西方共识理论框架展开分析，未能充分揭示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特有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重西方框架、轻本土特质的状况较为突出。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概念史的视角，系统梳理“政治共识”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中的生成与演变，追溯其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表达形态、语义流变与演进路径，提炼其内在结构、核心特性与本质要义，并通过中西比较彰显其独特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探索新时代政治共识的建构路径，彰显对“政治共识”作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自觉，推动形成这一概念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解释体系。

二、“政治共识”话语的历史表达

“政治共识”作为一个明确概念虽出场较晚，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关注政治行动中共同目标与思想认同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在 1890 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把《宣言》所阐述原则的最终胜利“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15]。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的联合从来不是自发的，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目标为指向的思想认同过程，这正是政治共识得以生成的深层逻辑。这一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实践中得到充分展开，其所指向的跨阶级、跨群体政治认同，围绕不同时代任务历经多次形态转换，既有“共识”边界的拓展与内容的深化，也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收缩与重构。

（一）“共同政纲”：以利益交集为根基的目标聚合

建党初期，各革命阶级在“打倒列强除军阀”上的现实利益交集，催生了以“共同政纲”为载体的目标型共识，为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提供了认同基础。党的二大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性目标，并指出“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16]。这一政纲并非某单一阶级利益的表达，而是各阶级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最大共识。其生成逻辑在于，“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16] 65-66}，这种利益交集使跨阶级联合获得了坚实根基。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政治动员将革命目标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认同实践，使“共同政纲”成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16] 468}的动态认同，而非仅仅停留于文本宣示。然而，这种建立在跨阶级联合之上的目标聚合本身具有暂时性与策略性，一旦革命形势变化、阶级利益冲突激化，这一“共识”形态便难以持续。

（二）“党的政纲”：阶级矛盾激化下的主体收缩与重构

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迫使政治共识的主体边界急剧收缩，“党的政纲”由此成为重建党与工农群众政治认同的核心载体。“八七会议”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识主体从“各革命阶级之间”收缩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阶级基础之间”。1929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通告强调“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17]，明确将政党纲领置于认同建构的核心。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以“党的政纲”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议题，将没收地主土地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相统一，依托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工农群众在具体经验中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解放自己。从概念史角度审视，这一阶段主体边界的急剧收缩揭示了跨阶级“共识”必须以共同目标和相对缓和的阶级矛盾为前提。这一时期“党的政纲”所确立的政党引领逻辑，也为后续各阶段“共识”形态中“党的领导”这一核心要素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救国纲领：民族危机驱动下的“共识”再凝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存亡的外部危机突破了阶级矛盾的藩篱，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表达形式的政治共识，在更广泛的主体范围内重新实现了跨阶级凝聚。这一“共识”在内容上将“争

取抗战的胜利”确立为“最基本原则”^[18]，同时将保护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利益、推进民主权利等主张纳入共识框架；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受到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的不断冲击，屡濒破裂，而之所以能坚持八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理、有利、有节”斗争艰难维系。这一时期的“共识”呈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这表明跨阶级阶层的政治共识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想化“结晶”状态，而是通过反复博弈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制度形态演变看，这一阶段创造性地实行“三三制”，在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的前提下将中间势力和进步分子纳入政权，在保证党的领导的同时拓展了“共识”的主体边界，在大敌当前的民族危机驱动下重新吸纳了多阶级力量，预示了向更为制度化“共识”形态演进的可能性。

（四）“基本纲领”：以国家建构为导向的制度化雏形

抗战胜利后，“共识”的核心议题从“共同对抗什么”转向“共同建设什么”。毛泽东以“基本纲领”为载体，推动政治共识向以国家制度建构为导向的新形态跃升。毛泽东于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抗战结束后各方“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19]，其中“基本纲领”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框架：政治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19] 1058}，使各阶级、各党派现实诉求得以在共同框架中合理安置。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基本纲领”进一步行动化为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所宣布的八项基本政策，成为动员、激励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进而建设一个全新国家的行动纲领。这一形态标志着“共识”结构从以政策目标为载体的临时性约定，转向以国家制度为框架的整体性认同，为此后“共同纲领”的制度化表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共同纲领”：从革命目标到国家认同的制度定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政治共识从革命动员话语正式确立为国家制度安排，完成了从阶段性“目标认同”向根本性“制度认同”的历史转折。“共同纲领”既是各方“同意”^[20]的结果，又具有“均应共同遵守”^{[20] 1}的规范效力，其“共识”核心不仅在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在于将“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20] 2}等原则确立为制度规范。在实践路径上，这一“共识”的巩固依托于两条路径：一是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0] 1}，为社会各界提供制度化协商平台；二是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持续的思想教育行动推动外在制度认同向内在思想认同转化，为新中国国家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思想、民意和社会心理的支持。

（六）“奋斗目标”：从制度认同到愿景驱动的动态转换

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后，政治共识的重心从静态的制度确认转向动态的愿景驱动，“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全民建设意志的新的话语载体。正如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提出的，“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21]。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22〕}这一论断揭示了新形态的“共识”不再是既有制度的静态确认，而是面向未来的动态凝聚。“奋斗目标”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通过群众运动与思想教育将宏大愿景转化为全民的思想认同。具体来说，一方面将抽象目标拆解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可感知的具体实践，使群众在亲身参与中内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社会主义价值塑造，将道路认同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以愿景驱动凝聚“共识”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后社会日趋分化之际，为“政治共识”概念化出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前提。

（七）“基本原则”：社会思潮多元化趋势下的边界重构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思潮多元化，促使政治共识的总体建构逻辑主要从内容设定转向底线划定，“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重构“共识”边界与内涵的核心依托。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3〕}1981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24〕}。由此，作为底线的“四项基本原则”与作为目标指向的“改革开放”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政治共识的核心内涵。在实现方式上，这一“共识”通过思想解放、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得以达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制度上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规范保障，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在利益则使“共识”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政治共识”概念的出场与运用^①

经过百余年历史实践的持续沉淀，“政治共识”概念的内涵不断深化，凝聚路径不断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多元分化与政治整合需求的同步发展，“政治共识”作为独立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并在国际关系、统一战线、法治建设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

（一）概念出场的历史契机：历史表达积淀与现实整合需求的碰撞

1990年1月15至19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其中提到：“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25〕}这是目前所见“政治共识”概念在国内政治话语中的首次正式出场。它不是在描述已经达成的“共识”，而是在呼唤应当达成的“共识”，其核心指向不是某一具体政策，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态度。这意味着该概念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维护制度稳定性的基石功能，它要回答的是在社会多元分化条件下“我们共同持守什么底线”这一根本问题。从概念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出场并非偶然。前文所述70余年“共识”表达的积累，已为该概念沉淀了核心内容。当社会整合的内在需求积

① 本部分以《人民日报》为核心文本来源。《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和国家政治话语的重要表达平台，其对“政治共识”概念的使用频率、语境与语义变化，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这一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轨迹，有助于把握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的生成逻辑。

累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前期的替代表述最终生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乃是水到渠成。

（二）外交场域的先行运用：作为协调性话语的率先拓荒

“政治共识”概念出场后，最早且最大体量地被运用于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据统计，从1990年至2025年底，《人民日报》标题或正文中含“政治共识”的报道共计478篇，其中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303篇，占比约63%^①。且在该概念诞生后的前20余年间，这一比重超过70%。从这一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在概念运用的早期阶段，“政治共识”主要作为外交词汇发挥功能。进入21世纪，这一概念在大国关系与多边机制中持续深化运用，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方频繁借助“政治共识”话语推动机制建设与战略协作；在全球治理层面，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场合反复强调以“政治共识”凝聚行动合力，等等。从功能特征看，外交场域中的“政治共识”概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协调性话语特征，其核心在于标识双方或多方的共同立场，为合作提供基础性框架。

（三）统一战线领域的聚焦深化：从一般性运用到标识性概念的生成

统一战线领域构成“政治共识”概念最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话语阵地。在《人民日报》478篇出现“政治共识”话语的相关报道中，统一战线领域172篇，占比约36%，仅次于外交领域。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一概念不但覆盖统一战线各具体领域，其内涵亦不断深化，逐步从一般性话语运用发展为该领域的标识性概念。

从演进轨迹看，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至2011年前后），“政治共识”话语高度聚焦于多党合作领域。1997年，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围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共识^[26]。2005年，中央统战部进一步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内容明确界定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27]。这一时期，“政治共识”的语义重心在于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第二阶段（2011年前后至今），概念运用向港澳台、非公有制经济、党外知识分子等统一战线其他领域稳步延伸。2012年，“九二共识”被明确界定为两岸政治共识^[28]，赋予这一概念以国家统一的核心意涵。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注重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强调在多元利益与社会差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并将“政治共识”话语广泛嵌入协商民主、民族团结等议题之中。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不断增进民营经济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29]。在党外知识分子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域，该概念亦持续得到运用。

从语义深化的角度看，在内容层面，“政治共识”被界定为涵盖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认同的多层次价值体系，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两面旗帜，形成同心圆式的共识结构；在功能层面，它被明确为统一战线的前提和基础，是“多党

① 本文对“政治共识”概念运用的统计，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核心论述指向为分类标准，每篇归入单一类别，不重复计算。

合作制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至此，“政治共识”已不再仅仅是描述统一战线某一功能的普通词汇，而是成为统摄整个领域功能目标的标识性概念。

（四）法治与反腐倡廉领域的延伸运用：作为制度规范认同的领域拓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政治共识”话语在法治建设与反腐倡廉领域亦有鲜明延伸。比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都被明确概括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30]；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视为“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共识”^[31]等。“政治共识”在这些领域的运用虽然数量不多，但指向明确，集中体现为对法治道路与权力约束的制度规范认同。法治与反腐领域的“政治共识”话语，拓展了这一概念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运用场域。

纵观“政治共识”概念的演进轨迹，其出场虽遍及外交、统一战线、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等多个场域，但主要集中于外交与统一战线两大领域，这一分布格局并非偶然，而是深刻折射出“政治共识”话语立足多元主体差异、以求同存异实现政治整合的核心价值功能。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虽核心职能不同，却共同以凝心聚力、包容共赢为基本价值导向，以团结协作、沟通协商为基本工作逻辑，由此成为“政治共识”概念运用的两大主要阵地。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在运用侧重上存在明显差异：外交场域强调主体间的对等协商与利益契合，侧重“求同”；国内政治场域则更强调在方向明确前提下的向心凝聚，侧重“凝聚”。从1990年的首次出场，到外交领域的率先铺展，再到统一战线领域的持续深化与法治反腐领域的延伸运用，“政治共识”这一概念的运用轨迹呈现出由边缘到核心、由描述到统摄的整体走向。

四、“政治共识”概念的基本内涵

立足于上文对“政治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中话语表述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概念不是沿用既有理论框架的人为建构，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生成、演变并走向成熟的。

（一）三层结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的立体架构

各阶段替代表述的演进表明，政治共识的内容并非平面化的单一认同，而是在不同层面同时展开、相互支撑的立体结构。“共识”虽因时代任务不同而各有侧重，却始终内含着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三者共同构成其立体结构的内核（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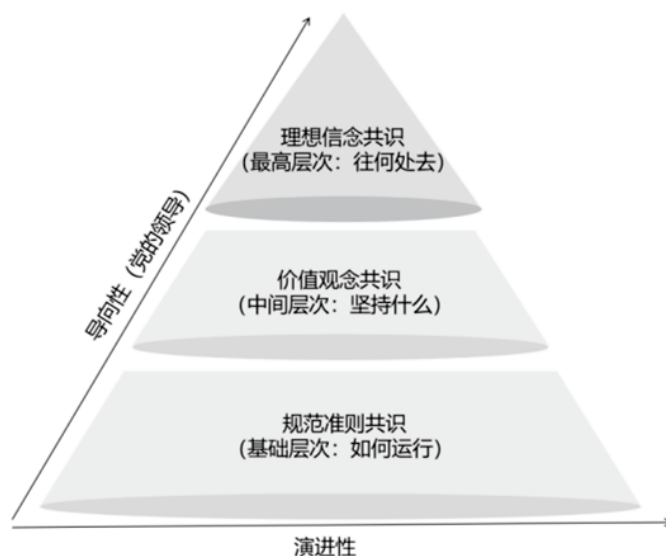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共识的纵向立体结构

1. 理想信念共识。理想信念共识是最高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往何处去”的根本方向问题，为其他层次的共识提供方向指引。它不规定具体行为准则，也不提供日常价值判断，而是为整体确立根本性的历史方位与奋斗方向。在政治实践中，其核心内容体现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民族复兴目标的持续认同。从国民革命时期“共同政纲”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指向^[32]，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3]为纲领，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均是这一层次共识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展开。

2. 价值观念共识。价值观念共识是中间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为多元主体的行动选择提供评价标准与正当性依据。它上承理想信念的宏观引导，将宏大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价值准则；下启规范准则的确立，为制度设计提供价值依据。建党初期“共同政纲”之所以能够成为跨阶级联合的思想基础，正在于它凝聚了“反帝反封建”这一最广泛的价值共识；抗战时期“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34]之所以能够超越阶级分野，同样在于它提供了各方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准则。这一枢纽地位使价值观念共识成为理想信念落地与规范准则生成的连接纽带。

3. 规范准则共识。规范准则共识是基础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如何运行”的行为规则问题，将理想信念的方向认同与价值观念的是非判断，转化为具有稳定性和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层次的“共识”相对弱化，主要表现为统一战线内部对基本纪律与组织原则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首次确立了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基本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四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为“共同的政治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35]法治规范以其强制性、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确保了“共识”的底线不被突破，使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获得制度化保障。

这三个层次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建党初期至土地革命

时期，理想信念共识与价值观念共识处于相对优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规范准则共识的地位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三个维度呈现协调推进态势，共同构成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的完整结构图景。

（二）核心特性：导向性、结构性、演进性及其相互关系

在三维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从功能定位、存在形态与发展机制三个维度，提炼出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特性。

1. 导向性。导向性是政治共识的本质属性与功能特征。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共识”不是价值中立的意见趋同，而是始终围绕特定政治目标展开、具有明确方向规定与引领功能的认同形态。这一特性首先体现为方向规定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根本原则为“共识”标定了边界。在此基础上，导向性进一步延伸为引领整合功能。从“共同政纲”为联合战线提供行动基础，到“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确立运行规范，再到“新发展理念”为现代化建设凝聚发展共识，政治共识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紧密关联。而这一切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引导，从建党初期向工人指出“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16〕}¹⁶的政治启蒙；到新时代的制度化协商与政治共识教育，党通过政治引导、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使多元主体在共同框架内形成价值认同，既确保了“共识”的方向，又赋予其向心力。

2. 结构性。结构性揭示了政治共识的存在形态和秩序特征。从内容维度看，政治共识呈现如前所述由理想信念共识、价值观念共识、规范准则共识构成的纵向层次性。从主体维度看，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并不是无差别的同质化认同，而是呈现出从核心向外围逐步扩展的圈层特征（图2）。党内共识处于核心圈层，具有高度自觉性与组织约束力；社会共识构成中间圈层，涵盖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及全体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不断增进共识，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36〕}³⁶人类共识体现对外延伸的圈层，是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国人民与进步力量，主要依靠平等协商与利益契合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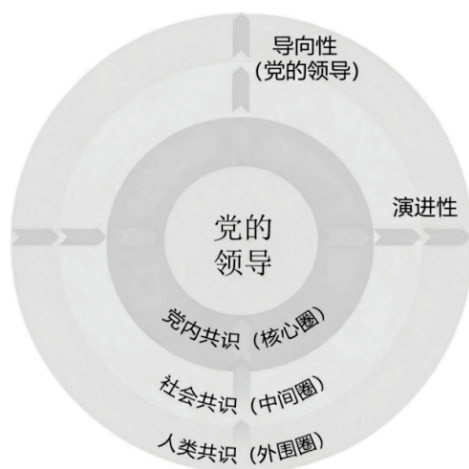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共识的横向圈层特征

3. **演进性。**演进性揭示了政治共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调整与深化的动态规律。其一，核心内容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调整。从革命时期对抗共同的敌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原则”，直至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识”的核心内容在继承基础上不断拓展深化。其二，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从革命时期主要依赖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托组织体系与思想改造，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协商与共识教育的常态化推进，“共识”的形成经历了由动员型向制度型、由集中型向协商型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指出“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37]，标志着“共识”形成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迈进。

上述三个特性有机统一：导向性是本质规定，回答“共识为了什么”；结构性是存在形态，揭示“共识如何构成”；演进性是发展机制，阐释“共识如何变化”。三者共同构成理解中国语境中“政治共识”的关键维度。

（三）概念界定：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的理论定位

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层次，共同回答了“共识”在内容上“认同什么”的问题；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特性，则共同揭示了“共识”在形态上“如何存在”的问题。二者共同勾勒出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的独特面貌：它既非价值中立的意见趋同，亦非单纯的利益博弈结果，而是在党的引导下，多元主体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持续互动、逐步凝聚的认同过程。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整合下，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所形成的稳定认同，是一种具备明确导向性、内在结构性分层与持续演进能力的基础性政治关系。就其历史性而言，它是百余年实践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集聚结果，随时代任务的转换而不断演进，在持续沉淀中走向成熟，而非先验存在的理论预设。就其结构而言，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层次相互支撑，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特性有机统一，形成层次分明又相互支撑的整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在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治方向与原则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引导、利益协调与制度吸纳相结合逐步生成，既区别于单向度的强制灌输，也区别于纯粹程序性的利益妥协，而是在核心引导下通过持续互动实现的向心凝聚。

正是这一独特的生成逻辑，决定了政治共识与统一战线的深刻关联。一方面，统一战线是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实践载体；另一方面，政治共识构成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石。作为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并非无原则的松散联合，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二者互为表里，政治共识构成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前提。

五、“政治共识”概念的中西比较

“政治共识”作为一个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均被使用的概念，其内涵深深嵌入特定的历史实践与文化结构之中。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与西方政治哲学语境

中的“共识”概念在价值基础、生成逻辑与实践形态上均存在系统性差异。

（一）价值基础不同：“人民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根本分歧

中国“政治共识”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准则，将凝聚多元视为实现整体利益的必要路径；西方“共识”则以不可通约的个体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将协调冲突视为维护个体利益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诉求被纳入国家发展目标之中并加以整合，使“共识”能够在“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中实现动态平衡。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则以个体权利与多元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其内在逻辑决定了“共识”只能是利益博弈的协调结果，而非价值层面的真正统一。以赛亚·伯林认为，终极价值或人类目标之间总是存在冲突，且这些价值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无法用一个合理的标准加以仲裁和解决^[38]。这一价值多元论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共识”形态的内在紧张，既然价值之间不可通约，那么任何“共识”都只能是差异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达成的有限协调。不仅如此，这种看似中立的“协调”也远非理想图景所描绘的那般公正。谢茨施耐德尖锐指出，“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堂合唱团唱着带有浓重上层阶级口音的歌”^[39]，所谓“协调”实则更多体现为优势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以美国党派极化为例，近年来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认同分裂不断加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一项调查显示，78%的共和党支持者与68%的民主党支持者均认为，对方政党的政策“会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并将其视为认同本党政治立场的重要原因^[40]。政治分歧已由政策竞争演变为身份认同对立，在财政预算、移民政策等重大议题上呈现“否决型竞争”而非“共识型协商”的运行特征。这正是“个体本位”价值基础的深层困境：当个体身份认同取代共同利益成为政治行动的根本驱动，“共识”便难以突破党派分野，形成具有持续整合能力的深层认同。

（二）生成逻辑不同：“团结-协商”与“契约-竞争”的深层分野

中国“政治共识”以团结为优先目标、以协商为内生路径，将“共识”视为凝心聚力的政治整合过程；西方“共识”则以契约论为传统、以竞争性博弈为运行机制，将“共识”视为力量对比下的阶段性均衡。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各自的历史实践与政治文化之中。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设，首要任务是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并团结为有机整体，而团结不能靠压制多元或放任竞争来实现，协商由此成为实现团结的必然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41]从“三三制”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到“五一口号”开启协商建国，《共同纲领》以制度确认共识，“团结-协商”从革命策略确立为国家制度，最终使政治共识超越利益均衡，成为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认同形态。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生成深嵌于契约论传统与竞争性政治文化之中。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契约论传统将“共识”视为个体利益计算与权利让渡的结果，内在预设了“共识”的工具性与暂时性。在竞争性民主结构下，政治主体围绕选票、资金与话语权展开持续博弈，“共识”的形成有赖于各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竞争性均衡”^[42]，更多取决于力量对比与策略互动。

有学者将这一形态概括为“杯葛型治理”，即意见表达充分却难以形成统一政治输出，与中国“共识型治理”形成鲜明对照^[6]。以英国脱欧为例，2016年公投中“脱欧”阵营以51.9%对48.1%的微弱优势获胜，但这一结果并未转化为稳定“共识”。此后围绕“硬脱欧”与“软脱欧”、北爱边境安排及贸易规则等问题，英国议会长期陷入僵局；2019年下议院首次表决脱欧协议时，政府方案以202票对432票被否决，形成230票差距的历史性失败^[43]。这一案例表明，在“契约-竞争”的生成逻辑下，阶段性的多数表决不过是力量博弈的暂时均衡，而非真正凝聚持续整合能力的“共识”。

（三）实践形态不同：制度化的持续生成与周期性的间歇表达

中国“政治共识”以制度化协商贯穿政治运行全过程，在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与深化；西方“共识”则主要依托周期性选举集中表达，受制于政治议程更迭而呈现显著的间歇性与碎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4]这一民主形态推动民主贯穿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过程，有效避免了“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的形式主义弊端。在具体制度层面，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构建了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商议政体系，“十四五”期间全国政协开展视察考察调研活动413项，提案立案25 043件，共举办各类协商活动279场次^[45]。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平台使不同社会主体在反复沟通中逐步形成稳定认同。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则主要依托竞争性选举加以表达，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与间歇性，缺乏持续积累与深化的制度路径。选举虽使“共识”在特定时间节点被集中表达，却使其形成高度依赖于选举周期与政治议程的更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46]以比利时政治实践为例，多党竞争与语言、地区分裂使联合政府长期面临组阁困境，反映出竞争性民主下“共识”往往受制于党派博弈与选举周期，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治整合。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并非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实践、围绕国家发展方向与人民整体利益所形成的“引导-整合”型认同。它既是分析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概念，更是承载中国政治智慧的学理凝结。

六、新时代政治共识的构建路径

政治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其凝聚既非自发生成，亦非强制灌输，而是一项需要多维协同的系统工程。当前社会结构深度分化、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政治共识的凝聚需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与外交五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扩大共同利益，夯实政治共识的经济基础

共同利益是政治共识最深刻的物质基础。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的经济基础工作，须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端协同推进。在“做大蛋糕”方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以产业升级带动高质量就业扩增，并将

其作为凝聚共识的首要民生支撑，着力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技术红利的分配失衡转化为社会认同的裂隙，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能够切实惠及广大劳动者。在分好蛋糕方面，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关键指标纳入政府绩效硬约束，推进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补短板工作，使社会成员在面对生活风险时有可依托的制度兜底。同时，将平台经济治理规则的完善、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制度保障纳入优先议程，防止数字经济扩张过程中的利益截留效应引发新的“共识”撕裂。只有当人民群众既能真实共享发展成果，又能切身感受公平正义，政治共识才能在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中获得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二）健全制度体系，筑牢政治共识的制度根基

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政治共识得以持续巩固的根本保障。推进制度维度的共识建构，须在顶层设计、基层延伸与监督嵌入三个层面同步着力。在顶层设计层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持续迈进，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凝聚共识、深化认同的制度通道。尤须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经济、数字治理等新业态快速涌现带来的制度空白区，加快立法供给，以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政治共识底线提供制度性保障。在基层延伸层面，将制度优势向治理末梢延伸，健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级协商议事机制，畅通利益表达与诉求协调渠道。同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媒介化协商共治”新格局^[10]，推动政治共识由价值认同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转化。在监督嵌入层面，将监督机制嵌入权力运行的日常环节，建立健全全链条监督体系，防止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落差造成认同损耗，确保方向性共识在具体实践中不被悄然架空。

（三）厚植文化底蕴，奠定政治共识的文化心理基础

文化认同是政治共识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巩固政治共识，须从文化内容建设、数字传播拓展与文明交流互鉴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第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文化精品创作，以生动可感的文化叙事将对国家道路、制度体系与发展目标的认同具象化，使文化认同成为超越地域、阶层与代际的持久凝聚力。第二，依托文化数字化战略，系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网络化传播，推进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等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共同文化记忆的辐射范围延伸至数字空间，以技术赋能拓展价值认同的覆盖广度。第三，坚持开放包容，打造多层次多领域文明对话交流机制与平台，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持续增强文化自信。要在融通古今、汇通中西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解释力、传播力与国际说服力，使文化认同最终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深层精神纽带。

（四）加强共识教育，提供政治共识内化的持续推力

共识教育是推动政治共识由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的关键路径，其有效推进有赖于教育内

容、教育对象与教育方式三个层面的协同深化。在教育内容上,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核心,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完善贯通大中小学的一体化课程体系,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以实践浸润增强共识教育的感召力与实效性。在教育对象上,坚持因群施策:对青年群体将共识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厚植认同根基;对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对党外各领域代表人士,强化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引领;对港澳台同胞则将国家认同教育、中华文化教育与民族复兴叙事有机结合,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深化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认同。在教育方式上,着力处理好数智化赋能与风险防范的内在张力。一方面,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理论宣传向精准互动传播转变;另一方面,高度警惕算法推荐机制的“信息茧房”效应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风险,将算法治理与平台可问责化纳入法治轨道,确保新兴技术在主流价值的规范下运行,服务于“共识”的主动塑造。

(五) 拓展国际共识, 汇聚政治共识的全球认同合力

国际共识的拓展是政治共识实践逻辑向全球治理延伸的重要路径,须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作为核心抓手,在差异化落实中协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须将减贫合作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相统筹,以可见的发展红利深度绑定合作各方的价值认同;全球安全倡议须在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的具体实践中转化为可操作的多边机制安排,以制度性存在替代单纯话语表达;全球文明倡议须将良渚论坛等品牌平台建设成回应“文明冲突论”、构筑多元文明共同价值认同的重要阵地;全球治理倡议须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主动提出中国方案,以议题设置能力将治理话语权转化为凝聚国际共识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依托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协商规则完善与共识形成程序规范化,善于在大国博弈的竞争性场域中识别共同利益,推动竞争性关系中的共识由消极防守走向积极建构,不断拓展面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交汇空间,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七、结语

“政治共识”概念的生成,本身即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缩影。它不是对西方既有理论的套用移植,而是在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由“共同政纲”“共同纲领”“基本原则”等历史表达持续积累演变而来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其演进轨迹始终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及国家中心任务的历史转换深度嵌合。就其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价值而言,“政治共识”既以“引导-整合”型认同与“团结-协商”生成逻辑,为理解非西方政治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也在于其揭示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相统一的结构特征,将长期停留于政策层面的话语范畴提升为具有系统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并不在于简单创造“新名词”,而在于通过对现实实践的理论提炼,实现概念内涵的更新与“术语的革命”^[47],进而形成具有主体性与自主性的概念体系。将“政治共识”从泛化的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既是对西方研究路径的学术超越,更是以中国经验为起点、以人类共同问题为指向的知识

创新, 极大彰显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向自主建构的内在自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1.
-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六十周年 俞正声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0-15(3).
- [3]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 2022-04-26(1).
- [4] 杨宏伟, 王亚妮. 中国共产党凝聚政治共识的百年探索[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2): 16-26.
- [5] 郭士民. 政治共识达成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关系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
- [6] 谢志焄. 中国的共识型治理——基于政治功能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型学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25(3): 33-45, 235-236.
- [7] 郭士民, 蒋锐. 达成政治共识的障碍与突破路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146-151.
- [8] 王锁明. 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及路径思考[J]. 人民论坛, 2014(11): 27-29.
- [9] 王可园, 唐兴军. “中国梦”与政治共识的构建[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5): 22-27.
- [10] 牛耀红. 媒介化协商共治: 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11): 5-22, 126.
- [11] 陈通. 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规律特点与实践创新——以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改革为样本[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2): 107-115.
- [12] 郭定平. 从多元社会谈及政治共识[J]. 社会科学, 1993(8): 28-31.
- [13] 吕元礼.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3): 86-91.
- [14] 石刚, 窦泽浩, 李雯. “政治共识教育”作为统一战线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内涵、边界厘清与实践体系[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3): 111-124.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64.
- [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31.
- [1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5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119-120.
- [1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318.
- [19]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55.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1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59.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6.
- [2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4.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66.
- [25] 闻迪.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N]. 人民日报, 1990-01-15(1).
- [26] 王新庆, 刘振英, 吴恒权, 等.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对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意见 江泽民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瑞环胡锦涛等出席[N]. 人民日报, 1997-08-29(1).

- [27] 就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N]. 人民日报, 2005-03-22 (2).
- [28] 孙立极, 陈佳慧, 侯东涛, 等. 从求同存异, 到聚同化异 (两岸聚焦)——写在“九二共识”20周年之际 [N]. 人民日报, 2012-11-30 (19).
- [29] 中办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N]. 人民日报, 2020-09-16 (1).
- [30] 袁曙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N]. 人民日报, 2014-11-04 (7).
- [31] 詹勇. 用铁的规矩重塑公权力 (评论员观察) [N]. 人民日报, 2015-01-09 (5).
- [3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册 [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116.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4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96.
- [34]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25.
- [35]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
- [3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9.
- [3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38] 约翰·格雷. 伯林 [M]. 马俊峰, 杨彩霞, 路日丽,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41-42.
- [39] E.E.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35.
- [40] Pew Research Center. As Partisan Hostility Grows, Signs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Two-Party System [M]. 2022: 38.
- [41]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 [N]. 人民日报, 2023-01-01 (1).
- [42]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 [M]. 燕继荣, 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61.
- [43] Thomas Quinn, Nicholas Allen, John Bartle. “Why Was There a Hard Brexit? The British Legislative Party System, Divided Majorities and the Incentives for Factionalism” [J]. Political Studies, 2024 (1): 13-14.
- [44]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0-15 (1).
- [45] 刘博通.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成就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凝聚各方智慧力量 (权威发布·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 [N]. 人民日报, 2025-08-19 (4).
- [4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1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47] 孙正聿. 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 (7): 38-51, 204-205.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林华山

塑造包容性秩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郭道久¹ 李明^{1,2}

(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2. 南开大学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独特优势。统一战线作为包容性秩序的实践形态，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凝聚人心夯实安全精神根基、汇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在社会多元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构筑制度化沟通渠道，运用“以团结求安全”的独特路径，将多元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资源，区别于依赖强制手段的一般性安全机制。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即通过政治吸纳凝聚安全合力，通过利益协调化解安全矛盾，通过认同建构塑造安全共识，通过风险预警防范安全隐患。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要着力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五个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独特价值，对于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成为中国治理逻辑的独特表达。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家安全；安全治理；风险防控；智能化；强大法宝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021-14

DOI: 10.13946/j.cnki.jcqi.2026.04.002

作者简介：郭道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4AZZ007）

引用格式：郭道久，李明．塑造包容性秩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21-34．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当前，我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压力不断上升，各类不确定性与难预料性因素显著增多^[2]。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社会领域矛盾与外部风险联动传导，对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系统防范和化解全域安全风险，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政治机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法宝。实践中，统一战线通过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元主体，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安全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统一战线深度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现实，尚未得到充分的学理回应。回顾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关于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讨论长期分属不同领域，交叉研究较为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吸纳、民主协商、社会整合等治理功能，对国家安全维度的关注不足，既有成果也多侧重于描述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3]、文化安全^[4]、民族宗教安全^[5]、意识形态安全^[6]、网络安全^[7]、边疆民族地区安全^[8]及涉港涉台和海外安全^[9]等具体领域中的功能作用，缺乏对其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功能定位的总体性认识与学理建构。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研究虽已形成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宏观治理与微观机制等多维度的分析格局，但其核心议题仍偏重于外部威胁应对、军事安全、情报工作等传统方向，对统一战线这一中国特色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安全价值关注不足。部分研究虽将统一战线纳入安全分析视野，并对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和制度路径等进行阐释^[10-11]，但总体来看，相关成果仍较为零散，理论深度和体系化程度均有待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围绕两大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一是厘清统一战线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回答统一战线“凭什么”和“以何种方式”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探究新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回答“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理效能。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期望能够加深学界对统一战线时代价值的理解，并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全方位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供学理支撑。

二、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

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是根植于中国政治逻辑与安全治理结构之中的重大课题。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从历史维度回溯统一战线“法宝”地位所蕴含的安全意蕴，也要从“人心”与“力量”两个方面解读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一）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安全意蕴

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12]，其之所以能够贯穿不同历史阶段而始终保持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能够在回应党和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中不断确证自身的战略价值。从历史维度审视，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在不同

时期呈现出不同面向，始终与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紧密相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一种生存性安全战略。“由于革命形势严峻，敌我力量悬殊”^[13]，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争取同盟军以求得生存发展。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建设中注重争取中间势力、分化瓦解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关键纽带，实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广泛动员。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集中体现为通过争取中间力量削弱对手、壮大自身，从而维系党的生存发展，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筑牢安全根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转向政权巩固与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人民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4]。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和平赎买方式完成，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在民族工作领域，通过派遣民族访问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国家政治体系，遏制了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分裂国家的图谋。在宗教工作方面，通过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了宗教领域的总体稳定。这一阶段，统一战线为新生政权建构政治认同、拓展社会基础、实现国家整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维护政治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安全价值日益彰显。1979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该阶段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定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明确地称为“爱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首次将爱国统一战线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标志着其制度化建设迈出关键步伐。一方面，统一战线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政治优势，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进入21世纪，统一战线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新兴群体纳入团结范围，有效防止其游离于体制之外，降低了社会分化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安全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5]，将其从“重要法宝”升华到“强大法宝”，凸显了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更为关键的功能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外部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内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领域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面对这一形势，统一战线的工作领域不断拓展，方式不断创新，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已从传统的政治团结和社会整合，拓展为涵盖总体国家安全各领域的综合性安全保障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统一战线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安全挑战，其安全意蕴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实践中持续深化，功能边界不断拓展，不仅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更是贯穿中国政治发展全过程、具有持续安全价值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5〕}“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6〕}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军事防御、技术防护等刚性手段维系，一国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本质上还取决于人心向背与社会力量的整合水平。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在“人心”与“力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

第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7〕}，也是国家安全最深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18〕}。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国家安全的巩固，不仅有赖于强大的物质力量与完备的制度体系，更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对国家基本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深层认同。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广泛联系和团结各方面人士，在多元社会结构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群体凝聚于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引导与认同建构，统一战线将国家主流价值融入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结构之中，使多元社会力量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同时，统一战线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交融、情感联结与利益共享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从而在源头上防范了因价值分歧与认同疏离而引发的安全风险。当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并在心理层面确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时，国家安全便拥有了最为稳固的精神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战线通过凝聚人心所构筑的，正是国家安全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防线。

第二，力量是安全的保障，统一战线是汇聚国家安全治理力量的关键机制。一个国家抵御风险、应对挑战的能力与其社会力量的整合程度密切相关，国家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统一战线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具有联系面广、包容性强的独特优势，能够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广泛动员和汇聚维护安全的社会力量。无论是民主党派成员在政治协商中就安全议题建言献策，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安全、舆情监测等领域发挥专业优势，抑或民族宗教界人士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宗教和谐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统一战线通过大团结和大联合的制度化渠道，将分散于社会各领域的安全治理力量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之中，使各主体在共同的安全目标下协同配合，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的力量整合。正是这种系统性的力量整合机制，使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转化为体系化的安全治理能力，显著增强了国家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组织效能与制度韧性。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通过凝聚人心来夯实安全的精神根基，通过汇聚力量来提升安全的治理效能。这既是统战工作的内在逻辑使然，也是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时代要求。

三、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整合全社会力量、统筹各类治理资源。统一战

线通过政治吸纳、利益协调、认同建构、风险预警四大运行机制，深度嵌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成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政治吸纳机制夯实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组织基础，是多元力量的整合平台；利益协调机制维护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是矛盾冲突的调节枢纽；认同建构机制巩固了国家安全的思想根基，是塑造安全共识的价值纽带；风险预警机制提升了国家安全决策的前瞻性与信息支撑能力，是安全隐患的监测网络。

（一）政治吸纳：凝聚安全合力的制度化平台

政治吸纳是指不同群体通过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参与政党政治与选举过程、接受政府任命等方式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动态过程^[19]。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扩展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代表性，使各种社会力量在体制内获得表达空间与参与机会，从而降低其转向体制外对抗性行为的可能性。统一战线通过政治吸纳机制，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纳入国家政治过程，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屏障。

首先，在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了政治吸纳的核心制度载体。该制度为统一战线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规范渠道，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得以在政协中表达意见、参与决策。其中，政协的界别设置能够将不同政党和社会新阶层组织起来，通过引导其进行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参与，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沟通协商促进党派阶层间的合作与共识^[20]，从而有效避免疏离与对抗，发挥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制度功能。

其次，在组织层面，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化吸纳机制，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培育参与主体^[21]，依托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台联、欧美同学会等覆盖面广泛的统战组织平台，实现对各类社会群体的分类联系与常态化沟通。这一过程的安全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通过组织的联结功能，统一战线使分散个体从原子化状态转变为组织化存在，增强了国家对其开展引导、沟通与动员的能力；另一方面，借助组织的整合功能，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异质性力量有序纳入既有政治体系，降低了其在体制外形成对抗性组织的风险。

最后，在代表层面，依照统战工作制度要求，统一战线持续推进党外代表人士的发掘、培养与储备工作，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新兴社会群体及归国留学人员等不同领域，逐步建设起一支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结构优化的骨干队伍。这些党外代表人士既联系着特定群体，又认同和支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从安全功能审视，这一过程的安全价值在于，党外代表人士使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关切能够在政治体系内获得制度性表达与回应，从而缓解多元社会中因代表性缺失可能滋生的政治疏离与认同危机，进而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合法性。

总之，政治吸纳机制发挥安全功能的本质就是：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合力，将潜在的离心倾向转化为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当多元社会力量都能在既有政治框架内找到位置并发挥积极作用时，其转向体制外对抗性表达的动机就会弱化，由此引发的政治对抗与社会动荡风险也会随之降低，这正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底层政治逻辑。

（二）利益协调：化解安全矛盾的调节枢纽

利益协调机制是处理利益矛盾的重要工具，该机制通过协调与整合多元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缓解社会冲突，维护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共同体的生成以成员对安全的普遍诉求为必要前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对社会秩序与利益保障的深层关切，本质上都是安全诉求的体现。然而，在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存在差异，若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局部利益矛盾便可能转化为威胁整体安全的离心力，进而削弱共同体的凝聚力与稳定性。通过利益协调机制，统一战线系统性回应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化解因利益分歧而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更从制度层面筑牢了政治共同体的根基。具体而言，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安全功能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识别与明确共同安全利益。统一战线在各群体之间系统梳理并确认了其共享的安全利益，其中国家安全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政党、民族、宗教、阶层，还是海内外同胞，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是所有人的共同底线。通过持续强调和明确这一共同利益，统一战线使各群体深刻认识到自身安全与国家整体安全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

其次，协调差异化的利益诉求。统一战线长期以来“坚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1] 179}，将不同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纳入国家安全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统筹回应。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覆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广泛群体，其利益诉求呈现多元性与差异性特征，既包括经济发展、权益保障等现实利益，也包括身份认同、发展机会等价值性诉求。例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可能更关注经济安全与营商环境稳定，少数民族群众可能更关切民族平等与文化安全，宗教界人士可能更在意信仰自由与宗教和顺。统一战线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柔性方式，在各群体之间寻求安全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将差异性诉求纳入统一框架加以协调，而非简单地压制或忽视。这些诉求的满足，本质上都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总体安全目标。

再次，平衡多元利益分配。安全诉求往往关联着更为广泛的利益分配问题。统一战线通过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权益保障等制度化途径，实现各群体之间利益的合理配置，减少因利益失衡而滋生的社会矛盾和安全风险。例如，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部门通过完善工商联和商会制度建设、构建统战数字化平台等创新路径^[22]，回应民营企业在经济规模、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合理诉求，化解企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矛盾，这既保障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经济秩序稳定与社会安全，实现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同频共振。

最后，防范利益分歧转化为安全风险。利益协调机制的深层安全功能在于防范利益分歧向安全矛盾转化，消解共同体内部的离心因素。多元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若缺乏有效的化解渠道，利益分歧可能演变为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统一战线秉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思维与原则，通过协商、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与认知差异，将矛盾消解于萌芽状态。例如，在民族工作中，统一战线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化解因文化差异与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矛盾，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安全风

险隐患。在宗教工作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协调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多重关系,化解宗教领域的潜在风险,维护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这种矛盾化解并非简单的压制分歧,而是通过利益协调与价值引导,将多元利益差异转化为共同体的活力来源而非离心力量,使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始终围绕国家安全有序延展,从而有效避免利益矛盾对共同体安全基础的侵蚀。

(三) 认同建构:塑造安全共识的价值纽带

认同建构是指通过思想引导与价值塑造,使不同社会成员在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价值取向上形成一致性共识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增强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防范因价值分歧或意识形态对立而引发的内部分裂风险。在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在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乃至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若缺乏有效的认同建构机制,这些价值分歧极有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或被内部矛盾激化,演变为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离心力。统一战线通过认同建构机制,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群体团结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之下,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防线。具体而言,这一机制通过凝聚价值共识与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为政治共同体筑牢价值基础。

其一,凝聚价值共识,形成支撑共同体稳定运行的价值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共识与精神纽带”^[23],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政治引导、理论教育、文化浸润等方式,推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各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这种思想政治引领并非强制灌输,而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对国家主流价值的广泛认同。例如,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部门通过搭建各种类型的平台载体^[24],引导他们理解国家发展大局,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结合起来;针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5]、文化交流活动^[26]等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爱国爱港爱澳、支持祖国统一的价值共识。这种共识凝聚,使不同群体的多元价值被整合到国家主流价值之中,形成了支撑共同体稳定运行的价值纽带。

其二,塑造集体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致力于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集体身份认同,以此化解多元社会结构中的身份认同分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7]这一重要论述为统一战线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根基提供了重要指导。身份认同是价值共识得以生成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来源。在复杂多样的社会格局中,不同群体可能因文化传统、地域分布、社会阶层等因素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与归属取向。若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引导机制,这些差异化的身份认同极易引发社会冲突,进而削弱共同体的向心力,甚至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统一战线通过系统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积极推动各民族、各群体形成对中华民族这一集体身份的深度认同,着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统一战线还积极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

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与深度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节庆活动、文化互鉴中不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逐步消解了因历史渊源、地域分布及文化差异所形成的隔阂与偏见。这种深层次的认同建构，不仅增强了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在根本上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安全根基。

统一战线通过认同建构机制凝聚共同价值与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为政治共同体筑牢了价值基础。在此机制作用下，共同体超越了单纯的利益集合，升华为价值深度契合的精神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成员提供行为导向，集体身份认同赋予各群体情感归属与心理联结，二者相互支撑，使共同体在面对内外风险时能够凝聚共识、统一步调，构筑起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思想防线。

（四）风险预警：防范安全隐患的监测网络

风险预警是指通过系统化的信息收集与灵敏的风险感知，及时发现和识别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隐患，并为决策层提供前瞻性判断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构建覆盖广泛、反应灵敏的风险感知网络，实现对安全威胁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从而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演化为现实层面的安全危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安全隐患往往具有潜伏性、跨界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若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这些隐患便可能在缺乏关注的情况下持续积累，最终以突发危机的形式爆发，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冲击。统一战线具有联系广泛、信息密集的独特优势，依托这一优势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有利于风险隐患问题的早期排查与发现^[28]。具体而言，统一战线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信息采集环节。统一战线凭借其联系广泛、深入基层的组织特性，能够在社会运行的第一线实时捕捉各类信息。统一战线成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许多人身处基层一线，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社会情绪的变化、利益矛盾的苗头以及外部渗透的迹象。这种嵌入社会结构深处的信息采集能力，使统一战线能够在风险信息尚处于模糊、零散、碎片化状态时便加以捕捉，为后续的风险识别与研判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统一战线所采集的信息更具即时性、真实性与情境性，有效补充了制度化信息收集渠道在时效与深度上的不足。

其次，风险识别环节。“风险防控治理的第一步，是及时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29]，统一战线通过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判，能够从海量、庞杂的信息中筛选出具有安全意义的潜在风险因素，然后将分散的、看似孤立的信息片段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加以审视，识别其中隐含的风险信号与趋势特征。统一战线联系对象的多元性为风险识别提供了多重视角的交叉验证机制，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立场的成员对同一社会现象的感知与判断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风险识别的重要资源。通过对比不同来源、不同视角的信息，可以更准确地判断风险的真实性、严重程度与发展态势，避免因单一信息源的偏差而导致漏判或误判。

再次，预警沟通环节。统一战线可依托其联系广泛、领域多元的组织优势，建立健全针对紧急事件的应急沟通机制。该机制的建立能够为相关专家、智库及从业者搭建高效互动的沟通平台，使其对突发情况作出及时响应，贡献专业性意见，并协同配合各方力量落实应急措施^[30]。通过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与快速响应通道，统一战线能够有效整合各领域专业力量，为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置提供智力支持与行动协同，从而推动国家安全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

最后，资源调动与动员环节。统一战线依据上述优势还可以系统摸排和分类梳理各领域可调动的治理要素，为突发性、大规模风险治理储备必要的物资、人力与社会联系资源^[28]。通过完善这一环节，统一战线能够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有效地配合国家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的紧急处置工作，为快速响应、资源调配与协同应对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人力物力支撑，进而推动筑牢国家韧性治理的基础防线。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1]共同体的持续稳定不仅依赖事后的危机处置，更有赖于事前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及时预警。一个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必须具备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能力，能够在风险尚未发酵之前捕捉苗头、研判趋势、发出警报。统一战线的风险预警机制，正是通过系统性整合各领域、各层级的信息资源，将分散的风险感知节点联结成覆盖广泛的信息网络，从而在源头捕捉安全风险、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家安全决策的前瞻性与精准性，更从信息保障层面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韧性与风险应对能力。

四、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群体、多层级的系统工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艰巨的改革任务，统一战线必须立足自身优势，从领导核心、社会动员、风险防控、技术赋能与法治保障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有利于拓展安全治理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是筑牢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是技术赋能提升风险感知与预警效能的具体路径；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则为相关工作提供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依据。五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成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大统战格局首先是一种党领导下的工作格局。”^[31]统战工作与国家安全工作均关乎方向性、全局性与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其顺利推进有赖于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中，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具备从全局高度统筹各领域工作的能力，能够确保统战工作与国家安全工作在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与行动方向上始终保持正确与统一。具体而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从两个维度着力。

在政治引领层面，应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促进统一战线成员深刻把握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要求。具体来说，应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统一战线各类培训与主题教育活动之中，通过理论武装与政策宣讲，引导各方面成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形成统一的政治认识，从而有力抵御历史虚无主义、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这种思想层面的统一，有助于防范多元力量因认识不同而陷入分歧，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确保共同体内各方力量在思想层面同向而行。

在统筹协调层面，应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的治理要素纳入统一的安全治理框架。统战与安全工作均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单一部门难以独立

应对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应推动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职能配置、议事规则及决策流程等方面实现系统衔接,明确风险研判、情报交流与应急响应等工作的职责分工。同时,健全统战与宣传、公安、国安、民宗、侨务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信息共享、情报会商与行动协同的常态化与制度化,确保各方力量在共同的安全目标下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将统一战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理效能。

(二) 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

国家安全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防灾减灾维护社会安全,到保护环境确保生态安全,从粮食稳产保证资源安全,到科技自强保障技术安全,各领域安全均离不开全民参与。“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32],这一定位决定了统一战线是组织动员全社会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通道。具体而言,依靠统一战线构建全民防线,需从以下两方面系统推进。

一方面,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全民参与的思想根基。首先,党员干部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力军职责,以坚定的政治信念筑牢思想防线,带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自觉。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媒体平台和线下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普及《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人民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最后,还要注重宣传方式的亲和力与渗透力,善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形式,将国家安全理念转化为贴近生活、易于感知的具体表达,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意识真正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营造全民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宣传教育与制度渠道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应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渠道优势,依托工商联、侨联、新阶联、知联会等统战平台,将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下沉至基层社区、企业园区、科研院所和社团组织。通过组织观看国家安全教育宣传片、在公共场所设置主题展板或张贴海报、在人流量大的区域悬挂宣传条幅或投放公益广告、开展全民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33]等方式,努力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知识学习氛围。同时,应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制作推出生动鲜活的国家安全教育产品,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3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35]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安全防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不受侵蚀。统一战线涉及多领域、多群体、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其运行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多种安全风险的传导路径与触发节点。因此,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构建安全防线,将风险化解于未然。

一方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监测。应针对统战各领域风险特征,建立差异化监测体系。在民主政治领域,核心是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安全工作全过程,要“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36]。在民族宗教领域,重点监测民族关系、权益分配等矛盾隐患,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渗透破坏;同时监测非法宗教活动、境

外宗教渗透等风险。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重点监测营商环境评价、劳资关系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关注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转化的趋势。在港澳台及海外领域，重点监测境外反华势力动态、涉华负面舆情及分裂势力活动等信息。

另一方面，提升应对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的事置能力。风险事置是风险防控从识别预警迈向有效化解的关键环节，决定着风险能否被及时控制、损失能否被最大限度降低。首先，建立分类分级的应急响应机制，根据风险性质、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分别制定事置方案。其次，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明确统战部门与公安、国安、网信、民宗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流程，确保风险发生时迅速集结力量、联合行动，形成事置合力。最后，注重风险事置后的总结评估与经验转化，建立复盘评估机制，系统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预案和防控措施，推动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改进、动态优化，提升统一战线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整体能力与水平。

（四）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

当前，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应用正深刻重塑着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网络空间已成为观念交锋与风险滋生的核心场域。在这一空间中，自发形成的各类“数字群体”构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面对的新领域^[37]。面对这一深刻变革，统一战线传统的组织动员与信息联结模式在覆盖面、响应速度、信息对称性等方面暴露出结构性短板。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已成为提升统一战线风险感知与预警效能的关键路径，具体需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应着力构建统战领域风险信息智能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统战系统内部各领域、各层级的信息资源，打通统战、公安、国安、网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统一的风险信息汇聚、分析与预警平台。该平台应具备信息采集、风险识别、趋势研判、预警发布等核心功能，实现对统战领域安全风险的动力监测与智能管理。通过技术赋能，推动风险预警从传统的经验研判向数据驱动模式转型，切实提升预警的时效性与精确性。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优势。鼓励大数据专家、信息安全从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风险预警工作，借助其在数据挖掘、舆情监测、网络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技术专长，为风险识别与研判提供支撑。同时，建立健全相关网络人士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通过定期座谈与专题研讨等方式，及时捕捉网络空间风险动向，有效防范网络舆论失控、虚假信息蔓延等新型安全风险。此外，还应加强海外安全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分析。依托海外侨团、留学生组织、驻外企业等渠道，建立海外安全信息报送网络，运用智能化手段对境外涉华舆情、反华势力动态、颠覆渗透活动等信息进行系统收集与研判，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海外信息支撑。

（五）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

法治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运行的根本遵循。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载体，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38]。唯有将统一战线服务国家安全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转化为法治约束，才能确保相关工作有法可依。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是推进统战领域国家安全立法与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统战工作法治化的首要环节是完

善统战领域的法律法规。”^[39]当前，统一战线法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但与国家安全相关制度的衔接仍不够紧密，部分领域安全职责边界尚不清晰，制度供给的针对性与系统性有待提升。应针对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及海外等重点领域，系统梳理现有法律法规的适用空间与不足，研究制定安全风险防控指引，明确各领域的安全底线与红线要求。同时，推动将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纳入统战工作条例或配套规章制度，使其从政策指导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海外统战工作领域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的法律制度规范，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建立健全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问责机制。风险防控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责任是否落实。应建立统战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的责任清单与任务台账，明确各领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处置流程与时限要求，确保风险防控工作权责清晰、落实到人。对于一般性风险，应坚持抓早抓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重大安全风险，应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推动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同时，应建立风险防控工作的督查评估与责任追究机制，对因风险排查不彻底、预警信息报送不及时、处置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安全事件的，应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过构建责任闭环，确保风险防线的各个关口都有人值守，各个环节都运转有效，切实将风险化解于未然。

五、结语

对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核心在于回答一个治理层面的问题：一个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不过度依赖强制手段的前提下，将多元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资源。其答案在于国家能否持续建构一种包容性秩序，使不同群体在差异中实现共存，在张力中维持联结。本文认为，统一战线正是这种秩序的实践形态，它通过凝聚人心夯实安全的精神根基，通过汇聚力量提升安全的治理效能，在社会多元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构筑起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这既是以团结求安全这一中国治理逻辑的独特表达，也是统一战线区别于一般性安全机制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统一战线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中，持续参与并推动着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巩固，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其本身就是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当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起深层次的互信与认同，当多元差异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得到包容与回应，安全便不再诉诸外部的强制防护，而内化为共同体自发生成的秩序状态。这种安全不仅指向国家层面，也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当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便获得了抵御风险、化解分歧的最深层安全根基。本文仅是对此一议题的初步探索，基于上述认识，后续研究可尝试从安全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出发，提炼契合中国政治语境的本土化概念或分析框架，以此深入考察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理解中国特色安全治理的独特逻辑提供新的理论进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3.
- [3] 孙悦棋. 统一战线领域政治安全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3): 46-54.
- [4] 李秋风. 统一战线视域下维护文化安全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 [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4): 18-22.
- [5] 徐以骅, 刘骞. 安全与统战——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双重解读 [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6): 1-8, 194.
- [6] 王祯军. 网络统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2): 12-17.
- [7] 张晋岚, 徐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行动逻辑与路径创新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 (4): 122-134.
- [8] 冯辉, 高永久. 多维整合: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战略需求与实践机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5): 13-28.
- [9]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79-89.
- [10] 毛欣娟. 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基本面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6): 39-44.
- [11]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12] 肖存良. 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分析——基于政党-社会关系的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6): 1-14.
- [13] 俞佳奇. 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演进、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116-127.
- [14] 张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化阐释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6 (1): 5-19.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51.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240.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59.
- [18]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64.
- [19] 韩冬临, 罗泽洋. 选票抑或子弹: 政治吸纳、族群分化与国内冲突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5 (10): 87-119, 154-155.
- [20] 杨光斌, 周楚粤. 试论中国的团结型政治: 人民政协的视角 [J]. 社会科学, 2025 (11): 30-42, 61.
- [21] 徐理响. 组织化吸纳与团结政治: 作为民主形态的统一战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1): 17-26.
- [22] 姜国刚, 葛吉霞, 朱明芳. 新时代工商联统战工作路径创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4): 69-73.
- [23] 胡金木, 吉聪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根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J/OL]. 民族教育研究, 1-10 [2026-06-23]. <https://doi.org/10.15946/j.cnki.1001-7178.20260427.001>.
- [24] 李腾. 从单一到协同: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效能提升研究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 (5): 117-126.
- [25] 施彦军. 大统战格局引领下港澳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若干思考 [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2): 20-31, 52.

- [26] 朱孔武.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试验区”: 创新路径与法治保障[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4): 66-67.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5.
- [28] 王远启. 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探究[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6): 53-65.
- [29] 许焯. 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机制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3): 47-57.
- [30] 陈倩, 杨平. 统一战线增强国家韧性的功能定位、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5): 94-104.
- [31] 束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团结与大联合: 大统战格局的目标指向与实现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1): 1-11.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04.
- [33] 陈欣. 基层普法国防线全民应急提素养——第六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总决赛现场直击[J]. 中国应急管理, 2025(10): 70-76.
- [34] 吴兢. 贞观政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71.
- [35] 习近平.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19-12-01(1).
- [3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37] 王子奇. 化流量为增量: 海外“成为中国人”网络热潮的共识凝聚潜力与数字统战启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3): 48-59.
- [38] 周叶中, 任澎. 论中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主要特色[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41-51.
- [39] 李晓艳. 统战工作法治化的意蕴内涵与实践进路[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6): 65-69.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杨稀琴

统一战线的群众逻辑：党的群众工作与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杨东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 200233）

摘 要：在党的理论与实践 中，群众并非先验性、同质化或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体，而是在特定理论与历史情境下，被不断建构、唤醒并赋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其具体构成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党和群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关系之一，党与群众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党的执政稳固性及其领导社会发展的有效性。群众路线是党联系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机制与方法，也是夯实党的阶级根基、巩固社会基础的根本方略。统一战线也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机制，侧重于整合团结特殊群众，是群众路线在政治联盟领域的逻辑延展与战略性拓展。新时代以来，大统战工作本质上是进一步做好党的特殊群众工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能脱离群众路线，需要深入地扎根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有效引领社会、团结社会的根本机制，把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核与方法路径有效运用于大统战工作中，是党团结联系社会的关键所在。大统战工作格局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党只有自觉运用和发展群众路线，才能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关键词：群众；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大统战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6）04-0035-15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03

作者简介：杨东光，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4ZDA065）

引用格式：杨东光. 统一战线的群众逻辑：党的群众工作与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35-49.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党与群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最基础、最核心的结构性关系之一，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社会运作模式，党与群众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党的执政稳固性及其能否有效领导社会。群众是党的社会根基与力量源泉，政党是群众中的先锋力量与领导结构，政党与群众有机统一。党需要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动员群众，不断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备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转变为分化程度较高、分化速度加快、多元化程度较高的社会^[1]；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利益分配模式不断变化，群众形态愈发多元。新时代以来，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新的社会力量不断涌现，这要求党更加有效地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与广大群众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一直以来，学界倾向于从群众路线角度研究群众工作，较少关注统一战线在党的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景跃进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与群众观点的内在结构，强调群众路线是先锋队处理与群众关系的重要原则与方法^[2]；王绍光从政治参与角度出发，认为群众路线是党主动鼓励并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参与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3]；部分学者集中关注群众路线对于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4-5]，把群众路线视为中国善治方案的核心元素与善治理论的概念基石^[6]。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到政党与群众间的密切联系，认为群众路线是党沟通联系群众的主要机制。

事实上，群众路线并非唯一的群众工作机制，作为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同样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机制。少数学者关注到统一战线内蕴于群众路线价值中，二者在内在价值上具有统一性，且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各有优势^[7]；群众路线的内涵价值与功能方法能够纳入统战工作中，统一战线要始终践行群众路线^[8-9]；而统一战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重要途径和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本质是群众路线工作，二者在价值取向、运行逻辑以及操作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共存共生性^[10-11]。这表明，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有着相同理论起源和价值理念，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主要面向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党外人士。它既非独立于群众路线之外，亦非完全内含于群众路线之中，而是群众路线的逻辑延伸与群众工作的战略性拓展。简言之，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一种更为特殊的群众路线，其与一般群众路线既相互区别（工作对象与方法不同）、又有机统一（工作属性相同）。群众路线是统一战线的价值根基，没有坚实的群众根基，就无法有效拓展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的逻辑延伸，没有群众范围扩展与工作方式创新，党的群众根基就会走向封闭、僵化甚至萎缩，二者共同构成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完整体系。

二、群众：社会力量的政治化

任何政治实践都建立在对特定主体的界定、代表与塑造之上。在党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并非先验性、同质化或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体，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特定历史情境下被建构起来的政治主体，是需要被唤醒、被组织并被赋予历史主体地位的工作对象，其具体构成随着社

会变化而变化。其本质是社会力量政治化的产物，是社会力量习得新的政治观念、知识与技能的结果，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社会力量进行界定、代表与塑造的结果。

（一）群众的理论生成

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最大差异是政治合法性差异，主权在民而非君权神授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人民群众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石。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是集合性的抽象政治概念，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启蒙思想家宣称人民是现代国家的起源，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推翻了前现代政治的神学根基，建立起基于人民意志而形成的现代国家。但马克思认为，启蒙思想家口中的“人民”只具备形式上的自然权利，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出现了阶级分化与实质性不平等，民众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经济社会权利，无法真正实现自由解放。在政治关系上，这种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人民受制于资本主义法权关系，无法真实地掌握国家权力，启蒙思想家构建的“人民”概念与政治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客观阶级对立，未能触及现代国家的经济社会根源与阶级本质。为此，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重新构建了“人民”概念，建构起新的现代国家理论及其经济社会体系^[12]。

马克思对人民与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从“群众”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表明，群众不是蒙昧的、待启蒙的、仅仅具备抽象自然权利的社会力量，而是具备巨大经济社会潜力、能够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转型的历史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群众的认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从事实际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历史进步源于生产力发展与广大群众社会地位的提升^[13]。这扭转了启蒙思想家对于群众的消极认知，把广大群众提升为客观的、主动的历史主体力量，广大群众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活动中推动着历史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群众的核心是受阶级压迫最为深重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处于经济社会体系最底层，但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他们与既有经济社会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具备潜在的自我解放能力。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再是启蒙思想家口中的抽象权利主体与被动启蒙对象，而是具备革命潜力的、能够改变既有社会形态的能动阶级。

虽然群众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能够促进人类世界变革，但是仅仅凭借群众的自发斗争是不够的，需要让群众认识到其生存困境背后的阶级实质，让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推翻阶级统治的全部经济社会根基。列宁认为，群众的自发性斗争并不能自动转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如果专注于经济斗争就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只会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难以产生要求变革全部经济社会体系的社会主义观念^[14]。那么，应该如何提升群众的阶级觉悟，促使广大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列宁主张建立先进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把社会主义观念从外部灌输给广大群众。这一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受到先进理论武装的、具备严密组织体系和铁的组织纪律的先锋队政党，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从广大群众中产生并走在广大群众前面的、具备强大阶级自觉的先进分子组织。先锋队政党是列宁对如何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如何组织并促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回答，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群众只有经受先进理论洗礼才能自觉开展阶级斗争。

由此观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党和群众呈现出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党既坚信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的社会根基与力量源泉；又走在广大群众前面领导群众，不断把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观念传递给广大群众并唤起群众。党不是外在于群众的政治组织，而是从群众中产生、最具阶级觉悟与行动自觉的先锋力量；党需要时刻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持续不断地唤醒、组织并动员群众，进而获得足够社会力量的支持并推进社会形态的变革。

（二）群众的历史演变与形态分化

作为掌握了人类社会发规律的政治力量，先锋队政党主动领导与代表群众。在领导群众之前，党需要对广大社会群体进行界定，有效识别哪些群体能够成为党的社会根基，进而主动把“群众”塑造出来。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⁹理论和群众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于广大民众，在社会性质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中有效识别出哪些是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根基，进而在宣传、组织与动员中把群众塑造出来。

传统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处于静止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宗法社会体系中，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潜在的阶级矛盾被控制在宗法系统内部^[15]。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强制性地拉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宗法社会结构被迫打开，产生了统治集团阶级、工农劳动者阶级、资本主义中间阶级等的巨大阶级分化^[16]。生产关系变革使得多重社会形态汇聚于同一时空中，阶级分化与利益冲突愈加显著并难以有效调和，政治失序问题随之产生。作为超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工农大众是中国社会最广大的阶级力量，只有首先满足并实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利益，并有效协调其他阶级利益诉求，才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以阶级分析为方法，准确判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定义中国社会性质，将广大民众组织动员为具有革命自觉性的阶级力量，并领导这一力量开展革命斗争，最终推翻旧秩序、建立新政权。

传统民众被塑造成为“群众”的过程，就是在阶级理论指导下获得新的政治观念、产生新的政治行动的过程，就是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正如邹谠所说：“中国社会革命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从阶级观念中又引申出群众的观念，中国政党以它的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17]简言之，群众概念是阶级理论的产物，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主动塑造出来的结果，以工农阶级为核心的基本群众被塑造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其革命潜力被释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不过这些中间阶级主要作为党和工农阶级的政治同盟军而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赶超式现代化目标，党对群众的塑造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均质化特征，“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是基本群众的主要内容。此时，城市主要采取单位体制，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等纳入工厂、机关、街道等单位。单位承担着政治动员、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福利分配等功能，群众与单位建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思想价值等受到党和单位的直接影响^[18]。农村则采取人民公社制度，农民被组织到政社合一的制度框架内，党务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组织网络延伸到社队之中，农民被直接纳入国家设置的正式组织网络中^[19]。在这种体制下，广大群众高度依附于国家并积极参与各项运动。与

此同时，“民主党派成员、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等各类统一战线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基本都被纳入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进行管理”^[20]。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21]，包括统战对象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均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群众形态相对均质化。

改革开放后确立起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调整，社会分化程度日益提高，党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界定群众。传统工农阶级产生大规模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大量工人进入非公有制经济中工作。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中涌现出各类私营企业主、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群众逐渐从均质化群体，转变为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多元复杂群体。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工农阶级仍然是党最坚强的执政根基，是“基本群众”的核心构成部分。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被明确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22]。“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22] 186}，其他新兴社会阶层均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均被纳入基本群众之列。总之，任何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爱国者，任何通过社会劳动与合法经营取得收入的、认可党的方针路线的、热爱祖国和社会成员，都是党需要紧密联系与代表的基本群众。

与此同时，广大民主党派、各类党外代表性人士、各种具备特定社会身份的统战对象等，重新活跃于中国政治社会舞台。党开始调整其理论话语，把政治性的阶级分析话语调整为社会性的阶层与治理话语^[23]。曾经以阶级标准界定群众的状况得到改变，“阶级话语的消逝推动了群众的去政治化，‘群众’这一概念的社会学意涵逐渐浮现”^[24]，统战对象全部被纳入群众之列。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25]，党的群众与社会根基得到最大程度扩展。比如，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中的新兴社会力量，党和国家主张要“切实把这些领域中的群众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25] 18}，这就确认了统战对象的群众属性。此后，党明确强调统战工作的群众性质，强调“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特殊的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是党加强同各方面群众联系、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广泛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作用”^[26]。在群众范畴不断扩展、统战对象被全面纳入“群众”范畴的情况下，统一战线成为党特殊的群众工作机制。

统战对象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工农群众，在身份属性、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本质上是“群众”，只不过是社会中较为特殊的群众。简言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以阶级为基础进行划分的“普通群众”之外，社会中还存在着以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等党外人士为主体的、以阶层与社会身份为划分的、作为统战对象的“特殊群众”。所谓特殊群众，并非指他们具有特殊权利或高于基本群众，而是指其通常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专业知识、经济实力或广泛社会影响力，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或利益诉求等，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中的多元利益结构，党需要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比如，民主党派成员虽然也属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与爱国者，但是其本质上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

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22] 186}，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多是横向上的同盟者关系，而非党和基本群众之间的纵向关系。因此，党通过政策与理论话语的调整，不断产生、界定、塑造出多样群众形态，并依据广大群众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特点、功能等差异，将其划分为“基本群众”与“特殊群众”。

三、从群众路线到统一战线：党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性拓展

群众工作，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塑造和巩固自身社会基础，并实现对广大民众的动员与组织，而进行的宣传、教育、联系、服务等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分化出“基本群众”“特殊群众”等不同形态的群众力量。这些群众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等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两类不同形态的群众力量，党需要差异化地开展群众工作。其中，群众路线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主要工作对象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基本群众”；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的逻辑延伸，是开展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主要工作对象是以广大统战对象为主体的“特殊群众”。

（一）群众路线：党联系群众的根本方法

群众路线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实质是对群众意志的有效吸纳与提取，以群众意志作为党的政策出发点与落脚点，进而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还主张“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认为广大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党的所有工作都要立足群众并以实现群众利益为主要目标。群众路线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分别是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政治含义，作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与工作方法含义，以及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含义^[27]。如果从党和群众的关系角度看，群众路线是党强化其与群众联系的根本工作方法。任何政党都有其社会基础与利益代表对象，群众路线不但回答了党应该代表哪些群体的利益问题，而且回答了以何种方式沟通、联系这些群体的问题。

群众路线有着具体工作对象，其首要对象是以广大劳动者等为核心的“基本群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后，受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的影响，党的“群众”范畴不断扩大，但广大劳动者始终是党最核心的工作对象。没有明确的利益代表对象，就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劳动者是党在任何时期都要加以紧密联系的基本群众，是其密切联系并代表的对象，是党明确其政治目标、确保其政治方向的社会根基。先锋队政党为了保持与这些劳动者的紧密联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要求党在充分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提炼、整合并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不断唤醒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确保其成为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直接力量源泉。

在功能上，群众路线能够从纵向上凝聚群众力量，不断强化党与基本群众联系。传统中国社会是低组织化社会，分散化、无组织的个体力量十分弱小，广大民众容易受地主士绅等传统力量的影响与控制。革命时期，党通过群众路线与广大群众建立起紧密联系，把受到地主士绅影响的广大群众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社会力量的凝聚。党通过宣传教育与思想引领，重塑民众的

政治认知,使其形成与新的社会结构与阶级位置相适应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党能够有效地组织动员基本群众,与之建立起深度的利益联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传统策略逐步实现“从革命动员策略向制度性治理机制的历史跃迁”^[28]。党以制度化方式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领导的治理体系之中,与广大群众建立起更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联系,群众利益得到更为充分深入的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框架,要求“群众路线不再仅仅承担传统的动员与宣传功能,而是被嵌入党内治理体系,转化为一种具有持续约束力和组织动员力的制度性实践”,进而为开展常态化的联系群众工作提供机制支撑^[28]。党通过群众路线始终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且这种联系日益制度化、常态化,最终实现党与群众的在政治上、利益上、情感上的深度链接。

群众路线能够整合并实现群众利益。群众路线是统一群众意志并将其上升为党的政策的重要方法,是满足群众利益的重要机制。“从群众中来”就是把广大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自下而上地准确把握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共同诉求,在综合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把握群众具体诉求,制定出符合广大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意味着党的政策源于群众诉求,而非源于官僚体系的简单研判,其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政治过程,能够确保党的政策始终与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到群众中去”就是经过系统集成把公共意志反馈给社会并促使群众自觉行动起来的过程,党自上而下地宣传基于民意形成的公共政策,通过说服、宣传与引导,促使绝大多数群众都能理解、认同、支持党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群众具体的、自觉的实践。正是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中,党的方针和群众意志实现统一,广大群众利益诉求成为党的主张,党的主张则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党和群众建立起紧密的一体性关系。可以说,群众路线是确保群众真实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路径,是把群众意志转化为社会发展动能的根本机制。

总之,群众路线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广大群众是党的工作对象。党只有加强与广大群众联系,才能巩固壮大其社会根基,才能夯实党的领导并实现广大群众利益。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深入,在“基本群众”之外,“特殊群众”的规模日益扩大,这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如何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将“特殊群众”纳入工作体系的新课题。这就要求党在延续群众路线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将工作对象从基本群众向各类特殊群众拓展,实现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的有效衔接与功能互补。

(二) 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延伸与群众工作拓展

统一战线是党处理与党外人士、同盟者等特殊群众关系的政治机制,是为了强化党与特殊群众联系并将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建设和发展的使命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整个社会凝聚在党的周围,形成一体,整体发展。”^[29]党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并非弱化群众路线,而是对群众路线的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30]统战工作拓展了党的群众工作对象与范围,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31]。**立足群众路线逻辑,统一战线在群众工作的对象、方法与功能等维度,均实现逻辑延伸与战略性拓展。**

首先,工作对象的拓展。群众路线主要聚焦“基本群众”,这种工作格局是由党的理论和革

命实践决定的。以广大劳动者为核心的基本群众被视为党的执政之基与力量之源，双方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他们是对党的认同感最强、联系最紧密的群体。与之不同，统一战线关注党外具备特定社会身份与社会影响力的“特殊群众”，他们是党和广大劳动者的政治同盟者，能够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特殊群众”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群体。统战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将上述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力量^[23]。这些群体在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认识乃至政治认同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统战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这些“特殊群众”凝聚到党的周围。“作为一种整合协调各方力量的机制，统一战线适应了工作范围不断拓展的时代要求，发挥着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的重要功能。”^[32]统一战线确保党的群众工作实现拓展，使得党的执政基础与社会基础从“基本群众”战略性地拓展至“特殊群众”。需要说明的是，党拓展群众工作范围并非放弃阶级基础，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实现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牢牢坚持领导权的前提下，党把广大群众全部纳入群众工作中，对其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与利益代表，从而建立起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其次，工作方法的拓展。面对特殊群众的工作对象，必然要求工作方式方法相应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强调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掌握特殊的方式方法^[33]。当面对多样化的“特殊群众”，针对基本群众的工作方法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就要求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从纵向的说服教育、组织动员，转变为横向的联谊交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群众路线中，党与基本群众关系呈现出纵向结构特征。基本群众在缺少先进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自觉行动起来，先锋队政党承担起教育引导基本群众的职责。基本群众在构成上具有同质性特点，这要求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充分整合与提炼广大群众意志的基础上，实现政策、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它借助全覆盖的组织系统，既自下而上地整合汲取民意，把民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党的政策出发点，也自上而下地推广执行党的政策，在持续地宣传、教育与动员中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针对基本群众的宣传教育方法，能够实现群众意志的高度统一与行动的高度一致，能够有效激发群众的自觉意识与促使其产生集体行动，展现出党在发动集体行动时的规模与效率优势。

然而，“特殊群众”的利益诉求更为分化、价值观念更为多样，若将适用于基本群众的工作方法简单移植过来，则可能适得其反。面对拥有多样价值观念与组织体系的特殊群众，党的工作方法需要更加注重其与特殊群众的双向互动和求同存异，要强调用沟通协商、联谊交友、相互包容的方式开展工作。民主协商是统一战线开展工作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它通过人民政协等制度化平台，让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事务进行平等讨论与协商。协商强调的是在审慎理性地思辨基础上，进行的持续政治互动与信息交流，旨在实现求同存异并达成共识，最终在一元领导和多元互动中实现利益平衡^[34]。在此过程中，党以领导者与协商者的身份进行倾听与互动，充分汲取各方面意见与建议，把合理的建议纳入到党的大政方针中。协商的本质是在一元政治领导下，对多元价值观念与社会利益的尊重，各方可以依据自身利益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与追求特殊社会利益。只要各社会群体不将其特殊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之上，党就会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并满足其合理利益诉求，进而在全体人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上，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

最后，政治功能的拓展。群众路线的核心政治功能是纵向的力量整合，致力于把基本群众组织凝聚起来，激发起基本群众的政治自觉与历史主体意识，为实现党的社会变革任务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群众路线所组织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始终是党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群众路线进行纵向上的力量整合不同，统一战线致力于进行横向上的社会整合^[35]，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横向协作体系^[36]。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统一战线能够通过制度化和网络化联系，把多元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建立起以党为统领的社会整合体系；能够化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之间的利益张力，调节各方利益关系并增进其政治认同，把因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张力，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丰富资源。统一战线通过横向的社会整合，不断团结扩大党领导的政治同心圆，把尽可能多的“特殊群众”纳入到最广泛的爱国者联盟中，构建起充满活力的政治社会发展格局。总之，统一战线通过横向上整合团结社会力量，使党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并扩大政治同心圆。

总之，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的逻辑延伸，二者以机制性互补方式，构建起完整的群众工作体系。作为联系群众的根本方式，群众路线依托党组织体系深入基层社会，能够有效把握基本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由于党的组织网络难以全面覆盖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领域，党对这些群体的利益识别存在不足，这就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作为党联系特殊群众的重要渠道，统一战线依托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等组织网络，通过联谊交友、谈心谈话等制度化沟通方式，深入了解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策意见。此外，统一战线还能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将不同党派、界别、领域的专业意见与多元视角引入决策过程，不断丰富基于群众路线形成的公共决策，实现民意代表性意见与专业性的有机统一。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形成互补关系，使党能够敏锐把握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并输出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公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统一战线既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群众路线的逻辑延伸。**

四、立足群众根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各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等新兴群众、特殊群众的力量日益庞大，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这就需要党与群众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同时做好“基本群众”与“特殊群众”工作。为此，党一方面坚持传统的群众路线原则与方法，以更加扁平化与机制化的方式联系群众，以党的自我革命方式优化党的作风，防止党与群众之间产生隔膜；另一方面，党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把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调动起来，把社会中新产生的多元社会力量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37]大统战工作格局旨在更加全面深入地团结广大统战对象，使其真正成为全党重视的战略性事业。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实质上是对其群众工作本质的回归。这一格局的根基深植于群众之中，只有切实回应特殊群众的利益诉求、持续密切与特殊群众的联系，才能真正构筑起具有坚实社会基础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群众根基

统一战线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机制，上联政党和国家，下联社会各界，最终目标是做好群众工作。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只是统战工作格局下的群众工作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团结凝聚统一战线范围内的群众，如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等。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完善，要求把这些统战范围内的群众，全部组织起来，实现党对社会力量的全方位领导。尤其是新时代的社会结构越是分化，统战工作就越是重要，统一战线就越是要把这些分化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心与力量凝聚起来，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社会逻辑^[38]。当下“统一战线领域的群众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好各种类型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二是通过代表人士，做好他们所联系的广大党外人士的群众工作。当前十二种类型党外人士涉及人员（除去重复部分）约5亿多人口，其中各民主党派成员超过130万人，党外知识分子约1.7亿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9100万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1.25亿人，全国宗教信仰人士近2亿人，港澳台和海外华侨9000多万人。”^[39]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各类群众数量庞大，大统战工作就是要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这些群体本质上属于群众，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团结这些社会力量，是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

从理论上看，大统战工作格局是群众路线内在价值在新时代的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之所以“大”，根本上源于其与群众路线之间的价值与逻辑同构关系。首先，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指明根本政治方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价值立场，决定了包括统战工作在内的党的群众工作，其最终归宿必须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确保了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人民性底色，使其不偏离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其次，群众路线通过构建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了深层社会资本。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广度，依赖于党的群众工作的深度。群众路线通过持续的政策回应与利益保障，与基本群众建立起深厚的血肉联系，进而为把群众工作拓展至特殊群众提供社会根基，为建构稳固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政治前提。因此，群众路线是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坚实基础，为党的人心与力量工作提供根基。

从方法上看，群众路线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了具体机制与方法。群众路线是一套长期实践并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体系，为大统战工作格局从理念走向实践提供了具体方法。首先，“从群众中来”的工作传统，要求构建全覆盖的社会沟通与反馈体系，为精准统战、有效统战奠定方法基础。群众路线要求党深入联系群众，时刻把握群众的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掌握真实客观的群众信息，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重要借鉴。由于社会群体高度分化，构建大统战格局需要首先具备动态化的社会感知能力，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以政协界别为基础的社会感受器^[40]，以及建立起其他综合性的社会沟通与反馈体系，持续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族宗教人士、海内外侨胞等不同统战群体的思想动态与利益诉求，形成关于统战对象的精准认知并提出相应举措。其次，“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要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协同网络，为满足群众诉求、实现社会整合提供组织载体。群众路线要求不断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形成社会主义发展合力。在多元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面对统战对象时，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可与执

行，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必须进行反复的协商与解释，不断激发多元社会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统战工作从“团结力量”的联盟逻辑向“激发能量”的治理逻辑的创新发展^[41]。这促使大统战格局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党政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同体系，确保各方力量围绕国家具体目标与社会需求展开实质性的合作与行动，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促使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党的治理实践中不断拓展。

从实践上看，群众路线为破解传统统战工作困境提供了具体路径。传统统战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丰富成就，但也面临若干结构性困境。从群众路线视角审视，这些困境恰恰源于统战工作忽视了群众工作的一般逻辑。传统统战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联谊交友，工作对象聚焦于各领域的代表性人士。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统战工作模式是有效的，有助于形成点对点的沟通联系。然而，当时代发展要求党与广大统战对象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时，这种统战模式就暴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当代表性人士与界别群众之间的联结不够紧密时，统战工作便可能悬浮于社会之上，对其所代表的群体整体状况缺乏了解。与统战工作相比，群众路线不是单纯联系代表性人士，而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心广大群众的生活状态、利益诉求与实际困难，这种工作模式为深入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统一战线同样需要深入到广大统战对象中，直接与其建立广泛联系，想统战对象之所想，把统战对象当作自己人，进而在党与群众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与政治链接。我们通过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引入统战工作，积极回应并梳理广大统战对象的利益诉求，切实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最终把广大统战对象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大统战工作格局一方面需要紧紧扎根于“特殊群众”之中，不断提炼并回应这些群众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需要党走在这些群众前面并领导他们，不断用科学理论与最新政策团结这些特殊群众。群众路线主张用先锋队的先进理念主动启发教育群众，激发群众的自觉意识，确保党与广大群众步调一致。群众路线虽然主张“从群众中来”，但是其从来不是走在群众与形势的后面，而是强调党作为先锋队有责任用先进思想启发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党在群众路线中的领导地位，对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大统战工作格局不能仅仅满足于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更关键的是引导各方力量朝着共同目标努力。这就要求统战工作必须强化对统战人士的思想引领和政治吸纳，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教育、深入实际的国情调研、深度的参政议政等，帮助各界人士深化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认同。通过宣传教育和照顾利益，把党的主张和价值观念内化为统战成员的共同信念与行动自觉，确保其在思想与行动上始终和党保持一致。

（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多维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不断涌现的诸多新兴社会力量，需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尤其需要加强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全社会力量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目标上的能力”^[42]。为了真正实现多元分化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必须在认知、制度、组织、行动等各领域，自觉践行和发展群众路线，进而构建起真正牢固有力、充满活力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首先，坚持明确统战工作基本理念，深化“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的价值共识。统战工作不仅是统战部门的专属性业务，更是作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均应参与

其中的广泛性业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43]。尤其要深刻认识到，联系和服务民主党派成员、民族宗教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战对象，本质上依然是做人的工作、是做特定群众的工作。走群众路线是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作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同样应纳入到广大党员同志的基本业务范畴中。因此，任何涉及统战对象的工作领域，广大党员干部都应自觉运用相关理念和方法，自觉联系、引导和服务统战人士。

其次，坚持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夯实大统战工作格局运行的制度根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生命力在于其运行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这有赖于健全的制度保障。其核心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战工作的顶层设计突破部门限制，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统一战线工作局面的形成^[44]。其关键是要完善广泛联系并深入统战人士的制度体系，不断在民主协商中聚民心、汇众智，真正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发展合力。这意味着要拓宽和畅通社会各界人士反映诉求、建言献策的制度化渠道，丰富和规范各类协商民主的形式与程序，建立健全将协商成果和调研建议转化为公共政策的体制机制，完善始终能够回应社会需求的政策执行和反馈评估体系等，通过完善的制度体系与运作机制，确保大统战工作格局始终建立在坚实有效的制度基础上。要确保大统战工作格局以丰富完善的制度设计为支撑，真正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最终在制度化轨道上实现有序且持久的运转。

再次，坚持有序变革组织体系，构建纵横贯通、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跨工作领域、衔接诸多方面制度规范、由多样主体参与的具有超越性的合作空间”，要求全党参与到统战工作中，这就必须优化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适应大统战工作需要^[45]。在纵向上，要实现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相贯通，确保大统战战略部署纵向到底，以及确保基层创新经验及时向上反馈推广。在横向上，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党政部门之间、党政部门与群团组织之间、党政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政策协调与行动配合，打破传统上各自为战的业务与行动壁垒，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统战工作局面。

最后，坚持提升党员干部行动力，培养新时代群众工作专家。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对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在当前统战干部队伍中，缺乏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统战干部的“本领恐慌”问题较为普遍^[43]。这就要求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统战干部的专业素养，不断夯实人才队伍支撑^[46]。党员干部一方面需要具备做传统群众工作的能力，能够深入基层并精准把握民情民意，能够与普通群众建立深度联系；另一方面需要具备做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和不同背景与观点的各界人士打交道，能够在沟通、协商与引导中团结人、引领人。这就需要加强对干部的系统性培训和实践锻炼，帮助他们掌握更加灵活多样的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确保其能够在多元社会领域中开展群众工作。

五、总结

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社会运行中最重要的一组结构性关系，如何不断巩固强化党与群

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面临的政治课题。其中,群众路线是党保持与群众联系的根本机制,群众路线能够把群众意志转化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能够有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与阶级基础。除此之外,统一战线是党联系群众的另一重要机制,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是党全面团结党外代表性人士及其相关领域群众的重要方式。统一战线并非外在于群众路线而独立存在,而是群众路线在政治联盟领域的逻辑延伸。群众路线首先实现对基本群众的紧密联系,筑牢党的根本社会根基。在此基础上,统一战线深化了群众路线逻辑,把广大特殊群众纳入到群众工作中,拓展了群众工作格局。统一战线对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的延伸与拓展,是筑牢党的群众根基与阶级基础的战略必然,这种战略性拓展使党最大程度上适应社会变化并团结社会力量。

新时代以来,党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紧紧立足统战的群众工作本质,汲取借鉴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与方式方法,创新实践路径与体制机制,确保大统战工作能够充分团结凝聚社会力量。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本质上仍然是在做群众工作,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但不能脱离群众路线,反而需要深入扎根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有效引领社会、团结社会的根本机制,把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核与方法路径有效运用于大统战工作,是党团结联系广大特殊群众力量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1994(2):47-62.
- [2] 景跃进. “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5-14.
- [3] 王绍光. 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J]. 学习月刊,2009(23):16-17.
- [4] 孟天广,田栋. 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分析与经验发现[J]. 政治学研究,2016(3):25-35.
- [5] 吕德文. 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J]. 开放时代,2012(6):117-129.
- [6] 肖滨. 群众路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治之道[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3):5-13.
- [7] 李照秀. 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内在逻辑的四重维度[J]. 求实,2014(12):20-25.
- [8] 杨萍. 试论新时期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23-25.
- [9] 郭世松,金荣.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发挥统一战线优势研究[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18-21.
- [10] 纳勇. 关于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的思考[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4):35-38.
- [11] 谢石生. 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内在契合与外在互动[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14-17.
- [12] 杨东光. 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J]. 社会科学,2023(6):122-134.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153.
- [14]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40-350.
- [15]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第2卷[M]. 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
- [16]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48-249.

- [17] 邹说.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 [M].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93: 4.
- [18] 何海兵.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 [J]. 管理世界, 2003 (6): 52-62.
- [19] 王立胜.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 (3): 28-33.
- [20] 曹伟, 黄天柱. 社会结构变迁与统战范式转换: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生成机理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3): 32-47.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9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85.
- [2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89.
- [23] 陈明明, 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2.
- [24] 杜鹏. 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的社会路径——基于村庄社会基础的分析 [J]. 开放时代, 2026 (2): 206-223.
- [25]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546.
- [27] 陈明明, 陈远星. 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 一个理论和历史的比较 [J]. 学术月刊, 2021 (7): 78-90.
- [28] 陈雪莲. 从工作方法到治理机制: 群众路线的制度演进与权力规制功能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5 (5): 11-18.
- [29]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130.
- [30]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34.
- [3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 [32] 陈家刚, 赵佳豪.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5-27.
- [3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48.
- [34] 李火林. 论协商民主的实质与路径选择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4): 94-99.
- [35] 肖存良,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279.
- [36] 任健峰, 赵洲洋. 作为横向协作体系的统一战线: 争取多数的制度逻辑、治理实践与知识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3): 20-31.
- [37]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90.
- [38] 肖存良. 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分析——基于政党-社会关系的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6): 1-14.
- [39] 肖存良. 政党、国家、社会与群众: 理解大统战工作格局概念的四个维度 [J/OL].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19[2026-06-29]. <https://link.cnki.net/urlid/11.2778.D.20260420.1743.006>.
- [40] 杨东光.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历史演进中的人民政协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40-56.
- [41] 林华山. 建设力: 统战工作一个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样本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 (1): 5-12.

- [42] 范劭兴,王智.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政治逻辑[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39-44.
- [43] 郑冯涛.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价值、内涵、困境与实践路径[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30-35.
- [44] 王彩玲.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要求[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40-52.
- [45] 商红日.统一战线制度及其效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1-7.
- [46] 简皎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4):78-85.

责任编辑:杨稀琴 校对:卢媛

知识功能型统战：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背景下的对象再识别与机制优化

张可 朱妍

(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党外知识分子的广谱化趋势，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识别、组织联系与作用发挥提出了新的适应要求。本文在梳理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的概念形成、政策确立与边界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多项实证调查资料，从知识生产、身份秩序和符号资本三个层面分析其广谱化的结构机制，并提出“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分析框架。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并非单纯的数量扩张，而是知识劳动从单位体系向市场、平台和社群外溢，知识主体从稳定身份转向复合位置，知识影响力从专家头衔转向议题传播和公共承认的综合结果。知识功能型统战立足既有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强调在坚持政治引领、组织联系和代表人士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功能、作用场域和转化机制。其重点不在于重新界定工作对象，而在于围绕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趋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就对象识别、场域嵌入和功能转化机制作出理论化提炼与实践性优化。应以“收缩外延、扩大内核”为对象再识别方向，围绕制度嵌入、社会传播和行业专业三种主要功能取向，构建动态识别、议题牵引、场景配置和闭环反馈机制，将分散在制度、市场、平台和社群中的知识能力转化为建言资政、凝聚共识、风险沟通、行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际效能。

关键词：党外知识分子；知识功能型统战；广谱化；对象再识别；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050-13

DOI: 10.13946/j.cnki.jcqs.2026.04.004

作者简介：张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成员。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专项课题“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规范化建设与组织力提升研究”（2023VTZ010）

引用格式：张可，朱妍. 知识功能型统战：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背景下的对象再识别与机制优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4): 50-6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与对象再识别

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特殊作用的知识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处在知识生产、意见表达、专业能力和政治参与的交汇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重要工作”，并从充分尊重、加强引导和发挥作用三个方面阐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要求^[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2]。

近年来，高等教育普及、职业结构分化和数字平台发展共同改变了知识群体的形成方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全国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约为2.18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者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3]。2024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80%，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846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毕业生1059.38万人，研究生毕业生108.36万人^[4]。这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并具备专业知识能力的群体，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规模精英阶层，而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持续扩展的基础性群体。

这一变化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再只是工作对象基数增加，而是既有统战工作的识别逻辑、组织方式和转化机制能否继续适应新的知识群体结构。长期以来，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主要围绕“对象是谁”“如何联系”“如何培养代表人士”展开，并在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知联会组织运行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这一路径在知识群体规模相对有限、单位依附较强、职业身份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具有较高效率。随着知识生产社会化、职业身份复合化和公共表达平台化的发展，传统身份逻辑虽然仍能回答“他是谁”，却越来越难以充分回答“他影响谁”“在哪些场域发挥作用”“其知识能力能够转化为什么样的公共功能”。

既有研究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方维规从概念史角度指出，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intellectual，而更多指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5]；李放春考察“知识分子”一词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生成和传播，说明其自形成之初便具有政治性和阶层性^[6]。一些专业理论研究则强调，党外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对象^[7]。梁君思从研究范式层面指出，当前党外知识分子研究需要从社会结构调整、阶层流动和社交方式变迁等角度理解其群体特征、身份叠加与工作机制^[8]。

新的社会阶层和数字社会研究拓宽了问题视野。李路路、王薇指出，“新社会阶层”虽非严格学术概念，但有助于揭示传统阶级框架之外的新兴社会力量及其整合问题^[9]；张海东、杨城晨从社会生产体制、生产要素和市场经济变迁解释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10]，张海东讨论其结构化、组织化和发展趋势^[11]，李腾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载体的效能提升^[12]。林华山提出“圈层统战”视角，强调信息社会中统战对象的社会影响通过圈层、平台、社群和议题网络扩散^[13]。许纪霖、王峰、吴冠军和刘铭康分别从新媒体、数字日常和“网红知识分子”等角度讨论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动^[14-15]。这些研究说明，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的边界、连接方式和影响路径正在发生变化。

现有研究仍有三点可推进之处：一是侧重于回答“谁是党外知识分子”，但对其在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中发挥何种知识功能关注不足；二是讨论“如何组织对象”，但对统

战工作如何进入知识生产、交流、传播和应用过程阐释不够；三是虽已关注到对象广谱化、圈层化和平台化造成的识别困难，却尚未形成“功能识别—场域嵌入—制度化转化”的整合框架。本文聚焦三个问题：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为何使既有身份识别逻辑面临适配压力；不同知识主体在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中发挥何种功能；统一战线工作如何进入知识生产、交流、传播和应用过程，将分散化知识能力转化为制度化统战效能。基于此，本文先提出“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分析框架，再结合多源实证材料分析其结构依据，最后讨论对象再识别与机制优化路径。

二、从身份对象到功能主体：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分析框架

当前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正经历从“大众化”向“广谱化”的结构性变迁，传统依托身份属性开展统战工作的模式面临新的时代课题。本文基于统一战线工作实践，提出“知识功能型统战”分析框架，主张实现从单一“身份对象”识别向多维“知识功能主体”识别的范式转换。

（一）从“大众化”到“广谱化”：对象结构的再理解

既有研究使用“党外知识分子大众化”概括群体规模扩大、社会来源拓宽、分布场域扩散和影响路径多元化的趋势^[16]，这一概括有其解释力，但“大众化”在中文语境中也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分子专业属性的弱化。本文采用“广谱化”来概括这一变化。“广谱化”是指这一群体在规模、来源、职业形态、组织连接和影响路径上的拓展与分化。它强调党外知识分子由传统相对稳定的“窄谱系”群体，转向分布于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中的多场域知识群体。

党外知识分子的广谱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命题，而是一个对象结构变化命题。如果只从“人数增加”理解这一趋势，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增加吸纳对象、提高活动频率或扩大组织覆盖。事实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知识劳动者的社会来源、职业分布、组织连接和公共影响方式。知识能力不再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传统单位体系承载，而是越来越多进入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机构、数字平台和自由职业场域；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也不再只是单一单位身份、职称身份或界别身份，可能同时表现为专业技术人员、平台内容生产者、行业社群节点、公共议题参与者和统战组织潜在成员。

因此，广谱化并不只是对象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场域、路径和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统战工作主要依托单位、系统和代表人士渠道发现和联系对象；现在，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市场、平台、项目、社群和新职业网络之中。这种变化要求统战工作不只关注对象身份，还要关注知识功能的发生场域、作用路径和转化条件。

（二）从身份识别到功能识别：统战对象理解方式的转换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个重要传统优势，在于能够依托政治面貌、学历层次、职称职务、单位归属、行业界别和社会声望识别对象，并通过相关组织和制度渠道建立联系。这种身份识别方式并未失去基础性价值，它仍然是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培养党外代表人士和形成制度化联系的基础。问题在于，广谱化背景下的党外知识分子往往分布在多重场域之中，其实际影响力未必完全由单位、职称和头衔决定。

本文主张将党外知识分子从“身份对象”进一步理解为“知识功能主体”。所谓身份对象，强调的是某个人是否符合党外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边界；所谓知识功能主体，强调的是其是否在特定场域中持续生产、传播、解释和转化知识，并对政策供给、公共沟通、专业治理、风险提示和社会服务产生实际作用。前者解决“谁被纳入”的问题，后者进一步解决“谁在发挥作用”“在哪里发挥作用”“如何将其作用转化为统战效能”的问题。相应地，统战工作的切入点也应从身份确认和组织吸纳，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作用实际生成的场域。过去的工作重点较多是把符合条件的对象吸纳进统战条线，使其进入组织联系、政治培养和政治安排的制度轨道；广谱化背景下，还需要统战工作主动嵌入党外知识分子实际发生作用的社会场域，进入知识生产、议题形成、公共表达、专业协同和政策转化的具体过程。换言之，工作的重点不能只停留在“把人找出来、联系上、组织起来”，还要判断知识能力在何处发挥作用、通过什么渠道产生影响、能够转化为何种公共价值。

（三）知识功能型统战：理论化提炼与机制化补充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提出“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分析框架。这里所说的知识功能型统战，是指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既有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之上，更加重视其在政策供给、公共沟通、专业治理、风险提示和社会服务中的知识功能，并通过对象识别、场域嵌入和机制转化，将分散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知识能力转化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化运用过程。这一分析框架与中央关于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是对既有工作范式的理论化提炼与补充。它立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这一根本要求，也延续了思想政治工作、组织联系和代表人士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时，更加关注党外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场域中实际发挥的知识功能，即以知识功能作为观察和识别对象的重要线索，以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作为工作切入点，并通过相应机制把分散的知识能力转化为建言资政、公共沟通、专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效能。

在对象再识别上，知识功能型统战可以概括为“收缩外延、扩大内核”。“收缩外延”重在提高对象识别的精准度，避免仅以学历、学位、职称等形式指标泛化工作对象；“扩大内核”则重在把具有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专业治理和公共沟通功能的党外知识分子纳入更有效的联系和转化机制之中。由此形成的再识别机制，不是简单扩大口径，而是在对象边界上更加清晰、在功能识别上更加开放、在组织转化上更加精准。

三、知识生产、身份识别与符号资本： 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的结构维度

党外知识分子的广谱化，深层上体现为知识生产组织方式、身份识别方式和符号资本生成机制的共同变化。它所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对象数量增加，而是党外知识分子作用方式和影响路径的结构性变化。理解统战工作为何需要从身份边界识别进一步转向知识功能识别，需要考察党外知识分子如何在新的知识生产关系、身份识别结构和符号资本生成机制中发挥作用。

（一）研究资料与分析路径

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团队 2020—2024 年围绕党外知识分子和统战组织建设形成的系列调研。相关材料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前者主要考察统战组织、活动平台和资源配置方式，后者主要考察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结构、组织认同、参与意愿和功能期待（如表 1 所示）。第一，覆盖对象较广，既包括传统大口单位中的党外知识分子，也包括归国留学人员、高新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新兴领域知识劳动者。第二，方法上采用政策文本、深度访谈、座谈会、问卷调查和新媒体活动统计的混合设计，能够同时呈现组织供给与成员需求。第三，年份跨度大，既能反映阶段性社会变化，也能观察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趋势对组织建设提出的持续要求。

下文分析围绕三个结构维度展开：一是知识生产关系的变化，即党外知识分子如何从传统单位体系中的脑力劳动者，转向分布于市场、平台、社群和项目网络中的社会化知识生产者；二是身份识别的复合化，即学历、单位、职称和界别等传统识别标识如何与场域位置、社会连接和议题能力相互叠加；三是符号资本生成机制的平台化，即数字传播、议题连接和公共表达如何影响知识影响力的形成，并推动统战工作由身份吸纳进一步转向功能识别与效能转化。

表 1 主要实证调查资料

材料类型	调研对象与范围	资料规模	主要用途
归国留学人员调查（2020 年）	归国留学人员	有效问卷 849 份，座谈会 6 场、68 人	分析高学历、高流动知识群体的职业选择、社会参与和组织连接
大口单位党外知识分子调查(2021 年)	党外知识分子	有效问卷 824 份	分析大口单位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组织认同与参与期待
新媒体活动调查（2022 年）	多地市级层面知联会、新联会微信公众号活动信息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共 767 条	比较统战组织活动类型、频率和功能结构
长三角地区知联会调查（2023 年）	苏浙沪皖省、市、区三级知联会负责人、基层会员、统战干部、党外代表人士	2 场区级座谈、14 场深度访谈，合计 47 人	分析知联会组织覆盖、会员结构、代表性和组织吸引力
企业党外知识分子调查（2024 年）	高新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	有效问卷 13 420 份，其中统战工作重点对象问卷 2 834 份，包括民主党派成员 2 537 份、无党派人士 297 份；中青年群众骨干问卷 10 586 份	分析专业技术知识群体的组织认知、参与意愿与功能期待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系列调研资料整理

（二）知识生产关系的变化：从单位化脑力劳动到社会化知识生产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来看，知识分子不能被理解为脱离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而存在的抽象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7〕}这一论断表明，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化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协作中的指挥、监督和调节职能、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体力劳动分离，以及大工业对科学技术的自觉应用^[18]。本文使用“知识生产关系”这一表述，主要指知识劳动的组织载体、劳动契约、协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条件，而非严格意义上关于所有权、控制权和利益分配结构的生產关系概念。因此，理解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不能仅从受教育人口增加出发，还应考察知识劳动的组织载体及其配置和使用方式。

在传统单位制和高度组织化的职业体系中，知识劳动主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专业技术系统展开。知识分子的职业位置较容易通过单位、学历、职称、学科和行政层级识别，统战工作也可以依托相对稳定的组织系统开展对象发现、政治联系和代表培养。此时，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与统战工作的识别方式之间具有较高重合度：单位提供组织入口，职称提供专业等级，学历提供资格证明，界别提供政治安排。

进入新时代以后，知识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市场经济、数字经济和平台社会共同推动知识生产从单位化、组织化的脑力劳动扩展为社会化、市场化和平台化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平民化、年轻化、网络化、单位依附弱化和原子化等特征^[19]。这一变化并非单纯表现为职业分布扩展，更体现为知识生产关系的变化（图1）。知识生产不再只发生在传统单位和学术共同体内部，也越来越多发生在企业研发、行业咨询、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内容生产、专业社群协作和项目制劳动之中。许多分布于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和平台化就业领域的知识劳动者，并不一定具有稳定单位身份，也未必能够通过传统组织渠道被及时识别，却在特定领域中生产、传播和应用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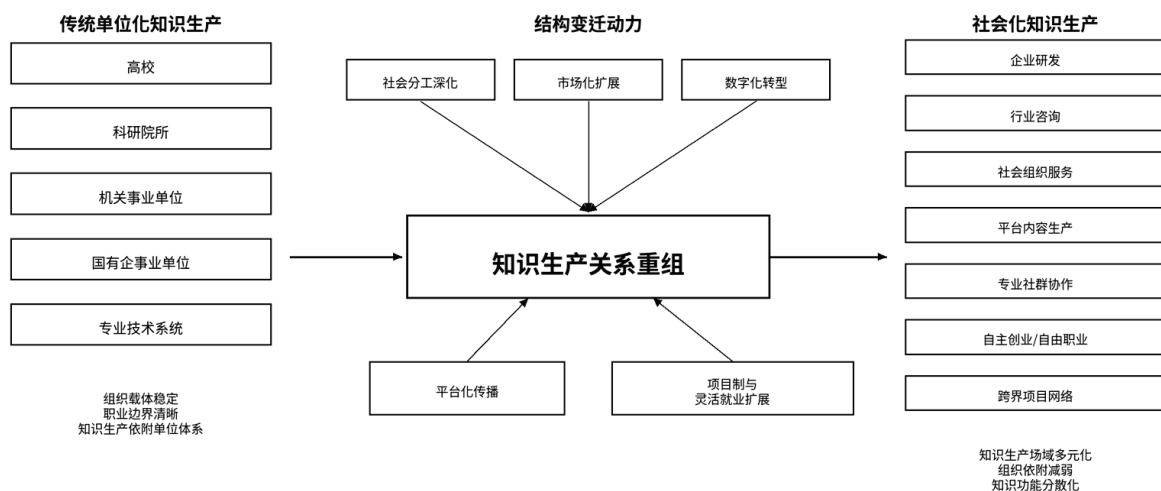


图1 知识生产关系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归国留学人员群体能够较好说明这一变化。相关调研显示，归国留学人员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主要分布在科研教育、文化传播、技术应用、企业管理等领域，但其组织归属和职业路径并不完

全依附传统单位体系。73.2%的受访者认为留学专业与当前工作关联程度较高。有受访者表示,这种专业能力的发挥,并不必然依托传统单位归属或职称体系,而更多体现于具体岗位、市场机会和专业网络之中^[20]。部分归国留学人员选择落户长三角城市,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传统单位身份,而是看重市场规则、契约精神、国际化环境和专业成长空间。有受访者提到,相关城市的吸引力在于“按照契约来做”和“凭本事说话”的环境^[21]。这说明,高学历知识群体的职业嵌入越来越依赖城市制度环境、市场机会和专业网络,而不只是依赖稳定单位归属。

社会化知识生产也改变了统战工作对象的发现路径。过去,通过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事业单位、大口党委和行业系统,较容易发现党外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士。现在,许多具有专业能力和公共参与潜力的知识主体,分布在企业、平台、项目、社群和跨界职业网络之中。调研发现,新兴领域知识劳动者持续增加,职业分布与身份谱系加速分化;与此同时,统战部门专职力量与资源投入增长相对有限,而组织承担的功能目标和治理要求不断提升。超大城市中具有专业知识能力、分布于不同单位和社会场域的党外知识群体规模较大,与基层统战组织的专职力量和组织资源之间存在一定张力^[20]。

由此可见,知识生产关系重组带来的并非单纯工作量增加,而是统战组织如何进入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场域的问题更加突出。过去,统战工作可以通过单位、组织和代表人士较为有效地找到对象;现在,知识生产越来越分散于市场、平台、项目、社群和新职业场域之中。如果仍主要以组织建制、会员数量和活动次数来衡量工作覆盖,就容易把工作重点停留在外延扩展上,而难以深入到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具体场域。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的第一重结构维度,体现为知识劳动从传统单位体系向市场、平台、社群和项目网络延展。相应地,统战工作在继续依托单位联系和组织渠道的基础上,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对特定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场域的嵌入能力。

(三) 身份识别的复合化:从资格识别到场域识别

如果说知识生产关系的变化反映的是党外知识分子“在哪里生产知识”,那么身份识别的复合化则进一步解释社会和组织“依据何种标志识别知识主体”。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视为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三个相关维度^[21]。这对理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对象的识别方式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学历、职称、专业资格和单位声望等指标,不仅可能构成专业能力的制度化证明,也可能成为社会评价和组织识别的依据;界别安排则进一步把这些社会身份转化为制度化的组织身份。

在传统单位制和职业分层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这套身份秩序具有较强操作性。一个人是否属于党外知识分子,往往可以通过政治面貌、学历层次、职业身份、职称职务、单位归属和界别安排来判断。由此形成的“身份识别—组织吸纳—代表培养”模式,实际上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资格体系之上:学历证明文化资本,职称标示专业等级,单位提供组织入口,界别安排则将专业身份转化为政治联系渠道。然而,资格识别能够解决“谁具备知识身份”的问题,却不一定能回答“谁在现实场域中产生影响”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职业流动加速、就业形态多样和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学历、单位和职称仍然重要,但不再足以判断一个知识主体的实际影响力、组织意愿和公共作用。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企业技术骨干、行业社群组织者、平台内容生产者、自由职业专业人士和公共议题参与者,其社会位置由职业流动、市场声望、平台影响和社群关系共同塑造,

传统资格识别方式也需要与场域位置和社会连接等因素结合起来加以理解。

从组织侧看，知联会成员结构能够反映这种变化。调研显示，苏、浙、沪、皖四地知联会总体上已经完成三级组织建设，从形式上看，组织覆盖已较为完整。以样本地区知联会会员结构为例，组织连接较强的单位来源仍占一定比例，市场化专业场域和社会服务场域成员也已进入组织网络，但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和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占比相对有限（如表2所示）。这表明，相关组织载体已在向新兴知识群体延伸，后续仍可进一步丰富对自由职业、新媒体、平台型和弱组织连接主体的识别联系渠道。

更重要的是，组织建设的制度化推进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组织认同和代表性生成。组织覆盖与功能发挥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依托代表人士、组织会员和层级联动实现联系带动的传统路径，仍具有重要制度价值；但在职业分化加快、作用场域流动增强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面向组织外部广泛知识群体的识别、联系和转化机制。

表2 样本地区知联会会员来源结构

来源类别	占比（%）	组织连接特征	说明
科研院所	21.8	组织连接较强	传统专业知识生产机构
机关、事业单位	21.3		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
央企、市企	13.8		兼具专业岗位与组织联系
外资企业	8.7	市场化专业场域	市场化知识生产组织
民营企业	32.2		知识型成员的重要来源
公益组织和社会组织	1.8	社会服务场域	弱组织连接和社会服务空间
自由职业	0.4	灵活就业场域	平台化、流动型知识主体覆盖有限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系列调研资料整理

从访谈材料看，这种压力并不主要来自组织规模不足，而更多体现为代表性生成机制的变化。知联会通过联系各领域中青年骨干和代表人士，带动更广泛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路径，仍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一些已被组织吸纳的对象虽然具备头衔、荣誉或组织身份，其在行业、社群或公共传播场域中的实际影响力并不与上述身份完全对应；而一些具有专业号召力、平台影响力或行业连接能力的党外知识分子，又未必已经进入既有组织网络。与此同时，部分地区还存在代表人士队伍年龄结构偏高、梯队衔接不够顺畅、后备人选储备不足等情况^[22]。换言之，代表性的形成，已不只取决于组织身份和正式认可，也越来越取决于其能否在具体场域中连接群体、回应议题并推动知识转化。

可见，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的第二重结构维度，体现为身份识别由相对单一的资格识别，逐渐转向由身份、场域、连接和议题共同构成的复合位置识别。这要求统战工作在继续发挥政治面貌、单位系统和代表身份等基础识别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对象所处的具体场域、社会连接、议题能力和转化潜力。只有把组织身份与场域影响结合起来，代表人士工作才能更好实现由对象发现到联系带动、由组织吸纳到功能转化的延伸，从而更有效地连接广谱化背景下的知识群体。

（四）符号资本生成机制的平台化：从专家头衔到议题影响力网络

知识生产关系和身份识别方式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党外知识分子的分布位置和识别方式，也进一步影响其社会影响力的形成方式。对于党外知识分子而言，专业知识不会自动转化为公共影响；学历、职称、学术成果、专业荣誉和单位声望，只有在特定场域中被承认，才会成为可被动员的社会资源。社会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拥有和可动员的资本结构及其存量，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不同资本也只有在特定场域及其评价规则中才能产生效力^[23-24]。

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和新媒体环境正在改变知识影响力的生产方式。知识权威不再只依赖论文、专著、核心期刊、专家头衔和组织任职，也越来越依赖平台能见度、议题发起能力、传播触达能力、社群黏性和公共解释力。数字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一定以传统专家身份出现，却可能在平台和社群中形成较强议题影响力。阅读量、转发量、评论数、完播率、停留时长与社群留存等指标，逐步成为衡量知识影响力的新尺度；在部分公共传播场景中，传统以收录和引文为核心的知识合法化机制，同样受到平台机制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平台流量只能作为传播触达的辅助指标，不能替代政治素质、专业信誉、社会责任和持续贡献等实质性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平台指标天然优于专业评价，而是说明知识影响力的社会生产机制已经发生变化。统战工作如果仍主要用专家头衔和组织职务衡量影响力，就难以充分把握平台化环境下知识影响力的实际生成方式。数字时代的统战工作不是传统统战工作的简单线上延伸，而是运用算法重构政治识别、话语转换、网络连接和叙事生产的治理过程^[25]。因此，统战工作在识别平台型知识主体、运用传播数据和配置数字场景时，应把技术效能与政治标准、专业信誉和伦理规范结合起来，避免将流量指标简单等同于社会影响力或代表性。

从供给侧看，活动结构也能反映知识资源和社会影响力转化的实际情况。以样本地区知联会和新联会微信公众号活动数据为例，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间，新联会共开展活动484项，知联会共开展活动283项。从活动类型看，新联会政治组织活动占45.5%，政治参与活动占6.0%，组织凝聚活动占28.5%，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占12.0%；知联会政治组织活动占60.9%，政治参与活动占15.7%，组织凝聚活动占12.8%，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占2.5%^[26]。其余活动包括社会交流活动、学术活动和庆典活动，新联会分别占4.1%、1.7%和2.2%，知联会分别占6.4%、1.4%和0.3%。这一结构表明，知联会在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同时也提示，围绕日常联结、社会服务和公共参与等场景，仍有进一步丰富活动供给和拓展功能转化空间的可能。

从需求侧看，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参与意愿，与组织供给能否回应其专业表达和功能发挥需求密切相关。在“知联会对个人帮助程度”的题项中，17.9%的受访者认为知联会活动“帮助较大”；在“知联会最重要功能”多选题中，64.2%的受访者选择“调研与建言献策”；在“若知联会定位更加清晰、功能更加侧重高质量建言平台，参与意愿是否提高”题项中，26.9%的受访者表示“意愿大幅提高”，46.9%表示“意愿有所提高”，二者合计为73.8%^[27]。这说明，提升组织吸引力和参与黏性，需要进一步把党外知识分子的专业判断、行业经验、议题表达和平台传播能力，转化为建言资政、公共沟通和专业治理等方面的实际效能。

总的来说，统战组织不仅需要识别党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符号资本，也可以为不同资本形态的转化提供制度化场域。例如，将专业文化资本转化为政策建议，将平台传播资本转化为公共沟通，将行业社会资本转化为治理协同，将个人声望转化为组织化公共效能。当前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如何使相关活动更充分地进入知识生产、议题形成和政策转化过程，而不只是停留在组织动员和一般参与层面。由此看，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的第三重结构维度，体现为符号资本生成机制的平台化：知识影响力的形成不再只依赖专家头衔、单位声望和组织身份，也越来越与议题影响力、社群连接和平台传播能力相关。统战工作也需要在识别代表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知识资本转化为公共价值和统战效能的能力。

四、对象再识别与机制优化：知识功能型统战的框架运用

党外知识分子的广谱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对象规模的扩张，而应放在知识生产关系、身份识别方式和符号资本生成机制共同变化的过程中加以把握。知识劳动从传统单位体系向市场、平台、社群和项目网络延展，使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更加多元；学历、单位、职称和界别等传统资格标识仍具有基础识别意义，但已难以完整呈现知识主体的场域位置、连接能力和公共作用；知识影响力也逐渐超出专家头衔、单位声望和组织身份的单一路径，更多在议题传播、社群互动和平台可见性中形成。广谱化的关键不只是对象数量增加，更在于作用方式和影响路径的变化。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仍需发挥身份识别、组织联系和代表人士工作的制度优势，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回答“谁在发挥知识功能”以及这些作用“如何通过组织机制转化为统战工作效能”等问题。

综上所述，机制优化的重点在于进一步解决不同知识功能如何被识别、嵌入和转化。需要说明的是，制度嵌入型、社会传播型和行业专业型并非严格排他的身份分类，而是从知识功能发挥方式出发提炼出的三种理想类型（如表3所示）。现实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功能属性，例如既在专业领域中承担行业治理角色，又通过公共表达参与议题传播。

表3 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对象类型与工作路径

维度	制度嵌入型	社会传播型	行业专业型
主要场域	在制度和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政策设计、制定与执行的党外知识分子	在公共领域、媒体、社群及线下空间从事知识生产与社会传播的党外知识分子	在专业机构与行业领域（如医院、科研院所、企业、律所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党外知识分子
重要性来源	政策参与经验、专业判断和制度协同能力	议题阐释力、传播触达力、社会连接力和公共信誉	专业资格、技术能力、行业网络和风险识别能力
扮演角色	政策顾问、制度建构者、治理执行者	公共议程阐释者、知识传播者、公共沟通者	专业知识生产者、行业引领者、风险提示者
影响途径	政策设计、制度供给、政策工具	演讲、写作、传播、社会联动与公共倡议	标准制定、专业评审、行业治理
工作目标	提升建言资政、政策协商和治理参与效能	增强正向传播、公共沟通和凝聚共识效能	促进专业治理、标准共建、风险预警和社会服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还需要在一般性联系基础上,增强类型化嵌入的意识。不同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相同:有的深度参与制度过程,主要通过决策咨询、政策评估、立法论证和治理执行发挥作用;有的活跃于公共领域和数字平台,主要承担议题解释、公共沟通和价值引导功能;有的扎根行业和专业共同体,主要通过标准制定、专业评审、行业治理和风险预警贡献公共价值。相应地,后续工作不宜仅以单一活动供给或统一组织路径回应所有对象,而应围绕政策供给、社会沟通和专业治理等不同功能场景,形成更加精准的对象识别、平台配置和成果转化机制。在操作层面,可从三个方面推进机制优化。

第一,完善动态化功能识别机制。党外知识分子的识别,除了政治面貌、单位系统和代表身份等基础信息,还应关注其在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中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和转化知识的实际能力。可围绕专业能力、场域位置、议题影响、组织意愿和转化潜力等维度,建立分层分类的对象库,并结合职业流动、公共参与和议题贡献进行动态更新。

第二,完善议题牵引的场域嵌入机制。不同类型党外知识分子并不必然进入同一种组织形态,也不宜依靠同一种活动方式发挥作用。统战组织可围绕重大政策议题、行业治理难题、公共沟通任务和社会服务需求,形成“议题—对象—平台—成果”的项目化工作链条,使不同知识主体在具体场景中发挥作用。对于制度嵌入型主体,可重点配置决策咨询、政策评估和成果采纳场景;对于社会传播型主体,可重点配置公共沟通、议题解释和价值引导场景;对于行业专业型主体,可重点配置标准制定、专业评审、风险预警和行业治理场景。

第三,完善知识转化的闭环反馈机制。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成效评价,不宜仅以活动次数和参与人数为主要指标,还应更加关注建言采纳率、议题转化率、协同部门数、公共沟通效果和持续参与意愿。通过形成“发现对象—匹配议题—配置场景—形成成果—反馈激励—持续参与”的闭环机制,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力可以在参与、转化和再参与中形成稳定循环,统战组织也能够从一般联系平台进一步拓展为知识功能的组织化转化平台。

知识功能型统战是在既有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体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延展。身份识别、组织联系和代表人士工作,仍然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性支撑;在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其不同场域中实际发挥的知识功能,并通过制度化机制将其转化为建言资政、公共沟通、专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效能。未来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简单扩大工作口径,而在于以更清晰的对象边界、更精准的功能分类和更稳定的转化机制,提升统一战线对知识群体的联系服务、组织动员和公共价值转化能力。

知识功能型统战的核心是以知识功能为识别线索,以场域嵌入为组织方式,以制度化转化为效能目标,推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在对象识别、组织联系和作用发挥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衔接。它既延续了统一战线团结人、联系人、引导人的传统优势,也回应了知识生产社会化、身份结构复合化和公共影响平台化带来的现实变化。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能够在广谱化背景下,把分散于制度、市场、平台、社群和行业网络中的知识能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专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际效能,从而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力和贡献度。

五、结语

党外知识分子的广谱化,并不只是工作对象数量增加,而是知识主体的职业位置、社会连接

和影响力生成方式趋于复合化。传统资格识别仍然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但仅凭学历、职称、单位和界别等指标，已难以完整把握知识主体在具体场域中的实际作用。统战工作需要进一步关注其场域位置、议题能力、社会连接和知识转化潜力，从而更准确地识别谁在何种情境中发挥知识功能。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不仅要有静态的定性，也要对动态的实践作出规定和描述^[28]。本文提出的“知识功能型统战”的分析框架，是在坚持政治引领、组织联系和代表人士工作的制度基础上，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识别和机制优化作出补充性分析。其核心在于通过“收缩外延、扩大内核”明晰对象识别重点，并以动态识别、议题牵引、场景配置和闭环反馈等机制，连接知识生产、组织联系与公共价值转化。由此，党外知识分子的专业判断、行业经验、公共表达和社会连接能力，能够更稳定地转化为建言资政、公共沟通、专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效能。

党外知识分子广谱化仍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本文资料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及若干行业系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and 不同平台场域中的知识群体结构、组织连接方式和作用路径仍可能存在差异；平台影响力、组织参与和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更长时段的经验资料加以检验。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区域比较、行业案例和组织运行数据，考察知识功能识别、场域嵌入与制度化转化在不同情境中的实现条件，从而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供更加细化的经验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 求是, 2024(2): 4-7.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人口受教育情况[EB/OL]. (2021-05-11)[2026-06-15].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6.html.
- [4]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6-11)[2026-06-15]. https://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 [5] 方维规. “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5): 191-202.
- [6] 李放春. “知识分子”一词源流新考[J]. 开放时代, 2025(1): 176-193.
- [7]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成果蓝皮书: 2009—2010[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1.
- [8] 梁君思. 党外知识分子研究述评: 学科范式与问题意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1): 101-108.
- [9] 李路路, 王薇. 新社会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J]. 河北学刊, 2017(1): 136-140.
- [10] 张海东, 杨城晨. 新社会阶层: 理论溯源与中国经验[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3): 70-84.
- [11] 张海东. 新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组织化及发展趋势[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5): 69-76.
- [12] 李腾. 从单一到协同: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效能提升研究[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5): 117-126.
- [13] 林华山. 圈层统战: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理论视角与升级路径[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29-36.
- [14] 许纪霖. 新媒体的迭代更替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5-9.

- [15] 吴冠军,刘铭康.从公共知识分子到“网红知识分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0-13.
- [16] 胡建国,谭浩博.党外知识分子“大众化”趋势及其对统战工作的启示[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5):105-116.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4.
-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385,418.
-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课题组.企业党外知识分子调查[R].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4.
-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课题组.上海归国留学人员调查[R].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0.
- [21] 韦伯.经济与社会:新版(全二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22]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课题组.大口单位党外知识分子调查[R].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1.
- [23]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258.
- [24]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M]. NICE 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2-121.
- [25] 高进,黄种兴.算法社会的数字统战:范式转型、运作机制与伦理规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166-178.
-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课题组.知联会与新联会活动数据分析报告(2020—2023)[R].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2.
- [27]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战研究基地课题组.长三角地区知联会调查[R].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3.
- [28] 林华山.建设力:统战工作一个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样本[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1):5-12.

责任编辑:卢媛 校对:王京菁

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现实表征、深层困境与引导策略

蒲清平 王嘉欣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扎实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与凝聚服务工作, 是巩固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在社会结构转型、数智技术迭代与资本逻辑扩张的多重语境叠加下, 新就业群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新兴主体, 在推动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 也面临效率与尊严、弹性与保障、流动与扎根之间的矛盾冲突, 特别是在平台算法异化支配、社会加速主义裹挟、绩效量化考核驱动及数字评分机制规训等外部系统性冲击下, 呈现出“强自主”与“弱掌控”、“高流动”与“弱归属”、“重效率”与“轻保障”、“高期望”与“低回报”并存的多重样态, 存在“急”存续、“难”融入、“愁”发展与“盼”尊重等深层困境。有效凝聚和引领这一新兴劳动力量, 亟须夯实思想引领的政治认同根基、构建技术驱动的制度保障体系、打造虚实交互的社群联结机制、开辟技能迭代的专业发展通道, 让新就业群体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强认同感、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推动这一社会“管理变量”转化为发展“治理增量”, 为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新就业群体; 数智时代; 思想样态; 算法支配;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063-12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4.005

作者简介: 蒲清平,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嘉欣,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25BKS103)

引用格式: 蒲清平, 王嘉欣. 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现实表征、深层困境与引导策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63-74.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深度赋能,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了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电商从业人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作为数字劳动形态的具象化呈现,该群体以“去雇主化”“平台化依附”为典型特征,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以来,平台经济年均新增就业岗位占全国比重稳定在22%以上,已累计吸纳超2.3亿人就业,成为稳就业的关键载体^[1]。新就业群体在享受平台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与高效匹配的同时,也因算法控制的隐蔽性、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碎片化,面临社会认同感偏低、职业尊严感不足等现实困境。数智技术迭代亦可能加剧部分从业者的生存焦虑、群体疏离、未来迷茫与身份危机,形成“劳动自主性”与“算法从属性”并存的复杂局面。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如何将新就业群体这一庞大社会力量有效纳入统战工作视野,构建适配数智时代特征的思想引导机制与价值引领体系,实现从“管理变量”到“治理增量”的逻辑转型,已成为有效联系、服务与凝聚这一庞大群体的重要课题,更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扩大党在新兴领域号召力、凝聚力与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新就业群体”是指基于平台经济、非固定就业、劳动过程高度依赖互联网、就业方式非标准化的平台劳动者^[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及“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3]。202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强调要“不断增进新就业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4],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从权益保障上升至思想引领的新高度。

自“新就业群体”提出以来,诸多学者围绕出场逻辑、特征要素、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一是从出场逻辑看,新就业群体在互联网、数智技术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产生^[5],依托虚拟与实体生产体系灵活协作的工作方式而立^[6],活跃于商品流通、生活服务和文化培训等广阔空间之中^[7],成为数智时代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社会群体。二是从特征要素看,新就业群体主要以平台为组织载体,以算法为管理中枢,以数据为生产资料,以流动性为生存常态。从外部看,该群体呈现“覆盖广泛、高度分散、流动性强”^[8]的空间特征,以及“平台化”就业与“弱组织化”劳动关系的结构性特质^[9]。从内部看,基于劳动关系、空间场域与社会资本的异质性,该群体呈现“利益诉求型、政治吸纳型、社会服务型”^[10]等不同类别。三是从现实困境看,新就业群体存在“原子化、流动化、网络化”^[11]形态,传统党建模式面临“有而不全、散而不力、广而不强”^[12]的覆盖难题;思想引导工作存在“广而不深、融而不透、有而不优”^[13]的效能困境;保障方面存在传统社保体系与新就业群体“就业方式多样化、数字化”^[14]的兼容难题。四是从破解路径看,学者们指出既要通过“思想引领与政治认同培育”^[15]重塑集体观念,又要以“情感嵌入”^[16]强化组织凝聚力,还要建立“分层分类的弹性适配机制”^[17],构建起纵向穿透、横向联结、多维整合的协同治理网络。

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数智技术对新就业群体发展的双重效应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议题。学者们认为,数智技术一方面破界赋能,通过“线上认证—线下准入”的创新模式,将传统的“共同在场”空间限制拓展为全域性、跨时空的就业在场形态^[18],并通过AI快速实现“人—

技一岗”精准匹配，促进新就业群体获得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替代效应正在改变就业机会分布，拉大劳动者的能力与收入差距，构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冲击，“高流动性、低保障性”的困境可能引发社会凝聚力弱化的潜在风险^[19]。

综上，既有研究在探讨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发展现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聚焦于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外部因素，对其内在思想样态的关注相对不足。在数智浪潮影响就业结构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现实表征及深层困境，探索构建科学有效的引导策略，对深刻理解其生存状态、提升服务效能，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现实表征

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自我认知、社会心态和情绪情感等，是客观生存际遇在主观世界的折射与凝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20]根据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21]。在数智时代，他们受算法支配、社会加速、绩效驱动与数字评分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就业形态的生存际遇与思想样态。

（一）算法支配下的“强自主”与“弱掌控”

新就业形态打破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凭借就业形式多元化、组织方式平台化等优势，构建起“即插即用”的灵活用工生态。平台算法通过即时派单、弹性计酬、自主接单等功能，赋予新就业群体接单自由、时间灵活、多劳多得等实际便利与主观感受。与传统雇佣劳动相比，新就业群体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标准的工位与明确的职业边界，无需遵守固定的考勤制度、接受严密的现场管理，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段与接单强度，形成了相对自由的生活节奏与行动秩序，在主观体验上生成“强自主”表象。然而，数智时代人类生活被算法深度支配，新就业群体劳动过程被算法规制、价值认同被算法评价、未来预期被算法牵引。以外卖配送员为例，在任务分配环节，算法依据历史数据与实时供需动态调节订单流向，从业者的实际收入高度依赖于系统的派单偏好，自主选择空间极为有限；在任务执行环节，算法对配送时限、行驶路线构成刚性约束，从业者的劳动节奏被系统精确控制；在绩效评估环节，评分机制将用户评价直接折算为收入与接单权限。如网约车司机在听单模式下长时间滞留于特定区域等待派单，却无相应等待薪酬保障；骑手为缩短配送时间摸索出的非常规路线，很快被系统认定为该距离的标准配送时间，原本的应对策略反而成为强化控制的工具。可见，“强自主”仅是平台技术设计制造的表象，“弱掌控”才是新就业群体算法化生存的实质。

（二）社会加速下的“高流动”与“弱归属”

当代社会呈现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现象，三者相互强化形成加速循环^[22]。科技加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即时通讯使新就业群体“随时待命”，平台算法

的实时派单与动态调度将劳动时间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工作对个人时间的侵占,使得劳动者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嵌入工作”,在工作中“构建生活”;社会变迁加速导致职业生命周期持续压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长期结合走向短期分离,知识技能更新迭代加快,从业者面临“35岁现象”、平均1至2年变换一次工作岗位等职业焦虑;生活节奏加速使个体陷入“忙—盲—茫”困境,新就业群体被裹挟在接单、配送、考核的循环中,难以获得与自我对话的闲暇。高流动的代价是传统归属机制的瓦解。新就业群体常年穿行在路上,工作在“云”端,一线快递员日均投递200件以上,网约车司机月均工作27.5天,货车司机每天开车10小时以上的约占一半^[23]。有研究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个体从传统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却未能实现有效的“再嵌入”^[24]。新就业群体终日穿梭于城市之中,其劳动深度嵌入社会运行,呈现身体“在场”与情感“疏离”的现象,既难以在固定社群中沉淀稳定的情感联结,亦难以从平台中获得身份认同,“没有归属感”成为新就业群体对平台不满的重要因素。以网约家政服务人员为例,大部分从业人员需要同时服务多个不同区域的家庭,与平台仅存在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传统的组织归属模式难以适用。可见,社会加速塑造了新就业群体“高流动”的客观处境,“弱归属”则使其陷入情感漂泊的状态。

(三) 绩效驱动下的“重效率”与“轻保障”

绩效驱动下的平台资本逻辑,表现为资本以数字生产力为手段、以利润获取为本质的二重性^[25]。平台通过算法将复杂劳动简化为可量化、可监控、可优化的数据流,并以“最短时间”“最优路径”“最高评分”为指标,构建起一套精密的绩效评价体系。这一体系通过积分等级、阶梯式奖励等制度设计,将劳动效率与收入回报直接挂钩,使从业者形成“时间就是收入”“效率决定收益”等价值认知。从业者为维持等级、获取奖励,倾向于持续提高劳动强度,将平台设定的效率标准内化为自身的职业伦理,塑造出“重效率”的普遍追求。与此同时,资本增殖的本能驱动平台压缩用工成本、模糊劳动关系、规避保障责任。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等灵活用工形式,将传统雇主责任转嫁于劳动者个体,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与社保参保率持续处于低位。调查显示,新就业群体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不足三成,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四成^[26],未接受过就业公共服务的约占七成^[27]。截至2025年10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覆盖11家平台企业,参保人数累计2325万人,覆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8]。在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的背景下,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平台通过动态抽佣、奖励浮动等机制将经营风险部分转嫁给劳动者,而繁琐的理赔流程与模糊的责任认定使许多从业者在遭遇工伤或事故后选择放弃维权。在个人全额承担社保费用的现实约束下,从业者倾向于将有限收入优先用于当下生活开销,形成“重当下、轻未来”的生存选择。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显示,仅42%的平台青年劳动者对工作现状满意,对未来5年有明确规划的仅占33%^[29]。可见,资本逻辑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会导致保障被边缘化,“轻保障”成为新就业群体无奈的生存现实。

(四) 数字评分下的“高期望”与“低回报”

新就业群体普遍期盼可靠的职业安全、合理的利益分配、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有效的社会融入。他们既期望获得稳定收入与基本生计保障,也追求职业尊严、社会认可与价值实现。有从业者坦

言：“哪条巷子垃圾堆积、哪个小区路灯不亮，都看在眼里”，希望简化上报流程为社区出力；也有从业者希望建立反馈机制，“能看到问题处理进展”，以保持参与积极性。“社会尊重我们，我们也乐意为大伙儿做点事”，这些朴素表达折射出新就业群体对职业价值显性化、社会地位平等化的深层期待。然而，数字评分机制下的现实却是“低回报”，例如，一个与己无关的差评扣分就相当于“五单白干”；平台申诉机制缺位，从业者只能“认倒霉”，收入因此陷入高度不确定性。精神上的回报同样艰难，为了争取好评，骑手可能不仅要承受常规的送餐压力，还要满足顾客提出的一些额外要求：代买商品、满足个性化诉求，甚至被迫完成与劳动本身无关的表演性任务。好评难得、差评易得，劳动尊严高度依附于算法生成的数字评价。“高期望”与“低回报”之间的持续落差，催生了新就业群体的焦虑、挫败与身份迷失。

三、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深层困境

马克思指出，意识的根源不在于其内部自身，而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0]。数智时代为新就业群体带来了灵活就业的便利，也使他们面临一系列深层困境。

（一）“急”存续：技术替代下的生存焦虑

数智技术的加速迭代正在重塑就业市场的底层逻辑，涌现大量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技术手段，又尚未及时为劳动力找到新的用途，“技术性失业”正从未来的焦虑走向眼前的现实。有研究预测，未来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可能被 AI 替代，新就业群体所从事的配送、驾驶和电商等岗位，恰恰处于技术替代的“高风险区”，构成了新就业群体生存焦虑生成的压力源。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未有效覆盖新就业群体。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以传统雇佣关系为基础，而新就业群体多属于平台经济的灵活用工形式，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在失业保险、职业培训、再就业服务等方面存在制度盲区。多数新就业群体与平台签订的是合作或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最低工资标准、带薪休假、社会保险缴纳等权益常无法落实。部分平台企业通过协议刻意去劳动关系化，要求劳动者先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以民事承包方身份签订承揽协议，将本应属于劳动法调整的用工关系转化为民事合作关系，加剧了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境遇。资本具有规避风险的能力，而劳动者长期处于风险之中，在面对技术替代时缺乏制度性缓冲。

二是平台技术迭代引发就业替代焦虑。平台经济通过算法将劳动拆解为标准化、可监控的操作单元，使得劳动者原有的路线规划、时间判断与人际沟通等经验性知识贬值，“机器换人”很可能演变为“机器裁人”。与此同时，算法系统的“黑箱”特性使平台决策逻辑、派单规则、收入测算高度不透明，从业者对影响自身职业前景的关键变量知之甚少，只能被动接受算法输出的结果。

三是群体脆弱性制约自身技术应对能力。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因经济社会地位与能力储备尚不足以有效应对技术风险而表现出“群体脆弱性”。一方面，从就业结构看，新就业群体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生活服务型工作为主，劳动者多为农村户籍的青年男性，普遍受教育程度有限，岗位技能单一、可替代性强，缺乏跨行业流动的知识储备与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风险往往向资源匮乏的底层群体聚集，新就业群体对平台技术的深度依赖与对未来走向的无法掌控，形成了“平台依赖即生存依赖”的心理锁定效应，进一步削弱了其面对技术

迭代时的自主调适能力。

（二）“难”融入：数智壁垒下的群体疏离

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在重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与群体离散化^[31]。新就业群体的特殊行动逻辑与我国长期形成的、以空间为核心的“属地化”治理模式之间存在明显错位，造成了脱域流动特征与传统属地治理之间的张力^[32]，面临职业流动高频化、空间归属虚无化、社会承认边缘化的“城市过客”困境，形成了数智壁垒下的群体性疏离。

一是职业流动的高频化侵蚀了新就业群体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新就业群体普遍处于频繁更换平台、工种甚至城市的流动状态，缺乏清晰的岗位边界与单位归属。不论是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还是网约车司机，多以个人账号为行动单位，较少与同行保持持续互动。这种高度个体化、去组织化的主体形态，使其难以在组织内部形成稳定互动关系。稳定的情感联结需要持续的互动与时间沉淀。新就业群体难以在某一社区或职业群体中形成持久可靠的人际关系，熟人关系因流动频繁而维系成本极高，陌生人之间又难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社会网络呈现出“高广度、低深度”的特征，即便长期活跃于城市之中，也难以真正扎根于当地的社会结构，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

二是劳动空间的算法化调度削弱了新就业群体固定的空间归属。“生产的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某个空间上”^[33]，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新就业群体的劳动空间完全由算法驱动，平台通过GPS定位、实时派单与动态规划使从业者无法在任一空间中稳定停留，难以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在平台与移动导航地图的合力之下，其劳动实践穿梭于“平台劳资空间、导航数字空间和城市物理空间”^[34]之中，缺乏社会融入的基础物理载体。

三是社会承认的边缘化加剧了新就业群体的疏离状态。大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往往不是基于直接经验，而是由媒体建构的符号世界^[35]。在流量逻辑主导下，部分短视频账号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作为摆拍“重灾区”，假借其职业身份打造“入不敷出”“社会尊严感低”等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等虚假故事。经由媒体放大、以“悲惨化”和“猎奇化”为特征的符号呈现，掩盖了新就业群体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真实职业生态与日常需求，使公众对其形成刻板印象乃至负面偏见。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依赖于“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形式^[36]。如果新就业群体在情感层面缺乏家庭与社区的温暖承认，在制度层面缺乏稳定劳动关系与平等公民权利的法律承认，在社会层面缺乏对职业价值的尊重与肯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群体疏离。

（三）“愁”发展：前景模糊下的未来迷茫

数智技术在提升就业匹配率与工作灵活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压缩新就业群体的技能价值。从业者普遍缺乏晋升通道、技能积累与稳定预期，陷入“过渡劳动”的长期困境，对未来感到迷茫。

一是发展通道窄化限制向上流动空间。在平台生态中，新就业群体嵌入程度较低，劳动关系高度扁平化，长期停留在同一技能层级，缺乏职业能力提升和岗位晋升机制。他们陷于重复性、碎片化工作中，既无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难获得转型所需技能培训，面临“低技能劳动—低培训—低质量就业”的循环。

二是绩效逻辑内化催生短视生存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平台算法通过积分等级、奖励阶梯不

断向从业者释放“赶超他者”“成为更好自己”等信号，使劳动者将平台设定的效率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从业者被迫持续冲刺以维持等级与收入，过度刺激容易导致精神疲惫，自我剥削引发心灵燃尽。高压环境也催生了新就业群体以“即时生存”为导向的职业心态，呈现“挣快钱、缺规划”的倾向。

三是技能持续贬值弱化发展信心基础。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电商平台加速了对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剥夺”，部分长期从业者“什么技能也没有学会，甚至平台更智能了以后，‘老人’的经验也不值钱了”。面对数智技术的全面渗透，一些从业者陷入适应性困境，逐渐形成了“无论投入多少时间，技术迭代总能轻易绕过既有技能”的认知定势。发展本应包含物质的增长与精神的升华，但技能持续贬值容易使新就业群体陷入习得性无助，对未来感到迷失。

（四）“盼”尊重：量化评价下的身份危机

数智时代呈现出“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术、日益量化的社会”^[37]三元特征。在平台经济的运行逻辑中，评价机制已从服务质量的反馈工具演变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使新就业群体面临外部评价持续主导的自我认知困境，面临身份认同从自主建构转向被动依附的结构性危机。

一是算法评分造成尊严异化危机。在平台劳动过程中，评分系统不仅是收入分配的技术工具，更成为职业价值的度量标准。评分机制将复杂的服务质量简化为单向度的数字等级，通过“好评—差评”的二元对立对从业者实施持续的评估、分类与矫正。取悦顾客、争取五星好评所付出的“情感与情绪劳动”，其折损和消耗远甚于体力劳动。部分从业者在面对平台要求的标准化礼貌用语及“请求好评”等行为时，会产生显著的心理不适与角色冲突，既感到与其既往生活经验与社会身份不符，又不得不服从于算法评分体系的隐性控制。

二是符号标签引发身份焦虑危机。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社会互动中存在“前台”与“后台”的划分：前台是按社会期望进行标准化表演的舞台，后台则是卸下角色、回归真实的私密空间^[38]。新就业群体在公共场域中常被赋予“流动者”“临时工”等符号标签，因着装规范、空间准入等隐性规则较少参与主流社交场景，被迫长期处于高压的“前台”表演状态。超长的工作时间、巨大的环境落差、波动的整体收入，进一步强化了自身是弱势群体的自我认知，持续削弱着新就业群体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连接，使其难以获得平等的身份认同。

三是外部评价催生认同弱化危机。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既需要社会承认，更需要自我确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我确认的空间被挤压：平台算法是“看不见的评价者”，用户评分是“随时在场的评价者”，社会舆论是“无处不在的评价者”，新就业群体自身反而失去了定义“我是谁”的自主权。新就业群体身份认同被不同的外部评价所主导，不同评价体系之间的冲突使从业者陷入角色分裂，难以形成稳定、连贯的自我认知。

四、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思想样态的引导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39]群众的难题就是时代的课题，新就业群体中“有很多有本事的人”，通过加强思想引领、完善制度保障，提升他们的认同感、安

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可将这一社会“最大变量”转化为发展“最大增量”。

（一）增进认同感：夯实思想引领的政治认同根基

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引领，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宣讲党的政策、化解思想心结、畅通表达渠道，增进他们的政治与思想认同。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结合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分散度高、时间碎片化等特点，创新思想引导方式。探索“精准滴灌”式教育，依托平台企业 APP、政府端服务管理小程序等载体，开发微视频党课、职业培训课等轻量化学习产品，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与新就业群体密切相关的生活话语。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在配送站点、暖心驿站等实体空间设置学习角，利用晨会、休憩等碎片时间开展“微宣讲”。在讲理论、讲政策的同时，可针对技能提升、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步提供关爱服务，使思想政治工作可感可及、入脑入心。

二是选树先进典型，激发情感共鸣。持续开展“最美快递员”“最美外卖员”“最美网约车司机”等评选活动，深入挖掘爱岗敬业、服务社会、参与治理的身边榜样。利用主流媒体、平台客户端、社群传播等渠道，广泛宣传先进事迹，将政治认同具象化为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鲜活典型。通过“劳动故事”分享、榜样人物宣讲，从业者可以在叙事中重新发现自身劳动的社会价值，将主流价值转化为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

三是畅通参与渠道，增进政治认同。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活跃度高，具有“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职业优势，渴望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制度设计上，应落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的“到 2027 年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要求，依托平台企业、街道社区建立党支部或流动党员服务站，将政治吸纳融入日常管理。实践探索上，可推广宝鸡市“新渭骑士”、北京延庆“骑手共治”和遵义“骑行哨兵”等模式，选聘优秀从业者以“随手拍、随手报”等方式反馈问题线索，打造“网格信息员、文明宣传员、爱心接力员、应急辅助员”队伍，建立“发现问题—反馈问题—获得积分—积分兑换”闭环机制，实现行政监管与新就业群体双向赋能。同时，搭建“小哥议事会”“骑手恳谈会”等协商平台，邀请从业者参加社区议事厅，就充电设施、休息场所等实际诉求建言献策。配套建立积分激励与荣誉标识制度，使政治认同与个人获得感相互增进。

（二）筑牢安全感：构建技术驱动的制度保障体系

技术替代的系统性风险与个体应对能力的有限性，要求安全感的筑牢需要从国家制度供给、平台规则优化与个体能力建设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构建一套系统、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一是国家完善制度保障，筑牢安全底线。技术替代风险具有系统性和不可控性，单靠个体无法抵御，必须由国家提供基础性制度兜底。其一，加快建立适应平台用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按单缴费、平台承担”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打破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参保壁垒；依托平台大数据建立“劳动轨迹即参保依据”的认定机制，将接单时长、收入流水等纳入参保资格与缴费基数核定，实现“一次注册、全网通保、随走随转”。推动 2026 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

全国 31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全覆盖目标。其二，探索设立“技术替代保障金”。可从平台企业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基金，为因无人配送、智能驾驶等技术替代而失业的从业者提供过渡期生活补助与转岗培训支持，降低结构性失业带来的系统性生存冲击。其三，建立就业风险智能预警系统。依托大数据分析，对技术替代风险较高的区域、岗位进行动态监测与早期预警，提前部署社保衔接、转岗培训等干预措施，将对风险的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预防。

二是平台优化算法规则，化解技术焦虑。作为新业态的枢纽，平台企业的算法决策直接影响从业者的职业安全与收入预期。其一，确立公正合理、公平协调、公开透明的算法优化原则。主动公开配送时限、抽佣比例、奖惩标准等核心算法规则，接受工会与第三方机构监督。采取“算法取中”原则，在效率与人性化之间寻求平衡，设置合理的劳动定额与配送时限，避免以“最严算法”过度规制劳动者。其二，建立畅通的算法申诉与反馈机制。当从业者遭遇不合理派单、恶意差评或误判处罚时，应有便捷的申诉渠道和快速纠错程序，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减少“算法黑箱”带来的不公平感与失控感。其三，推动平台与从业者共建风险缓冲机制。鼓励平台设立“互助保障基金”，为遭遇重大疾病、交通事故等意外的从业者提供临时救助，缓解个体独自承担风险的脆弱性。

三是个人提升数智素养，增强抗风险能力。新就业群体应主动学习算法常识与申诉规则，理解平台运行逻辑，及时发现技术替代风险。遇到算法不公或权益受损时，应善于利用平台内设的申诉渠道维权。同时，主动参与心理疏导服务，缓解焦虑情绪；积极组建或加入同行互助小组，通过经验分享与情感支持增强群体韧性。此外，自觉参加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减少工作中的人身与财产风险。

（三）强化归属感：打造虚实交互的社群联结机制

归属感是人们在保障基本温饱和安全后最重要的需求。依托数智技术打造虚实交互的社群联结机制，有助于将原子化的新就业群体重新编织进有温度的社会网络。

一是加强虚拟社群联结，增强组织归属感。针对新就业群体触网率高、时间碎片化、线下交往受限等特点，党群组织应主动介入线上社群运营，探索流出地流入地相配合、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流动教育管理模式，推动社群从功能性的“信息圈”向情感性的“共同体”转化。在现有活跃社群中培育向上向善力量，鼓励他们分享工作感悟、生活故事与价值思考，以真实的情感流动替代纯粹的信息交换。平台应探索“社群积分”等互助激励机制，对提供情感支持、参与困难援助的成员给予认可，强化社群内部的互助氛围，使虚拟空间成为从业者的“精神家园”。同时，有效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延伸党的工作覆盖范围。加强对平台企业的党建嵌入，形成以平台为节点、以功能嵌入为主要方式的组织创新路径。

二是嵌入实体服务载体，增强空间归属感。在社区、商圈等场所嵌入“友好驿站”“暖新空间”等实体场景，提供休憩、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依托这些空间组织主题沙龙、技能交流、心理互助等线下活动，使从业者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实现共时性交往，将线上“弱联结”转化为线下“强互动”。同时，推进“歇脚有去处、就餐有优惠、冷暖有关怀、形象有展示、安居有保障”五有服务，协调解决住宿、餐食、停车、道路通行等实际问题，有效缓解劳动者“吃饭难、喝水

难、休息难、如厕难”等现实问题。

三是营造友好从业环境，增强价值归属感。推动社区、商圈、物业与平台企业协同，建立多方协商机制，促进从业者与居民、保安、商户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减少因平台用工规则引发的矛盾冲突。同时，在虚拟社群与实体空间中倡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鼓励从业者之间共享工作经验、安全技巧与心理调适方法，形成“老带新”“熟带生”的日常互助氛围。依托平台建立“困难援助通道”，对遭遇重大疾病、交通事故等意外的成员提供临时救助或爱心众筹。设立“互助时间银行”等新模式，将成员参与帮扶、分享知识等行为折算为积分，用于兑换实物奖励或优先享受平台服务，将原子化的个体凝聚为有温度的价值共同体。

（四）增强成就感：开辟技能迭代的专业发展通道

以数智化赋能职业发展，通过职业晋升引导、培训体系重构、劳动意义重塑等，帮助从业者在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看见方向、找到出路、重拾意义，消解前景模糊下的价值迷茫。

一是以职业评级畅通晋升通道。推动平台企业与职业院校、人社部门等多主体协同，建立与新就业群体劳动特征相匹配的职业评级体系。将接单量、好评率、安全记录等日常劳动数据纳入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指标，打通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晋升阶梯。制定各等级对应的知识技能、操作规范与服务能力标准，明确从低等级向高等级晋升所需的最低从业时长、绩效门槛与培训学分。打通跨平台、跨区域的等级互认机制，避免从业者因更换平台而“等级清零”。同时，鼓励平台企业为获得更高技能等级的从业者提供订单补贴、优先派单、管理岗位选拔、意外保险升级等实质性激励，并在客户端展示等级标识，增强职业认可。

二是以灵活培训加强能力积累。新就业群体需要具备持续终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利用人工智能的创新能力、多次灵活就业的适应能力、不确定性状况的处置能力及智能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等“关键能力”，打造“从波动、混乱和压力事件中受益，实现超越恢复的成长和进化”^[40]的脆弱体质。平台企业应开发模块化、“微认证”式的在线学习平台，将技能拆解为可碎片化学习、可量化认证的单元，使从业者能够利用间隙随时学习、随时考核。培训内容应聚焦智能设备运维、数字化服务、社区社群运营等高技能缺口领域，实现新就业群体从“谋生型就业”到“发展型职业”的跨越。

三是以数智对话重构劳动意义。借助数智平台搭建从业者与技术、社会之间的对话空间：既要组织技术专家、行业研究者与从业者面对面交流，阐释数智技术的边界与人类劳动的不可替代性，帮助理解“人机协作”而非“人机替代”的本质，缓解技术恐惧与焦虑；又要通过线上论坛、直播问答等形式，让从业者就算法规则、职业发展等议题发表意见，使劳动过程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鼓励从业者记录和分享日常工作中的温情时刻、专业付出，在叙事中重新发现自身劳动的社会价值，将劳动意义从算法定义的效率回归到服务人、温暖人的本真。同时，积极宣传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贡献，提高社会认可度与美誉度，增强其职业荣誉感、成就感和自豪感。

五、结语

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反映了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资本逻辑共同作用下

的劳动形态变迁。这一群体在获得就业弹性与数智接入便利的同时，亦面临劳动意义消解、社会归属弱化与价值认同模糊等困境。为此，需要依托数智技术营造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激活劳动者主体性，构建起贯穿意义赋予、制度支持与日常生活的一体化引导体系。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本质上是“投资于人”的长期工程。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包容性的劳动秩序，使新就业群体真正成为有尊严、有归属、有发展的社会主体，让新业态“跑得起来”、劳动者“稳得下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凝聚奋进合力。

参考文献：

- [1] 平台经济促就业如何发力[N]. 经济日报, 2025-06-21(5).
- [2] 杨婧. 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基本逻辑与内涵特征[J]. 科学社会主义, 2025(2): 144-15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8.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EB/OL]. (2026-04-26) [2026-06-12]. https://www.gov.cn/zhengce/202604/content_7066998.htm.
- [5] 李涛. 如何做好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J]. 中国社会工作, 2025(10): 19-21.
- [6] 张成刚. 就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及影响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19): 86-91.
- [7] 储晓东. 做好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5(6): 60-64.
- [8] 严成江, 杨汉秋. 筑“巢”暖“新”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J]. 党建, 2024(3): 49-51.
- [9] 陈彤彤, 岳奎. 新就业群体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情感向度[J]. 重庆社会科学, 2025(1): 51-65.
- [10] 李辉, 彭雨萱, 慕梦. 超越同质化与属地化: 新就业群体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重构与机制重塑——基于全国四个典型案例的归纳[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5(6): 23-34.
- [11] 郑琦. 新就业群体党建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18): 23-30.
- [12] 王金柱, 刘振鑫. 新时代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的实践探索、问题挑战与优化路径[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5(4): 110-118, 136.
- [13] 陈宇飞, 肖丙浩. 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论析[J]. 领导科学论坛, 2025(6): 111-114.
- [14]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J].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23(3): 11-12.
- [15] 曾盛聪, 董沁昕. 激活“新”力量: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组织化的机制与路径[J]. 探索, 2025(6): 74-88.
- [16] 杨建科, 雷恺祺. 从脱嵌到再嵌入: 数字游民的社群联结与情感机制分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2): 215-228.
- [17] 杨慧. 新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中国实践与创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5): 47-55, 97.
- [18] 代玉启, 韩译心. 互动式凝聚: 新就业群体党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机制与路径[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6(1): 44-53.
- [19] 李延昊, 苏竣, 魏钰明. 智能社会新兴就业群体组织重构的关键特征研究——以数字平台劳动者为例[J]. 电子政务, 2025(1): 39-50.
- [20] 习近平.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 求是, 2023(13): 4-16.

- [21] 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N]. 人民日报, 2023-03-27(1).
- [22] 哈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6.
- [23] 积极回应新就业群体期盼[N]. 人民日报, 2025-01-20(14).
- [24]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73.
- [25] 张开. 平台资本二重性: 基于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的探讨[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7): 85-102, 154-155, 157.
- [26] 黄晨熹. “三新”组织和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图景[J]. 人民论坛, 2025(10): 15-21.
- [27] 既活又稳做大就业“蓄水池”[N]. 新华日报, 2025-06-04(3).
- [28] 吴秀章. 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2025年12月22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J].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6(1): 140-143.
- [29]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构建更友好发展环境[N]. 中国青年报, 2026-03-11(6).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5.
- [31]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26-144.
- [32] 刘思齐, 刘雨航. 不确定性工作: 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属性及其治理张力[J/OL]. 人口与社会, 1-19 [2026-06-15].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851.C.20260515.1111.002>.
- [3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189.
- [34] 徐婧, 王婧涵. “网”路里的人: 移动导航地图建构的劳动空间实践[J]. 社会学研究, 2024(4): 114-135, 228-229.
- [35] 王先伟, 朱登. “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视角下两岸认知重塑——以台湾网红“馆长”大陆行直播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6): 169-181.
- [36] 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 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M]. 胡继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26.
- [37] 曹克亮. 算法权力与未来民主: 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基于《算法的力量: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125-136.
- [38]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17.
-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3: 300.
- [40] 肖静华, 盛君叶, 周小豪. 人与数智技术协同的反脆弱能力构建——即时阻断式安全管理模式创新案例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5(11): 70-85.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杨稀琴

“十五五”时期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现实困境与突围之策

龙珍罗尔依 崔佳旭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 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指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依据一定的分类体系和语义标准, 从原始数据加工形成高质量的文化数据集的全过程, 涉及中华文明数字化的发展战略及文化数据资源的整体规划。“十五五”时期, 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 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文化数据主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培育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及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然而, 当前中华文化数据标注面临着高质量中文语料稀缺、数智化程度低和数据分布分散的“数据之困”; 复合型人才短缺、人才结构两极分化和行业人才流失率高的“人才之困”; 统一标准体系缺失、难以满足文化数据复杂性和质量评估标准不完善的“标准之困”; 数据权属不清、政策引导不足和可持续性保障不充分的“治理之困”。面对这些现实困境, 突围之策需立足于发展数字化、多模态的智能标注技术; 打造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梯队; 建立先导性、规范化的标准支撑体系; 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政策引领体系。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既是关乎文化主权与文明传承的战略命题, 亦是推进中华文明数字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数据标注; 文化数据主权; 人工智能; 文化数字化战略; 文化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TP18;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075-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06

作者简介: 龙珍罗尔依,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崔佳旭,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军队院校学员坚定历史自信研究”(22VSZ172)

引用格式: 龙珍罗尔依, 崔佳旭. “十五五”时期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现实困境与突围之策[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75-8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数据标注已构成模型训练的“元劳动”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基础环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指出，数据标注是“连接数据资源、算法模型与实际应用场景的关键桥梁，是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环节，是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核心生产力”^[1]。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指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依据一定的分类体系和语义标准，从原始数据到加工形成高质量文化数据集的全过程，涉及中华文明数字化的发展战略以及文化数据资源的整体规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一定位不仅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更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对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作出了全面部署。2024年，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数据标注产业是对数据进行筛选、清洗、分类、注释、标记和质量检验等加工处理的新兴产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2]。这一战略导向标志着我国文化数字化从基础建设迈向智能应用的新阶段，而如何通过科学规范的数据标注释放文化数据的深层价值，成为当前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据标注的相关议题展开了一定探讨。其一，战略定位。研究指出，语料库、知识图谱、标注资源等对推动语言文字信息化和智能化具有支撑作用^[3]。数据只有经过采集、清洗、标注等一系列劳动过程，才能凝结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化数据产品^[4]。当前，相关领域一般运用 ALBERT-BiLSTM-CRF 模型^[5]、预训练语言模型 SikuBERT^[6]、大型语言模型^[7]等实现数据标注。其二，潜在风险。数据标注劳动多由低技能、高流动性的“幽灵工作者”承担，难以应对专业领域知识的复杂性^[8]，倘若标注人员无法准确理解中华文化的概念内涵，便极易将个人偏见或错误理解编码进训练数据^[9]，而训练数据的偏差会导致模型生成与事实不符或缺乏自洽性^[10]，如果将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纳入某种单一的、带有偏见的分类框架之中，便会埋下误读的系统性风险^[11]。其三，治理路径。数据标注涉及数据提供方、加工方、使用方与监管方等主体，亟须建立“全程可控、处处留痕”的信任机制和多方共治的收益分配秩序^[12]。比如，在构建古籍流传大规模数据集时，可运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元数据的初步抽取，再由古典文献学专业人员进行人工复核^[13]，联合图书馆、科研机构与数据企业等力量，共同构建高质量数据集^[14]。此外，有研究主张对训练数据的真实性标准实行分类分层治理，特别是对文化阐释类数据允许在主流学术共识内保留多元见解^[15]。

现有文献已从战略定位、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等维度初步勾勒了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研究轮廓，为后续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三个层面的不足：一是视角碎片化，多聚焦技术或管理单一维度，缺乏对文化主权、语义安全与文明传承等深层战略命题的整体观照；二是路径应激化，往往针对具体风险提出局部应对策略，尚未形成“数据—人才—标准—治理”全方位的突围之策；三是前瞻性不足，未能充分回应“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文化生产与传播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十五五”时期，以大型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技术正深刻重塑文化数据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无论是古籍知识图谱的构建、典籍风格的量化分析,还是民族语言的智能保护,中华文化数据标注都是不可逾越的前置环节。因此,本文立足中华文化数据标注这一战略性课题,构建“战略价值—现实困境—突围之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提升至国家文化数据主权与文明传承的战略高度,超越既有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倾向;构建“价值—困境—路径”三位一体的闭环逻辑,实现从“问题识别”到“问题突围”的理论贯通;提出“数据主权—语义主导—价值话语”三位一体的主权 AI 文化治理逻辑,为“十五五”时期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

在人工智能日益主导信息分发与知识生产的当下,数据标注的深度直接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呈现形态。理解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价值,需要跳出单纯的技术效率视角,从国家文化数据主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和中华文明在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层面予以审视。

(一) 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文化数据主权

文化数据主权是数字主权向文化领域的延伸^[16]。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以领土、领海、领空为边界,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则形成了“数字边界”。当人工智能大模型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时,数据标注的来源、结构和价值便成为影响文化话语权的关键变量。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意义在于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数据主权基础设施。第一,数据自主权,即确保中华文化的核心资源是由中国自主完成的高质量数据标注,形成具有主权属性的“文化数据疆域”。第二,语义主导权,即通过建立符合中华文明的概念分类体系、知识图谱和语义内涵,确保人工智能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始终根植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第三,价值话语权,即通过对标注标准和标注内容的自主设计,使人工智能可以全面呈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值得关注的是,“主权 AI”成为各国保障数据安全、掌握数字主导权的重要战略方向,尤为关键的是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主权基础模型”^[17]。有学者提出“语义主权”的概念,强调“一国或文化群体有权力和能力确保自身的语言、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在全球数字空间得到准确、完整、平等的表达与呈现”^[18]。质言之,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性工程。

(二)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2023 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19]的理论品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转化过程通过对中华文化进行数据标记,将文化素材库转化为可供人工智能、数字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等使用的“活性数据”。第一,语义标注实现文化知识的“可计算化”。以中国传统书法为例,一个经验丰富的鉴赏家能够辨别不同朝代、不同书家、不同书体的风格特征,但此类方式往往“只能意会、

难以言传”。但通过细粒度的图像语义标注，将书法作品的笔法特征、结构关系、章法布局等视觉要素转化为结构化的描述标签，这些隐性经验便获得了可计算的形式。第二，知识图谱构建实现文化体系的关联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诸多核心理念的深层意义往往散见于经史子集、民间习俗、艺术形式等载体中，缺乏系统性的关联呈现。通过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可将这些分散的文化元素按照内在逻辑进行结构化标记，构建起覆盖哲学思想、历史事件、艺术流派各领域的文化知识图谱。第三，高质量数据集能够为中华文化提供“底座”。2025年8月，国家数据局启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工作，首批先行先试数据集共140个，其中文化旅游领域5个，涉及演艺、戏曲、文博等方向^[20]。西北师范大学联合甘肃简牍博物馆推出了DeepJiandu数据集，数据集包含了7416张简牍文物（文献）图像，并从中标注了99852个简牍字符，有效解决了字迹模糊、字迹残缺、字迹复杂等识别难题^[21]。可见，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通过数智技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手段。

（三）培育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文化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符合新发展理念为取向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为核心标志”^[22]。在文化领域，数据要素正成为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文化数据要素能够“从深层次激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活力，助力国家数字文化资源基础体系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3]。数据标注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文化数据标注激发文化业态创新。高质量的数据标注使人工智能得以精准学习文化内容的结构、风格和语义特征，从而赋能数智化的文化内容生成。广州大学粤语语料库建设与大模型评测重点实验室发布了6个岭南文化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均面向人工智能应用。以此为例，粤语文化思维链语料数据集搭建了3层结构，涵盖17个文化类别、360余个核心文化概念，并配套逾1万组高质量标注语料，可直接服务于大模型的精调训练^[24]。其二，通过文化数据标注优化文化产业链。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形成“数据筛选—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质检—数据反馈”的完整产业闭环，该闭环的建成旨在形成与之相关的数据服务生态系统。以越王州句剑数字化为例，本次文化标注完成了从资源采集、数据标注到产品开发、价值变现的全流程闭环，充分验证了文化数据标注在产业层面的乘数效应^[25]。其三，通过文化数据标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数据标注使公共文化服务能够实现智能化推荐、个性化定制和精准化供给，让广大用户通过“云端”“指尖”享受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敦煌、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等，通过将海量馆藏的高精度图像与丰富的元数据标注相结合，让全球受众动动手指就能“穿越”到历史现场。这一探索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为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提供了可持续的技术保障。

（四）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在全球数字文明竞争的新格局下，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如何使中华文明不是以“他者”的形象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而是以“自我”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文明的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²⁸，而推进中华文化数据标注这一战略工程，能够显著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数字空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其一，变

文化诠释的“被动接收”为“主动定义”。全国人大代表陈国桢提出，“通过标注构建全球文化知识图谱，使中华文化从‘模糊的东方印象’蜕变为可参与、可理解、可消费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26]。中华文化数据标注能够清晰、完整、明确呈现中华文明的语义结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其二，变国际传播的“零散叙事”为“体系化话语输出”。基于标注数据的智能传播，克服传统传播模式的内容碎片化、叙事单向度和效果短暂性等短板，凭借知识图谱、语义网络、智能推荐等技术支持，形成“系统化、立体化、持久化”的传播新格局。当前，我国学界已提出构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特色元话语体系^[27]。总之，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可以增强中华文明的“厚度”与“深度”，进而极大地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数字空间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现实困境

“十五五”时期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全球竞争格局被深度重塑的关键阶段，高质量数据标注已成为驱动大模型进化的核心动力。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塑造中国人工智能本土特色、掌握文化话语权的战略根基。然而，当前我国在系统推进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工程时，正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

（一）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数据之困”

数据是实现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元要素”，但面临高质量与结构化中文语料的极端稀缺和严重失衡的“数据之困”。第一，中文语料存在总量不足与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阿里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显示，中文语料在互联网中的占比仅1.3%，远低于英文的59.8%，占比悬殊^[28]。目前，常规大模型训练严重依赖英文语料，更为严峻的是，在稀缺的中文语料中，文言文、传统文化内容、本土主流媒体文本等尤为稀缺。这类语料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价值，无法通过简单的机器翻译从英文语料中弥补，其短缺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大模型本体化发展的核心短板^[29]。第二，文化遗产智能化与数字化程度低。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但系统性、机器可读的高质量数字化建设严重滞后^[30]。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仍以纸质或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无法直接用于AI模型训练。例如，在中医、非遗等传统领域，大量宝贵的中华文化资源尚未转化为可用的数据资源，数字化基础薄弱^[31]。第三，数据分布分散，形成“数据孤岛”。各文博机构、研究单位和技术企业等在语料库建设中，在数据模型、标注体系、技术流程上往往“各自为政”，导致大量重复建设，进而形成分散、异构的“数据孤岛”，资源难以整合与共享，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级文化遗产知识网络的建设^[32]。

（二）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人才之困”

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对标注者的文化素养与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专业人才短缺恰恰成为制约其质量与效率的瓶颈。第一，复合型高端人才严重短缺。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要求从业者既精通中华文化，又熟练掌握数据标注的技术工具。但在AI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融合中，人才结构面临“懂文化的不会用技术，懂技术的不懂创作”的困境^[33]，文化数据标注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几近空白。随着大模型建设向纵深发展，对具备行业领域知识的专业

化数据标注人才需求激增,这类人才相对匮乏^[34]。第二,人才结构呈现“高一低”两极分化。我国数据标注产业蓬勃发展,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但高端人才如标注工具研发工程师、垂直领域标注专家稀缺^[35]。现有人才结构无法满足文化数据标注对深度、精度和创造性的高要求。第三,行业人才流失率高。数据标注工作常被视为“数字流水线”,标注行业存在“用工低龄化”“流动性大”等特点,许多从业者缺乏耐心,难以坚持到技能成熟、获得高回报的阶段。在西北等地区,“招人难、留不住人”的问题尤为突出^[36]。缺乏稳定且专业的人才队伍是制约中华文化数据标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标准之困”

统一、科学的标准体系是确保数据质量、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前提,但目前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深陷“标准之困”。第一,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标注标准。当前古籍、文博等行业标准,尚无法覆盖文化数据标注全流程、全领域。例如,对同一件文物,不同机构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属性描述体系和元数据标准;对一段古文献,分词、句法、语义标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标准直接导致数据无法兼容、对比和整合。第二,现有标准难以满足文化数据的复杂性。中华文化数据具有多模态、强语义关联和文化敏感性等特点,通用标注标准无法精准捕捉其文化内涵。标准不统一是制约文化数据开放共享的一大难点,亟须构建涵盖文化数据标识、生产、体验等全流程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37]。例如,在非遗领域,若仅完成基础信息标注,而缺乏对文化语义、技艺传承关系的深度语义标注,便无法理解和传承文化的独特价值。第三,数据标注质量评估标准有待完善。由于缺乏统一的“尺子”来衡量数据质量,文化数据标注成果参差不齐。网络文本中充斥着大量非正式、低质量甚至错误的内容,而专业领域的数据标注又极易受标注者主观判断影响。如若不建立高精度的语料质量评估体系,低质量数据将污染整个训练集,导致AI输出产生“幻觉”,无法准确传递中华文化精髓。

(四) 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治理之困”

有效的治理体系是保障文化数据标注工程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数据标注治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第一,数据权属与利益分配机制不明晰。文化数据资源涉及复杂的版权、个人隐私、文化敏感性等权益。这些复杂的权益关系极大地增加了数据权属界定的难度,也削弱了市场力量介入开发的意愿。有别于商业等其他行业数据,文化数据更多集中在公共文化机构,缺少投资驱动力和盈利吸引力,所以需要行政力量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机构主动作为^[38]。但行政推动与社会参与的结合,必须建立在清晰的利益分配规则之上。由于缺少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数据持有方往往将数据视为核心资产,加之数据外流会削弱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封闭。第二,政策引导与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完善。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但针对中华文化数据标注仍缺乏行业指南、政策激励和资金扶持等顶层设计。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涉及宣传、文旅、文物等部门,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第三,长效运营与可持续性保障不充分。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工程,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或短期项目扶持难以行稳致远。第四,数据安全与伦理问题突出。一方面,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包含大量涉及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非遗技艺

等核心内容，部分数据具有不可再生性，若在标注、存储或共享环节发生数据泄露、篡改，将对文化传承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另一方面，标注过程中标注者可能因文化认知偏差或主观偏好，对文化内容进行不当解读或标签化处理，导致文化语义的扭曲。此外，AI模型基于标注数据生成内容时，若存在伦理缺陷，可能传播错误的文化观念，损害中华文化的国际形象。

四、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突围之策

破解中华文化数据标注面临的诸多困境，需要超越零散的技术修补或局部优化，从系统性、协同性角度寻求整体突破。这一战略既涉及技术能力的提升，又关乎人才结构的重塑，更依赖统一规范的建立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突围之策应当兼顾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在技术、人才、标准、政策等维度上协同推进。

（一）发展数字化、多模态的智能标注技术

要突破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数据之困”，必须坚决推动技术路线的迭代升级，将人工智能从应用对象转变为赋能工具，实现文化标注的智能化跃迁。第一，大力研发与推广数智化标注工具。“目前，主流的标注都会采用AI辅助标注。”^[14]业界与学界应合力攻关，针对文物图像分割、非遗动作捕捉、戏曲音频提取等特定文化场景，研发高精度的预训练模型和自动化标注算法。这类工具应将人工从繁重的初级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并专注于语义校对、知识关联等高价值任务。平台方应开展工具集成，打造智能标注 workflow，使标注效率提升一个数量级。第二，积极构建支持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标注平台。当前，数据标注正向专业化、智能化、多模态方向发展^[39]。中华文化的表达是立体的，比如一件青铜器蕴含形制、铭文、工艺和史学价值等，标注平台要突破单一文本或图像的局限，支持对文本、图片、音频、视频、3D模型进行一体化关联标注。平台应具备跨模态语义对齐能力，要求底层数据模型支持复杂的关联关系定义。第三，着力探索数据质量与安全的前沿技术。在质量层面，引入基于主动学习、对抗性样本的智能质检算法，对标注结果进行动态抽样和一致性校验。在安全与伦理层面，对于涉及个人隐私、文化敏感性的数据，采用差分隐私与同态加密等技术，实现在不汇集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进行分布式模型训练与标注。

（二）打造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梯队

突破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人才之困”，必须打破学科与行业壁垒，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一，率先进行教育体系的学科专业改革。在“新文科”与“新工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高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与特色文科院校，应积极探索设立“数字人文”“文化遗产数字化”“AI数据工程（文化方向）”等交叉学科专业。职业院校则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开设“数据标注师”等新型职业方向，侧重实践技能培养，加强数据标注领域人才培养和产业对接^[40]。第二，深化“产教融合、项目育人”的协同培养模式。应当建立“高等院校—文化机构—科技企业”协同育人机制。高校提供理论教学与生源，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提供待标注的文化数据资源，科技企业则提供前沿的标注技术平台。通过多方共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能参与具有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中华文化数据标注项目。第三，完善人

才评价体系和建立职业发展通道。相关行业协会与企业应联合研究,制定“数据标注师”的职业能力标准与评价体系,设立从初级到高级的清晰职级晋升路径。薪酬体系应与技能水平、项目复杂度、文化专业深度强关联,让能够处理复杂语义标注、制定标注规范的高端人才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同时,应鼓励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数据标注的知识顾问和质检专家。

(三) 建立先导性、规范化的标准支撑体系

突破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标准之困”,必须加快构建自上而下引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的文化数据标准体系。数据标注要重视标准体系建设^[41]。第一,加快推进国家层面核心基础标准的研制工作。根据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总体部署,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可会同宣传、文旅、文物、工信等部门,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数据资源分类与编码》《文化数据标注通用要求》等基础性标准文件的研制工作。聚焦文化数据互联互通这一最紧迫问题,核心任务是制定统一的文化数据元数据模型、唯一标识符体系、基础属性描述框架及跨机构交换接口等关键标准。第二,鼓励形成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古籍、非遗、戏曲等领域和敦煌学、徽文化、巴蜀文化等特色文化地区,鼓励相关行业学会、龙头企业、重点文化机构牵头,制定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第三,建立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认证标准。应积极研制《文化标注数据质量评估指南》,明确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等维度的认证标准。同时,可探索第三方数据质量检测与认证机制,对符合高标准的文化数据集予以认证,鼓励其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中优先采用。

(四) 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政策引领体系

突破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治理之困”,必须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将文化数据标注纳入国家文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布局。“十五五”时期,要将“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工程”列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可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明确牵头部门,设立跨宣传、文旅、文物、工信等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通过设立国家文化数据标注重大科技专项,持续打造一批具有前沿技术研发与重大应用示范作用的数据标注产业。第二,明确数据标注的权属界定与利益分配规则。加快研究出台针对公共文化机构数据、个人创作数据、非遗传承数据等不同类型文化数据的确权授权指引。探索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模式。特别是对公共文化机构持有的数据,鼓励具备资质的市场主体进行深度标注、开发和利用,并建立和完善分配机制,将收益用于机构的数字化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第三,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长效机制。通过设立国家文化数据标注基金等方式,支持基础性、战略性标注项目和相应平台建设。同时,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将高质量文化数据标注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第四,加强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治理。明确数据分级分类保护标准,将民族文化核心符号、非遗技艺核心流程、古籍孤本数字化信息等列为核心文化数据。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审计机制,对标注过程中的数据流转、权限变更、操作日志进行实时记录与追溯,确保数据可管可控。此外,建立标注内容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涉及历史人物、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敏感内容的标注项目进行事前评估与事中抽检,确保标注结果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向。

五、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中华文化数据标注从战略谋划走向系统实施的关键阶段。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是关乎国家文化主权和文明传承的战略课题。它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制度供给和“眼睛向内”的深耕细作，又需要技术、资本、人才等多要素的协同驱动；既需要立足本土的文化自觉和主权意识，又需要面向世界的开放胸怀和合作精神。正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昭示的，文化建设要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19]，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工作，既要理解其深层的战略意图和文化使命，又要探索其在技术、产业和传播中的路径。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数据标注才能真正成为激活中华文明数据基因的重器，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使中华文明在人工智能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R].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2025：1.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
- [3] 王春辉. “数字中文”的体系框架与建设进路[J]. 语言战略研究，2025（6）：5-19.
- [4] 洪永淼，林滔，史九领. 数据要素的基本属性、价值形成与市场构建[J]. 中国经济问题，2025（3）：1-16.
- [5] 张文亮，丁淼，魏来. 满文古籍知识库研究与构建[J]. 图书情报工作，2025（5）：126-139.
- [6] 张逸勤，邓三鸿，胡昊天，等. 预训练模型视角下的跨语言典籍风格计算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3（10）：50-62.
- [7] 刘杰. 融合创新：以大型语言模型技术助力民族语言学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9-19.
- [8] 高泽晋. 潘多拉的魔盒：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来源、使用与治理——面向100位AI开发者的扎根研究[J]. 新闻记者，2022（1）：86-96.
- [9] 胡泳，张文杰. 数据标注治理：可信人工智能的后台风险与治理转向[J]. 云南社会科学，2024（6）：29-36.
- [10] 罗敬蔚，李勇坚.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幻觉风险与制度因应[J]. 科学管理研究，2026（1）：80-90.
- [11] 吴文新，蔡文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传播的“守正”命题：风险隐忧、核心要义、破局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88-99.
- [12] 温强. 夯实可信数据空间基础，激活出版行业数据要素价值[J]. 出版广角，2026（1）：20-27.
- [13] 樊海东，胡玉花，沈骞，等. 古籍流传的大规模数据集构建[J/OL]. 图书馆论坛，1-12 [2026-04-28]. <https://link.cnki.net/urlid/44.1306.g2.20260423.1657.002>.
- [14] 李书娟. 数智时代图书馆数据馆藏的内涵特征、逻辑构成与构建路径[J]. 图书与情报，2026（2）：112-119.
- [15] 束开荣. 平台外包人：论幽灵工作的可见性——以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为个案[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22-133，171.

- [16] 曹克亮. “DeepSeek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3): 56-68.
- [17] 马川. 中国主权AI价值对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功能与实践指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2): 58-65.
- [18] 段玉聪. 具身智能的模型分析: 基于语义自主视角[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2): 93-102.
- [19] 本报评论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N]. 人民日报, 2023-10-11(1).
- [20] 国家数据局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工作启动[EB/OL]. (2025-12-18)[2026-06-15]. https://www.nda.gov.cn/sjj/zhuanli/ztdsjblh/ztxwfb/0830/20250830132721781598252_pc.html.
- [21] 苏家英. 国际首个简体字符检测与识别数据集发布[N]. 甘肃日报, 2025-04-03(1).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191.
- [23] 俞锋. 数据要素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N]. 光明日报, 2025-08-20(2).
- [24] 粤语语料库建设与大模型评测重点实验室在2025年中国数字文娱大会发布自研数据集成果[EB/OL]. (2025-12-19)[2026-04-29]. <https://wyy.gzhu.edu.cn/info/1087/4213.htm>.
- [25] 2025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举行[EB/OL]. (2025-12-18)[2026-04-29]. http://www.cpra.org.cn/2025-12/18/content_43310021.html.
- [26] 陈国桢代表: 要高度认识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的战略意义[N]. 开封日报, 2026-03-06(2).
- [27]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58-69.
- [28] 史雅萍. 加快中华文化数据标注, 抢占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制高点——访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河南省委原副主委、开封书画院院长陈国桢[N]. 中国艺术报, 2026-03-13(4).
- [29] 两会聚焦 | 陈国桢: 推进中华文化数据标注筑牢AI时代文化根基[EB/OL]. (2026-03-13)[2026-04-29]. https://www.mj.org.cn/mjfc/mtjj/202603/t20260310_305021.htm.
- [30] 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中文语料库[EB/OL]. (2025-07-13)[2026-04-29]. <https://www.rmlt.com.cn/2025/0703/734403.shtml>.
- [31] 王云杉. 大模型如何更懂“中国话”[N]. 人民日报, 2025-12-25(7).
- [32] 《文博语料库建设导则》团体标准编制说明[EB/OL]. (2022-07-15)[2026-04-29]. <https://www.ttbz.org.cn/upload/file/20260211/6390641971396388756658956.pdf>.
- [33] 李芸委员: 推动AI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融合,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EB/OL]. (2026-02-27)[2026-06-15]. <https://www.shobserver.cn/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1076977>.
- [34] 大模型发展提速中文语料够“吃”吗[EB/OL]. (2024-06-27)[2026-04-29]. https://wlaq.gmw.cn/2024-06/27/content_37405458.htm.
- [35] 加快推进数据标注产业人才队伍建设[EB/OL]. (2025-09-26)[2026-04-29]. https://www.studytimes.cn/kjqy/202509/t20250926_83290.html.
- [36] AI开辟就业新赛道, 数据标注员走红[EB/OL]. (2024-12-21)[2026-04-29].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KjunlDsRQm>.
- [37] 为文化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全国政协“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举行

- 展”专题调研综述[EB/OL]. (2023-06-14)[2026-04-29].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3/06/14/ARTI1686711061673152.shtml>.
- [38] 数据标注:文化数字化的战略支点[EB/OL]. (2022-07-15)[2026-04-29]. <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kygz/9551/202310/W020231020646140193865.pdf>.
- [39] 任保平,李昊玥.数据资产资本化的理论逻辑、推进机制与实现路径[J].江汉论坛,2026(1):22-34.
- [40] 苑卫国.我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现状、挑战与优化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10):101-107.
- [41] 贺灵,周璐.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与地区生态效率[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13-124.

责任编辑:杨稀琴 校对:王京菁

“十五五”时期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蒙 慧 肖丙浩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词元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正由技术层面的计量工具演化为智能服务定价与价值结算的经济范畴, 折射出智能经济新形态对既有生产方式、价值流通逻辑与收益分配格局的深层重构。词元经济的生成植根于算力突破与智能体普及、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市场需求的结构性拉动、国家战略部署与制度体系建设的协同驱动。从价值机制看, 词元经济在价值创造环节呈现出活劳动智能化凝结的新形态, 芯片研发者、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员等共同构成“总体工人”的当代形态; 在价值计量环节, 词元以可计量性、可定价性与可交易性三重属性承担起“智能时代价值锚点”的功能, 但其计价能力仍依附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价值流通环节, “消费即生产”的正反馈循环区别于传统商品经济的单向物质流转; 在价值分配环节, 产业链纵向收益集中、劳资关系横向分化与金融化趋势初现, 构成三重结构性张力。这些新特征显示, 劳动价值论在智能化条件下并未丧失解释力, 而是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 活劳动仍是词元价值的唯一源泉, 价值量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收益分配格局仍取决于各主体对核心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十五五”时期规范发展词元经济, 需要从健全计量与质量分级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筑牢安全合规底线、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等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关键词: 智能经济; 词元经济;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 F49;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086-13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4.007

作者简介: 蒙慧,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肖丙浩,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研究”(23XJA710003)

引用格式: 蒙慧, 肖丙浩. “十五五”时期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86-98.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阶段。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与规模化应用，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已从推动技术创新向重塑经济形态纵深延伸。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1]。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对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以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等作出系统部署^[2]。“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3]。上述战略部署表明，我国经济形态正加速从以数据积累与平台连接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阶段，向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生产生活的智能经济新阶段跃迁。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正加速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4]。在这一进程中，词元（Token）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正由算法内部的技术参数逐步演化为智能服务计量与价值结算的经济范畴。2026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公告，优先推荐“词元”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的中文名^[5]。国家数据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将词元定位为“智能经济时代的价值锚点”与“联结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并披露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跃升至2025年底的100万亿、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6]。词元调用量的指数级攀升表明，围绕词元的生产、调用、分配与消费正在加速形成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词元经济并非独立于智能经济之外的自足概念，而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在大模型运行、智能服务供给和产业价值转化层面的具体化表达。智能经济新形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人机协同与跨界融合为主要特征，深刻重塑着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4]。词元作为数据要素经由大模型加工后的基础性计量单元，将算力、数据、模型与应用场景贯通为有机联动的价值通路，使智能服务的生产、计量与交易获得了可操作的经济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词元构成了观察智能经济内部运行机理和价值关系的关键切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把握词元经济的价值机制，是揭示智能经济新形态区别于传统数字经济的深层逻辑所在。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词元经济的理论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散见于政策解读、产业分析与少量学术文献之中，已在多个维度取得初步进展。在概念界定层面，有研究将词元经济界定为围绕词元的生产、调用、反馈和分配而形成的智能经济样态^[7]；有研究将其界定为以词元作为智能服务标准化计量单元的新型经济形态，并从技术、要素、市场、制度与生态等维度构建了系统分析框架^[8]；也有研究从新型生产要素的角度提出“词元经济学”分析框架^[9]；还有研究将词元经济界定为以词元为价值载体、围绕词元的生产、分发、调用、交易、价值转化和治理全过程而形成的经济体系，并从内涵特征与生成逻辑两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10]。在价值属性层面，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词元兼具价值载体、计价标准与资本工具的三重属性，其经济运行并未颠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逻辑^[11]；有研究着眼于计量功能，认为词元开创了语义可计算的全新经济逻辑^[12]；还有研究强调词元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重塑要素的定价机制与市场化应用生态^[13]。在产业实践层面，有研究指出词元正经历从“通用语料堆砌”向“行

业 Know-how 语义对齐”的转变^[14]；也有研究对词元经济的产业逻辑与演进方向进行了系统研判^[15]。此外，学界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与理论构建^[16]、形成逻辑与政策路径^[17]、驱动因素与实践方略^[4]，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18]、算力经济规制逻辑^[19]等相关问题也展开了探讨。

现有研究初步揭示了词元经济的技术基础和产业价值，但在以下方面存在拓展空间。其一，词元从技术要素转化为经济要素的深层逻辑有待系统阐释，特别是词元经济生成的技术、要素、市场与制度条件尚未得到整合性分析。其二，词元的价值创造、计量、流通与分配机制缺乏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系统理论建构，现有讨论多停留于定性描述，尚未形成对价值机制全链条的贯通性解释。其三，词元经济快速扩张中暴露出的标准缺失、竞争失序与安全隐患等问题，亟需探索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路径。鉴于此，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三个维度对词元经济展开系统分析。其中，价值机制是全文分析的重心，旨在从价值创造、价值计量、价值流通与价值分配四个环节揭示词元经济的内在规律，为深化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理论认识提供学理支撑，并为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二、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

词元经济的兴起并非偶发的技术现象，而是智能经济范式深度演进的内在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任何新型经济形态的形成都是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词元经济的生成遵循这一基本规律，是技术迭代、要素改革、市场需求与制度供给四重力量协同驱动的产物（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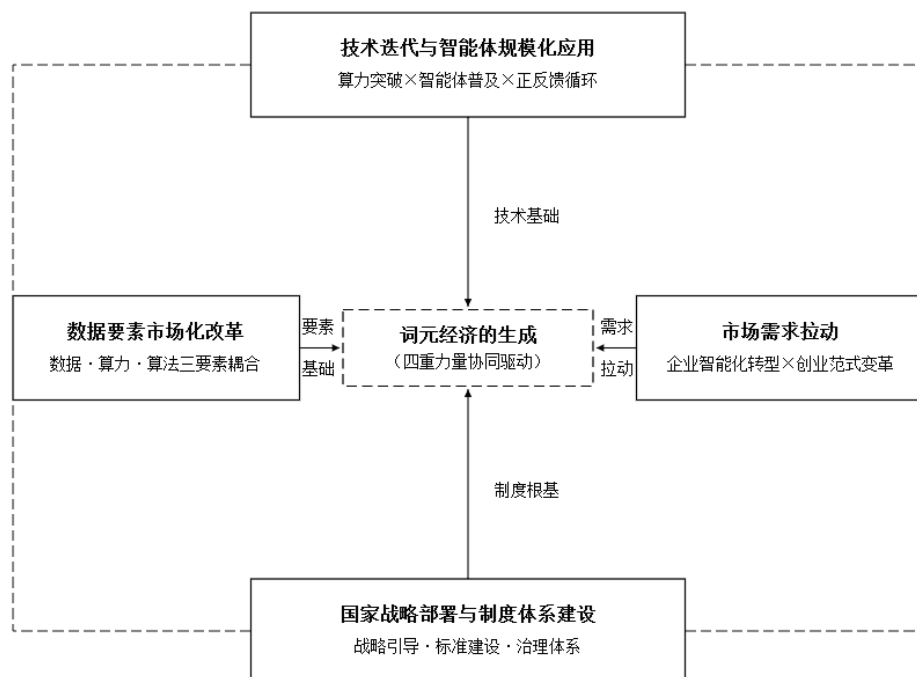


图 1 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

（一）算力突破与智能体普及奠定技术基础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0] 技术革命构成经济形态变迁的物质前提。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推动经济形态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词元经济的生成首先植根于这一技术变革之中。

从技术供给端看，算力技术的突破为词元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高性能计算系统、液冷散热技术、算网一体化等关键创新持续提升单位算力的词元产出效率，推动词元生产成本逐步下降。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6 年 1 月披露，我国已建成万卡智算集群 42 个，智能算力规模超过 1 590EFLOPS^[21]；至 2026 年 3 月底，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 1 882EFLOPS^[22]。在“东数西算”工程的战略引导下，算力资源的跨区域部署形成了全国性的算力供给网络，推动词元从大模型内部的技术参数向具有经济属性的生产要素转化。

从需求端看，词元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深层原因在于应用形态的根本性变革。2026 年初，新一代智能体应用迅速普及，智能体能够自主完成信息检索、文档撰写、代码编写、任务执行等复杂工作，运行过程中需持续进行推理、试错与修正，单次任务的词元消耗量远超传统对话模式。这种应用形态的变革标志着人工智能正从被动“应答者”升级为主动“执行者”。算力技术突破与智能体技术演化之间由此形成双向驱动的正反馈循环：智能体的普及催生对高效算力的巨量需求，算力成本的下降则降低了智能体的部署门槛。这种技术供需之间的螺旋式上升，构成了词元经济生成的首要物质前提。

（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筑牢要素基础

技术迭代为词元经济提供了物质前提，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则为其筑牢了要素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0]²⁰⁸ 在智能经济新形态中，数据日益成为贯穿智能生产全过程的新型劳动对象，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不断凸显。与传统物质资源遵循的稀缺性逻辑不同，数据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与边际成本递减等特征，在使用中不仅不会被消耗殆尽，反而通过深度挖掘与再利用呈现出倍增效应。

词元作为大模型处理数据的基础性单元，本质上承载着数据要素经由算力与算法加工后以标准化形式释放经济效益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23]。在此基础上，国家数据局于 2026 年 4 月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探索词元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元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集价值体系”^[24]。从数据确权的制度框架到词元交易的模式探索，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与定价机制逐步完善，有力推动了词元从技术概念向可度量、可交易的经济要素转换。

词元经济的要素基础不仅在于数据本身，更在于数据、算力、算法三者之间的有机耦合。数据为算法训练与优化提供原料，算法通过对多元应用场景的适应与优化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模型可调用的知识能力，算力则为数据处理与算法运算提供动力支撑。三者之间形成循环耦合结构，呈

现出“产出转化为新一轮投入”的递进积累特征。这种以数据、算力、算法循环驱动为核心的要素组合方式，构成了词元经济区别于以流量为核心指标的传统互联网经济的显著特征。

（三）企业智能化转型与创业范式变革拉动市场需求

技术与要素层面的条件具备之后，词元经济的纵深发展还有赖于市场需求的有效拉动。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25]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与创业范式的深刻变革，构成了词元经济需求侧增长的两大引擎。

从企业智能化转型看，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入实施，智能技术正加速嵌入制造、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全链条。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 1.2 万亿元^[26]。当企业将大模型服务纳入日常运营流程，词元调用便从偶发性的技术尝试转变为持续性的经营投入，需求性质发生了从弹性化向刚性化的根本转变。比如，三大电信运营商明确提出从“流量经营”向“词元经营”转型升级^[27]。中国电信将词元服务定为经营主线，提出“做强自有词元、做大生态词元、探索国际化词元”的战略布局；中国移动确立通信、算力、智能三大主业，多地省公司相继面向个人用户推出词元套餐；中国联通加快构建“智能体+词元+AI 云”的算力经营模式。这一集体转向表明，词元正在取代流量成为衡量智能经济运行水平的核心指标。

从创业范式变革看，智能技术的突破显著降低了创业门槛，催生了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创业形态。创业者仅凭智能体调用即可完成产品设计、代码编写、营销推广等核心业务环节，词元消耗成为创业活动的基础性支出。多地相继出台模型调用补贴与算力券等扶持政策，进一步释放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创业者的词元需求潜力。企业智能化转型与新型创业模式的兴起，共同拓展了词元经济的需求边界，推动词元服务从头部企业向广大中小企业和基层经营主体普惠化扩散。

（四）国家战略部署与制度体系建设夯实制度根基

词元经济的生成不仅是技术演进与市场驱动的自发过程，更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与制度建设。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形态的形成与演进。

在战略引导层面，2025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28]。《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设定了到 2027 年、2030 年、2035 年分阶段推进的目标体系^[1]，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2]，“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作出系统部署^[3]。这一系列战略安排表明，国家对智能经济的定位已从局部技术应用提升至系统性经济形态建设。

在标准建设层面，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 Token 中文名“词元”的公告^[5]，为词元经济的标准化进程奠定了术语统一的基础前提。广州于 2026 年 4 月上线全国首个基于词元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6]，多地也相继推出面向开发者的词元公共服务与算力调度体

系，为跨平台的词元流通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依据。

在治理架构层面，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石、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专项法规为支撑的多层次协同治理架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并强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29]，人工智能立法亦被纳入国家层面的议事日程。这些制度供给为词元经济划定了合规边界，也为其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词元经济的价值机制

价值机制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涵盖价值的创造、计量、流通与分配四个基本环节。马克思指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0] 52} 价值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经由商品流通实现从潜在形态向现实形态的转化，并在生产结构的约束下完成收益分配。传统商品经济中，这一机制以有形产品的物质生产与空间流转为载体，各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分离。词元经济在技术形态上呈现出新特征：价值创造高度依赖算力基础设施中凝结的复杂劳动，计量以词元为标准化单元实现了智力服务的可通约性，流通中生产与消费高度重合，分配面临收益向上游算力环节集中等新型张力。然而，这些新特征并未逾越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词元的价值仍来源于人类劳动，价值量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分配格局仍取决于各主体对核心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词元经济价值机制的整体框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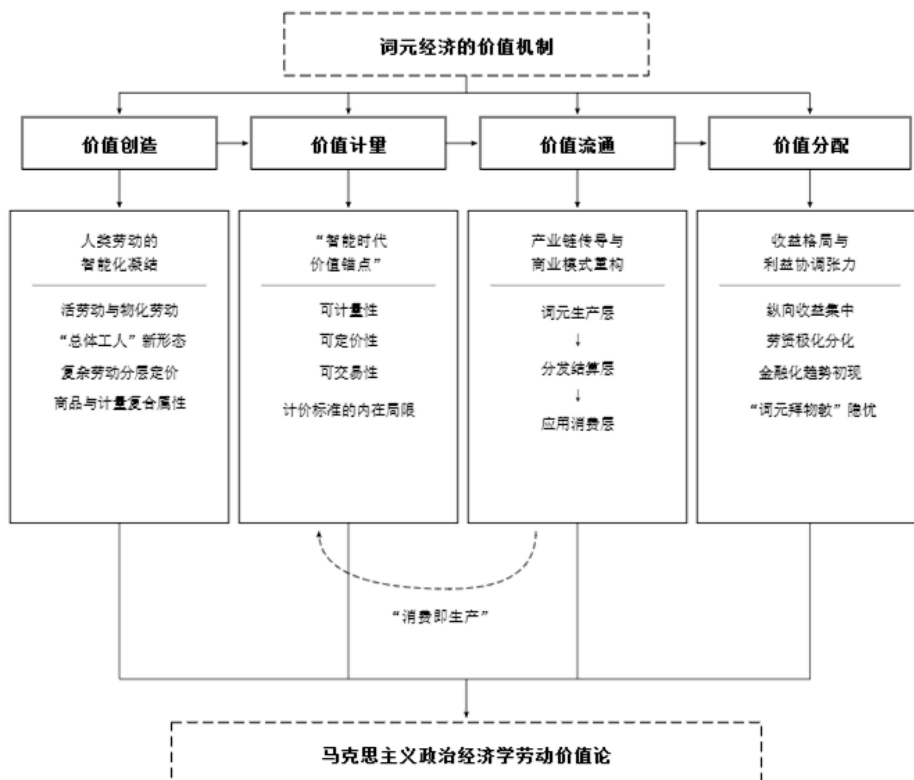


图2 词元经济的价值机制

（一）价值创造：人类劳动的智能化凝结与词元的价值来源

价值创造是词元经济运行的逻辑起点。在智能经济新形态中，词元并非凭空产生的技术符号，而是人类劳动在智能时代的凝结形式。每一次词元的生成与处理，都依赖于芯片设计、算法编写、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系统运维等一系列劳动环节。这些劳动虽然形态各异，但作为人类脑力与体力的耗费，均可还原为抽象人类劳动。这一判断与传统商品经济中价值来源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

准确把握词元生产过程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关系，是理解词元价值来源的关键。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0] 210}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智能时代最为典型的劳动资料，属于不变资本的范畴，在词元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真正创造新价值的是活劳动。电力转化为算力的过程，本质是芯片研发、数据中心建设等人类劳动的物化；算力驱动模型生成词元的过程，则是这些物化劳动的价值向最终服务逐步转移。从事上述劳动的芯片研发者、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员、模型训练师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工人”的当代形态。在词元经济中，这一范围被极大扩展，只要其劳动直接参与了词元的生产与价值增殖过程，就构成了总体工人的有机组成部分。

词元价值的差异还直观反映了劳动复杂程度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20] 58}。当前词元分层定价体系正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印证。以 2026 年 4 月主要厂商公布的 API 调用价格为参照，海外头部厂商旗舰模型的输出价格达每百万词元数十美元，而中国企业凭借架构创新将同类性能水平的输出价格大幅压缩。以 DeepSeek 为例，其 V4-Flash 模型输出价格约为每百万词元 0.28 美元，V4-Pro 在限时优惠后输出价格降至约 0.87 美元，与海外同类模型之间形成了数十倍的价差^[30]。这种巨大价差的基本面在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高阶词元的生产凝结了更为复杂的研发劳动，其价值量远高于通用词元。与此同时，中外企业在算法架构、工程优化路径和算力成本结构上的差异，也在定价层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价值计量：词元作为“智能时代价值锚点”的形成与限度

价值计量是词元经济运行的枢纽环节。马克思指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20] 114}。在传统商品经济中，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异质商品的价值得以比较和交换。词元经济的特殊性在于，词元本身既是智能服务的产出单元，又承担着计量和结算功能。从工业时代的“千瓦时”到互联网时代的“流量”，再到智能时代的“词元”，计量标准的历史演变折射出每一阶段核心生产力的运行逻辑^[31]。

词元承担计价功能，建立在三重属性之上^[11]。其一，可计量性，大模型消耗的算力、电力等资源与词元调用数量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其二，可定性性，不同应用场景下词元的效用存在显著差异，金融风控、医疗诊断等高价值场景催生出分层定价体系。其三，可交易性，词元可跨平台、跨场景流通，通过 API 接口实现标准化调用与结算。这三重属性使词元将异质性的智能服务转化为可通约、可比较的价值表现形式。在产业实践中，数据中心的衡量指标已从存储容量转向每瓦算力的词元产出效率，词元成为度量智能服务生产效能的基准单元。

然而，词元作为计价标准仍存在内在局限。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20] 114} 货币得以充当价值尺度，前提是其自身作为商品具有价值。词元则不同，它并不具有脱离生产过程的独立价值，其计价功能本质上依附于词元生产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物质条件上，词元的价值锚定仍依赖于芯片、电力等上游资源，其流通范围局限于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尚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储藏功能。在技术标准上，各大平台在分词规则上的差异使同一段文本可能产生数倍的词元数量差异，制约了其作为统一价值尺度的精确性。因此，词元在现阶段本质上是资本主导下的数字价值流通工具，而非独立的货币形态。

（三）价值流通：产业链传导与商业模式重构

价值的现实化有赖于流通环节的有效运转。马克思以“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来比喻价值实现对流通环节的依赖，指出“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20] 127}。在传统商品经济中，价值流通以实物商品的空间转移和所有权让渡为基本形式，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明显分离。词元经济的价值流通则呈现出不同特征：流通对象并非有形的实体产品，而是即时发生、即时结算的智能服务过程，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在时间上高度重合，空间上借助网络实现瞬时传递。

词元经济的价值流通以产业链为载体，通过生产、分发、结算、应用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实现算力资源向终端服务价值的逐层传导。上游为词元生产层，以芯片制造、算力运营、电力配套为核心；中游为词元分发与结算层，以大模型企业、云服务商和 API 聚合平台为主体；下游为词元应用层，覆盖智能办公、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应用场景^[7]。各环节之间的价值传导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呈现出双向性和网络化的显著特征。用户在消费词元的同时，其交互数据也在反向流入上游的模型优化环节，形成“消费即生产”的正反馈循环，使词元经济的价值流通区别于传统商品经济中单向的物质流转。

在商业模式层面，传统互联网平台经济以“注意力捕获与广告变现”为基本路径，用户本身并非直接的付费主体。词元经济则重构了这一逻辑：用户直接为智能服务的使用付费，价值链条更为直接透明。这一转变的深层意义在于，智能服务的使用价值不再被“免费”的表象所遮蔽，劳动创造的价值得以在流通环节中被更为直接地计量和实现。然而，词元经济的价值流通也面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词元生产高度依赖算力、电力等刚性投入，而词元调用收入的规模化积累需要较长的市场培育周期，价值创造的前期集中投入与价值实现的渐进式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错配，构成了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另一方面，当前词元的跨平台流通仍面临技术标准不统一、接口协议不兼容等问题，制约了价值在更大范围内的高效流通与配置。

（四）价值分配：收益格局与利益协调的现实张力

价值分配是词元经济运行中矛盾最为集中的环节。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25] 19}。在传统商品经济中，价值分配主要受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制约，呈现为工资、利润、地租等基本形式。词元经济中，价值创造依赖于芯片制造商、算力运营商、大模型开发者、应用服务商、数据标注劳动者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各主体对核心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了收益分配的格局。当前，词元经济的价值分配呈现出三重结构

性张力。

第一，产业链纵向收益集中。掌握核心算力基础设施与高端芯片的平台巨头居于词元价值链的顶端，无论是应用层企业的 API 调用还是终端用户的智能服务消费，费用最终都通过词元计价体系流向算力供给方。2026 年以来，头部云厂商围绕 AI 算力及大模型服务的定价策略持续调整^[6]，反映出掌控算力资源的主体在产业链中的议价优势。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 GTC2026 大会上将数据中心定义为“Token 工厂”，宣称“计算即收入”^[32]，正是这种资本逻辑的直白表达。收益向上游集中的趋势，使中下游的应用开发商和终端用户承受日益增大的成本压力。

第二，劳资关系横向分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特征，算法工程师等高技能劳动者在人机协同中获取较高回报，而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等基础环节劳动者的报酬往往远低于所创造的价值量。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因总产出扩张而显著增加，但这些新增剩余价值并未惠及基层劳动者。更值得关注的是，词元经济借助算法系统将工作任务拆解为可计量的词元产出，实时追踪劳动效率，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生产结果延伸至劳动过程的每一个微观环节。

第三，金融化趋势初现。词元配额、词元套餐、词元交易平台等新现象的涌现，使词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作为服务计量单位的原始功能，开始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的某些特征。当词元被视为脱离真实劳动过程的独立“资产”进行投机炒作时，便可能形成“词元拜物教”，由此积聚泡沫化风险。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词元这一新型价值符号的包装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展开。收益分配的结构失衡与金融化风险的交织叠加，对词元经济价值实现的治理路径提出了迫切要求。

四、词元经济价值实现的治理路径

词元经济在价值创造、计量、流通与分配四个环节形成相应运行逻辑。活劳动仍是词元价值的唯一源泉，词元以标准化计量单元实现了智能服务的可通约性，“消费即生产”的正反馈循环重塑了价值流通形态，分配格局则取决于各主体对核心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这些新特征赋予了劳动价值论新的解释场域与时代内涵，也对词元经济的计量规范、竞争秩序、安全底线与协同治理提出了现实要求。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2]，将治理议题纳入智能经济新形态建设的核心位置。“十五五”时期推动词元经济走向规范化、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与其价值机制特征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促进价值的有效实现，在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之间实现动态均衡。

（一）健全词元计量标准与质量分级体系，夯实价值度量的制度基石

计量标准是词元价值得以准确度量 and 公平交易的制度前提。当前，词元作为智能服务的结算单位虽已在产业实践中获得广泛应用，但度量规则、质量分级与核算口径等关键环节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从根本上制约了词元作为“价值锚点”功能的有效发挥。比如，同一段文本在不同模型中可能产生数倍的词元数量差异，分词规则由各平台单方设定，用户既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缺乏独立核验的技术手段，这种计量上的不透明为隐性调价和价格操纵留下了空间^[33]。

健全词元计量标准体系，可从三个维度协同推进。第一，在通用计量规范层面，依托国家标准化管理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明确词元的统计口径、核算方法与分词标准化规则，为跨平台的词元核算与比较提供统一的制度基准。在具体操作上，可先就纯文本场景建立基础换算规则，逐步扩展至图像、音频等多模态数据类型，同步建立分词器备案与计量审计制度，压缩平台单方操纵计量结果的空间。第二，在质量分级标准层面，建立以最终效能为导向的多维评价体系，根据不同任务场景区分通用词元与高阶推理词元的质量等级，引入响应精度、任务完成率、安全合规性等指标进行分层评价，使词元定价从单纯的数量计费走向质量与效能并重的复合评价。第三，在绿色能效评价层面，应将单位算力词元产出效率、清洁能源使用比例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随着词元调用规模的持续攀升，数据中心能耗对电力系统的压力日益显著，将“词元碳强度”作为评估智能服务环境成本的核心指标，有助于推动词元经济从粗放扩张走向集约高效。

（二）完善词元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促进价值的合理分配

词元经济的垄断根植于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资产属性与核心芯片的技术壁垒，物质条件上的刚性约束使市场进入壁垒远高于传统互联网行业。若不加以引导，将压缩中小企业的创新空间与利润空间，使价值分配进一步向少数头部平台集中。在实践中，头部平台不仅控制着算力供给，还掌握着分词器设计、计费规则制定、上下文缓存策略等关键技术参数，能够在不直接调整名义价格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参数的微调间接影响交易条件，形成传统反垄断工具难以有效识别的新型市场权力。

完善公平竞争秩序，可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第一，在反垄断治理层面，词元经济中的垄断行为以算力供给控制、词元计价体系操纵、算法合谋等新型形式呈现^[34]，应依法治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算法协同定价以及基于用户画像的价格歧视等行为^[35]，促进算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共享。第二，在差异化定价层面，应构建涵盖算力成本、能耗水平与场景复杂度等指标的定价模型，推动形成“通用需求普惠定价、高端需求场景溢价”的分层定价格局。同时，平台的义务范围应从内容安全延伸至结算透明，明确词元计量规则披露、动态调价提前通知以及计费日志留存与审计接口等基本要求，切实保障用户在不同平台之间的知情权与比价能力。第三，在公共交易平台层面，政府可主导建设词元公共交易与调度平台，依托国家算力调度监测平台为词元的弹性供给与按需调度提供数据支撑，引导市场竞争从单纯的价格比拼转向质量与效能并重的价值竞争。

（三）筑牢数据安全、算法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底线，保障价值流通的安全可控

词元经济的安全挑战具有独特的“全链条”特征。在输入端，用户提示词往往包含个人隐私与商业机密；在处理端，大模型可能在训练过程中“记忆”敏感数据，形成“模型记忆泄露”风险^[36]；在输出端，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合规性与版权归属亦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种贯穿词元生命周期的安全风险，要求治理措施必须覆盖从数据输入到内容输出的完整环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国内企业调用境外大模型 API 时，词元交互过程中的数据出境问题将涉及数据安全评估、外汇管理等多维度规则适用，使安全治理的复杂性进一步上升。

筑牢安全底线，可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第一，在数据治理层面，针对词元生产与调用的特

殊环节,制定覆盖训练数据来源审查、用户输入数据最小化采集、隐私计算保护以及输出内容安全审查等关键节点的专项合规标准,明确词元交互数据的本地化存储要求与出境审查操作规程^[37]。第二,在算法透明度层面,建立针对高风险应用场景的算法备案与审计制度,对金融、医疗、司法等高风险领域实施更为严格的算法透明度要求,要求服务商提供独立且可审计的词元计量日志并建立第三方核验机制,对低风险的通用词元服务给予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在法治稳定性与技术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第三,在知识产权层面,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特点的产权认定规则,厘清训练数据使用的合理边界与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明确各方主体在词元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 构建多元协同与国际对接的治理格局,拓展价值实现的制度空间

词元经济具有跨行业、跨平台、跨国境的运行特征,单一部门或单一层级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应对治理的全部需求。在国内,词元调用链条横跨芯片制造、云计算、模型服务与终端应用等多个行业领域;在国际,词元交互过程中的数据流动、算力调度与服务结算已突破国境限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化运行格局。这种内外交织的治理复杂性,要求构建国内多元协同与国际规则对接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在国内治理层面,核心任务是建立协同监管机制。词元经济的运行涉及工信、网信、数据、市场监管、科技等多个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38],可在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基础上建立以风险等级为导向的分类监管分工体系。词元经济的跨部门治理难题在于,同一次词元调用可能同时触发算力资源配置、数据合规审查、内容安全审核与市场公平竞争等多重监管需求,而各职能部门在规则制定与执法标准上尚未形成有效衔接,容易出现监管重叠或监管空白并存的局面。对此,可探索建立词元经济治理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统筹规则制定与执法协作,避免政出多门与监管真空。面对词元经济快速迭代的产业特征,监管理念应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常态化治理,既坚决打击借词元概念进行的投机炒作与非法交易行为,又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探索留出必要的制度弹性空间。

在国际治理层面,词元的计量标准、定价机制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正在成为大国技术博弈与规则竞争的新焦点^[39]。欧盟《人工智能法》已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出训练数据信息披露要求,美国则通过出口管制手段限制高端芯片流通,词元经济的国际规则体系尚处于各方角力的窗口期。我国应立足自身产业优势与治理经验,主动设置词元经济国际议题。当前,中国企业在词元定价与开源生态方面已展现出显著竞争优势,应将这些产业实践经验转化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资源。在具体路径上,可依托“东数西算”工程的运营实践,探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算力互联、词元服务合作与数据治理规则互认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形成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词元经济治理框架。

五、结语

词元从技术计量单元向经济价值锚点的跃迁,折射出智能经济新形态对既有生产方式、价值流通逻辑与收益分配格局的深层重构。这一重构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智能化条件下并未丧失解释

力,而是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活劳动以“总体工人”的当代形态继续充当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词元则以标准化计量单元的角色将智能服务纳入可通约的价值表现体系。词元经济的实践演进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数智时代的新问题打开了重要的理论窗口。在这一窗口中,如何准确界定各类智能劳动在“总体工人”框架内的价值贡献,如何在词元计量体系的建构中兼顾效率目标与公平原则,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工具解释词元金融化趋势中的虚拟资本风险,均是需要持续深化研究的理论命题。与此同时,当词元调用量持续攀升并深度嵌入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防范收益向上游算力环节过度集中、推动基层劳动者合理分享智能化红利、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竞争中将产业实践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资源,将是我国政策设计需要持续关注的现实课题。词元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的协同推进,更有赖于凝聚各方面力量在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持续校准方向,使其真正服务于“十五五”时期智能经济新形态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5(25): 16-20.
- [2]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4] 许丹荔, 王炳涵. “十五五”时期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驱动因素、核心内涵与实践方略[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2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317.1520.002>.
- [5]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关于发布试用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中文名“词元”的公告[EB/OL]. (2026-03-25) [2026-05-19]. http://www.cnterm.cn/news/tzgg/202603/t20260325_827999.html.
- [6] 杜壮. 词元经济如何塑造智能经济新生态[N]. 中国改革报, 2026-04-29(5).
- [7] 李国庆.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2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515.1040.004>.
- [8] 潘宏亮, 杨文光, 叶璐. 我国词元经济发展的条件、约束与推进路径[J/OL]. 中国流通经济, 1-12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664.F.20260509.1631.002>.
- [9] 丁从明, 石梦圆. 词元经济学: 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理论分析框架[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3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0.C.20260510.1949.002>.
- [10] 夏璋煦, 徐政. “十五五”时期智能经济新形态下“词元经济”的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6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518.1128.006>.
- [11] 蔡万焕.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词元的性质及对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的重构[J]. 天府新论, 2026(3): 125-136, 159.
- [12] 刘明辉, 王鹏程. 词元: 智能时代可持续信息计量的新框架[J]. 财会月刊, 2026(10): 3-11.
- [13] 刘典. 词元经济: 智能时代重塑生产力的重要引擎[N]. 学习时报, 2026-05-08(3).
- [14] 洪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 让AI像水电一样普惠千行百业[N]. 人民政协报, 2026-04-10(11).
- [15] 杜晓宇. 词元经济的产业逻辑与演进方向[N]. 学习时报, 2026-05-13(2).
- [16] 周文, 李森. 智能经济的本质特征、理论构建与形态重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 (3): 5-19.
- [17] 钞小静,王清. 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形成逻辑与政策路径[J/OL].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52.C.20260410.1020.002>.
- [18] 张春,刘超,董兵兵. 数据要素的形态特征、产权边界与效能增值[J]. 经济问题, 2026(1): 37-46.
- [19] 袁曾. 算力的规制逻辑及其高质量发展[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73-84.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
- [21] “1590 EFLOPS”意味着什么?[EB/OL]. (2026-01-23)[2026-05-19]. <https://www.news.cn/fortune/20260123/d66bdc56d7084fdd93e2b8dcfc9e1f5a/c.html>.
- [22] 工信部:截至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EFLOPS[EB/OL]. (2026-04-21)[2026-05-19].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019963.
-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EB/OL]. (2022-12-19)[2026-05-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19/content_5732695.htm.
- [24] 《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EB/OL]. (2026-04-15)[2026-05-19]. <https://news.bjd.com.cn/2026/04/15/11690868.shtml>.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 [26] 刘坤. 智能经济形态日益焕新[N]. 光明日报, 2026-04-02(15).
- [27] 郭倩. 拓展增长新空间智能经济新形态加速崛起[N]. 经济参考报, 2026-04-28(1).
- [2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5-04-27(1).
- [2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13.
- [30] 彭新. DeepSeek击穿大模型底价百万Tokens低至2分钱[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6-04-28(3).
- [31] 张守营. 从技术计量单位到数字新燃料四方面读懂词元经济学[N]. 中国经济导报, 2026-03-28(1).
- [32] 黄仁勋GTC演讲全文:推理时代到来,2027营收至少万亿美元,龙虾就是新操作系统[EB/OL]. (2026-03-17)[2026-05-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9863688959706959&wfr=spider&for=pc>.
- [33] 蒋慧. 算力计量法治化:词元计量交易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因应[J/OL]. 广西社会科学, 1-10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45.1185.C.20260506.0912.002>.
- [34] 程雪军. 生成式人工智能下数字金融平台算法合谋的精巧规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5(6): 114-121.
- [35] 叶明,朱佳佳. 权力视角下平台经营者垄断风险的治理路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86-100.
- [36] 郑煌杰. AIGC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数据风险及其敏捷治理[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89-102.
- [37] 李毅. 完善数据立法至关重要[N]. 经济日报, 2026-04-29(5).
- [38] 陈兵. 从包容审慎到常态化:数字经济监管的完善进路[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5): 57-67.
- [39] 胡仙芝.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与监管的三维平衡论[J]. 新视野, 2025(6): 73-84.

责任编辑:林华山 校对:王京菁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

李国庆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24)

摘 要: 词元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和生成内容的基本单位, 已由算法内部的技术环节, 逐步转化为理解模型运行、服务计价和价值分配的重要范畴。词元经济是围绕词元生产、调用、反馈和分配形成的新兴经济形态, 也是智能经济在大模型运行、智能服务供给和产业价值转化层面的具体化表达。就技术内涵而言, 词元是数据要素进入智能生产过程后的基础性形式, 词元经济以智力服务的计量和价值实现为支撑, 反映智能经济形态下的新型生产关系。就产业逻辑而言, 词元经济推动智能服务从模型供给延伸至场景嵌入, 即推动传统产业在存量焕新中实现流程再造和价值跃迁, 推动新兴产业在增量扩张中形成可持续性的智能服务, 推动未来产业在潜量培育中加快技术验证和场景孵化。就治理体系而言, 应在高质量发展主题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下, 把战略安全、市场秩序、文化主权、法治伦理和社会公平贯通起来, 以战略安全治理确立词元经济的发展坐标, 以市场秩序治理规范词元经济的运行机制, 以语义文化治理维护词元经济的话语主权, 以法治协同治理完善词元经济全周期机制。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智能经济新形态; 词元经济; 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 “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 F49;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099-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08

作者简介: 李国庆,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生动实践研究”(25LLYJB143)

引用格式: 李国庆.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99-110.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阶段，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也由推动技术创新延伸到经济形态塑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并提出“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2]。“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3]，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4]。这表明我国正在从以数据积累、平台连接和产业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阶段，进一步迈向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产生活全过程的智能经济阶段。

理解智能经济新形态，不能停留于应用场景和产业规模的外部描述，还需要进入大模型运行过程，考查数据如何被处理，产业价值如何被计量和分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词元”开始从人工智能技术术语转化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切口。词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数据单元”^[5]。作为观察智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2024年初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约为1 000亿，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2026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1 000倍^[6]。词元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不仅是人工智能使用频次增加的技术现象，更是智能经济加速成形的现实信号。面对这一新趋势，2026年3月25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公告，优先推荐“词元”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的中文名，面向全社会发布试用^[7]。与此同时，国家数据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正式采纳并使用“词元”这一术语，进一步推动其进入公共政策和产业实践视野。

所谓“词元经济”，是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广泛应用条件下，围绕词元的生产、调用、反馈和分配而形成的智能经济样态。词元经济不是替代数字经济、算力经济或平台经济的上位概念，而是对智能经济内部运行机理和价值关系的深化表达。词元正在成为连接数据资源、算力消耗和应用场景的基础性单元，进而具有计量、结算和治理意义。这意味着“以词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商业逻辑正在形成”^[8]。从这一角度看，它涵盖两个关键环节：第一，数据如何通过大模型被转化成可计量、可利用的数据单元；第二，词元如何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被调用并最终产生产业价值。

由于词元经济是一个新兴概念，相关讨论散见于政策解读、报刊评论、产业报告和少量理论文章之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在概念界定层面，相关研究认为词元已从技术单位转化为一种“AI运行的计价单位”^[9]，与数据之间存在本质差异^[10]，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11]，开创了语义可计算的全新经济逻辑^[12]，其调用量增长是词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3]。在作用属性层面，有学者强调词元经济的技术路径，认为其本质旨在深度解决大语言模型应用的“量化和规模化问题”^[14]，属于智能经济的重要子集；有学者着眼于经济机制，指出词元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重塑相关要素的定价机制、资源配置模式与市场化应用生态，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治理价值。在产业实践层面，现有成果指出随着单位成本的下降，智能体应用、算力平台和大模型服务的爆发式增长，词元正经历从“通用语料堆砌”向“行业 Know-how 语义对齐”^[15]的转变，

有助于打通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的市场化流通^[16]。现有研究初步揭示词元经济的技术基础和产业价值，但对其作为智能经济基础研究对象的学理阐释仍显不足，尤其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何以成为观察数智化生产、产业组织和治理秩序变革的关键范畴。基于此，本文拟在界定词元经济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明其生成机理、产业逻辑与治理要求，以期为理解智能经济形态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视角。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

作为智能经济的“细胞形态”，词元一方面是数据要素在大模型运行中的基本量化单位，其流转更关联市场规则、收益分配、整体安全等多重社会关系。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既要说明数据要素如何在智能经济形态中具象化为词元这一新的存在形式，更要揭示智力服务如何由模型能力转化为市场价值，用户、平台、数据、资本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围绕词元发生调整。

（一）词元支撑数据进入智能生产并转化为智力服务

任何成熟的经济形态都需要相应的价值尺度和计量单位。农业经济离不开土地、亩产和粮食重量，工业经济离不开吨、千瓦时、工时和公里，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则离不开比特、字节和点击量。比特和字节虽可以较好地度量信息存储和传输，却难以反映数据的语义密度、知识含量、模型处理难度和智力服务价值。相同字节规模的文本，可能只是日常闲聊，也可能是法律条文、工业故障记录、医学病例或科研文献。数据进入大模型之后，智力服务不再只是为信息存储、检索、呈现及交易提供便利，更是对语言、知识、图像、代码及行业经验等复杂知识的深度理解、逻辑推理、内容生成与任务执行。但是，数据要素无法自发生成智力服务，厘清词元作为数据要素融入智能生产过程的基础单元属性，是理解这一转化逻辑的前提。

从技术层面看，词元不是自然语言中的“词”，也不是简单的汉字、单词或标点符号，而是模型依据分词器、语义结构和训练需要形成的基本离散单元。它可以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代码符号、图像片段或其他能够被模型识别的内容单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 Token 定名为“词元”，也正是因为“词”体现其语言和语义根源，“元”体现其基本单元属性。随着大模型从文本走向多模态，词元也可以被更广义地理解为各类内容进入模型系统后的基本处理单位。词元并不是把数据进行简单地细化切分，而是使数据、语言、知识和场景经验在进入大模型之后获得语义化和可调用化的表达形式。

从运行机制看，词元经济并非否定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而是突出数据要素是如何通过词元化作为生产过程的价值实现载体。以往关于数据经济的讨论，更多关注数据采集、确权、开放、流通、交易和安全，但如果仅把数据看作待开发、待交易、待流通的“静态的原始素材”^[13]，就难以解释大模型为何能够形成语言生成、重组知识、辅助推理并执行具体任务。数据要转化为智力服务，首先需要经过词元化（Tokenization）^[16]处理，才能进入模型训练、推理调用、场景反馈和持续优化的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可以作如下简要理解：原始数据并不能直接被模型有效使用，而是需要经过清洗、筛选、整理和去重，转化为模型能够识别和处理的词元；模型在大量词元中学习语言关系、知识结构和任务模式，并将这些关系沉淀为可供调用的模型能力；用户提出问题

时,输入内容会被转化为词元,模型再依据已有参数生成新的输出词元,从而形成问答、分析、写作、编程、检索辅助等服务;用户的追问、修正、评价和使用结果,也可能成为新的反馈材料,继续参与模型优化。可见,词元化正是数据进入大模型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词元化过程体现了劳动对象形态的深刻变化。传统工业生产主要加工自然物质,数字经济更多加工数据和信息,而智能经济则进一步把数据、信息和知识加工为模型能够处理的语义对象。词元本身没有物质形态,却必须依托芯片、服务器、数据中心、电力、网络和算法系统才能发挥作用。它表面上是信息颗粒,背后则凝结着语料生产、数据清洗、人工标注、模型训练、算法优化和用户反馈等社会劳动。词元并不是脱离社会生产过程的纯技术单位,而是数据要素在智能生产过程中获得现实作用的基本形式。

可见,词元经济揭示了智能经济区别于一般数字经济的重要机制:它不是简单描述数字资源规模,而是说明数据要素如何在大模型运行中完成从资源形态向服务能力形态的转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词元可以被理解为数智生产过程中的新型价值细胞,是数据要素在智能经济下的具体化和活跃化表达。

(二) 词元经济以智力服务的计量和价值实现为支撑

词元的出现是“把数据和信息区分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17]。词元经济之所以能够从技术概念转化为经济概念,关键在于词元将原本难以度量的数据转化为可核算的交换单元,使进入大模型之后的加工、调用、生成和反馈过程具备了相对清晰的计量尺度,从而构建了 AI 产业应用和价值创造的核算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与传统软件服务有根本不同。传统软件通常按授权、席位、订阅或功能模块计费,而大模型服务则更多按照输入和输出的词元数量、模型等级及工具调用情况进行综合计量。用户向模型提问需消耗输入词元,模型生成回答产生输出词元。智能体在规划、检索、工具调用与反馈分析中也会持续消耗词元。这使得原本相对抽象的智力服务“有了标准化的计量单位”^[18],得以转化为可以核算成本和组织交易的经济活动。

从价值链看,词元在电力、算力、模型和应用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连接。电力驱动数据中心运行,算力支撑模型训练与推理,模型通过词元处理语言、知识与任务,应用场景则通过词元调用获取智能服务。以往,算力规模、模型参数与数据资源往往分别计量,其经济转化路径并不清晰。词元的出现,使模型运行的成本和智力服务的产出之间形成了更加直接的联系。词元“是排行榜上大模型调用量的评估标准,也是大模型厂商销售套餐的计费单位”^[19],已成为衔接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的關鍵结算基础。

词元经济绝非简单的“按字数收费”,而是将词元消耗与任务复杂度、模型能力、场景价值和服务质量深度关联。随着大模型从简单问答迈向代码生成、专业分析、智能体协同与行业决策,同等数量的词元在法律分析、医疗辅助、工业设计或金融风控等不同场景中产生的经济价值亦有不同。在各式服务场景中,词元经济的重点不仅是降低单位词元成本,更在于提升单位词元的有效产出,推动 AI 经济评估从单纯关注计算效率转向更加注重服务效能。随着智能体应用发展,未来智力服务的计价模式将进一步发展为“词元消耗+工具调用+任务复杂度+结果价值”的复合计价体系,反映出技术效率、市场博弈与场景风险三者的综合作用。

可见,词元经济以智力服务的可计量性与价值实现为支撑,系统回应了智能经济中的一组基

础命题：人工智能如何从技术能力转化为市场服务，如何从模型运行转化为成本核算，如何从数据加工转化为价值创造。词元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智力服务被衡量、定价与交易，进而支撑人工智能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应用和制度化治理。

（三）词元经济反映智能经济形态下的新型生产关系

伴随大模型训练与智能体落地，数据挣脱了单一场景的使用桎梏，并以词元为通用载体贯穿智能经济全流程，清晰映照出技术变革背后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

首先，词元经济重塑了智能生产中的主体关系。在传统数字平台中，用户主要以消费者、浏览者和数据提供者的身份参与平台运行；而在大模型场景中的用户活动，都会转化为词元，成为模型改进和产品优化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在智能体持续运行的条件下，用户活动、工作流程、知识经验和场景需求会被不断记录、整理和调用，进而转化为新的词元流。用户不再只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被动消费者，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智能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一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用户贡献如何确认，数据权益如何保护，平台能否无偿吸收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单纯技术效率的范围，进入了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领域。

其次，词元经济改变了平台组织智能生产的方式。大模型平台通过模型接口、上下文窗口、调用规则和智能体运行环境，组织词元的输入、处理、生成和反馈。传统平台经济主要控制流量、用户、广告和交易入口，而大模型平台则进一步控制模型能力入口、知识调用入口和智能服务入口。在词元经济中，平台的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高质量词元资源的占有和整合能力，二是对词元调用流程与计价规则的设定能力，三是对模型持续迭代和服务供给的支撑能力。平台不仅影响智能服务的成本结构和企业应用的收益空间，也可能在智能生产体系中形成新的组织优势。

最后，词元经济关系到智能时代的语义秩序和文化安全。大模型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语义机器。哪些语料被纳入训练，哪些知识和表达被重点强化，哪些价值判断被嵌入模型，都会影响模型输出的知识结构和话语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词元经济关联着“算力意识形态话语全球扩张”^{〔20〕}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和价值阐释能力。

总体而言，词元是数据要素进入智能生产过程后的基础表现形式，兼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模型识别、加工和重组数据知识的基本对象，也是在提示组织、语境设定和工具调用中连接劳动者与模型系统的重要技术媒介。词元经济的发展表明，智能生产过程不再单纯依赖数据积累或模型规模，转而依靠多要素协同联动以持续提升生产效能。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是更多经由数据词元化、模型服务化和平台组织化等环节得以表现，并使生产资料占有、劳动过程组织、价值实现和收益分配呈现出新的样态。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词元经济如何通过理顺各类生产要素的流转路径与落地方式嵌入产业体系。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产业逻辑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智技术创新”^[21]，这一战略部署将数字中国建设推向以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为路径的新阶段。从产业发展视角看，词元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了一套清晰且通用的产业运行单元。一方面，词元在算力、数据、模型与应用场景之间搭建起互通联动的底层通路，“使之从相对独立的资源，转变为紧密耦合的价值创造循环”^[12]；另一方面，围绕词元的生成、计价、流通与场景落地，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一）词元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在存量焕新中实现流程再造和价值跃迁

传统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主要场域。传统产业的网络化解解决能否连接的问题，数字化解决能否记录的问题，词元化则解决生产要素可计量可流转可优化配置的问题。传统产业开展词元化改造，并不是把人工智能当作外部工具生硬嵌入原有业务流程，而是以行业词元为中间载体，将沉淀在生产设备、业务流程与从业人员实践中分散的存量数据、隐性知识和场景经验，重组转化为模型能够调用、反馈并持续优化的标准化词元资源，使之有效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制造企业在平台化转型中普遍面临“数据之间缺乏关联性，数据库彼此无法兼容，导致决策受限和协作困难”^[22]等问题，难以跨系统流动与规模化复用。词元经济不仅可以“感知”多环节、碎片化的图纸、工艺说明、设备运行记录、质检结果、维修记录和售后反馈，更能整理成大模型能够理解调用的行业知识，使人工智能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进入具体生产场景，帮助企业发现设备异常、改进工艺流程、提高质检效率和优化售后服务。相关案例研究也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推动制造企业价值链重构，使企业的生产管理和服务方式发生数字化转型^[23]。

词元经济的产业逻辑并不局限于宏观效率提升，也正在通过低门槛、按需化、可计量的智力服务进入基层经济运行。传统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面临改造经济成本高、产业配套支撑有待完善、关键核心技术亟待攻克、复合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四类障碍^[24]。词元经济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自建模型、自购设备、自组团队的智能化路径，企业可以通过行业平台、模型服务和按需调用机制获取全业务场景智力服务，不再局限于既定技术轨道下的单一渐进式创新模式。这样既有助于降低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也有助于推动大模型服务从头部企业向广大中小企业和基层经营主体扩散。

（二）词元经济推动新兴产业在增量扩张中形成可持续性的智力服务

与传统产业侧重存量优化和流程再造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任务在于创造增量。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已经具有较明确的技术方向、产品形态和市场空间，正在成为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的重要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显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呈现创新引领、结构优化、区域集聚和全球拓展的发展格局^[25]。词元经济作用于新兴产业应理解为，通过词元调用、计量、反馈和迭代机制把快速成长的技术产品、装备系统和应用场景转化为持续性的智力服务生态。

从产业运行看，新兴产业过去更多依靠技术路线突破、产品性能提升和市场规模扩张形成竞

争优势。进入大模型时代以后，新兴产业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技术扩张进一步转向谁能够把产品运行、用户交互、场景反馈和模型能力结合起来，围绕词元形成稳定高效安全的智力服务生态。词元在此发挥的作用，不只是充当模型处理信息的技术单位，而是使智能服务能够被调用、被计量、被优化和被交易的基础单元。它把模型能力从抽象的技术展示转化为企业可以实际使用的产业能力，使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不再止于一次性交付，而是能够延伸为远程运维、研发辅助、风险识别、个性化服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可见，词元经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深层逻辑，在于把“产品”转化为持续服务入口，把“模型”转化为产业可调用能力，把“场景”转化为价值增值空间。具体而言，芯片、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电力提供物质基础，大模型和云平台提供能力支撑，行业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开发者和用户反馈推动服务迭代。词元则把这些环节连接起来，使不同主体能够围绕智能服务的调用、质量、成本和效果形成协作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词元不只是参与数据处理，更深度参与新兴产业的价值创造、服务组织和生态构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技术产品竞争走向智能服务能力竞争。

（三）词元经济推动未来产业在潜量培育中加快技术验证和场景孵化

未来产业不同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是培育壮大和规模扩张，未来产业的核心任务是把前沿技术从科学探索转化为产业能力。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未来产业“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26]。就现实发展而言，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着“硬件设施超前投入与人才效能释放滞后、再生产循环长效周期与评价尺度错位、资源配置规模优势与制度治理衔接不畅”^[27]等挑战。鉴于此，词元经济对未来产业的赋能呈现为一种服务于前沿技术甄别、概念验证、场景试验、价值研判等全链条的微观机制。

其一，词元经济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提供技术识别与路线研判支撑。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及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兼具颠覆性和不确定性，前期选择往往决定后续资源配置效率。词元经济以大语言模型的数据处理能力为技术支撑，对前沿技术资源与各类场景需求进行系统性梳理整合，并转化为可以对比研判、随时调用且支持逻辑推演的智能化可用资源。依托这一能力，行业内对于前沿技术的甄别筛选、发展路线判断以及研发方向选定，不再单纯依靠少数专业人员的主观经验。结合大范围的知识联动分析与实际场景反馈，产业研发布局能够获得更全面的数据支撑，进而提升未来产业前期规划的科学性与精准度。

其二，词元经济为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和场景试验提供过程记录与反馈机制。未来产业不能停留在实验室成果和技术设想层面，关键在于能否进入真实场景反复验证，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调整技术路径。词元能够记录智能系统执行任务的过程、实验反馈、场景变化和结果评价，将原本分散的试验信息转化为可追踪和优化的过程性材料。这样，技术是否成熟、场景是否适配、风险是否可控，就能够获得更加具体的判断依据。对于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示范应用和监管试点而言，词元经济能够提供更细致的反馈机制，推动前沿技术更快完成从“可能可行”到“场景可用”的转化。

其三，词元经济有助于推动未来产业的早期价值识别和生态孕育。未来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缺少成熟产品、稳定收入和清晰市场规模，传统指标难以及时评价其真实潜力。如果只以短期收

益判断未来产业价值，容易压缩长期创新空间。词元经济则可以从任务完成质量、技术成熟度、场景适配度、服务效果和反馈改进等方面，提供过程性、动态化的评价依据，帮助政府、资本、企业和科研机构判断哪些方向具有持续投入价值，成为未来产业早期识别技术潜力、组织创新资源和培育产业生态的重要支撑。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治理体系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单元，词元“强大的扩展迁移能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基础设施，隐而不彰地重塑社会结构和治理形态”^[28]。构建词元经济治理体系，要从其技术结构和运行机制出发，把战略安全、市场秩序、文化主权、法治伦理和社会公平贯通起来，坚持安全型治理、发展型治理、法治型治理和协同型治理相统一，在规模化发展基础上实现有序持续发展。

（一）以战略安全治理确立词元经济的发展坐标

词元调用量、词元处理效率、词元定价规则和质量词元供给能力，关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主动权，并“将进一步增强全球权力的非对称性”^[29]。当前，中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竞争已演变为一场覆盖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治理规则与商业生态的系统性、多层次综合博弈，位居中美大国博弈的核心地位。这并非单一技术或产品的较量，而是贯穿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标准、规则与应用生态的全链条竞争。芯片与算力的竞争，决定了词元的基础生产力与成本结构；数据与语料的竞争，定义了词元的原料品质与价值密度；模型与算法的竞争，驱动了词元的转化效率与能力边界；平台与标准的竞争，构建了词元的流通规则与市场秩序；而应用与场景的竞争，则最终完成了词元从计算成本到经济价值的兑现。词元经济处于各竞争层次的交汇点与价值枢纽，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安全维度上，词元经济治理涉及三重安全。第一是科技安全。词元的生产、流通与调用，必须依赖高质量多模态语料、先进模型算法、高端智算芯片及安全可信的软件工具链。若上述核心技术与基础设施受制于人，词元经济的发展将缺乏自主可控的底层支撑，极易产生“数字技术依附”^[30]。第二是经济安全。在科技自主的基础上，还需确保核心模型、制度规则、平台入口与调用生态不被少数跨国资本或实体垄断，否则将会威胁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第三是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词元作为语义构建与流动的基本单元，是意识形态塑造与文化认同的关键载体。而大模型并非价值中立的语义机器，训练语料、价值对齐、输出规则都会影响社会认知、舆论生态和价值传播。

因此，词元经济治理应坚持“固本培元”与“正本清源”相统一。一方面，要重视“词元经济主权”，继续加强算力算法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供给质量和应用推广范围，夯实词元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另一方面，要拧紧“词元经济安全”阀门，加强数据质量治理、模型安全评估、应用风险监测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防止词元经济在无序扩张中放大安全风险。

（二）以市场秩序治理规范词元经济的运行机制

鉴于我国在算力和算法等基础层短期内难以实现赶超，“中国更重视人工智能在应用层的快

速落地”^[31]。这种“应用先行”的战略，在释放巨大潜能的同时，也因基础层支撑相对滞后而更易引发市场失序、创新内耗与生态垄断的风险。因此，要加速构建健全的词元经济市场秩序，通过完善规则、统一标准、加强治理与优化分配，引导其服务于实体经济，避免在资本单一逻辑下偏离正确方向。

第一，以服务价值锚定词元经济的市场边界。词元价值依托于具体模型能力、应用场景和服务效果而存在，是服务计量和价值核算工具，并非脱离智能服务场景便可独立增值的金融资产。应通过交易边界界定、服务标准披露、价格机制规范和平台责任压实，引导市场主体把竞争重点放在模型效能、场景适配和产业赋能上，避免“金融化和泡沫风险”^[32]，使词元经济始终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和真实智能服务展开。

第二，以规则体系建设提升词元经济的运行效率。我国具有统一大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和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应加快构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衔接的词元经济运行体系。在标准化方面，应明确词元统计口径、质量评价、服务披露、计费规则、安全责任和争议处理机制，增强不同模型平台之间的可比性。在差异化方面，推动词元市场规则要从简单按量计费，走向词元消耗、模型能力、任务复杂度、服务质量和市场价值相结合的复合评价体系，形成透明合理的差异化定价体系，“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规模偏好”^[13]。在可调度化方面，应推动算力、模型、数据和应用场景高效匹配，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错配。

第三，以协同发展机制激发词元经济的生态活力。发展词元经济，需要统筹大模型企业、算力平台、电力企业、数据提供者、行业应用主体、开发者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关系，形成要素共建、能力共享、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的生态机制。其一，推动算力规划、绿电供给和价格机制协同，通过算电联动降低智能服务基础成本，鼓励大模型企业、算力平台和行业企业共建行业级推理服务平台。其二，探索“基础使用费+增量价值分成”等收益模式，运用可信存证、贡献计量和调用记录等工具，使数据、知识、反馈和优化等生态贡献获得合理回报，并明确行业知识库授权使用、数据权益和商业秘密保护边界。其三，完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在重点行业探索模型企业、平台、开发者和用户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明确词元使用、收益分配和争议解决规则，防止价值抽成垄断和分配失衡。

（三）以语义文化治理维护词元经济的话语主权

词元经济治理的特殊性在于它深度嵌入语言、知识、文化和价值观进入智能系统的全过程。词元作为语言知识进入模型系统的基础单元，是连接文化表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媒介，直接影响模型如何组织语料、建构知识关联、生成内容表达和塑造意义秩序。但由于计算编程语言壁垒、中文优质内容在全球网络数据库中缺失等因素，英文语料和平台生态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中国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新的结构性失语风险。

维护词元经济治理的话语主权，一是要加强高质量中文语料库体系建设。当前，中文语料库建设仍存在着供给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具有文化代表性、专业权威性的多模态语料资源收录不足等问题^[33]。应系统推进权威中文语料库、行业知识库、公共文化资源库和基础科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产业实践等，转化为规范完整、可持续更新的高质量语义资

源。二是要增强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和中文处理机制的自主创新能力。中文词元体系建设不能只依赖外部模型和外部分词规则，而应结合中文语言结构、中华文化表达方式、中国制度语境和本土应用场景，发展更适合中文表达和中国知识体系的大模型技术路线，才能保证智能系统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和中国道路的表达更加准确、充分和可持续。三是要把词元经济纳入智能传播能力建设。“大模型对训练、建模语料的强依赖性和技术‘强者’所属的文化价值理念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舆论体系中的既有对华偏见。”^[34]既有研究发现，“ChatGPT 在进行人机互动时倾向将中国价值观与‘文化孤立’和‘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35]。发展词元经济，要坚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36]，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和“智能向善”的宗旨，倡导大模型平台内协同共治，使其成为准确阐释中国道路、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支撑。

（四）以法治协同治理完善词元经济全周期机制

数据治理重点聚焦数据采集、确权、流通、交易与安全保护，平台治理重点聚焦市场秩序、主体责任、开放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算法治理重点聚焦算法透明、公平可解释、风险评估与责任追溯，既有治理框架为词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参照。词元经济治理具有跨场景、跨主体和跨领域的特征，需要进一步走向全链条、普惠化和协同性治理。

第一，构建覆盖词元全生命周期的法治规则 and 标准体系。词元经济贯穿数据词元化的全过程，应围绕词元计量、质量分级、服务披露、价格规则、交易合同、责任认定、争议解决和安全评估建立制度规范。在采集和训练环节，明确数据来源合法性、版权授权、隐私保护、数据质量控制和训练用途边界。在调用和输出环节，防范提示词注入、越权调用、敏感信息泄露和虚假有害内容扩散，明确生成内容责任。在交易和跨境流动环节，依据商业词元、行业敏感词元、公共数据词元、个人信息词元和重要数据词元等类型实施分类分级治理。这样才能使词元经济在可计量、追溯和问责的制度框架中规范运行。

第二，强化人文关怀和普惠治理。“词元经济的生命力，在于能否让 AI 服务与民生场景深度结合，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得实惠。”^[37]词元经济的发展要致力于把过去高门槛的智力服务转化为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资源。比如，面向老年群体推出适老化智能服务产品，简化操作流程，强化语音交互和安全提示；面向农村地区持续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服务建设，依托“东数西算”等工程提升算力资源调度能力，使农村群众也能享受低成本、便捷化的智能服务；面向普通劳动者、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广泛开展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应用培训，降低智能工具使用门槛，使词元经济发展红利更加公平地惠及社会成员。

第三，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应承担战略规划、制度供给、安全监管和公共服务保障职责；大模型企业和平台企业应承担合规运营、风险防控、服务披露和技术向善责任；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加强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伦理规范和人才培养研究；行业协会应推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和纠纷协调；用户和社会公众应参与风险反馈、合理使用和伦理监督。在统一战线工作视野中，应凝聚民营科技企业、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行业组织力量，形成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技术创新、维护安全底线、促进技术向善的广泛合力。

五、结语

词元经济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它以词元为基础单元，揭示数据要素进入智能生产过程后，经由模型训练推理调用场景反馈与价值实现，逐步沉淀为智力服务并释放相应产业价值。本文从技术内涵、产业逻辑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意在强调词元经济是智能经济新形态下理解数据要素活化、智力服务计量、产业体系升级和生产关系重组的重要切口。实践先行、应用先行、产业先行，是新技术经济形态成长的一般规律。立足当下，一方面，要充分释放词元经济在降低智能服务门槛、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促进数据价值释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围绕国家安全、市场秩序、文化主权和法治伦理，建立与其运行特征相适应的治理体系。面向未来，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以词元经济为主要代表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充分发挥我国拥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完整的产业链条、海量的数据资源和不断完善的算力能源基础设施优势，加速算力、算法、数据、模型和场景深度融合，持续释放词元经济产业价值，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7.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18-11-01（1）.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13.
- [4]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26.
- [5] 王云杉. 漫谈词元[N]. 人民日报，2026-01-28（5）.
- [6] 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N]. 人民日报，2026-03-24（8）.
- [7]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关于发布试用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中文名“词元”的公告[EB/OL].（2026-03-25）[2026-04-25]. http://www.cnterm.cn/news/tzgg/202603/t20260325_827999.html.
- [8] 求是网评论员. 140万亿词元调用量意味着什么[J]. 红旗文稿，2026（8）：46-47.
- [9] 杨卉.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从模型服务走向词元服务，是智能体时代对基础设施的必然要求[N]. 每日经济新闻，2026-04-17（5）.
- [10] 丁从明，石梦圆. 词元经济学：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理论分析框架[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6-05-1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APJ&dbname=CAPJLAST&filename=CQYD20260508001>.
- [11] 刘继为. 何为“词元经济”[N]. 学习时报，2026-04-22（2）.
- [12] 刘典. 词元经济：智能时代重塑生产力的重要引擎[N]. 学习时报，2026-05-08（3）.
- [13] 潘宏亮，杨文光，叶璐. 我国词元经济发展的条件、约束与推进路径[J]. 中国流通经济，2026（6）：3-14.
- [14] 杨岚. 全国政协委员黄群慧：词元经济的三问三答[N]. 人民政协报，2026-04-10（11）.
- [15] 洪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让AI像水电一样普惠千行百业[N]. 人民政协报，2026-04-10（11）.

- [16] 中国科协. 词元来了: AI对话到底在“花”什么? [EB/OL]. (2026-05-07) [2026-05-08]. https://www.kepuchina.cn/article/articleinfo?business_type=100&classify=0&ar_id=695977.
- [17] 王坚. 话说Token [EB/OL]. (2026-04-05) [2026-04-25]. <https://tv.cctv.com/2026/04/05/VID-EV6DS6qFBqeMjgR2M5fPa260405.shtml>.
- [18] 杜晓宇. 词元经济的产业逻辑与演进方向 [N]. 学习时报, 2026-05-13 (2).
- [19] Token中文名定了! [EB/OL]. (2026-03-25) [2026-04-25]. https://www.nda.gov.cn/sjj/swdt/mtsy/0325/20260325113132934906079_pc.html.
- [20] 徐宏潇. 数智时代算力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极化效应 [J]. 经济学家, 2024 (10): 64-73.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6: 39.
- [22] 马鸿佳, 王亚婧. 制造企业平台化转型如何打破“数据孤岛”? ——基于人—数交互理论的混合方法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4 (4): 176-200.
- [23] 张明超, 孙新波, 刘剑桥.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 [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5 (10): 102-119.
- [24] 臧冀原, 季桓永, 黄庆学. 数智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7): 1183-1190.
- [25] 韩保江, 邹一南, 朱晟君, 等.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5)》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205.
-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EB/OL]. (2026-01-18) [2026-05-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9021.htm.
- [27] 潘智璇.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140-152.
- [28] 张欣.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J]. 现代法学, 2023 (3): 108-123.
- [29] 余南平.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 (4): 41-59, 205.
- [30] 周念利, 吴希贤. 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 理论逻辑与典型事实 [J]. 当代亚太, 2021 (6): 78-101, 167-168.
- [31] 李恒阳, 唐桂杰. 中美人工智能竞逐: 现状、特点和影响 [J]. 美国研究, 2025 (6): 108-133, 7.
- [32] 蔡万焕.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词元的性质及对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的重构 [J]. 天府新论, 2026 (3): 125-136, 159.
- [33] 陈强, 邢窈窕. 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料库建设: 现状、挑战与未来策略 [J]. 社会科学, 2025 (6): 177-192.
- [34] 何苑, 张洪忠. 主流大语言模型呈现中华文化符号: 智能拟态环境的建构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12): 64-75.
- [35] 相德宝, 吴艳. 中华文化价值、价值偏向及传播策略研究——以国际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为研究对象 [J]. 对外传播, 2024 (6): 56-60.
-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466.
- [37] 杨岚. 全国政协委员张云泉: 从算力经济到词元经济 [N]. 人民政协报, 2026-04-10 (1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十五五”时期“中国服务”品牌培育：机遇、梗阻与路径

王闻萱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 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服务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支撑。从时代机遇来看，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变革以及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中国服务”品牌培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然而，当前“中国服务”品牌培育仍面临着高品质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服务标准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以及高层次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现实约束。“十五五”时期，应通过推动服务供给品质升级以提升品牌价值承载能力，健全服务标准制度体系以夯实品牌信任核心根基，完善高端服务人才培养以增强品牌市场竞争实力等方式，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实现我国服务业发展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在全球服务贸易体系中更好地扩大品牌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服务”品牌；服务经济；服务业；服务贸易；“服务强国”；“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111-12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6.04.009

作者简介：王闻萱，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4BKS060）

引用格式：王闻萱. “十五五”时期“中国服务”品牌培育：机遇、梗阻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111-12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影响深远。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能提质服务业”列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组成部分，并首次提出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指出，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2]。2026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3]。相关政策的接连出台充分表明，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已上升为引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支点，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80823.1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升至38.2%，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增速高达10.4%^[4]。这一强劲增长态势有力印证了“中国服务”作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5]。“十五五”时期，在服务消费持续升级和服务业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推动“中国服务”由分散的服务供给形态上升为具有国际识别度和影响力的品牌体系十分必要。

当前，学界关于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其一，价值维度。学者们从品牌建设视角出发，提出好的品牌不仅在于商品质量或商品价格，更在于其细致入微的服务形成难以复制的服务竞争优势^[6]。我国技术服务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合作机遇，也推动了中国标准在交通、电力、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化^[7]。其二，困境维度。有学者表示，在短期流量思维导向下，一些服务的首发活动往往被扭曲为流量收割的工具，导致特色品牌的创新内核被稀释^[8]。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的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伴随着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争论需要引起我们重视^[9]。还有的学者提出，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中，政府往往采用直接提供的方式，这种单一的政策工具容易出现失灵的情况^[10]。其三，路径维度。有的学者表示，企业应积极构建品牌创新生态系统，注重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以实现价值共创共赢^[11]。面对智能养老服务所面临的困境，有的学者指出，在强化宣传与审慎应用技术的同时，还要以人工智能为辅强化亲情关怀^[12]。还有的学者表示，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缩小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差距，为人民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筑牢能力基础^[13]。

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更多关注“中国服务”品牌培育的意义及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而对“中国服务”品牌培育的机遇、梗阻及路径的研究相对不足。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国服务”品牌培育时代机遇的基础上，分析所面临的现实梗阻，并提出相应优化路径。

二、“中国服务”品牌培育的时代机遇

近年来，我国服务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服务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服务生产与交易环节，服务业开放水平也在稳步提高^[14]。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服务业发展正由规模扩张阶段逐渐转向质量提升阶段，为“中国服务”品牌培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拓展“中国服务”品牌生成空间

与工业经济阶段以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增长模式不同，服务经济更强调知识、技术与体验等无形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15]。随着我国服务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种结构性变化为“中国服务”品牌的生成与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其一，居民消费结构由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为服务品牌形成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基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以及消费理念不断更新，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医疗健康、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体验质量与服务信任，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时往往更关注品牌所代表的信誉、专业性与稳定性。例如，消费者奔赴胖东来，核心动力主要来自自身对“被全方位尊重与呵护”的信任感^[16]。这类由民营企业打造的服务标杆，生动展现了社会力量在品牌培育中的积极作用。服务品牌逐渐成为连接服务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重要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品牌逐渐成为服务价值的重要表达方式，使“中国服务”品牌能够在不断扩大的服务消费市场中积累认知度与影响力。

其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结构重塑，为“中国服务”品牌培育提供重要产业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5]。随着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活动逐渐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生产性服务活动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过程，通过知识、技术与管理要素的输入显著提升了产业链整体效率。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企业由单纯提供产品逐渐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设备运维、系统集成、技术咨询等服务环节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服务能力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品牌则成为体现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重要标识。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专业化与高端化方向发展，“中国服务”品牌得以依托完整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并在产业链协同中不断积累价值。

其三，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拓展服务品牌成长空间，为“中国服务”品牌塑造提供多元实践场景。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居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餐饮住宿、文化旅游、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生活性服务业进入品质化发展阶段^[17]。与传统服务模式相比，新阶段的生活性服务更加注重服务体验与服务环境，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关注程度显著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服务企业逐渐通过标准化服务流程、精细化管理以及文化元素融入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一批具有较高市场认可度的服务品牌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文旅融合、商旅融合以及数字消费场景的不断出现，使生活性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为服务品牌的成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消费升级与服务品质提升的双重推动下，生活性服务业正逐渐成为“中国服务”品牌生成的重要载体，使“中国服务”品牌能够在多样化消费场景中不断强化市场认知与价值表达。

（二）数字技术变革深度重塑“中国服务”品牌价值实现路径

在数字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下，服务活动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以及价值实现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据、算法与平台逐渐成为服务活动的重要基础设施，推动服务业由经验型供给向数

据驱动型供给转变^[18]。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服务”品牌价值实现提供了新的实现机制与传播条件。

其一，数字平台发展重构服务供给组织方式，为服务品牌形成提供新基础。随着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服务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传统的线性结构转向平台化网络结构。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的服务供给主体与消费需求，使服务活动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匹配与协同运行。服务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市场空间，而能够依托平台体系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网络，形成更好的服务效果。与此同时，平台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服务反馈进行数字化记录，使服务质量能够通过数据形式持续呈现，从而推动服务品牌在平台生态中逐渐积累信誉与影响力。

其二，数据要素应用优化服务供给，助力服务品牌在互动中得以强化。随着数据要素在服务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更加准确地识别消费需求变化，并据此调整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相较于传统服务模式依赖经验判断的供给方式，数据驱动的服务供给能够实现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使服务活动更具针对性与灵活性。例如，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泰山文旅集团融合文旅领域公共数据，借助通用大模型和文旅垂直大模型，打造泰山景区 AI 伴游智能体，显著增强了文旅服务的温度与深度^[19]。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所形成的评价、反馈与互动信息也会不断被纳入数据体系，使服务质量能够在持续反馈中不断改进，品牌信誉也将不断提升，最终使“中国服务”品牌能够在长期服务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

其三，数字技术推动服务场景不断拓展，为服务品牌的国际传播创造新空间。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及远程服务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服务活动可以通过数字网络完成，从而突破传统服务必须依托实体场景的限制。例如，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文化产品以及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使服务活动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价值传递^[20]。服务品牌的传播也由此不再仅依赖线下市场扩张，而能够通过数字渠道实现跨区域扩散。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使服务内容更容易被记录、传播与再生产，从而提升服务品牌的国际可见度。在数字技术不断推动服务形态演化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品牌能够借助数字网络进入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并在跨区域互动中不断积累品牌认知与市场影响力。

（三）制度型开放深化拓宽“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化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努力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21]近年来，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制度型开放，通过完善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推动国际规则对接，积极为“中国服务”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

其一，服务业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为“中国服务”品牌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制度基础。随着我国服务业开放不断推进，一系列开放平台与试点机制相继建立，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通过推动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逐步放宽、优化跨境服务贸易管理制度以及完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机制，我国服务业的开放格局逐渐由局部试点向更大范围扩展。服务企业能够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参与国际合作，并通过与全球企业的竞争与协同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服务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服务”将逐渐从国内市场走向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使服务

品牌能够在跨国市场互动中积累更多经验与信誉。

其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不断深化，为“中国服务”品牌参与全球竞争提供制度保障。随着区域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也在持续演进。通过积极参与多边与区域经贸合作机制，我国不断推动服务贸易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服务企业在跨境经营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明确的制度预期。在规则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专业服务资质互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据治理等制度安排逐渐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在降低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本的同时，还为“中国服务”品牌在全球市场建立稳定信誉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其三，国际合作网络不断拓展，为“中国服务”品牌提升全球影响力提供广阔平台。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机制持续推进，我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经贸、技术与人文领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数字服务、文化服务、专业服务以及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目前，我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医药内容被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高质量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30个、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31个^[22]。通过参与跨国项目合作与区域服务市场建设，我国服务企业能够在更加多元的市场环境中开展业务，并在合作过程中逐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国际合作网络的扩展也使“中国服务”能够在不同区域市场中积累经验与信誉，逐渐形成具有全球识别度的服务品牌形象。

三、“中国服务”品牌培育的现实梗阻

尽管服务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为“中国服务”品牌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服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当前，高品质服务供给能力、高标准制度体系以及高层次专业人才支撑仍存在一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持续积累。

（一）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制约品牌价值生成

在服务经济加速发展背景下，服务品牌成为竞争关键载体，其价值依赖服务供给体系的综合能力。当前我国服务业虽实现规模扩张，但在高端供给、运行管理与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呈现“规模快、品质慢”的阶段性特征，制约了“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持续生成。

其一，服务供给结构仍以基础型服务为主，高端服务供给能力相对不足。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但知识密集型与专业化服务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在金融咨询、法律服务、工业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等专业服务领域，部分企业在技术积累、专业能力以及服务深度方面仍与国际成熟机构存在差距^[23]。同时，一些服务企业仍主要依赖低成本和规模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在高附加值服务领域的布局相对有限。这使得服务企业难以在品质和专业能力维度形成明显优势，也限制了服务品牌溢价能力的提升。此外，品牌价值的形成通常依赖持续稳定的高品质服务输出，当高端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时，企业在品牌塑造过程中通常缺乏能够支撑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从而影响“中国服务”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整体形象。

其二，服务供给在运行管理与服务体验稳定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影响品牌价值的持续积累。与标准化生产的工业产品不同，服务价值更多依赖服务流程管理、组织协同以及人员能力等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当服务供给体系在组织管理、流程衔接以及服务执行等环节缺乏有效协调时,服务体验容易出现波动,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整体认知。在部分服务行业中,服务机构在运营管理能力、流程衔接效率以及服务细节把控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不同主体提供的服务体验呈现明显差别。在一些消费场景中,服务供给体系在应对高峰需求、保障服务效率以及维持服务品质方面仍面临一定压力。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领域的供给仍滞后于需求,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到10%,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约36%的水平^[24]。如果服务供给难以在不同场景中保持稳定表现,消费者对服务品牌的信任感就会下降。品牌价值的形成也同样依赖长期稳定的服务体验,服务过程中的组织协同能力与运营管理水平不足,导致品牌所代表的品质承诺无法及时兑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稳步提升。

其三,服务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品牌差异化特征尚未充分形成。随着消费者对服务品质、服务体验以及服务个性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服务业竞争逐渐由传统的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和体验竞争。然而,从整体来看,部分服务企业在服务模式创新、服务内容设计以及服务体验优化等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一些服务产品在形式与内容上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同质化。另外,一些企业在品牌建设过程中更侧重市场营销,对服务内容本身的创新投入相对不足,这使品牌难以形成鲜明而稳定的自身特征。当服务供给缺乏创新驱动时,企业就难以通过独特服务模式建立长期竞争优势,更限制了其在市场中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

(二) 高标准制度建设滞后削弱品牌信任根基

当前,我国服务领域在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与市场治理等方面仍不完善,统一规范与权威评价机制有待强化,这制约了“中国服务”品牌信任基础的稳定积累。

其一,服务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行业运行规范化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当前服务标准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均衡,通用性基础标准与细分领域专门标准衔接不畅,部分新兴服务领域缺乏明确规范。不同地区、不同主体在服务流程、操作规范与质量控制方面存在差异,行业内部标准不统一,导致服务供给呈现明显分散性。一方面,标准更新滞后于业态发展。数字服务、平台服务等领域在数据使用、服务边界与责任界定方面存在规则缺位。另一方面,标准实施约束力不足。部分企业对标准执行缺乏刚性约束,行业监督与评价机制未能有效嵌入标准体系。此外,标准国际对接程度不高,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仍存在差距,制约服务品牌在跨境市场中的识别与认可,削弱了品牌信誉的制度基础。

其二,服务质量认证与评价机制尚未形成成熟体系,品牌信誉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撑。从我国服务业运行情况看,部分行业已经探索建立质量评价机制,但整体而言,服务认证体系在覆盖范围与评价规则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25]。一些服务机构在品牌建设过程中缺乏权威认证支持,消费者在进行选择时更多依赖个体经验或口碑传播,而缺乏稳定的制度化评价依据。例如,国宇(上海)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在未获得相关资质情况下,2022年为全国27个省市的202家企业违规颁发236张服务类认证证书,严重制约了“中国家政”服务品牌的市场拓展^[26]。在这种情况下,品牌信誉往往建立在零散信息基础之上,其稳定性与传播效率都受到一定限制。当品牌价值缺乏权威认证与评价体系的制度支撑时,品牌认同难以在更广泛市场范围内形成共识,从而影响

“中国服务”品牌信任基础的巩固。

其三，服务市场治理体系存在不足，影响品牌信誉稳定。服务业态不断丰富以及数智化服务模式的广泛应用，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部分领域，治理规则更新速度与行业发展节奏之间仍存在一定滞后，一些新型服务形态在监管边界、责任界定以及运行规范等方面仍缺乏清晰治理框架。同时，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在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方面仍存在一定分割，这使得市场监管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而稳定的约束。当治理体系难以及时回应服务市场变化时，一些不规范经营行为可能对行业整体信誉产生负面外溢效应，从而削弱消费者对服务品牌的信任预期。由于品牌信誉的形成依赖稳定的治理环境与持续的市场秩序，一旦治理能力与市场发展之间存在错位，服务品牌在市场中的信誉积累便容易受到影响。

（三）高层次专业人才匮乏影响品牌竞争实力

在人力资本逐渐成为现代服务业核心要素的背景下，专业队伍质量直接决定服务价值创造能力与品牌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服务业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仍面临高层次专业人才供给不足、结构供需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制约了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中国服务”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其一，专业服务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降低高端服务效能。当前，高端服务领域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结构性短缺，具备深厚专业能力与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复杂服务需求。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高达500多万人，但在校生仅4万人左右，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升^[27]。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培养导向上与行业实际需求衔接不够紧密，课程体系偏重理论传授，实践训练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与岗位要求存在脱节。企业在高端业务拓展过程中面临人才储备不足与能力匹配不精准的问题，难以形成稳定的专业支撑。同时，高水平人才向少数头部机构集中，中小服务企业获取优质人才的能力较弱，人才配置呈现不均衡状态。企业内部培养机制不完善，高端人才成长路径不清晰，人才供给存在阶段性断层。

其二，国际化人才资源匮乏制约服务品牌的全球拓展能力。与国内服务活动相比，跨境服务不仅需要专业能力，还需要理解国际规则、熟悉不同文化环境并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这类能力通常依赖长期国际化实践经验以及多领域知识积累。从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看，部分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仍面临国际化人才不足的问题。一些企业在开展跨境服务时难以找到既具备专业能力又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质量与沟通效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一旦缺乏稳定的人才支撑，便阻碍了服务能力的充分释放，品牌影响力也不易在海外持续积累。服务品牌的国际传播效果既取决于市场推广力度，更依赖专业团队在服务过程中的能力呈现。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服务”品牌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表现与持续拓展能力。

其三，人才培养体系与服务业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错位。现代服务业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还需要能够将数字技术、管理能力与服务经验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28]。然而，部分教育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与实践训练方面仍以传统学科知识为主，对新兴服务领域所需的复合能力关注不足。一些毕业生虽然具备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在进入服务行业后仍需要较长时间进行

实践训练才能适应岗位需求。这种培养模式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差异,使服务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与成本。当人才培养体系难以与产业发展形成有效衔接时,服务企业在人才获取与人才成长方面面临较大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服务”品牌的竞争力。

四、“中国服务”品牌培育的优化路径

在服务经济持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壮大,离不开服务供给质量、制度环境与人才队伍的协同支撑。推动服务供给能力、制度规范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的系统优化,是提升“中国服务”品牌核心竞争力、实现品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 推动服务供给品质升级以提升品牌价值承载能力

服务供给质量不稳与结构层次偏低,已成为制约“中国服务”品牌价值形成的关键瓶颈。对此,要立足供给结构优化、运行体系强化与内容创新推进三个维度统筹施策,推动服务供给由规模扩张向品质跃升转变,更好地提升品牌价值的承载能力。

其一,推动服务供给结构向高端化、专业化方向演进,夯实“中国服务”品牌价值形成的产业基础。要聚焦研发设计、工业设计、信息技术服务、数据服务等重点领域,制定生产性服务业分领域提升方案,明确高端服务供给发展目录与支持清单。一方面,依托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试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完善“研发—验证—转化—应用”衔接机制,推动技术服务能力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嵌入。另一方面,要支持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服务平台,提升系统集成、方案设计与综合服务能力,带动形成高端服务供给集群。此外,要建立面向高附加值服务领域的企业培育机制,支持服务企业向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推动服务供给由基础性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持续延伸。例如,2025年,苏州市立足自身制造业优势,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园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1567.1亿元,有力推动了企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升级^[29]。

其二,强化服务供给运行管理能力,提高服务体验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服务企业应建立更加清晰的运营管理体系,在服务接待、服务执行以及售后反馈等环节形成稳定衔接,使服务过程能够保持连续顺畅。同时,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过程监测,对服务效率、客户反馈以及服务质量变化进行持续跟踪,及时识别服务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并进行调整^[30]。此外,完善岗位协作机制与服务人员培训机制,提高服务团队之间的协同效率,使不同岗位在服务过程中形成更加稳定的配合关系,为“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持续积累提供更加稳固的支撑。

其三,推动服务内容与体验持续创新,增强品牌价值的独特性。建立重点行业服务场景清单,明确应用需求、技术标准与推广路径,推动创新服务在医疗健康、文旅消费、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领域率先落地。一方面,依托“首购首用”“示范应用”等机制,引导新型服务模式进入实际应用环节,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服务设计与服务交付过程,提升服务供给的智能化水平与响应能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构建“产品+服务+场景”一体化供给模式,增强服务品牌的识别度与市场吸引力。要通过建立服务创新评估与推广机制,对成熟模式进行标准化输出,推动形成持续迭代的服务创新体系。

（二）健全服务标准制度体系以夯实品牌信任核心根基

面对当前服务规则分散、质量评价缺乏统一标准以及制度执行约束不足等现实问题，亟需通过完善服务标准体系、健全质量认证与评价机制、强化市场治理协同等方式，形成一个可识别、可验证、可持续的服务信任生成机制。

其一，完善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服务活动逐步实现规范化运行。要明确基础通用标准与重点领域专门标准，形成覆盖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分层分类标准体系。依托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新业态、新模式纳入标准规范范围，推动数字服务、平台服务等领域实现规则前置。此外，加强标准实施约束，将标准执行情况纳入行业监管与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中国服务标准与国际规则对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互认机制建设，提升服务标准的外部适配能力。

其二，健全服务质量认证与评价机制，强化品牌信誉的制度保障。要分行业建立统一的服务质量认证目录与分级评价标准，明确认证范围、技术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推动其在专业服务、数字服务、生活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标准化认证服务。建设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信息平台，整合认证结果、用户评价与监管数据，实现服务质量信息公开共享^[31]。同时，建立认证全过程监管制度，完善失信惩戒与退出制度，防止评价失真与认证异化。推动重点领域认证结果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跨境服务认证互认机制，从而不断提升“中国服务”品牌的国际可识别度。

其三，优化服务市场治理体系，提高制度运行的协同效率。建立跨部门服务业监管协同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与综合监管部门职责分工，形成统一协调的治理框架。比如，浙江省通过构建“企呼我应”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形成线上线下一体融合的企业综合服务新格局。2025年，全省共归集涉企问题14.02万个，办结率达99.97%^[32]。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服务业监管规则统一与执行标准对接，减少区域间制度差异与重复监管。此外，推行“信用+监管”模式，将企业信用记录嵌入日常监管与执法流程，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提高治理精准性。与此同时，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健全投诉响应与纠纷调解制度，提升市场运行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建立重大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强化跨区域、跨行业风险联动处置能力，深化服务市场的协同治理。

（三）完善高端服务人才培养以增强品牌市场竞争实力

提升“中国服务”品牌竞争实力，离不开高端服务人才的持续供给与有效配置。对此，要通过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国际化能力培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方式，形成教育供给、产业需求与制度保障协同联动的人才支撑机制，使高层次人才能够在服务创新、价值创造与品牌塑造中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夯实“中国服务”品牌竞争力的人才基础。

其一，优化服务业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专业服务人才供给能力。优化服务业相关学科专业布局，重点向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数字服务等领域倾斜，压减同质化专业设置。支持有条件地区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政府牵头整合高校、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资源，形成联合培养机制^[33]。建立订单式培养机制，企业参与招生、培养与评价全过程，

直接对接用人需求。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推行“双导师制”,由企业技术骨干与高校教师共同指导培养。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将认证结果与就业准入、岗位晋升挂钩。

其二,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提升跨文化服务能力。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在高校与职业院校中设置跨文化沟通、国际规则、服务贸易实务等核心课程模块。推动建立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与境外高校、行业机构开展双学位与短期交流计划,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与此同时,依托龙头服务企业建设海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与在职人员参与跨境项目,强化真实场景训练。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数字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急需领域,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嵌入外语能力与国际业务规范训练。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化在岗培训,支持员工参与国际项目与海外轮岗。要通过教育培养、实践锻炼与技能培训协同推进,系统提升服务人才跨文化服务能力。

其三,完善服务业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建立服务业高端人才引进目录,拓宽专业人才引进范围,面向数字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实施精准引才^[34]。推进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签证办理、居留许可、子女教育与医疗保障等服务事项,提升引进效率与便利化水平。完善市场化薪酬机制,允许企业对高端服务人才实行协议工资与绩效分配。建立以能力与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将项目成果、服务创新与市场表现纳入评价指标。同时,支持建设服务业创新平台与人才集聚载体,提供科研转化与项目孵化支持。推动人才跨区域、跨机构流动,建立柔性引才与兼职制度,以此形成引进便利、评价科学、激励有效、流动顺畅的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持续激发服务人才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中国服务”品牌的竞争力。

五、结语

在全球服务经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服务业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维度,“中国服务”品牌亦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以及服务产业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服务业发展将在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与全球影响力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此,我们应继续坚持以创新驱动丰富“中国服务”品牌的价值内涵,以开放合作拓展其国际服务网络,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与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其核心竞争力基础。面向未来,随着全球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加速重构与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中国服务”品牌将在更高层级参与全球服务价值链重构,逐步形成与国际高端服务体系相衔接的发展模式,在规则塑造与标准引领中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服务”品牌也将更加紧密嵌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服务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持续释放新的增长潜力,进而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能。

参考文献:

- [1]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6-04-22(2).
- [4] 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结构持续优化[EB/OL]. (2026-02-06)[2026-03-11]. 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602/content_7057286.htm.
- [5] 习近平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李强出席全国服务业大会并讲话 丁薛祥作总结讲话[N]. 人民日报, 2026-04-09(1).
- [6] 宋跃刚, 李卓妍. 创始人特质、品牌构建与零售企业服务质量跃迁——基于“胖东来”的案例研究[J]. 宏观质量研究, 2025(5): 102-115.
- [7] 王小玲.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的新特征及发展策略[J]. 国际经济合作, 2019(3): 43-52.
- [8] 周月华, 杨峰, 时文龙. 国内大循环视角下首发经济扩大服务消费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J/OL].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2026-04-21]. <https://doi.org/10.13734/j.cnki.1000-5315.2026.0408>.
- [9] 陆杰华, 孙杨. 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养老服务: 价值定位、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40-51.
- [10] 苏雪琴.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激励性法律规制: 逻辑起点、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226-237.
- [11] 赵红, 张静怡, 姚鸽, 等. 服务品牌数字化管理创新路径研究——以碧桂园智慧社区为例[J]. 管理学报, 2025(11): 1981-1992.
- [12] 聂建亮, 薛梦瑶. 人工智能助力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逻辑转换、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101-113.
- [13] 周文, 李森. 论“中国人经济”: 理论内核、政策保障与重要着力点[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1-12.
- [14] 李勇坚. 迈向“十五五”的服务消费: 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J]. 当代财经, 2025(12): 3-17.
- [15] 李俊. 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与战略转型[J]. 国际贸易, 2016(8): 20-24, 51.
- [16] 借鉴胖东来经验 优化“购物旅游”[EB/OL]. (2025-11-28)[2026-04-21]. https://www.ctnews.com.cn/guandian/content/2025-11/18/content_181181.html.
- [17] 白雪洁, 艾阳, 娜梅雅.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服务经济发展: 内涵要求、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J]. 经济纵横, 2024(10): 77-93.
- [18] 杨越, 吴德胜. 数智技术赋能服务消费结构性矛盾破解的路径探索[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5(12): 2249-2256.
- [19] 2025“数据要素x”大赛优秀项目① | 人工智能驱动——泰山文旅数智多业态创新实践[EB/OL]. (2025-10-20)[2026-03-10]. https://dsjj.taian.gov.cn/art/2025/10/20/art_351702_5585.html.
- [20] 蒋媛媛, 温悦, 陈瑞. 社区居家养老与老年家庭数字消费[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5(6): 63-70.
- [21] 习近平向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22-09-01(1).
- [22] 姚常房. 中医药在全世界璀璨绽放[N]. 健康报, 2025-05-16(1).
- [23] 沈鹏, 龚谨, 谭荔丹.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技术经济, 2024(2): 1-9.
- [24] 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OL]. (2025-08-15)[2026-04-21]. <https://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27/125957/f5c4690f2cbd40918bf24c2d39ac58af/b3e8c1a2b07d44facb38f4a>

7426415252/index.html.

- [25] 李思仪, 韩秋红. “十五五”时期以新质消费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6 (1): 19-31.
- [26] 上海公布2024“铁拳”行动第一批典型案例 [EB/OL]. (2024-04-18) [2026-04-21]. https://www.samr.gov.cn/zt/pgt/art/2024/art_5c22d6152d9f42d2a1285f2cfd2842b.html.
- [27] 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B/OL]. (2025-11-27) [2026-04-21]. 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511/t20251127_1401966_ext.html.
- [28] 余泳泽, 武思婕. 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赋能路径与政策导向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6 (2): 32-46.
- [29] 江苏苏州: 壮大生产性服务业 赋能产业向高端攀升 [EB/OL]. (2026-04-15) [2026-04-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62478425427124579&wfr=spider&for=pc>.
- [30] 李森, 李钢.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消费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路径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1): 14-22.
- [31] 卢圣华, 汪晖. 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招投标数字证书互认的自然实验 [J]. 管理世界, 2026 (4): 23-36.
- [32] 浙江: 构建“企呼我应”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 [EB/OL]. (2026-02-12) [2026-04-21].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xhyshj/dfdt/202602/t20260212_1403740_ext.html.
- [33] 胡剑锋, 畅立丹, 许倩婷. 产教双能: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时代内涵与发展路径 [J]. 教师教育研究, 2025 (5): 114-121.
- [34] 王海杰, 靳颂琳, 王全景. 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韧性 [J]. 经济评论, 2025 (4): 38-5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杨稀琴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内涵要义与原创性贡献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 纪检监察研究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破解执政党的建设难题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文化根基和实践根基,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涵要义, 分别阐明了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既要把“十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 放置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体系中加以理解, 又要悟透“十四个坚持”中的每一个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深厚的理论涵养,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建原理; 优化了执政党建设的顶层设计, 完善了党的建设的知识体系, 促进了现代政党治理的范式更新。

关键词: 习近平党建思想; “十四个坚持”; 党的创新理论; 政党学说; 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123-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6.04.010

作者简介: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风腐同查同治的统合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25CDJ080); 华东师范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专项“集中教育常态化下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论题与践行机制研究”(2026ECNU-LLYJ008)

引用格式: 樊士博.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内涵要义与原创性贡献[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123-13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次概括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广阔的议题论域,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方式、兴党强党目标与强国复兴使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在统筹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双重向度的基础上,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治理与国家建设互动的规律性认识。

从既有研究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虽属新近提出的理论命题,但学界围绕其若干核心要素与基本主张已有丰硕成果。整体观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党的创新理论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唐皇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2]。王炳林等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内涵、意义和路径,揭示了历史发展逻辑^[3]。宋雄伟主要从政治概念创造的角度,研究了党的建设概念在政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4]。二是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贡献。此类研究数量丰富,旨在从概念、论断、话语中剖析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包括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5]、思想建设重要论述^[6]、组织建设重要论述^[7]、作风建设重要论述^[8]、纪律建设重要论述^[9]、制度建设重要论述^[10]、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11]等。这些研究由点出发、点面结合,对透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生成过程具有借鉴意义。三是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国家、社会同步演进的内在机理。蔡礼强从党的领导角度,探究了党建引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12]。樊士博认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事关政党治理现代化,是以强大政党促进强国建设的必然之举^[13]。上述研究揭示了执政党建设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对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在贯通性提供了参考。

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党的建设某一具体方面,整体性的学理审视尚需深化。随着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个集成性理论命题的正式出场,如何在整体性视域下推进该议题研究,已成为亟待回应的学术课题。基于此,本文力图系统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内涵要义与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关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纵深拓展,更是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锚定方向、提供根本保证的应有之义。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

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知识脉络,给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时代答案。诞生于中国大地的理论体系,必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之下,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一) 魂脉所系: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主要回答了党的性质、纲领、策略等“元问题”。

在时代条件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建党原理时十分注重国际主义原则。这些观点对此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在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给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目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从“政权建设”深入思考，强调“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5]。从权力行使等维度探索党的建设问题，彰显了理论思考的细化和延展。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开启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实践。他在俄国革命的现实环境中，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政党权威”等具有一般意义的组织原理。此外，列宁十分注重纪律的作用，将其视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他强调，如果缺少铁一样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6]。这些一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建党思想基础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本土化探索。作为“舶来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中必须经过“中国化”改造。毛泽东在批驳“本本主义”等错误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等一系列基本主张，作出了原创性探索。在组织设置上，毛泽东探索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解决了组织密度与功能密度的问题，成为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的基本遵循。在作风建设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概括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沿用至今的重要理论主张。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邓小平围绕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内容，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命题，贯通了治党与治国的关键领域。胡锦涛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提升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助推党的建设在科学化轨道上行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的一脉相承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根脉绵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脉绵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脉。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既是中华文化的辑录，也是国家治理之道的集成。历代先贤围绕自我价值实现和政治组织发展进行了诸多思考，对现代使命型政党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这些前人形成的文本典籍，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做到“鉴之改之”。《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修好自身是干事创业之基。由一人到一国，在政党政治日益发展的今天，执政党必须先把自身建设好，才能领导国家现代化的自然进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中，是古代士大夫的毕生追求。中华文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民惟邦本；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推己及人；主张“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追求格物致知。这些主张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理论基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为政以德”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气度。习近平党建思想诞生于中国大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依据原有理论，

创造新的理论，是坚定理论自信的最好表达。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数千年文明思想史中汲取丰厚滋养，推动了中华古老的治国安邦之道、修身立心之理、齐民安民之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所具备的“高度的历史主动”的精神品格。理论的根扎得越深，理论就越能说服人；理论也只有说服人才能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相互贯通，有利于彰显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优势，赋予其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三）“两个结合”：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又指导着实践；理论的成色如何，必须在实践中检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概括提炼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就证明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真理性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突破了“老虎吃天，不知如何下手”的窘境，擦亮作风建设的“金名片”，催动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一方面，在“两个结合”方法论指导下，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不断加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各方面的重要论述为具体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廓清了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中就包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8]。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与党的建设相关的理论创新占据较大篇幅。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新时代变革性成就，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202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并用“十三个坚持”概括其主要内涵。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并提出了“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这段发展过程表明：理论的内涵仍在不断丰富，理论的形态仍在不断更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形态跃升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19]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具有反复性、顽固性，一旦放松警惕，就会卷土重来。针对这些不良现象，管党治党务必精准施策。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彰显了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管党治党的非凡气魄。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强国建设的主心骨才能愈久弥坚。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

“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是一个层次严密、逻辑清晰的科学体系。这“十四个坚持”可以划分为若干层次，分别指向了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保持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工作布局、压实政治责任的方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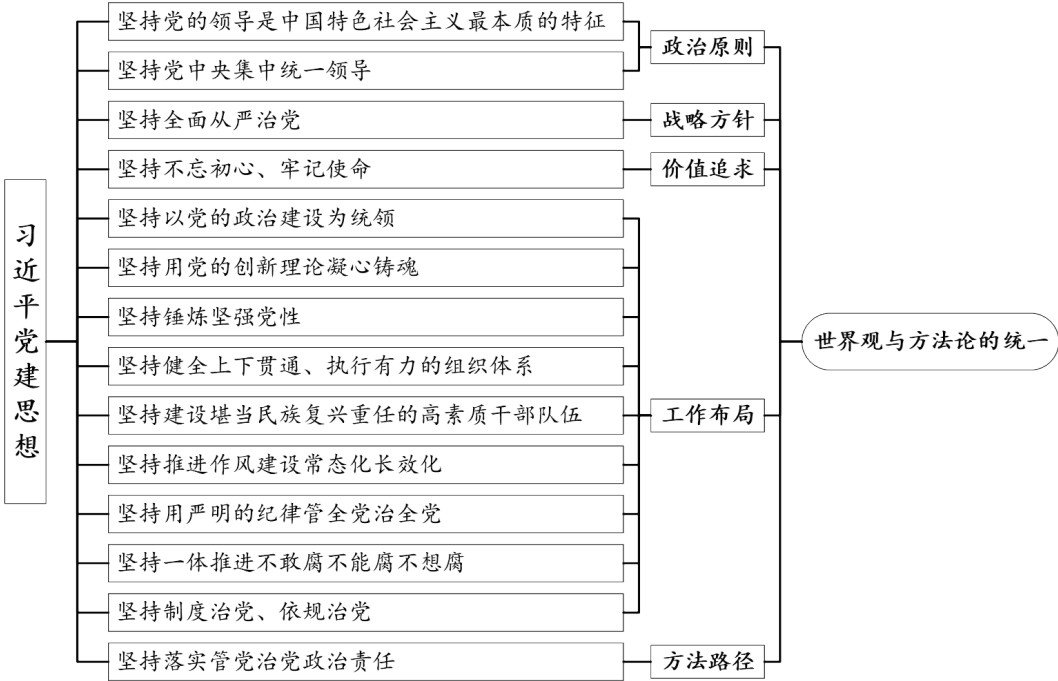


图1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的层次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一）政治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动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党员干部绝不能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割裂开来、孤立看待，而应将其作为统一整体、统筹把握，以此不断夯实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我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基本制度的形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伟业就会落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0]从现实来看，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概括为“十四个坚持”之首，既具有阐释目标的意味，也蕴含着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哲学考量。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规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1]政出多门是政治组织发展的大忌，一旦出现，势必会造成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也是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行动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做到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党中央居于“帅位”，是科学决策的中枢。一个成熟的政党，离不开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从政党建设规律来看，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也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蕴含着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均带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深刻意涵。“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四个坚持”的理论框架中深刻回应了“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战略意义。

（二）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主题，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理解中国之治，核心在于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认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此后又将其概括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正因如此，“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广阔论域中具有标识性意义。它不仅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精准把握，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贡献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全面从严治党拓展了管党治党的边界，为政党优化内部治理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概括到“十四个坚持”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不动摇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党的建设的政治态度。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一，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主体，是对范围的强调。任何一名党员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均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其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要从严，不是某一个方面的从严，强调的是管党治党的标准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要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坚持将严的基调进行到底。其三，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历史上政党建设失败的反例证明，治标不治本、花拳绣腿的治理，最终将反噬自身肌体。政党内部治理成效，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从成绩来看，中国共产党依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由“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显著增强。从发展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依然面临严峻形势，危及党的形象建设的诸多问题还有生存土壤和条件。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全周期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变革。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十四个坚持”，正是对社会上认为“管党一阵风、治党走形式”等错误认识的有力驳斥。

（三）价值追求：保持初心使命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发挥着传递价值追求的核心功能，深刻标定了使命型政党的目标航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在“十四个坚持”的总体框架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其余十三个方面提供了价值坐标。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例，管党治党的各项举措始终不能偏离初心使命内含的旨归，否则就会偏离正轨。更进一步看，在处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这一对关系中，“坚

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构成了贯通二者的观念桥梁。它既从价值层面规定了党的领导的根本立场，又从实践层面赋予了党的建设以方向性指引。

初心易得，始终难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22〕}历史上，那些数典忘祖的政党，均没有长期存在。党的建设要通过不断叩问党员干部的初心，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理念与制度上双管齐下，激励党员干部守护初心和使命。从理念来看，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概括到大会主题中，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就是因为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初心是政党目标的外显，使命是政党任务的外化。政党一旦丧失初心和使命，就会迷失方向。为激励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23〕}。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将此常态化、长效化的实践努力。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概括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中，是对铭记来时路的果断重申和郑重强调。

（四）工作布局：优化治理结构

按照党的十九大制定的顶层设计，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呈现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20〕51}的理论结构。“十四个坚持”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每一个部分均有理论呈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优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重点把握，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优化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理论主张之一。如果中国共产党丧失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凝聚力也会随之消逝。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揭示了政治组织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客观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呼吁。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和“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十四个坚持”对党的思想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前提。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实践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在党员教育、干部轮训中，必须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不断进行思想淬炼、精神升华。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性的体现。早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增长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决定党员干部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4〕}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党性修养贯通党的建设全过程，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抓手。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党的力量全在于组织，组织严密是党的优势之一。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能够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保证了内部有效的组织覆盖。组织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党员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

能力的干部队伍。”^{[17] 51}在知识社会快速迭代的世界中，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攻坚克难的必要条件。伴随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干部必须不断克服“本领恐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新时代以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成为要求之一。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就是形象，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重塑了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做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时刻把纠治不正之风作为重要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十四个坚持”对作风建设提出的要求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遵循。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25]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也是党员干部规范自身行为的底线。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据纪律建设的实践发展，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断引导党员干部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纪律不能失之于宽，必须严明下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腐败是人民公敌，是损害党的肌体健康的“毒瘤”。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不加以遏制，就会亡党亡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一是坚持“零容忍”态度，不断祛除腐败存量，遏制住了腐败的增量；二是推进廉洁自律，将党员干部的“自律”与社会的“他律”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论断之一，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敢腐需要强化震慑，不能腐需要扎牢制度笼子，不想腐则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政党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这种组织化有赖于制度化。政党的制度化会形成文化形态，直至融入政党基因，体现政党的内在气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建设全过程之中，促进了政党治理的良性运转。除围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推进制度完善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激活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集成效应正在逐步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上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刚性的制度一旦形成，就具备了升格为法规的可能。因此，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实质上存在一致的逻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修订多部党内法规，为管党治党提供了硬约束。制度和法规是管党治党的保障，贯穿在党的建设全过程。

（五）方法路径：压实政治责任

“十四个坚持”蕴含着管党治党的科学方法论，“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26]推动党的建设，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共同努力、兜牢政治责任。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方面强化责任落实。一方面，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党委（党组）肩负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

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党员干部承担具体责任。强调责任，重在推动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实效。另一方面，明确责任的具体内容。比如，对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划出责任田，明晰责任边界。划分责任，不是为了比较大小，而是为了“抓落实”。党的领导涉及各个方面，党的工作涉及多个领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还基于党内法规，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统一战线工作责任制予以确认。这些同样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忽视的任务。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推进党的建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管党治党，必须责任到人，否则，再好的设计也会变成“稻草人”。各类主体不可推卸在管党治党中的责任，这是基本义务，也是政治要求。将“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概括到“十四个坚持”之中，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底蕴。

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实现了理论形态、实践形态、文化形态的新质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科学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原理性观点、原发性意义、原创性贡献，有利于推动党建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建原理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理论生命力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起点，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始终占据着理论的中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诸多原创性党建原理，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厚度。这些党建基本原理，既是认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世界观，也是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原理进行的探索，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前瞻性、工作上的针对性。

其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著名论断，首开系统论基础上管党治党的先河。党的建设问题一提出就是从整体视域出发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发展条件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作出新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增量概念”，在坚持原有观点的同时，实现了理论广度的拓展、理论深度的拓新。此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四个伟大”的论断，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8〕12}这一论断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置于更加广阔的角度理解，具有极高的思想含量。

其二，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组织路线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18〕559-560}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

了党建工作的抓手，为锻造一个强大执政党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重视基层党建和新兴领域党建，将其与社会结构变动紧密结合。理论之所以鲜活，就在于符合时代变化规律。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社会退场，加之社会结构快速变化，注重新兴领域党建成为一道时代命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宏阔的时代空间中，对新兴领域党建的诸多命题提出了原理性认识，如寓管理于服务、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等。

（二）优化了执政党建设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确立了理论基座，习近平党建思想则在增强理论厚度的基础上，优化了顶层设计。这种科学的顶层设计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体现了全周期管党治党的先进理念，有利于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优化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实现了宏观设计与具体实操的有机贯通，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全局、推进系统协同的能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优化党建工作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原创性主张。

首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概括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纲领性作用。在这一总要求的统摄下，党的建设不再停留于零散的经验应对，而是上升为具有内在贯通性的理论体系。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站位充分彰显，展现出其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系统思维与战略定力。

其次，重塑党的建设布局。党的十九大之前，党的建设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为基本框架的“五大建设”布局。党的十九大顺应管党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发展为“5+2”模式，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这一布局不是对旧有框架的简单增补，而是对党的建设内在逻辑的深度重构。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党的政治建设被明确界定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居于统领地位，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方向与性质。制度建设的“贯穿性”定位，则意味着制度成为保障党的建设稳定性的基础机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对各个方面均有明确观照，体现了锚定重点、“牵牛鼻子”的方法论。

最后，科学把握治党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体论域是执政党建设，主要回答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命题。从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体系化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也与其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直接相关。比如，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这显然是道理相通、理念一致的。思想的穿透力，就在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这样一种既注重整体性又强调关键环节的思想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新时代的内涵“扩容”。

（三）完善了执政党建设的知识体系

理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知识形态也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话语、文化性叙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的知识体系，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从标识性概念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使用了诸多前人没有讲过的概念,蕴含着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概念创新是保持和增强理论吸引力的有效方法,也是促进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从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体系化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本身也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彰显了政党强化自身建设的注意力和聚焦点。从内部结构与学理论述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概念的集大成。比如,“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党的政治建设”等标识性概念的广泛使用,增强了话语受众的政治认同感。

从原创性话语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传递了解决执政党建设难题的政治观念。话语的背后是观念,传递着政党的政治主张。比如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0] 588}这种原创性话语,既点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点出了执政党未来发展的科学方法;既包含对传统观点的承接,也包含全新的理论内涵。历史发展证明,理论发展决不能固化僵化,必须不断讲新话、出新意。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话语开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化执政党建设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开显。

从文化性叙事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阐述了政党引导文明发展的中国故事。人类社会步入政党政治时代以来,政党如何引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担负着全方位的政党责任。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文化建设上,就承担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完成这些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身建设好。而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也自然而然走进了文化领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政治文化更新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其对党建工作的理论指导,将引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为政党文化不断成长的重要资源之一。

(四) 促进了现代政党治理的范式更新

政党在发展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西方政党政治深陷种种困境,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思潮泛滥,各国政党发展亟需新的理论指引^[27]。在世界政党建设的问题场域中,有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社会撕裂,人民被不同政见裹挟。严重的社会撕裂反过来又加剧了政党的分化,造成相互攻讦。有的国家在政党影响下,陷入了持续的经济低迷,人民群众始终挣扎在贫困线,无法摘掉“穷帽子”。建立在利益集团基础上的政党,注定要为其服务的资本做工作。种种困境倒逼世界各国对政党治理作出新的审视。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利益的争夺者,而是社会利益的守护者。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8]这个定位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的强调,也揭示了西方政党博弈加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地站在一起,始终坚守初心使命。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够厚植强国建设的政治优势。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以来,执政党建设取得了变革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领导力量。从国内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新篇章,必须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从国际看,处理国际共同问题需要加强政党合作,自觉履行政党责任。高质量党建,能够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而以中国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注入更大确定因素。

五、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秉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以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理论目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开新。“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涵要义,具有“政治引领、价值坚守、全面建设、制度保障、责任落地”的内在逻辑关系^[29],为推进党建工作、开展党务实践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要深刻研究其内在逻辑,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也要将其放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框架中考察,做到统筹理解、贯通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30]做好党建工作,同样也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将以强大政党开创强国建设新局面,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政党之为。

参考文献:

-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N]. 人民日报, 2026-06-19 (1).
- [2] 唐皇凤. “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与理论贡献[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6(2): 5-16.
- [3] 王炳林, 廖松涛.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内涵、意义和路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3): 13-19.
- [4] 宋雄伟. 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基本要素、类型划分与建构逻辑[J]. 政治学研究, 2026(1): 115-131.
- [5] 王炳权. 新时代政治建设思想论纲——学习习近平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J]. 理论探索, 2025(5): 5-21.
- [6] 刘红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宏大主题、构成要素与内容体系[J]. 中共党史研究, 2025(4): 5-15.
- [7] 王庭大. 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J]. 红旗文稿, 2024(5): 9-12.
- [8] 孟伏琴, 马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道理学理哲理——基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研究[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3 [2026-06-16].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522.1347.002>.
- [9] 宁国良, 王一博. “纪律立党”理念下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宣传教育策略——以长征时期《红星》报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2): 42-51.
- [10] 鲁芯玮, 辛向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研究[J]. 世界社会科学, 2026(2): 5-21.

- [11] 倪明胜,张耀元.统筹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1):29-39.
- [12] 蔡礼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基础、运行逻辑与主要优势[J].政治学研究,2025(6):3-16.
- [13] 樊士博.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议题与效能[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8):38-50.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
- [16]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96.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8.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6.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3.
- [21]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23.
- [22]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71.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72.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13.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6.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3.
- [27] 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N].人民日报,2026-06-16(1).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
- [29] 文丰安,李江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与重要意义[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6-06-22].<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621.1319.002>.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138.

责任编辑:卢媛 校对:杨稀琴

习近平党建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魏崇辉 李 玲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以“十四个坚持”为内涵要义，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大成之作。学理上，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视角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首先要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之境遇的新样态、理论的新发展、成就的新集成，其次是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即“十四个坚持”的内在机理。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大成者，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的内在统一，是指引强党强国新征程的根本遵循，同时以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图景。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视角。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执政党建设难题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136-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11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玲，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A058）

引用格式：魏崇辉，李玲．习近平党建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136-146．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领导超大规模现代化，越要把自身建设作为最紧要的治国之策。党自身的坚强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建设、改革的前途命运，是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所在。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从这一根本前提出发，把党的建设作为新时代的鲜明主题，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步形成并完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统领位置，以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推动管党治党一以贯之坚持严的基调，成功掌握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主动^[2]，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3]，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形成重要理论成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明确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会议强调，“‘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3]。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成逻辑，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之境遇的新样态、理论的新发展、成就的新集成，通过科学探讨“十四个坚持”的系统化结构，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大成，对破解长期执政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结晶，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建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成逻辑，就是要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之境遇的新样态、理论的新发展、成就的新集成。

（一）境遇的新样态：国内外环境与执政党的建设难题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开年之时便指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4]。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党在超大规模组织形态和长期执政条件下，需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持续推进党的建设，回应“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所揭示的长期性风险，防止这些风险在组织运行中积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和治理能力。对拥有上亿名党员、数百万基层组织的世界最大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而言，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更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政治责任。

当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改革攻坚已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博弈与技术遏制（封锁）加剧，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从内部条件看，党自身面临的风险具有结构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1]。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进一步将执政党建设难题概括为“六个如何始终”，并明确解决这些难题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和“必须啃下的硬骨头”^[5]。

具体到党组织运行层面，风险主要来自组织规模与长期执政带来的问题：部分党员干部在长期和平环境下宗旨意识淡化，权力观出现偏差；组织层级增多导致信息传导失真，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执行中存在衰减；错误政绩观对制度执行的干扰依然存在，监督执纪刚性有待加强，等等。同时，在强问责与多重考核下，部分干部出现担当精神不足、形式主义抬头等问题。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6]，关键在于将上述风险的化解纳入制度化轨道，通过稳定的自我纠错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健康的政治生态加以防范和化解。百余年的党史经验表明，党的事业发展依赖于组织自身的坚强有力。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性集成，为超大长期执政体解决“统一意志从何而来、自我纠错靠何维持、权力不蜕化靠何担保”提供了系统回应，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时代性推进。

（二）理论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何建立、建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根本问题，以深刻认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为基本使命^[7]，旨在回答：以无产阶级解放为使命的政党，何以能长期保持先进性，何以维持政治统一与自我净化。

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基本规定性：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且“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8] 278}。前者划定党不得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后者确立党的使命在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整体性进程而非一时一地利益，二者确立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基本持守。列宁建党学说把上述原则落实为可运行制度。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归结为“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把纪律与反派别、中央意志的组织统一绑定^[9]；在《怎么办？》中将“革命家组织”“集中制”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并置^[10]，突出了“理论统一—组织集中—行动纪律”，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理论表达提供了学说史上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在建党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本土化难题，即农民党员占多数、根据地分散，阶级成分不能自动担保先锋队品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1]，并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列为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1] 606}。其实现路径为：通过思

想建党、民主集中制与整风机制，使政治统一建立在制度性生活的基础之上，从而克服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涣散风险。

邓小平将“制度”置于党建的核心位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领导和组织制度“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警示制度不好则“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2]。这从制度层面回答“党如何不蜕化”，使“党建”从政治—作风层面正式进入制度层面。这一阶段表述更多围绕“改善党的领导”与制度约束展开。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明确为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新时代把党建各条线系统集成积累理论与实践经验。

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其强大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已经得到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三）成就的新集成：从地方探索到体系化建制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从地方实践探索到全党理论创新、从理论指导到制度体系化落地齐头并进的演进过程。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要围绕“党如何实现对发展的坚强领导”与“党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管好自身”主线，形成了丰富的县—地—省不同层级地方实践积淀，在“制度规矩—群众路线—基层治理—执政能力建设”多个维度推进党的建设理论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推动管党治党从整顿式切入，走向战略布局，再定型为可制度化运行的体系，逐步形成并系统概括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是围绕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与系统集成，是循序渐进、步步承接的，即先以具体抓手打开局面，再通过战略布局把管党治党提到全局高度，继而以制度规范把规矩写进党内政治生活并落实为党章要求，最后在实践积累与制度成熟的基础上完成系统性概括。

第一，以作风为抓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全局。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八项规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具体抓手拉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序幕^[13]；随后通过2013—2014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反“四风”^[14]。在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并全面部署“从严治党”，将其提升为重大战略方针^[15]。这为其随后在2014年12月江苏调研中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后又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第二，把规矩从“抓作风”推进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监督、确立为党章总纲层面的规范。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16]，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落实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制度规范，这标志全面从严治党路径进一步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化制度约束。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五大建设+制度建设”布局制度化，并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17]，在党章层面把党建与刚性约束固化下来。

第三，自我革命成为长期执政内在逻辑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路径走向体系化。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之一^[1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中，把“自我革命”概括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9]。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把“四个自我”纳入这一体系的运行要求，管党治党从重点突破、集中整治进一步转向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的制度化轨道。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20]。此后制度配套与学习教育继续补齐：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实施后，党中央部署开展全党党纪学习教育，强化纪律规矩的刚性内化^[21]；2025年1月，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出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22]，对“十三个坚持”的核心内容做系统阐释，重点阐明党建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与实践要求。相关配套读本出版发行，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提供权威辅助读本。

第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明确提出，标志着党的建设系统集成走向成熟。2026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系统部署，标志着这一思想在全党正式提出并得到全面阐述。会议明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并提出了其核心内涵“十四个坚持”。随后，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学习培训、宣传阐释与制度落实一体推进^[23]。从“十三个坚持”的集中概括，到“十四个坚持”对核心要义的条理化阐发，体现的是同一思想体系在定型之后，理论形态与制度形态并行的基本轨迹。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本体、政治统领、人民立场等根本原则一以贯之，但在展开方式上更突出了高政治执行力的逻辑。

三、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的“十四个坚持”： 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十四个坚持”内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与方法路径。“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一）党的领导最本质特征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逻辑起点与最高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可动摇的逻辑起点，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元命题，回应“由谁领导、按何种意志领导、以谁为最终权威”的根本问题，为党的建设内容提供政治坐标。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回答的是党与国家制度结构的本体关系问题。制度不是先于或者外于政党的框架，两者的关系也不是制度加政党的外在组合，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现—国家治理”的一体化构造^[24]。回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对无产阶级

政党与阶级、国家关系的经典设定：共产党不是议会框架内若干竞争性政党之一，而是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组织政党”^{[8] 592}与先锋队，其领导权来自历史实践与阶级基础而不是来自程序性授权的附加条款。党不是执政过程中的功能性要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和成立前提。失去“党的领导”这一根本规定性，“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就失去可被历史与制度辨别的组织载体，“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解决的是统一领导权的归属与传导秩序问题。对拥有上亿级党员、百万级基层组织的超大执政党而言，层级链条长、条块交叉密，中央决策面临信息过滤与地方利益重新解释的摩擦。党必须是统一意志、统一纪律、统一行动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是管理偏好，而是大规模政党维持政治统一的制度硬约束。通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以及把重大决策部署纳入党中央统一决策与督办链条，确保事权与最终责任归于党中央。在此基础上强调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走出口号层面，使管党治党各项建设在同一政治指挥体系内展开。否则，党的建设就容易变成各层级、各部门按局部逻辑各行其是，陷入“执政党建设难题”所警示的碎片化、分散化风险。

（二）战略方针与政治统领：以初心使命定向、以从严基调布局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连接价值立场与建设行动的中介层，共同构成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总开关”，确保党的建设既不偏离政治方向，又不陷入事务主义。

第一，以何种姿态执政——战略方针的确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5]这将“严”的主基调进一步提升为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常态化治理方式。这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执政党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而在于内部的松懈、腐化与变质。将“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确立为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意味着管党治党没有休止符，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6]，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第二，为谁执政——价值立场的锚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价值锚定为整个党建体系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和合法性基础。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与纪律约束中重申这一立场，就是要防止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科层化运行逻辑将“服务人民”异化为“管理社会”，避免执政党滑向脱离群众的“自我服务”。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校准一切建设方向的终极标尺。

其三，从何处着手执政——路径与标准的明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标准是衡量党的建设成效的首要尺度，统领并贯穿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之中。这一定位从操作层面解决了“党建从何处抓起”的问题，防止党建工作陷入具体事务而迷失政治方向。只有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才能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避免陷入事务主义与技术主义的泥潭，保证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轨道推进。

（三）思想铸魂、强基固本与正风肃纪：建设内容的系统展开

在确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并明确“初心使命—从严基调—政治统领”的总体方略之后，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原则进一步落到可运行的实体内容上。这部分回答的是操作性命题：统一意志如何生成并巩固，如何有效穿透组织层级传导至基层，以及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规避权力异化风险。其内在机理体现为三个维度的有机衔接：思想引领、组织传导与权力规制。

第一，思想铸魂与党性锤炼：解决认知统一与立场持守问题。一方面，“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把政治共识从经验性认同提升为系统性理论认同，使全党在复杂环境下拥有共同的概念框架与判断尺度，避免“统一”异化为机械的形式一致。另一方面，“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则把这一认同落实到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之中，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宗旨意识在长期执政的科层化考核中最容易被指标压力稀释，党性锤炼的作用正是提供一种持续的纠偏机制，在利益取舍与压力传导面前，把“为谁用权、为谁尽责”拉回政治立场与纪律边界之内。

第二，组织体系与干部队伍：回应意志传导与执行主体问题。“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关键在于“贯通”与“有力”。决策能否一贯到底、信息能否真实回流、条块矛盾能否按党的原则被协调，组织体系提供的是意志传导的结构通道；而“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落到“谁在关键位置、凭什么选拔、向谁负责、失责如何纠偏”的责任链条上。二者共同决定党中央权威能否从政治宣示转化为可核查的治理效能。

第三，作风、纪律与反腐：解决党群关系与权力约束问题。“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核心是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从集中整治转化为制度安排，防止作风问题反弹回潮。“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约束前移，使纪律成为日常行为的刚性边界，而非仅作事后惩戒。“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通过强化惩治震慑、扎紧制度笼子、筑牢思想堤坝^[27]，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提升治理腐败效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以上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建构层：思想建设确立政治共识与价值基准，组织体系与干部队伍提供传导载体和执行主体，作风—纪律—反腐形成刚性约束与纠错机制。三者相互衔接，将政治坐标与战略方针，从原则要求推进为可运行的党内治理与制度安排。

（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运行支撑

在分别确立政治坐标、价值方针与建设内容之后，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回答：上述原则与布局如何在长期执政的常态中保持不松劲、不走形、不回潮。对此，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制度保障，把政治原则转化为可持续运行的治理秩序。

第一，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构成长期执政的“规则基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靠觉悟与动员可以打开局面，但要让“严”跨越时间、穿透层级，需要把纪律要求、权责边界、监督程序落实为稳定的规则文本与执行机制^[28]。新时代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强调的正是这种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即把“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意志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可重复、可核验的运行秩序，使权力运行更多依靠程序把关与责任追溯，制度治党由此把党建从“政治宣示”推进到“规则之治”。

第二，“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29]。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层级问题，易被放大为“人人负责、实则无人扛”的风险。抓住党委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职责、“一岗双责”与纪委监督专责这条责任链，实质是把“该干什么”进一步落到“谁主责、谁协同、谁监督、失责如何追究”的结构里。唯有如此，前述思想铸魂、组织体系、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常态化、纪律刚性、一体推进“三不腐”等内容层，才能避免在实际运行中退化为条块各自解释的例行程序，制度条文也才能获得明确的责任主体、执行标准与纠错机制。

四、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的集大成者：思想伟力与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视角考察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多是聚焦其标志性引领性特征。这种“标志性引领性”集中体现在思想伟力与原创性贡献上。

（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的内在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完成了从经验叙事到建制理论的跃迁。这一思想的理论品格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3]，它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魂脉，又在实践中塑造出适应长期执政条件的现代组织形态。它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以及科学的思想方法^[3]，具有鲜明而坚实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第一，渊源上，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这一思想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时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实践；另一方面，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党建理论既保持阶级性与人民性，又获得深厚的历史承载力，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具体深化，也是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深度充实。

第二，品格上，体现了“本体—方法”的有机统一。先明其“体”，把党与国家制度结构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内在一体化构造；再达其“用”，把这一根本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治党轨道。政治建设统领、纪律边界前置、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成体系、责任链条可追溯、监督机制可运行，这一思想既擘画宏伟蓝图，又提供实现路径。

第三，构造上，体现了“全涵盖—全链条”的严密统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多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并逐渐形成

逻辑严密、体系完善的党建思想。”^[30]在政治建设统领之下，新时代党的建设呈现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与反腐一体部署的“内容全涵盖”；从中央高层到基层组织、从“关键少数”到普通党员，纪律约束与责任传导的“对象全覆盖”；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职责、“一岗双责”与监督专责环环相扣的“责任全链条”；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治理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全贯通”。

（二）指引强党强国新征程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具体方案，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组织的日常运转和干部的具体行动中，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明确政治规矩、完善制度设计和严格干部管理，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组织健康提供了可行路径。

第一，进一步稳固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针对党组织层级多、分布广的特点，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原则，明确了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和政治对标的要求。同时，将政治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在干部选拔、考核评价等环节突出政治标准。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折扣，保证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够一贯到底，防止了分散主义倾向。

第二，构建了常态化的纠偏机制。改变以往依赖集中整治的模式，该思想建立了制度化的自我净化能力。通过作风常态化防止问题反弹，通过纪律建设明确行为边界，通过“三不腐”一体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制度治党与责任链条的结合，把原则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定和可追溯的责任，使党内监督由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管控，提升了组织自我修复的效率。

第三，优化了干部行为激励机制，推动树立正确政绩观。针对考核压力下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从选任、约束、监督多维度进行调整。在选人用人上强调实绩和群众公认，在纪律上划出红线，在监督上压实责任。通过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让群众评判成为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促使干部将精力投入到解决实际问题 and 推动发展上，而非应付检查和制造虚假政绩。

（三）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图景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管党治党成败，首先关乎中国自身前途，同时也构成全球政党政治中一个体量最大、治理负荷最高的现实样本。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把一个长期被抽象化的命题，即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既不走向涣散蜕化，又能保持治理效能与获得人民信任，推进为更可检验的系统叙事，从而为政党治理比较研究拓展了新参照系。

第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应对长期执政的内生风险。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与不可动摇的政治坐标，以政治建设统领把方向、标准与用人导向贯通起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作风常态化、纪律刚性、制度治党与监督追责整合成可追溯、可复核的责任链条，把反腐治理从个案震慑提升到结构与程序治理层面。其效果在于把风险治理从原则宣示推进到可操作的党内治理工程：一方面通过更明晰的纪律边界、更可核验的问责机制和群众可感的纠偏，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另一方面以纪律、制度与监督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降低因监督缺失导致的廉洁风险与组织风险累积，由此形成一种更可控、更可持续的长期执政自我约束机制。

第二，以“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一体化叙事，打破了把政党现代化简单等同于选举竞争的窄化叙事。在西方主流话语里，“防滥权”常被绑到多党轮替与选举周期上，久而久之就容易把政党矮化为竞选机器与利益博弈平台，导致政策短视、治理碎片化与政治极化。中国给出另一种可对照的命题：执政党把政治承诺通过组织体系一贯到底，把公共权力关进可核查的规则、让群众在微观治理中持续获得公正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兴党强党”视为治理底盘。它不导出国强必霸的逻辑，也不接受“执政党必然走向衰朽”的宿命论，为“政党与国家能力如何长期稳定”提供可借鉴的参照经验。

第三，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意义上的选项”，并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落到党建层面的核心体现：政党自身不过硬，任何现代化都会中途走样；实现现代化不能靠阶段性运动，要靠制度、纪律与群众监督合力维持。它不替别国做选择，但清晰表明：现代化不等于政党选举化，治理现代化更不等于把政党降为选票收割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所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更长周期的制度耐心与更强的组织连贯性，让发展、公平与秩序在不同阶段可被重新校准，从而在政治发展道路多样性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增加了一个更具分量的参照坐标。

五、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确立，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当代发展中构成一个标志性节点。它意味着新时代管党治党从“破局—布局”走向系统化建制化的日臻完善，把大量实践经验提炼为概念清晰、要素完整、可传承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的内在统一，指引了强党强国新征程，为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图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站在“十五五”开局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坐标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视角，坚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积极破解党在长期执政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全面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秦书生，梅可欣. 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着力点与实现机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70-81.
- [3]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蔡奇出席并讲话 李希出席[N]. 人民日报，2026-06-16（1）.
- [4] 习近平. 在二〇二六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二〇二六年二月十四日）[N]. 人民日报，2026-02-15（1）.
- [5]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N]. 人民日报，2023-01-10（1）.
- [6] 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N]. 人民日报，2026-06-16（1）.
- [7] 刘东旭，黄蓉生.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蕴含的辩证逻辑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29-40.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 [9]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
- [10]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
-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 分析研究二〇一三年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2012-12-05(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10.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5-102.
- [16]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8(1).
-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N].人民日报,2017-10-25(1).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1-11-17(1).
- [19]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 [20]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N].人民日报,2023-06-30(1).
- [2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N].人民日报,2023-12-28(1).
- [2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出版发行[N].人民日报,2025-01-17(1).
- [23]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N].人民日报,2026-06-19(1).
- [24] 赵永红.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由来、构成、优势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34-45.
- [2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07-28(1).
- [26] 人民日报评论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39.
- [27] 林学启,崔浩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作风全面纯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实践进路[J].理论与改革,2026(2):1-12.
- [28] 徐凯.专项治理中文件的规范功能与运行机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2):144-153.
- [29] 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N].人民日报,2026-06-18(1).
- [30] 文丰安,李江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与重要意义[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6-06-22].<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621.1319.002>.

责任编辑:杨稀琴 校对:卢媛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特征与实践启示

葛英儒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政绩观集中体现了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与执政胸怀, 关乎执政方向、执政效能、执政根基, 其生发逻辑、演化方向及具体内涵始终与特定精神谱系的在场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前置性的观念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价值立场、导向目标、方法指引、校验场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形塑的正确政绩观, 是一个以人民性为主体、历史性为尺度、斗争性为动力、实践性为归宿的有机观念系统。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统摄和导向下, 正确政绩观展现了区别于任何其他政绩取向的根本特质、内在结构和深层底蕴, 并集中体现为人民性的主体向度、历史性的时空境界、斗争性的内在动力和实践性的现实品格的有机统一体。立足“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方位与新使命, 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要从价值内化、实践导向、精神赋能、纪规约束等层面系统发力,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符合时代要求和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正确政绩观,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与持久引领。

关键词: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正确政绩观; 党性修养; “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147-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12

作者简介: 葛英儒,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内监督体系的基层实践及其效能提升研究”(24CDJ058)

引用格式: 葛英儒.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特征与实践启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147-158.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1]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宗旨和使命在领导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是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性、前提性问题的系统回答，也是深植于党的精神血脉、体现党的初心使命的价值理性与实践自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结构，政绩观的生发与演化有其前置性的观念基础，与特定的“社会结果”的赓续在场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下文简称“精神谱系”）这一政党精神形态在标定中国共产党奋斗特质的同时，其蕴含的价值性、情感性、认知性和方法性等要素也深刻影响着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推动全党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背景下，在精神谱系的宏阔视域下探究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特征、深刻意涵，不仅是对建党百余年来精神血脉的时代赓续，也是对新征程上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回应。

综观当前学界关于正确政绩观的研究，有研究者或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握其核心意涵^[2]，或从体系化学理化视角中探寻其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建构^[3]，或将其置于高质量发展^[4]、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审视其现实要求和实践路径，或聚焦于考核评价体系^[5]、制度建设^[6]探求其治理效能实现，或基于观念维度深入党性内核^[7]、精神谱系传承^[8]的视角探究“滋养”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来源。这些成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参照。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可深拓之处。第一，解释性分析有待深化。多数研究侧重于精神谱系历时性梳理，尚未在“精神形塑”与“观念生成”的内在互动机理上实现系统性论证。第二，对本质特征的提炼有待加强。现有研究虽已触及“人民性”“实干性”等具体特征，但对正确政绩观本质的认识趋于碎片化，难以把握其作为一个有机观念系统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理。第三，实践转化路径有待细化。现有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原则倡导与意义强调层面，对于更好地将精神谱系内化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仍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精神谱系—正确政绩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旨在超越对二者关系的一般梳理，深入阐释精神谱系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通过价值内化、历史赋能、方法供给与实践校验等动态机制形塑正确政绩观的内在机理，提炼精神谱系映射下正确政绩观所呈现的人民性、历史性、斗争性、实践性等本质特征及所具有的深层意蕴。通过这一理论探索，本文尝试在学理层面实现从“事实梳理”向“机理阐释”的跃升，在实践层面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植根于精神源流的实现路径，为相关研究从“应然倡导”到“实然生成”提供有益借鉴。

二、生成逻辑：精神谱系如何塑造正确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的形成并非自发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党百年来的精神传统与实践历程。精神谱系通过价值锚定、历史传承、理论创新与实践淬炼等多重机制，持续推动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升华

与实践演进。

（一）价值逻辑：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奠定坚实的根本立场

精神谱系所凝结的“政绩为民”的价值共识，通过持续的教育传承、典范叙事与仪式强化，为正确政绩观设定了根本的价值前提与情感归属。从历史源头看，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标定了“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9]的党的任务，从政治纲领上确立了党的政绩创造活动与人民利益的同一性。由此，从“井冈山精神”中“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艰苦实践，到“苏区精神”中“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执政探索，再到“长征精神”中“救国救民、不惧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都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生动体现与精神升华。在统摄意义上，由纲领奠基并经精神谱系凝结和传承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观念与行为设置了不可逾越的价值前提。在这一精神的导向下，中国共产党从观念层面上预先排除了为个人、为小集团、为狭隘利益的政绩追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确保了将“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赋予了正确政绩观“政绩为民而树”的内涵。

（二）历史逻辑：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确立鲜明的导向目标

精神谱系是特定历史阶段时代精神与政党使命凝结而成的宝贵成果，它将宏大的历史任务转化为具体的精神符号，为各阶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了清晰的价值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民族危亡与人民苦难，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把“工作成绩”与“革命胜利”“人民解放”紧密联系，使“政绩”始终指向民族独立与人民翻身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国家建设，精神谱系随之拓展为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这些精神将“政绩”内涵拓展为国家自立、工业奠基与人民福祉，体现为甘于隐姓埋名、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精神谱系进一步融入开拓创新、敢闯敢试的时代气质，特区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应运而生，将“政绩”与“发展”“效率”“拼搏”紧密结合，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国家富强为价值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精神谱系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实现系统性升华，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相继形成，将政绩追求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战略目标，体现了正确政绩观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阶段的自觉回应。

（三）理论逻辑：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提供科学的指导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崇尚实干、埋头苦干是其鲜明品格^[10]。这一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党的百余年奋斗中的结晶，构成了精神谱系的方法论内核，也为如何创造政绩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框架与行动指引。在党的百余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这种科学精神和思维来应对各种困境和挑战。面对党内错误路线带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曾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既坚决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也为正确政绩观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夯实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基础。面对抗战根据地困难形势，延安时期党中央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明

确创造政绩必须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满足人民需求，确立了正确政绩观中的“群众路线”方法论。面对国际安全威胁和外部技术援助中断，党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者们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将这种精神生发为一种不依赖外援、勇于攻坚的“主体性”实践原则。新时代以来，面对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这一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正确把握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精神谱系内在包含的理论创新，确保了创造政绩的过程始终沿着遵循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期待、服务发展大局的轨道稳步推进。

（四）实践逻辑：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构建有效的校验场域

正确政绩观是在不断经受检验的实践进程中形成的，而精神谱系始终深深嵌入其中并主导这一实践的运行，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回应时代之问、破解实践难题中从一种政治观念成长为一种实践自觉，并始终契合中国共产党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在规范性层面，精神谱系将自身蕴含的价值立场、认知模式与行动逻辑，内化为政绩创造主体在具体实践场域中的结构性“惯习”，使其在应对现实挑战时，能够自觉依循特定的价值目标、运用相应的认知范式、遵循既定的行动逻辑，从而确保政绩追求始终不偏离精神谱系所确立的根本方向。如“脱贫攻坚精神”一经提出，其“精准”“如期”“不返贫”等内容就成为党员干部对标对表的政绩目标。在策略性层面，精神谱系则往往以典范叙事为核心，辅以生活叙事、共情叙事、视像化叙事等多元化的叙事策略，营造浸润式的观念形塑环境。如典型人物在面对困难、作出抉择、矢志奋斗的事实中内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通过必要的设计引导，便成为党员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参照和行动坐标。更进一步说，在精神谱系浸润下全社会形成一个崇尚实干、鄙弃虚功，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从外部潜移默化地校正干部的政绩追求和行为方式^[12]。

三、核心特征：精神谱系映射下正确政绩观的本质属性

在精神谱系的深度影响下，正确政绩观呈现了主体向度层面的人民性、时空境界层面的历史性、内在动力层面的斗争性、现实品格层面的实践性等核心特征。这四大特征层次丰富，相互关联，且有机统一，深刻揭示了正确政绩观区别于任何其他政绩取向的根本特质。

（一）人民性：正确政绩观的主体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毛泽东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5]百余年来，在精神谱系映射下，正确政绩观不断回答了“政绩为谁而创、依靠谁而创、由谁评判”这一根本问题，揭示了“人民”在其价值体系与实践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

一是确立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1]精神谱系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明确了干部权力必须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要求，精神谱系将权力属性内化为党员干部“对人民负责”的深刻认同。同时，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再到“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等，精神谱系为权力行使提供了具体方法和行为规范，并通过党内集中教育和干部责任制等制度嵌入权力运行过程，确保权力运行始终围绕提升人民福祉展开。

二是规定了“人民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6]百余年来，虽然创造政绩过程中经常需要权衡多种利益和多重目标，但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导向下正确政绩观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从土地革命时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纲领，到长征途中“半条被子”的暖心故事，到新时代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再到当前高质量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精神谱系的传承一再确证，政绩的生命力，根本在于其与人民利益同频共振的深度与广度。

三是明确了“政绩为民所创、为民所享”的功能指向。毛泽东曾深刻比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17]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1]百余年来，精神谱系的实践和传承塑造了党员干部“政绩为民而树”的自觉。如焦裕禄精神展现了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躬身实践，将“造福一方”的政绩追求与解决具体民生疾苦深度融合。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则系统性地将“精准务实、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转化为千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历史实绩。在精神谱系的引导下，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清晰界定了政绩创造主体的人民性和享有主体的人民性，真正回答了政绩“是什么”和“为了谁”的问题。

（二）历史性：正确政绩观的时空境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精神谱系的影响下，正确政绩观这一特定政治观念结构逐渐成为一种反作用于历史进程的理性自觉，成为一种既立足当前现实、又贯通历史与未来的科学政绩观。

一是政绩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正确政绩观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谱系的孕育和铸就，集中体现了对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与约束条件的清醒认识。例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拘泥于“城市中心论”，而是基于敌强我弱、农村敌人统治薄弱的现实，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蕴于其中的“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深刻揭示了真正的、能够引领事业走向胜利的政绩，必须建立在对所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客观环境与根本任务的精准判断之上。在中国“第二次革命”道路的探索中，特区精神则进一步诠释了政绩必须“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对于发展的理解包含着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理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1]这充分说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空环境及发展趋势对于政绩内涵的构成与变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政绩的效应呈现历史过程性。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而是充满复杂性与延续性的历史实践。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其价值往往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其中既包括那些投入大、周期长、短期内难见成效却关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也包括那些见效快但仍需时间验证其持续价值的实际工作。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一种超越个人任期、着眼事业永续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责任感，甘愿为后人铺路和奠基。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曾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8]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考量，揭示了创造政绩要具备历史耐心、责任担当与长远视角。

三是政绩受历史检验具有权威性。政绩的真伪、高下、得失，最终不由创建者的自我标榜或一时的舆论评价所决定，而将在历史进程中被检验。精神谱系超越短时段的经验性认知局限，能够使党员干部从中长时段维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成效。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能源供应紧张的历史时期，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秉持“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铁人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成大庆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这一政绩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其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更在于它经受住了长周期的实践检验，持续支撑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能源安全。铁人精神中“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的誓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政绩“历史负责”最朴素的诠释。

（三）斗争性：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斗争则是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途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标识的精神谱系，为正确政绩观注入了勇于直面矛盾、敢于较真碰硬等精神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19]正确的政绩观因具备这类精神基因，而具备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特质。

一是始于同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纵观党的历史，精神谱系中的斗争性伦理品格使得党员干部在面对大是大非、歪风邪气时敢于亮剑和斗争，敢于同一切背离初心使命、偏离人民立场的错误政绩观作毫不妥协的斗争。遵义会议所彰显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斗争性的光辉起点与经典范例。面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革命濒临绝境的危局，会议通过充分的思想交锋，结束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延安整风运动则通过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深刻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脱节、言行不一等弊病，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政绩观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思想纯度”。坚决的斗争精神的有效在场，是正确政绩观在复杂环境中抵御侵蚀、保持定力的根本前提。

二是成于攻坚克难的实践斗争。真正的实绩，从来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其生成于具有斗争性的精神谱系的支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苦奋斗攻难关”的苏区实践以及长征途中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英勇跋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员干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完成“两弹一星”这一战略性工程，再到新时代以来面对脱贫攻坚战、抗疫斗争等“硬骨头”，党员干部均以坚决意志和实干行动兑现政绩。精神谱系在事实层面赋予了党员干部敢干、善干、持久干的斗争品质，并在制度与物质性资源的支撑下取得了相应的伟大成就。

没有这种精神导向，就不可能创造出被群众认可、被时代铭记的过硬业绩。

三是寓于拒腐防变的自我斗争。政绩观并非悬置于权力结构与利益关系之上的纯粹观念，其生成与持守始终伴随着与权力异化、利益诱惑及复杂环境的博弈。列宁曾警示，执政后的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蜕化的现实危险，必须“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20]。精神谱系内蕴的自我革命要求，正是抵御这种侵蚀、保持政绩观纯粹性的内在抗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政治预警，指出必须同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的危险作持续斗争，永葆“赶考”的清醒。西柏坡精神蕴含的这种自我革命要求，为正确政绩观筑牢了“政治安全”的堤坝。

（四）实践性：正确政绩观的现实品格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 135}真正的政绩也因精神谱系的观照，具有显著的实践规定性，即是基于现实土壤、通过人的能动创造、在历史进程中被检验和确认的实在成果。

一是立足客观实际的现实基点。任何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绩，必然建立在对党情、国情、社情、民情的真实认知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1]这意味着，谋划发展、推动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目标设定适应现实条件。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的精神谱系塑造了党员干部立足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政绩观，赋予其坚实的现实根基。例如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蕴含着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条件下观察形势、实事求是的实践导向，这种精神贯穿于党在根据地建设和战略转移的实践决策中，使革命力量没有因主观意志盲动而迷失方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延安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把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理解作为制定政策和评判政绩的基础。

二是依靠实干付出的实现过程。马克思曾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3] 134}政绩不会自动生成，必须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塞罕坝荒漠变林海的三代人坚守，脱贫攻坚战中直面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众，都离不开实干这一实践性要素的在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21]没有“钉钉子”般的执着，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奋斗，就无法创造真正的政绩。

三是追求现实转化的结果目标。毛泽东曾指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4] 864-865}这深刻揭示了政绩必须体现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百余年来，精神谱系始终作为一种观念性力量，深刻塑造了政绩追求要以“落地实绩”为准绳。例如脱贫攻坚精神中“精准务实、开拓创新、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生动诠释了政绩“变现”的能力逻辑。“落地”导向下的正确政绩观，反对停留在文件上的空谈、停留在报表上的数字，追求把规划转化为现实结果。这种对现实转化的不懈追求，正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在政绩观上的具体体现，从根本上确保了政绩的真实性。

四、实践启示：以精神谱系引领新时代政绩观建设

新时代新征程，立足“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方位与新使命，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宝贵精神财富，将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信念力量、价值追求与实践品格，全方位融入政绩观建设，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深层的精神力量。

（一）深化价值内化：以精神谱系滋养政绩观的思想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1]要坚持用精神谱系引领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进一步滋养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一是深化学习教育，从精神源流中滋养政绩理念。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看不清、辨不明，把不准、没信心，重要原因在于精神上缺“钙”^[22]。为此，要将精神谱系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理论学习，使正确政绩观内化为价值追求、外化为行为准则^[23]。要将精神谱系融入学习教育，让党员干部在重温党史与英模事迹中深化对个人行为选择的认识，不断提升其思想境界与行动自觉。例如，以“两弹一星”精神启发“注重潜绩的长远主义”，以脱贫攻坚精神砥砺“精准务实的‘钉钉子’作风”。

二是强化党性锤炼，在对照反思中消解政绩偏差。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性坚强之源，党性坚强是正确政绩观之基^[24]。要结合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将精神谱系深度融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党员干部常态化查摆政绩观偏差的根本标尺。要深入学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对标先进，查摆自身在宗旨意识、价值取向、工作作风上存在的差距。要将精神传承与政德建设、警示教育结合，教育党员干部从精神谱系中汲取“大公无私”的品格，从思想根源上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私心杂念，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三是紧扣时代使命，在服务大局中提升政绩境界。“十五五”时期面临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艰巨任务。要引导党员干部从塞罕坝精神中领悟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从探月精神中汲取科技自立自强的攻坚意志，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教育党员干部在“十五五”规划实施中，既要多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甘于做打基础、做铺垫、利长远的好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二）强化实践导向：以精神谱系锚定政绩观的价值尺度

精神谱系中蕴含着为民初心、务实作风和党性原则，要坚持将这一精神优势转化为校准政绩观偏差、引导政绩创造的具体标尺。

一是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方向。校准政绩观，要坚持在精神谱系中把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要求。为此，要始终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锚定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坚决摒弃“唯上不唯下”的功利倾向，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立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1]广大党员干部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大力弘扬“三牛”精神，将政绩观落实到解决民生实事的具体实践中。

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路径。精神谱系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宝贵品质，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并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辩证关系。追求政绩，应学习发扬塞罕坝精神、右玉精神所彰显的长期主义，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投身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同时，要传承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自力更生、科学求实的品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脚踏实地“干”政绩，避免夸夸其谈“喊”政绩。

三是坚持以精神内核为引领的考核评价。思想引领最终需依托制度落地，要坚持将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要求转化为科学、可操作的考核评价标准。要健全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核心评价内容，特别是要加强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成效的考核，引导党员干部甘于“十年磨一剑”。要注重听取基层群众和一线同志的意见，让“乡语口碑”成为重要标尺。要将考核结果与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紧密结合，通过鲜明的用人导向和奖惩机制，引导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求真务实、干事创业上。

（三）激发精神赋能：以精神谱系淬炼政绩观的实干担当

精神谱系是滋养实干担当的动力源泉，赋予个体与团队以超越眼前利益和现实困境的战略定力与思想伟力，为党的行动提供内在原动力^[25]。这种赋能，能够将崇高信仰转化为“愿不愿干”的使命自觉，淬炼为“敢不敢干、会不会干”的能力方法，实现内在动力与实践能力的有机统一。

一是激发“功成有我”的使命自觉。政绩观来源之一是领导干部的心态和境界^[26]。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自身在伟大事业中的历史方位与角色责任，自觉从“旁观者”转变为“实干家”，坚决摒弃“躺平”心态和“佛系”作风。要鼓励并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直面矛盾问题，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和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初心、锤炼本领。要教育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公与私、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抉择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与狭隘的本位主义。要弘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甘于为事业长远发展做铺垫、打基础，以“无我”的情怀追求“有我”的作为，切实将精神力量转化为“舍我其谁”的进取意识。

二是锤炼“求真务实”的实干作风。精神谱系中蕴含的“钉钉子精神”和艰苦奋斗传统，为解决“会不会干、干得好不好”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实践中，要走好群众路线，坚持与群众面对面，聚焦事业发展中的堵点、痛点与群众遇到的真问题、真难题，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27]，既吃透上级精神，也精准把握本地区、本领域的特殊性，制定出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步骤可行的“施工图”，确保政策举措能够精准滴灌到具体问题和实际需求上。

三是强化“攻坚克难”的斗争本领。做到实干担当，要具有干事创业的精神魄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

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的历史逻辑。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党员干部安排到重大任务前沿、矛盾集中领域和条件艰苦岗位接受锻炼，使之在直面复杂局面中磨砺斗争意志，提升驾驭风险的能力。要大胆选拔使用那些在斗争一线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鲜明树立“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导向。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科学界定失误错误性质，为出于公心、担当尽责而在探索中出现的偏差失误提供必要的容错空间，切实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四）恪守纪规底线：以精神谱系筑牢政绩观的约束屏障

精神谱系是党员干部修身正风的“压舱石”，是严守纪律底线的“指明灯”，为政绩创造划定不可逾越的纪律红线与行为边界。

一是以制度刚性防范政绩冲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持正确权力观为支撑，权力观的错误与政绩观的偏差是同向而行、互为因果的^[2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注重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29]据此，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推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进一步压缩政绩冲动赖以滋生的模糊空间与机会主义土壤，从源头上杜绝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乱象。

二是聚焦“关键少数”纠正政绩跑偏。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政绩观落地的“风向标”，必须作为监督对象中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30]，“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31]。在实践中，要织密监督网络，健全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贯通协同的机制，重点加强对“一把手”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监督，防止搞“一言堂”和个人专断。要做实日常监督，将政绩观偏差问题纳入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的重要内容，对热衷于搞“数据造假”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要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的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因政绩观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一案双查”，既问直接责任，也问领导责任。

三是强化纪律规矩严惩政绩失范。不少政绩观错位的现象主要源于不能自觉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3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7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33]，这从纪律层面封堵了“捞好处”型干部通过损害长远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制度漏洞。在实践中，要明确这条纪律红线，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处分规定，对违背新发展理念、给党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严肃依规处理。要贯通执纪问责，坚持风腐同查，对政绩造假、数据注水背后的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深挖彻查。要加强警示教育，用好政绩观扭曲的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广大干部深刻认识“纪律底线不可越、规矩红线不可碰”，自觉在纪律规矩约束下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百年奋斗的精神结晶，是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立场、认识准则、

行动原则的生动体现,是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决定意义的党性的精神性、情境化、集成式表达,为正确政绩观的生成提供了价值内核、科学方法和精神动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形塑的正确政绩观,是一个以人民性为主体、历史性为尺度、斗争性为动力、实践性为归宿的有机观念系统。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历史方位,对标“十五五”时期战略任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必须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源头活水”,将其蕴含的信念力量与实践品格,全方位融入政绩观的培育、考核、激励与约束之中,积极破除急功近利的政绩焦虑和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立场,持续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实践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J]. 求是, 2026(7): 4-15.
- [2] 陆卫明, 姚文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原创性贡献及时代旨归[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3): 5-15.
- [3] 魏崇辉, 李玲. “正确政绩观”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演进与理论建构[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3): 16-24.
- [4] 潘超, 韩卓鹏. “十五五”时期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内在逻辑和现实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3): 73-84.
- [5] 陈家喜. 从价值坐标到制度闭环: 基于正确政绩观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构[J]. 云南社会科学, 2026(3): 11-19.
- [6] 方雷. 新时代加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制度建设探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6(2): 47-54.
- [7] 张彦, 徐粤超. 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逻辑关联与路径要求[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2): 25-32.
- [8] 鲁敬诚, 刘靖北.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正确政绩观的基本内容、丰厚滋养与实践运用[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3): 60-72.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3.
- [10] 邓海龙.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 “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间”的场景、逻辑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103-115.
- [1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
- [12] 黄恩华, 曾智勇. 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蕴与路径[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2): 47-56.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1.
- [14]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40.
- [16] 习近平. 坚持人民至上[J]. 求是, 2022(20): 4-8.
- [17]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6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9.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27.
- [20]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2-223.
- [21] 习近平.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 [J]. 求是, 2023 (13): 4-16.
- [22] 石建国. 影响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因素 [J]. 人民论坛, 2026 (5): 21-25.
- [23] 韩美群. 如何把握“功成不必在我”与“功成必定有我”的辩证关系 [J]. 红旗文稿, 2026 (6): 9-12.
- [24] 周晔. 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 [N]. 解放日报, 2026-01-27 (10).
- [25] 许燕.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与赓续的文化自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6 (2): 112-125.
- [26] 陈金龙.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四维阐释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6 (2): 38-46.
- [27] 陈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71.
- [28] 柴奕.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四个关系论析 [J]. 理论与改革, 2026 (2): 28-39.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 [N]. 人民日报, 2025-07-01 (1).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38.
- [3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100.
- [32] 鲁敬诚, 刘靖北.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文化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6 (1): 35-43.
- [3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7.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现实危害与学理应对

赵超¹ 胡静²

(1.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市党建研究所, 重庆 400041;
2.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当今国际学术话语博弈日趋激烈, 境外一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错误中国史观假借学术研究之名持续传播, 既损害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根基, 也深刻影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国际话语主导权乃至国家统一大局。内藤湖南的错误中国史观伴随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两大关键节点发生深刻蜕变, 由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有限认同转向对现实中国的否定, 最终形成服务于日本侵华图谋与分裂中国行径的殖民主义史观。内藤湖南提出的所谓“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 存在先入为主预设政治立场、生硬套用西方历史分期范式、选择性曲解历史史实、人为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根本性谬误。在学术层面, 此类错误史观误导中国史的研究与叙事范式, 成为“内亚史观”“新清史”等错误思潮的重要思想根源; 在政治层面, 其刻意炮制“中国停滞论”等谬论, 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解构国家疆域编造虚假理论说辞。唯有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以唯物史观引领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 在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中正本清源、明辨是非, 方能从根源上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与错误史观的渗透侵蚀, 更好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民族团结大局。

关键词: 中国史观; 内藤湖南; 中华民族历史观; “宋代近世说”; “文化中心移动说”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159-15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13

作者简介: 赵超,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党建研究所副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 胡静,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研究”(23CMZ004)

引用格式: 赵超, 胡静. 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现实危害与学理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159-173.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1]历史观不仅关系到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解释，更关乎国家认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主权维护与国际话语权构建。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试图淡化甚至美化侵华历史。2026年适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政界部分势力仍频繁出现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责任、美化战争行为等现象；部分右翼政客借“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再提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试图干预中国国家统一问题。历史观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国际舆论斗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当代日本右翼推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并非孤立现象，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近代日本的“中国论”、东洋史学及殖民史学传统，两种思潮间存在清晰的历史延续性与思想谱系关联。内藤湖南作为近代日本京都学派的奠基人，他的部分理论既是后世错误中国史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加以挪用、改造的关键思想资源。内藤湖南长期开展中国史研究，提出的所谓“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在20世纪东亚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然而，其史学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探索，而是深受日本近代国家扩张、东亚霸权构想及“大陆政策”影响。在其历史叙事中，中国被塑造为“缺乏自主革新能力、需要外力改造的对象”，日本则被赋予所谓“领导东洋”“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这种以日本为中心重构东亚秩序的历史解释框架，本质上服务于日本对外扩张及殖民统治的政治诉求。内藤湖南片面化、碎片化解读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逻辑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基础，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认知。

当前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研究，已从单纯剖析其个人思想与侵华相关立场，逐步拓展为整体性反思其错误中国史观的本质属性与现实危害。一是揭示内藤湖南学说的帝国主义政治本质，认为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2]。内藤湖南的所谓“唐宋变革论”“文化中心移动说”等核心学术观点与其政治立场紧密关联，服务于日本对华扩张战略^[3]。二是立足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重新审视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实质及危害。“崖山之后无中国”是被东洋史学“遗毒”植入、西洋史学谬误塑造的伪历史观，内藤湖南窄化“中国”为“汉族政权”，实质上是要割裂中华文明、掩盖中华民族大家庭交往交流交融真相^[4]。20世纪以来，日本与西方学界提出的“东洋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割裂了古代中国与北方民族的紧密联系，违背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5]。“新清史”“内亚史观”等西方伪史观并非纯学术观点，而是服务于西方地缘战略的意识形态“软战争”，其共同目的是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国家主权合法性^[6]。三是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为日本右翼二战史观提供了学理说辞。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从根本上否认二战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人民、其他东亚国家人民的侵略屠杀事实^[7]。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不仅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日本右翼的“元清非中国论”开启恶端^[8]。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对内藤湖南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缺乏对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生成脉络的系统性考察，未能充分揭示其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转型、东

亚霸权争夺及殖民史学建构的深层关联；二是未能整体梳理内藤湖南思想从近代东洋史学延续到当代“新清史”“内亚史观”及日本右翼历史叙事的内在关联。系统梳理与深刻批判内藤湖南的错误中国史观，是夯实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根基、助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历史领域国际话语权和维护国家统一大局的应有之义。为此，本文立足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厘清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剖析其现实负面影响，从逻辑起点、分析框架与政治意图层面开展学理批判，并提出应对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在古籍整理、文献考订方面确有客观贡献，不应全盘抹杀。但学术方法与价值立场须作区分——其考据成果可为今人所用，而其“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观点所嵌入的殖民主义立场则需严肃批判。本文侧重剖析其史观的政治指向与现实危害，而非否定其全部学术工作。

二、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是在东亚格局更迭、自身记者兼学者的从业经历以及日本对外扩张思潮共同作用下逐步演变的结果。其中国史观的演进脉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争前有限认同文化层面的中国，甲午战争后转而否定现实中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转向主张殖民中国。沿此脉络，能够逐层厘清内藤湖南中国史观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想取向。

（一）甲午战争前对“文化中国”的有限认同

甲午战争之前，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知以汉学为基础。内藤湖南自幼接受汉学教育，文化民族主义和实学思想随之萌芽。其后在东京从事新闻与编辑工作期间，深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确立了反对全盘西化、坚守本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他主张各国实现现代化应立足自身国情选择适宜道路，而非照搬欧化主义、将西方作为唯一模式。他曾表示：“呜呼！日本既非德国，亦非英国，日本即为日本，日本国有相应于日本国之政体，相应于日本国之产业，日本人亦有相应于日本人之教育，相应于日本人之宗教、美术和工艺。”^[9]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才发展起来的，他用“点卤成腐论”“长者辅学论”来比喻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本土文化如“豆浆”“懵懂幼童”，是在中国文化这一“盐卤”与“长者”的凝聚引导下才逐渐发展成型^[10]。这种思想底色使内藤湖南早期对中国抱有积极的文化认同，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一旦入了门，连它的残羹冷饭，也足以医治他们被甘美伤害的口腹”的文化^[11]。他秉持中日人种同源、文化一脉相承的观点，认为“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12]。“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的文化传统则是从古代中国黄河文明发展而来”^[13]。作为兴亚论思潮的拥护者，内藤湖南认为中日在西方外力冲击下有着相似命运，新闻从业经历也促使其实学思想进一步成熟，开始关注晚清社会改革问题，并将中国变局与日本发展前途相关联。他与当时在政教社任职的其他年轻人都认为：“如果日本用自己的‘国粹’给中国以良性刺激，能够从中国那里获得日本所欠缺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资源，那么黄色人种的将来还是有希望的。”^[9]⁶⁶可见，这个时期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表现为对“文化中国”的有限认同。

（二）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对“现实中国”的否定

甲午战争爆发后，内藤湖南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他在《所谓日本的天职》社论中提出“日本天职说”，声称日本的天职不在于充当西方文明的中介，而是以日本文化为中心构建能与西方文化抗衡的东亚文化。他宣称：“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11] 183}。基于这一认识，内藤湖南在《地势臆说》社论中提出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文明中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转移。他试图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中华文化的活力，借以反驳当时日本学界盛行的“中国停滞守旧”论调，强调中华文明并非停滞。“三代以下到唐宋，世虽有兴衰隆替，各代都具有各代特色的文化。如果变化递移就是西方人所谓进步的话，中国未尝没有进步。”^{[11] 181}但他最后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即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呈现分离的状态。在随后发表的《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中，内藤湖南暗喻日本“如人之壮年，嗜欲旺盛”，中国“及至老境，嗜好偏于定一”，继而抛出极具政治图谋的荒谬结论：“文明之中心，今又将有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13] 48-49}他呼吁日本学者到东亚收集新的资料、创造新的思想，声称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日本将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东洋中心。

甲午战争后，内藤湖南赴中国的考察经历，加之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进一步否定了“现实中国”的自我发展能力。内藤湖南声称，中国应该依靠日本帮扶、模仿日本模式进行改革。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理应致力于调和与中国各改革派系之间的矛盾，促成其联合，共同推动中国改革^[14]。在中国之行及其与中国士人的交流过程中，内藤湖南多次提到中国改革应当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从日本的政治体系中汲取经验，最优路径仍是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借鉴近邻日本的制度，或许比效仿遥远西方国家的制度更具实效”^{[14] 571}。至此，内藤湖南已由对“文化中国”的有限认同，逐渐转向对“现实中国”发展主体性的否定，并形成由日本主导中国改革的思想倾向。

（三）辛亥革命后主张对“现实中国”进行殖民

辛亥革命之后，内藤湖南的著作《支那论》《新支那论》出版，标志着他的中国史观走向殖民化。内藤湖南在《清朝衰亡论》中，通过对兵力、财政经济以及思想变迁的分析，认为清朝统治难以维系，君主专制必将终结，“革命党会取得胜利，革命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无疑的”^[15]。而对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该走向何方，他在《支那论》中从长时段历史出发，提出所谓“宋代近世说”。在他看来，宋代以来传统贵族政治走向衰落，君主专制集权日趋强化，平民社会地位有所抬升，因此主观判定中国社会内部已然萌生走向近世政治形态的历史因子，明确认为中国的未来必将是共和政体。“民主力量正逐步发展，贵族阶级的复兴已绝无可能，因此，中国最终也只能走向共和政治，别无他途。”^[16]然而，内藤湖南并未对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走向共和政治抱有信心。他声称，中国社会中乡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乡团缺乏国家认同，“地方父老本就不格外重视国家独立与爱国精神，只要乡里安宁、宗族繁盛、生计无忧，他们便会柔顺服从任何外族统治”^{[16] 297}，因而难以形成支撑共和政治的公共意识。基于这一判断，内藤湖南进一步将辛亥革命后政治困局的原因归结为革命党人脱离中国社会现实。他认为，革命党人忽视中

国社会内在结构与民众基础，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的国民性，未能掌握“赢得父老欢心”的秘诀，仅凭激进理想推进政治变革，最终难以获得基层社会的支持^{[16] 296-297}。可见，内藤湖南虽然承认中国历史发展存在走向共和政治的可能，但又否定中国具备自主实现共和政治的社会条件。

内藤湖南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削弱中国主权国家形态的主张。在政治上，他鼓吹所谓“国际共管论”，宣称“对于支那民众而言，只要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都统政治反而是最为幸福的状态”^{[16] 296}。在领土上，内藤湖南反对“五族共和”，主张中国放弃满、蒙、藏等地区，应缩减为所谓“纯粹的汉地本部”，宣称“对于支那这样的国家而言，并无必要固守清末遗留的疆域，维持所谓‘五族共和’的格局。蒙古、西藏等地，非但无助于维系支那财政，反而会成为其负担；此时不如主动剥离此类地区，仅以纯粹的汉地本部为基础实现统一，或许才是支那的幸福事”^{[16] 461}。在国防问题上，内藤湖南提出所谓“放弃国防论”，宣称“具有深刻识见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明确，未来二十年间，支那绝无国防建设的必要”^{[16] 380-381}。这一系列主张系统否定了中国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标志着内藤湖南中国史观开始由对“现实中国”的否定走向对“现实中国”殖民的逻辑。

五四运动之后，内藤湖南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国家与民族能力的否定，美化日本侵略行径。他叫嚣，“我的国际管理论，与其说是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6] 154}，并妄称中国人民的“排日风潮既非源于支那民众的爱国心，亦非出于公愤，完全是煽动的结果”^{[16] 489}。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湖南将中国人贬低为“如同蚯蚓之类的低等生物”，妄称中国“即便被切断一部分，其余部分也毫无感知，依旧能够独立存续”^{[16] 499}。他还扬言日本参与中国革新和东洋文化中心的转移是东洋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声称文化中心的转移“并不拘泥于国民或地域的界限”，日本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根本不足为奇”^{[16] 509}。他甚至将日本侵略中国包装为所谓“帮助中毒的中国解毒的过程”。此外，他故意曲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而为现实中的侵略行为提供说辞。他声称：“若未经历五胡十六国的冲击，早已在王朝循环中走向衰亡。正是这些充满活力的新民族的融入，为支那注入了新的生机，促成了唐代文化的再度繁荣……近代论者多将外族侵略视为支那的不幸，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支那文化的长期存续，恰恰得益于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带来的冲击与革新。”^{[16] 512-513}他妄称对中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保障日本国民生存权”，是“以力量争取生存是正当的主义”，而中国地大物博却“暴殄天物”“坐拥资源却未能善加利用”，因此“理应成为被侵略的对象”^{[16] 513}。他进一步以“开凿水渠”的说辞谎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履行帮助中国的天职”，途中动用武力只是挖掘巨石的“斧凿炸药”，并不能视为目的^{[16] 514}。至此，内藤湖南已不再停留于对“现实中国”的否定，而是进一步以“中毒论”“文化中心移动说”与“日本天职说”为幌子，为日本对华侵略提供说辞，其中国史观最终走向殖民主义。

三、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危害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并非封闭在书斋里的清谈，而是以“学术研究”为外衣，在学术、政治层面造成了实质性危害。其不仅在学术领域误导研究范式、污染学术生态，更在政治层面为侵略扩张与分裂行径提供理论说辞，对中国历史认知、国家主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成深层冲击。

（一）学术层面：误导研究范式并滋生错误史观

一是误导了后来学者的研究范式。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凭借看似严谨的史料梳理与“新颖”的论述框架，以长时段历史解释为包装迷惑了一些中外学者。一些学者忽视其学术建构本质上服务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霸权叙事的现实目的，进而不经意间陷入其暗含的殖民主义历史逻辑。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宣称：“本书是站在支那的立场、替支那考量而写成，缺少从外国——譬如我国日本这类受中国局势牵动诸多利害的国家——视角出发的议论。”^{[16] 294} 内藤湖南打着为中国考虑的旗号，使其理论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被创元社合为一本刊行，仅在十天之内就重印了10版^[17]。可见，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理论资源。

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对当今学界影响较大，有的学者在学术上肯定其在把握唐宋社会转型、重构中国历史分期等方面的学术意义，却未能触及该理论背后的政治立场与现实指向，未能揭露其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意图。内藤湖南首先炮制“唐宋变革论”，宫崎市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宋朝近世论”，这套学说在海内外学界有一定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宫崎市定的时代区分论基于世界史的立场，重视古代、中世、近世时期中国与各地域的文化交流”^[18]。还有研究者认为：“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义。‘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19] 有人甚至提出“只研究其学问，不涉及其政治”的论调。这种看似客观研究学问的态度，实际上完成了对内藤湖南殖民思想的“无害化”与“经典化”，但忽视了其学说背后的政治立场，没有“充分批判其政治观点和史学观点中的糟粕”^[20]。有的研究者沉浸于“宋代近世说”带来的“范式突破”，不自觉地剥离了该理论产生的政治语境，从而沿用其问题意识与观察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

二是为各种错误史观提供思想资源。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并非孤立的学术观点，而是一系列错误史观的思想源头。其“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以“中国衰落，日本兴起”为预设，将“中国”狭隘地等同于“汉族中国”，否认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制造民族的二元对立。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正是这种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他将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称为“北狄”，声称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是与汉族敌对的“外族”，妄称整个东亚大陆的历史是以长城为界的中原汉族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历史，还妄称“两个人种之间呈现的敌对关系是没有变化的”^[21]。这种将边疆民族与“中国”相分离的思维方式进一步被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吸收，发展为“征服王朝论”——将辽、金、元、清等王朝界定为外在于“中国”的“征服政权”。“征服王朝论”本质是西方殖民史观与日本军国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产物，核心在于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否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22]。这一错误解释框架持续影响西方学界，形成了可统称为“内亚史观”的学术思潮。“内亚史观”以“农耕—游牧”“中原—内亚”的三元对立模式解释中国历史，刻意夸大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差异性。进入21世纪后，西方“新清史”学派进一步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与“内亚帝国”属性，试图割裂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传承，将清朝塑造成游离于“中国”之外的“内亚政权”。对此，有学者指出：“如

果向前溯源可以发现,关于清史的所谓‘新’观点或‘新清史’观,不过是‘内亚史观’或‘王朝征服论’的延续。”^[23]这一系列错误史观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共同特征都在于制造民族对立、歪曲历史、割裂民族联系、否定共同历史记忆,试图达到分裂国家、削弱民族凝聚力、否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的。“‘满蒙史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观’等,制造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二元对立的虚假历史,并试图将他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离出去,肢解历史中国。”^[24]

(二) 政治层面:服务于侵略扩张并试图解构中国

一是炮制“中国老朽停滞论”,为列强干预中国内政、侵蚀国家主权提供借口。内藤湖南所谓的“国家树龄论”将中国描述为进入“老年期”的文明,诬称中国政治制度腐朽、社会结构停滞、民族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甚至鼓吹“纵使中国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25]。他妄称,中国只需要从事“文化艺术”,政治上交给外部力量“扶助”与“管理”。对此,有学者批评道:“‘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26]内藤湖南关于“中国衰老停滞”“中国无力自救”“国际共管论”的论调,为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侵占中国领土提供了理论资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当日,内藤湖南就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关于满洲国的建设》一文,为日本政府如何加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而摇旗呐喊:“这次建立的新国家,并不是在军国主义的企图下建立起来的,而是要在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世界民族共同的乐园。”^{[16] 170}日本军部将侵略行为包装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恢复东亚秩序”的“合理行动”,日本借此侵占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在华特权。其结果不仅导致中国大量领土沦陷,更造成3500万军民伤亡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内藤湖南提出的“国际共管论”与当时西方列强的“门户开放”论调高度契合,客观上强化了“中国问题国际化”的殖民逻辑。英国等列强也以“保护利益”“维持秩序”为名强化对中国边疆与经济的控制,导致中国的国家主权被不断切割。这种论述消解了中国自主现代化的政治正当性,严重阻碍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进程,使“依附西方”“全盘西化”等思潮在晚清民国时期获得传播空间,打击了国人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华民族自我发展的信心。

二是鼓吹“满蒙藏放弃论”,妄图瓦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藤湖南明确反对“五族共和”,声称中国应当“收缩疆域”,放弃边疆民族地区。内藤湖南刻意夸大民族差异,宣称汉人“无法真正平等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并声称蒙古、西藏等“只是服从满洲天子,而非认同汉人国家”,清朝灭亡后,满、蒙、藏“自然脱离中国”^{[16] 339-340}。他将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简化为“支配服从”的关系,将统一多民族国家人为拆解为“汉族中国”与“边疆异域”两部分,否认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所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种论调不仅歪曲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有意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为外部势力介入中国民族事务提供思想资源,更深层的危害是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深受内藤湖南影响。“内藤湖南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广为人知的诸见解,比如缺乏爱国心、满洲以及蒙古应该从中国本土分离、中国的国际管理等观点对石原莞尔影响很大。”^{[9] 295}1932年,日本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在《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中叫嚷,满

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27]，企图以“民族自决”为名将东北永久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还不断推动所谓“蒙古自治运动”，试图建立受其控制的缓冲地带。在此影响下，部分地方势力借民族矛盾进行政治操弄，边疆地区离心倾向加剧。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边疆安全遭受巨大冲击，使当时的部分人士对边疆地区形成疏离认知，削弱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认同。

时至今日，西方部分反华势力仍借用类似“民族压迫”等叙事炒作民族问题，部分美西方智库在评估中国民族政策时经常“将人权议题政治化、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并将其塑造为国际舆论的核心争论点之一”^[28]。其思想源头与内藤湖南的民族二元对立逻辑存在明显关联。内藤湖南对民族关系的刻意割裂，不仅破坏中国的国家整体认同，也对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构成持续性政治威胁。内藤湖南的错误史观也成为“台独”分裂势力进行理论建构和思想动员的“毒源”之一。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台独”史观，妄图进一步将“台湾认同”进阶为“反中”“仇中”的“台独”认同，为其“务实台独”路线制造民意基础^[29]。“台独”史观妄图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人为割裂出去，消解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历史认同，进而以虚构的“台湾认同”置换中国认同，服务于“台独”政治目标^[30]。这种以虚构历史煽动民粹、解构国家认同的行径，不仅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使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面临严峻挑战。

四、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学理批判

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学理谬误贯穿始终，在逻辑上背离唯物史观、结论先行；在方法上套用西方分期、割裂中国历史连续性；在民族认知上狭隘化理解中华民族，刻意解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内藤湖南的史学体系从根基上就不具备客观性与科学性，其本质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一）逻辑起点批判：结论先行背离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1]这意味着历史研究必须立足客观史实、整体史事与历史发展规律，尊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连续发展和不断革新的统一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应当源于史实的整体梳理与客观推演，而非主观预设与政治剪裁。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表面是“以中国的漫长历史为主要依据”^[32]，并断言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历史本身”，是“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看似客观的学术研究，实际是为侵华的政治目的服务，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在“宋代近世说”中，内藤湖南先预设“中国已进入衰颓阶段、需要日本介入帮扶”的结论，再对宋代社会的历史现象进行片面解读、刻意筛选，将本应体现社会进步的史实歪曲为衰落征兆。宋代平民阶层崛起、科举制度的完善打破了门阀垄断，平民获得更多上升通道，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市民文化，社会流动性与活力显著增强，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但内藤湖南将其定义为衰颓，“平民时代大体上也就接近于民族生活的衰颓期”^{[32]7}。他牵强地以人的生命周期类比国家发展，声称民族“有幼年期、青年期，然后还有衰老期”^{[32]114}，认为民族同样经历由盛转衰的

不可逆过程。他之所以如此叙述，是因为需要推导出“老朽”的中国需要“年轻的日本”来“帮助”的结论：“对于支那这样一个并非稚嫩、反而是已然‘老朽’的国家而言，其政治及其他制度的革新，绝非当下流行的民族自治方针所能实现。正如老人需要年轻人的搀扶，中国这样的国民，其统治核心中也必须引入外国人的参与。”^{[16]51}内藤湖南为了适配“中国衰颓”的预设结论，回避宋代社会进步的大量史实，刻意忽视商品经济繁荣、科技发明众多、文化昌盛等进步方面，强行借用生命周期类比，刻意放大所谓“衰颓”的历史表象，为预设结论寻找虚假的逻辑支撑。

在“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内藤湖南依据赵翼的“地气说”强调中国文化中心由关中向江南再至沿海的转移，并据此推论文化中心并不受地域与民族限制，从而得出日本亦可成为“东洋文化中心”的结论。然而，赵翼“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的论断本意是解释中国境内不同地域间文化发展的消长变化，其核心始终是在统一中国历史框架内解释文化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主体的转移，更不意味着“中国文明可以脱离中华民族而存在”。但内藤湖南为适配自身预设结论，刻意割裂赵翼论断的原始语境，将中国境内的文化地域移动，强行延伸为“文化中心不受地域与民族限制”，进而得出日本将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的结论。其本质上是对史料的歪曲借用，他只选取了“文化中心会移动”这一信息，这种取证方式并非客观的史料梳理，而是为预设结论量身定制的“选择性摘取”。

（二）方法论批判：以西方历史分期框架割裂中国历史

内藤湖南以西方历史分期框架解释中国历史，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以西方历史分期作为参照，脱离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他虽声称“余之所谓东洋史，即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33]，却刻意忽视了中国文化一直连续发展的事实，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西方历史分期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欧洲色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34]。这一分期体系所对应的是欧洲社会由古典文明崩溃、封建割据形成、宗教统治强化，再到资本主义兴起与民族国家形成的断裂式历史进程，其核心特征在于社会形态的剧烈更替与文明结构的阶段性断裂。中国虽然历经王朝更替，但中华文明始终延续不断，尤其是秦汉确立大一统国家形态后，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体系等基本制度框架长期延续，从未发生社会形态的剧烈更替。《汉书》记载：“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35]这标志着中国自秦代起就确立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宋代虽有制度层面的调整与完善，但始终是在既有大一统框架内演进。中国也有学者指出唐宋两朝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所说的差异并不是社会形态发生了变革。“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36]这同样表明唐宋之际的变化属于制度内部的“因革损益”，而非社会形态的断裂性跃迁。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能脱离中国自身文明结构而简单套用欧洲历史范式。因此，中国的形成“不宜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为基准或尺度简单理解”，应当在中国历史中理解中国，即在中国自身历史脉络中把握中国的演进^[37]。内藤湖南的分期理论本质上并非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归纳，其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三）民族观批判：将中华民族简化为单一民族

内藤湖南将“中国”狭隘地等同于“汉族中国”，从而割裂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观违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也割裂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内藤湖南宣称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地不会归顺新生的共和政府，这些地区抗拒汉人统治^{[16] 449}。他甚至妄言：“随着中国政府日益走向民主化，其对异民族的统辖力也必然持续衰减。今日所谓‘五族共和’，事实上已近乎失去意义。”^{[16] 340}内藤湖南声称，蒙古族等民族之所以接受中国统治，不过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蒙古人及其他族群愿意放弃部分独立的名誉、接受支那封爵并长期臣服，本质上都是基于这种经济利益的考量”^{[16] 340}。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将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简单解读为利益交换。正如有研究认为：“内藤湖南并不认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仅将汉族聚居区视作‘中国本土’，并认为该区域终将统一、不会‘南北分治’”^{[25] 171}。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汉族单方面主导的历史，而是汉族作为起凝聚作用的核心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并非以绝对的族群边界区分“华”与“夷”，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政治、文化与血缘等多方面的联系。“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38]，“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38] 3502}。各民族的关系并非像内藤湖南所说的“汉人仍以自身文明为傲，倚仗自身能力，即便名义上统辖五大民族，也难以真正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与文化、将其与自身平等对待。汉人理想的本质，不过是以自身为中心，让其他民族依附并接受统治”^{[16] 338-339}。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9]这一论述明确表明，中国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基础，不是单一民族的血缘同质性，而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

五、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的学理应对

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与话语体系构建起步偏晚，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对于自身历史解释的话语主导权不足，使得日本以及西方学者借以中国历史构建出带有明显殖民立场的一系列错误中国史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代日本右翼否定侵华历史、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在涉台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思想内核与历史逻辑上深受以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国衰老论”“满蒙非中国论”为代表的近代日本侵华史观的深刻影响，是这一殖民霸权史观的延续与变种。因此，应对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各种错误中国史观，需要溯源纠偏，着力筑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基。

（一）加快构建中国自主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一是夯实史料基础，建构自主完备的史料体系。一方面，构建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系统整理汉文典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考古遗存、碑刻文书与口述史料，形成多语种、多形态、可互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资源库；编纂中华民族通史、民族关系史与边疆治理史，依托翔实史料还原各民族共生共居、互鉴互融的发展历程，展现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明、共同培育民族精神的客观史实，从史实层面驳斥内藤湖南错误史观及其衍生的“征服王朝论”“满蒙非中国论”“崖山之后无中国”等分裂论调，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以确凿史实捍卫国家主权，驳斥内藤湖南边疆割裂论调，驳斥日本右翼美化殖民、将侵略行径合法化的错误叙事。搭建中国台湾史、中日关系史专题史料库，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日联合声明》等国际公约与历史档案为核心依据，确凿佐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有力戳破日方借所谓的《旧金山和约》歪曲台湾归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谬论。

二是强化话语建构，打造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解释力的自主话语体系。一方面，立足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与中华民族自身演进脉络，提炼“多元一体”“大一统”“石榴籽”等本土化、原创性概念，构建“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中国疆域不容分裂”的自主话语框架。对内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对外秉持中国立场、遵循中国逻辑、运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疆域主权归属的客观史实。另一方面，对内阐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戳穿日本右翼抛出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文化亲缘论”等分裂论调；对外依托本土原创叙事，揭露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篡改侵华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我们要加快构建自主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解构西方话语霸权^[40]，如此才能牢牢掌握历史阐释主导权，破除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以及日本右翼歪曲事实的受害方叙事。

三是推进理论创新，构建体系完整、能够回应现实挑战的自主理论体系。一方面，立足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演进与近代自觉凝聚的历史实践，根植各民族交融共生、大一统格局长期延续的客观史实，把鲜活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为系统化、学理化理论成果。科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内在架构、精神内核与发展规律，针对性回应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错误史观，揭露其背后的殖民立场与分裂本质，明晰其割裂文明脉络、拆解民族整体、侵蚀国家疆域主权的真实企图。另一方面，以本土原创理论为思想利器，剖析内藤湖南错误史观与日本右翼思潮的思想同源关联。其所谓“中国文明趋于衰朽、依赖外部力量重塑文明”的论调，是当下日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思想渊源；其拆分国土、觊觎边疆的主张，与当代日方借涉台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逻辑相通、诉求趋同。需要依托理论创新夯实学理根基，为守护历史真相、维护国家领土统一、驳斥右翼挑衅行径筑牢理论支撑。

（二）秉持唯物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一是坚守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夯实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科学根基。始终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从研究方法筑牢根基、理论层面深挖内涵、社会层面普及认知，全方位塑造并传播正确的中华民

族历史观,稳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1]依托这一基本原理开展民族历史研究,紧扣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物质根基,梳理各民族经济互补往来、政治一体整合、文明互通互鉴的历史实践。依托实证研究驳斥内藤湖南刻意割裂民族关联、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的谬误,从学理层面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逻辑,让历史认知依托科学史观建立。坚决摒弃内藤湖南“结论先行、选择性取证”的错误研究范式,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确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严谨性,从源头杜绝错误史观的蔓延传播。

二是依托唯物史观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凝聚全社会正确历史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42]以唯物史观统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释,结合“五个共同”“四个与共”核心理念,面向全社会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教育。坚持多管齐下拓宽宣传教育路径,纠治内藤湖南错误史观衍生的各类历史认知偏差,凝聚正确历史共识、筑牢国民历史认知根基;牢牢把握校园教育核心阵地,把正确历史观融入教材编撰,贯穿历史、思想政治等课程教学,筑牢青年群体历史认知底线;借助专题宣讲、学术交流、文博展览等线下载体,面向社会群众开展精准解读历史渊源、疆域沿革与民族交融史实;借力新媒体传播渠道,以短视频、图文科普、历史影像等通俗直观形式阐释中华民族演进脉络,还原各族血脉相依、休戚与共的史实。

(三) 强化学术实践,在对话与交锋中增强中国话语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一是主动开展平等学术对话,积极驳斥错误史观。以内藤湖南错误史观为核心靶点,联动批判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在国际学界澄清历史谬误。当前,内藤湖南的错误史观依旧盘踞于国际汉学、东亚史研究领域,日本右翼学者借“学术争鸣”之名否定侵华史实、歪曲中国台湾历史、宣扬分裂论调。要立足客观历史事实,深化中华民族史、边疆史、台湾史等研究,依托我国自主构建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主动与沿袭错误观点的海外学术流派开展平等对话、理性论辩。如可通过举办高水平国际研讨会、专题论坛、联合研究等交流平台,在对话中澄清历史谬误,破除内藤湖南及其追随者制造的“民族对立”“领土割裂”观点,揭露内藤湖南中国史观的殖民立场与分裂本质。与此同时,系统批驳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质疑东京审判、虚化一个中国原则的荒谬言论,在国际学界正本清源、匡正认知,挤压错误思潮传播空间,切实增强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

二是提升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能力,拓宽传播路径与渠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43]当前,中国史学声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依然存在。日本右翼借助西方话语体系,将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包装为“客观学术观点”、将侵华罪行歪曲为“历史争议”、将涉台问题炒作成“国际议题”,致使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各类错误中国史观借助西方话语体系持续传播,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对此,要把本土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国际通用学术表达,推进史学经典著作多语种译介发行,推广《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外文版本,搭建中外历史认知互通桥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论坛、海外考古项目,主动设置学术议题,

推动中国史学主流观点、核心理念广泛传播。同时,依托跨文化交流平台与新媒体载体,以短视频、纪录片、专题讲堂、数字展馆等鲜活形式,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两岸血脉相连的客观事实以及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责。提升边疆史、民族史研究国际影响力,为批驳错误史观、守护历史真相、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凝聚全民族共识筑牢坚实支撑。要从学理上系统揭示内藤湖南中国史观本质是服务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插手台湾事务是公然违背战后国际秩序、背弃人类道义良知的错误行径。

六、结语

内藤湖南的错误中国史观绝非纯粹的学术观点,而是近代日本国家转型与对外扩张背景下催生的思想产物。从深层维度审视,内藤湖南错误中国史观所折射的并不仅是个别学者的认识偏差,更是近代以来国际学术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知识逻辑。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往往被置于“被观察”“被定义”“被解释”的位置,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逻辑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结构,长期被纳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以及“农耕—游牧”“汉族—少数民族”等二元对立范式之中进行裁剪与重构。无论是“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还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的“新清史”叙事,其核心都在于通过切割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消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进而削弱中国历史叙事的主体地位。对错误史观的辨析与批判,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的理论争鸣,更关系到国家历史叙事权、国际话语权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虽聚焦批判内藤湖南中国史观中的殖民主义逻辑,但并不否认其在具体史料整理与版本考订方面的学术价值。不过,内藤湖南考据方法与政治结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关联,方法上的精湛掩盖不了结论上的错误,而考据再精细也无法为错误的政治论断正名。当前尤其需要剥离其殖民叙事框架,在批判中有辨析、在扬弃中求超越。

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与国际舆论竞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近代日本殖民史观的现实影响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新的话语形式持续存在。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刻意淡化甚至否认侵华战争历史,在历史教科书修订、靖国神社参拜以及战争责任认知等问题上持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其背后仍延续着近代以来“文明优越论”与“中国衰弱论”的思想惯性。与此同时,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不断炒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论调,其背后同样隐含着近代以来将中国边疆与中央政权相割裂的认知逻辑。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学术环境与舆论斗争,若仅被动驳斥零散错误观点,无法根除殖民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渗透,必须立足客观历史实情,加快构建具备主体性、原创性、国际阐释力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只有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在开放的国际学术对话中不断增强中国历史叙事的解释能力与传播能力,才能真正突破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史观的话语束缚,牢牢掌握中国历史解释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历史认知基础与思想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J]. 求是, 2021(7): 4-17.
- [2] 李华瑞. 走出“唐宋变革论”[J]. 历史评论, 2021(3): 76-80.

- [3] 林鹄. 打扮中国历史, 为日本扩张“护航”——内藤湖南批判[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5(6): 5-39.
- [4] 廖靖靖.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审“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错谬[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3(3): 25-38.
- [5] 姜维公.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坚决抵制国外错误史观[J]. 中国民族, 2024(5): 12-14.
- [6] 张仁枫. 西方伪史观的国家安全威胁与唯物史观批判应对——以“新清史”“内亚史观”为靶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5): 199-211.
- [7] 卢旭东, 陆惜.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全链条解构与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6): 182-192.
- [8] 罗玮. 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J]. 历史评论, 2021(4): 73-77.
- [9] 傅佛果. 内藤湖南: 政治与汉学(1866—1934)[M]. 陶德民, 何英莺,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60.
- [10] 内藤湖南.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M]. 刘克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6-7.
- [11] 内藤湖南. 燕山楚水[M]. 吴卫峰,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82-183.
- [12] 内藤湖南. 日本文化史研究[M]. 储元熹, 卞铁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
- [13] 钱婉约.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40.
- [14] 内藤湖南全集: 第4卷[M]. 东京: 筑摩书房, 1971: 426.
- [15] 内藤湖南, 冈崎文夫. 京都中国通史[M]. 李雨桃, 熊心梅, 曹京柱, 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22: 872.
- [16] 内藤湖南全集: 第5卷[M]. 东京: 筑摩书房, 1972: 328.
- [17] 子安宣邦.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M]. 赵京华,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148.
- [18] 李济沧. “宋朝近世论”与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7(5): 77-86.
- [19] 柳立言. 何谓“唐宋变革”?[J]. 中华文史论丛, 2006(1): 125-171.
- [20] 郑庆襄. 政治还是汉学: 内藤湖南的重现[J]. 中国图书评论, 2017(12): 93-97.
- [21] 李路. 白鸟库吉鼓吹“南北对立”意欲何为?[J]. 历史评论, 2025(4): 51-55.
- [22] 赵发, 李勇赛. “征服王朝论”的危害谬误与批评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1): 236-249.
- [23] 王延中.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 历史研究, 2022(3): 22-32.
- [24] 卜宪群.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J]. 求是, 2025(20): 63-67.
- [25]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1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77.
- [26] 黄艳. 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55-64.
- [27] 复旦大学历史系.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1931—1945)[M]. 第2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65.
- [28] 陈奕平, 龚健. 美西方智库涉华民族议题的舆论生成机制与中国话语叙事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5): 105-117.
- [29] 伍俐斌, 林卓立. 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的做法、危害与反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6): 142-155.

- [30] 陈思.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82-96.
-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32] 内藤湖南. 东洋文化史研究[M]. 林晓光,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53.
- [33] 内藤湖南. 中国史通论[M]. 夏应元, 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41.
- [34] 雷海宗. 雷海宗史论集[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22.
- [35]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542.
- [36]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76.
- [37] 葛兆光. 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4-35.
- [3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483.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 第2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 [40] 王军, 陆心宇. 西方全球治理话语霸权的理论祛魅与实践批判——以“脆弱性国家”话语的生成与异化为例[J]. 探索, 2025(6): 46-59.
-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9.
- [42]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N]. 人民日报, 2014-07-08(1).
- [4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 人民日报, 2024-09-28(2).

责任编辑: 刘泮菡 校对: 杨稀琴

国际教育排名中的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生成机制、全球困境与调适重构

陈 奇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国际教育排名已然成为当代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评价机制，但其并非中立的测量工具，而是推行西方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的隐蔽权力装置。国际教育排名通过指标政治、语言垄断与数据守门等嵌套机制运作，将所谓的西方学术标准塑造为“全球规范”，迫使非西方国家在全球知识生产中处于依附地位。此类做法引发非西方国家知识生产的结构性危机：知识主体消解，本土问题与理论被边缘化；智力依附加剧，人才单向流动固化“中心—边缘”格局；学术生态扭曲，绩效主义催生学术成果短平化与同质化，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断裂。面对困境，全球南方国家从认知觉醒、制度突围和自主建构维度展开递进式探索，中国以“三大体系”建设为起点，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转型，为突破依附陷阱提供中国参照。多元实践图景揭示，对抗指数霸权的关键在于打破单一评价垄断。应在价值、语言、平台、人才方面协同推进，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学术新秩序，在自主与开放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最终实现基于认知正义的知识共同体。

关键词：国际教育排名；学术殖民；指数霸权；学术话语权；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174-16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4.014

作者简介：陈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陈奇. 国际教育排名中的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生成机制、全球困境与调适重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174-189.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以来,国际教育排名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评价机制。欧美国家主导的排名体系,不仅为公众提供大学表现的可视化参照,更深刻重塑各国高校的战略规划与办学理念。排名从最初的信息工具演变为具有规训力量的全球治理技术,不仅定义着“何为优秀大学”“何为重要研究”,还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追求排名提升意味着内化西方主导的学术规则,从而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陷入依附地位。在全球性学术治理与话语权力结构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面临独特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挑战。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2026 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3]。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然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学术议程。然而,追求学术自觉与全球排名主导的评价体系之间存在张力。解决这一矛盾,需认清国际教育排名是不是客观反映实力的“测量仪”以及主动建构知识生产规则的“塑造者”。

表面上看,排名通过数据化呈现科研产出、学术声誉等指标,看似是中立工具。然而,美西方国家依托其构建的制度性话语霸权,将国际指数排名异化为推行认知战的战略武器^[4]。其指标体系设计、权重分配、数据来源蕴含着特定价值预设与知识立场。排名在塑造大学行为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学术领域的权力不平等,具体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主流与边缘知识体系的等级化差异。排名以看似去政治化的技术语言,实现对全球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垄断与规则制定权控制,形成“指数霸权”,即通过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实现对排名领域的行为规训与话语支配。美国及其盟国仍然控制着世界顶级核心期刊名录、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话语权,以西方标准主导全球知识生产体系^[5]。理解国际教育排名的权力逻辑,需置于殖民主义历史延续中审视。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者建构的教育系统“在显性层面,通过制造语言壁垒,将土著语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排除在学术话语体系之外;在隐性层面,通过‘文明化’标准进行筛选,要求受教育者割裂其文化根基以换取教育资源”^[6],由此奠定西方知识优越性神话。二战后,领土殖民终结,但更隐蔽的“学术殖民”悄然形成。学术殖民即特定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其他国家学术活动和知识体系构建传播工作的控制、操纵和置换,并对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学术话语、知识构建、教育教材、媒体舆论、知识精英、国民观念乃至政府行为产生严重影响^[7]。国际教育排名既是国家治理大学的工具,又能发挥议程设置功能,还作为分区技术强化着地区高等教育的跨境合作与集成化发展^[8]。正因如此,它早已超越一般评价工具,成为当代学术殖民中典型的权力装置。

国际教育排名承载着复杂权力意涵与治理功能,其引发的学术争议与理论探讨日趋深入。国内研究在重点探讨其演进规律、功能属性及社会风险、揭示其面临信任危机的同时,也提出了坚守中国立场、构建自主发展路径的学术主张。回溯历史演进脉络,国际教育排名经历了从学术研究成果到市场化评价产品的转变,随后被制度化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工具,最终被异化为高等教

育发展的政绩目标与管理工具^[9]。当排名从学术工具演变为治理技术,其政治属性愈发凸显。尤其是排名日益嵌入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对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逐渐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叙事深度绑定^[10]。这引发学界高度警觉,学者揭露排名的奇观化潜藏着排名社会失范、高校主体失位、大学内涵失落等三重迷思^[11],直指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12],呼吁打破世界大学排行榜符号暴力^[13]。在批判的同时,也有学者建议理性客观看待中国高校和学科的国际排名的上升趋势^[14],并建议以排名体系信誉崩塌为契机,推动科研体系向追求原始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转型^[15]。既有研究多聚焦外显影响,较少揭示排名作为知识实践的社会建构性、认知暴力机制及全球学术生产不平等结构,也未能从全球南方经验中汲取有益资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启示。尽管学界已形成相对清醒的认识,但仍需要承认的是,当前中国尚未掌握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与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16]。为此,本文剖析国际教育排名所隐藏的知识权力形态及其对非西方国家知识体系的深层影响,探索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全球知识共同体走向公正与多元的可行路径。

二、机制剖析：指数霸权的运作逻辑

指数霸权的运作逻辑根植于国际教育排名与全球学术评价体系的结构性权力网络之中。其核心机制表现为三个相互嵌套的层面：指标政治层面，通过高度选择性的指标体系，将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路径包装为“国际公认”的评估尺度，实现标准认定的话语霸权；语言垄断层面，以英语为底层逻辑，将语言优势转化为学术评价的准入门槛，构筑排他性的语言霸权；数据权力层面，依托商业引文数据库与学术期刊的“守门人”角色，将自定义的规范框架嵌入知识生产、传播与评价的全流程。三者相互强化，共同塑造全球学术生产的依附性结构，使非西方国家在追逐国际排名的过程中，不得不接受西方预设的学术规范与价值标准。

（一）标准的认定：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指标政治

国际教育排名的核心权力来源，在于其认定“何为优秀大学”的话语权。话语权的确立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过程，而是通过高度选择性的指标设计，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学术传统制度化。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与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等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并非预先存在且普遍认同的质量共识的操作化表达，而是通过指标选择、归一化处理与加权汇总等设计决策，编码特定的规范假设”^[17]。指标设计逻辑表面上追求“客观量化”，实则深植于西方学术传统与价值偏好。

QS排名的指标设计以学术声誉（30%）与雇主声誉（15%）为核心，辅以师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比例等^[18]。其逻辑在于将“声誉”这一主观感知量化为首要依据，而声誉调查对象集中于英语国家的学者与跨国企业，此类群体天然熟悉英美名校，导致非西方高校即便在本国或区域内成就斐然，也难以获得同等程度的认知积累。此外，师生比例、国际化程度等指标，直接偏向资源高度集中且早已深度嵌入英语学术圈的高校，使得西方大学在结构上占据先发优势。

THE排名的指标体系更为复杂,涵盖学习环境(29.5%)、研究环境(29%)、研究质量(30%)、国际展望(7.5%)与行业收入(4%)^[19]。其中,“研究质量”主要依赖基于爱思唯尔 Scopus 数据库的引用影响力,而 Scopus 收录的期刊以英文为主,且优先覆盖欧美出版机构,致使非英语国家、非西方学术传统的研究成果在计量上被低估。“学习环境”维度中的“教学声誉”权重占15%,同样存在语言、地理与文化网络的不对等,调查问卷的发放范围与回收率高度集中于西方学术圈,使得非西方高校难以进入评估视域。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则更为直接地体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评价逻辑。其关键指标包括全球研究声誉(12.5%)、区域研究声誉(12.5%)、出版物(10%)、书籍(2.5%)、学术会议(2.5%)、标准化引用影响(10%)等^[20]。该排名高度依赖科睿唯安(Clarivate)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并将“高被引论文”与“高被引学者”作为关键权重。该设计将“学术影响力”窄化为英语期刊的引用网络,忽略人文社科领域中以本土语言出版的著作、区域性学术会议,以及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成果。更关键的是,“全球研究声誉”与“区域研究声誉”指标重复同样的认知偏见,声誉调查的采样与加权机制默认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权威,非西方高校即便在本土拥有极高的社会贡献度,也因难以被西方学术界关注和认可而在排名中处于边缘地位。

三者虽侧重点不同,但共享一套以英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为隐含范本的评估框架,将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路径,包括精英化师生比、英语主导的学术发表体系、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社交网络等,包装为所谓“国际公认”的评估尺度。它们通过强调“国际化”“引用影响力”“声誉”等概念,将西方高校在殖民历史、语言霸权与学术资本积累中获得的既有优势,转化为可量化的领先地位,迫使非西方高校为提升排名而模仿英语国家大学的组织结构与评价方式。现有的排名逻辑显示,世界大学排名具有霸权性质及服务于跨国精英阶层的功能,也是导致全球高等教育实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排他性工具^[21]。正是通过指标垄断,三大排名掌握定义“何为优秀大学”的标准制定权,使西方学术中心主义在量化排名的外衣下得以延续和强化。

(二) 语言的枷锁: 英语作为全球学术通货的垄断

与指标体系相配套的是英语在全球学术场域中构筑起的语言壁垒。英语已超越单纯的语言交流范畴,演变为学术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国际教育排名的各项核心指标,无论是基于引文的论文发表、国际声誉调查,还是国际化程度评估,均以英语为默认媒介。英语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而是被制度化为学术评价的准入标准,形成隐形的却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语言门槛。

从文献计量的数据来看,英语在学术领域占据的支配地位极为显著。如有研究指出,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 94 种传播学期刊均以英语为学术通用语言,这致使非英语国家研究者在国际发表中面临不平等挑战^[22]。英语论文与其余语言论文呈现悬殊的分布格局,意味着以德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语言撰写的学术成果,无论其在本土学术传统中具有多高的原创性,都难以进入所谓“国际主流评价体系”的视野。

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而言,用非母语完成学术写作本身便构成额外负担,语言的转换不仅意味着时间与精力成本的显著增加,更可能在论证的精确性、修辞的流畅性以及理论表述的深度上构成难以逾越的劣势。在英语国家,英语给学者表述创新成果带来更大便利。使用英语表达供学者选择的传播平台更多、权威性更强、受众面更广,产生的学术影响自然会更大^[23]。语言层

面的结构性不平等,使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在参与全球学术竞争时,被迫承担隐性的“语言关税”,为了获得国际可见性,必须在语言转换中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而代价又往往无法在最终的学术评价中得到充分的承认与补偿。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表达工具,而是思维的组织方式、认知的框架结构以及知识生产的权力载体。英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成为英美文化占领全球传播高地的重要载体,为西方文化霸权提供了便捷工具,这也导致无法掌握英语的人被动地站在了西方自诩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对立面^[24]。当英语被确立为学术评价的通用语言时,与之相伴的并非仅仅是词汇与语法的转换,而是英语学术共同体长期沉淀下来的认知惯习、问题意识、理论偏好以及研究范式的整体迁移。非英语国家的学者若要在国际期刊上获得发表机会,便不得不在研究议题的选择、理论资源的调用、论证方式的组织乃至结论的表述风格上完成自我调适,以契合英语学术圈的隐性期待。这一过程在无形中完成知识生产规范的“标准化”,却使非西方学术传统中独特的概念体系、方法论路径以及本土知识关怀面临边缘化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英语作为学术通货的垄断,其本质并非单纯的语言优势,而是嵌入评价制度的知识权力。它通过语言门槛的隐性筛选,重塑全球学术生产的规范与边界,使非英语国家的学术共同体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时,不得不以让渡部分学术自主性为代价,换取在既有评价体系中的可识别性。

(三) 数据的权力: 数据库和期刊的“守门人”角色

知识权力的渗透并非显性的强制干预,而是假借学术基础设施悄然实现,其中商业引文数据库与学术期刊构成全球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守门人”。以 Web of Science、Scopus 为代表的商业引文数据库,以及隶属于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西方商业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共同织就了覆盖全球学术领域的评价网络。由西方商业机构主导构建的学术基础设施,以“国际科学标准”为外衣,将自定义的规范框架嵌入学术生产、传播与评价的全流程,塑造全球学术生产的方向与形态。

“守门人”的权力,首先体现在数据库收录规则所内含的价值判断与准入壁垒上。Web of Science 的核心期刊目录由专属的“选刊委员会”负责审定,其标准表面上围绕出版规范、编委构成、引用数据等技术性指标展开。然而,实际操作中的筛选标准则向英语期刊与西方出版机构倾斜。非英语期刊、非西方出版机构主办的期刊,即便在本土学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也往往因语言壁垒、编委构成不符合西方预期等原因,难以进入核心数据库的视野。

以拉丁美洲为例,该区域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在全球学术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主要受到以下“守门人”机制禁锢。一是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高影响力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多由来自英语国家精英大学的学者主导,他们决定什么知识具有“合法性”,从而将在其他情境或语言中产出的研究边缘化。二是全球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等商业数据库偏向收录英语期刊和 STEM 领域,对资源较少国家的期刊代表性不足。三是开放获取出版带来新的不平等。审稿费成为经济“守门人”,使得资金不足的拉美学者成果发表受限^[25]。期刊收录规则形成刚性的准入壁垒:只有进入核心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才能被纳入全球学术评价体系,获得引用与学术影响力;而未能进入数据库的学术成果,无论其质量、价值有多高,都将被排除在全球学术视野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商业出版集团通过持续的并购整合，形成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少数几家集团掌握全球大部分核心学术期刊的版权与传播渠道。作为逐利型企业，出版集团的运营逻辑倾向于扩大市场份额、巩固竞争优势，其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学术议程的设置权，哪些议题被塑造为“热点”，哪些范式被定义为“前沿”，哪些理论被确立为“主流”，皆由该群体决定。非主流的研究范式、非西方的学术传统、非英语的表达方式，在“守门人”把关下难以获得足够的可见度与认可机会，全球知识生产的多样性被压缩。

“守门人”机制对非西方国家的学术共同体造成难以化解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在国际教育排名中取得竞争力，就必须在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另一方面，要在此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又必须接受西方学术共同体预设的研究范式、理论框架与议题偏好。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使非西方国家的学术发展陷入“依附性创新”的状态，学者们看似在追逐国际前沿，实则始终处于追随者的位置，其知识生产的方向、方法与价值标准，最终由欧美商业出版集团与数据库选刊委员会界定。“守门人”权力的存在，既是指数霸权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又是学术殖民持续蔓延的关键路径。

三、全球困境：知识依附的结构危机

国际教育排名塑造的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不仅在宏观层面重构全球知识生产的权力格局，更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引发结构性危机。非西方国家被迫接受西方学术规则，逐步丧失知识主体性，陷入依附性发展困境。困境沿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其一，知识主体的消解表现为本土问题与理论的边缘化，非西方学者在议题、理论与话语上层层失守；其二，高端人才的单向流动构成隐性的智力依附，通过学术认同与知识规则的全球化复制，固化“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其三，绩效主义导向下的学术生态趋同化，使研究活动日益偏离本土社会需求，坠入短期主义与范式单一化的窠臼。三重困境相互交织，共同构成非西方国家挣脱学术殖民、重构知识体系的根本性障碍。

（一）知识主体的消解：本土问题与理论的边缘化

在学术殖民胁迫下，指数霸权持续消解非西方国家的知识主体性。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为了获得国际学术认可、提升所在大学排名，被迫将研究重心转向符合中心国家学术兴趣的议题，从而导致本土紧迫的现实问题与悠久的学术传统被逐步搁置。知识主体性的消解并非偶然，而是沿着“议题失位—理论失据—话语失声”三个递进层次展开，最终陷入“知识失语”状态。

议题失位表现为非西方国家研究议程中本土问题的边缘化。在国际教育主流排名评价体系中，科研产出指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科研产出的衡量标准又高度依赖英文国际期刊的发表。为寻求在此类期刊上发表论文，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往往被迫顺应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研究热点与理论偏好。在现行评价标准下，聚焦区域特定问题的研究课题或采用本土化方法所得的研究成果，常因与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评价体系下的“主流理论框架或学术议程”未能完全契合而遭受低估，甚至被指斥为“缺乏普适价值”。非西方国家学术界由此陷入认知悖论，本土重大现实问题被边缘化，而西方中心议题则被过度内化与精细推演。诸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区域发展的不

均衡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调适、人口结构变迁的深层挑战等问题，本应构成本土学术研究的首要议题，却在排名压力下被大量学者悬置。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倾尽全力培养兼具历史意识与本土关怀的知识分子，而是日益聚焦市场导向与国际主流范式所驱动的技能训练。学术研究由此与其所植根的社会现实之间形成显著的断裂。

理论失据体现为非西方国家从知识生产者沦为理论依附者。非西方议题的边缘化仅仅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理论创新能力的丧失。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中，理论创新被视为最高层次的学术贡献，但是其创新标准完全由西方学术共同体定义。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发表论文时，通常以西方理论为分析框架，仅用本土经验数据加以验证或修正。该研究范式虽然在形式上呈现“理论—经验”的互动，实际上“西方在全球结构的‘中心’主导了知识的生产与流通，而非西方‘边缘’则沦为科学研究的‘数据供应地’‘知识输入地’或‘知识消费地’”^[26]。学术流动的主流理论“霸权式国际化”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学术体系的依附，侧重描绘学术人员从全球“边缘”到“中心”的流动过程^[27]。在此过程中，西方“中心”知识权力谱系得以强化，同时切断“边缘”区域的知识传统，抑制“边缘”区域向西方“中心”的学术影响力倒流。前者生产过度理论化、缺乏“边缘”区域经验反馈的知识，后者则产出碎片化、缺乏理论深度、盲从“中心议题”而与本土现实脱节的知识。

在议题边缘化与理论依附化的双重作用下，知识主体的消解最终走向最彻底的阶段，即“知识失语”。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实质上却逐渐丧失对在地社会问题的定义权、对本土学术传统的传承力、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能力。学者们虽然能熟练运用西方理论分析本土现象，却难以立足本土视角回应全球议题；虽然能以流利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却难以借助母语展开深度学术思考。部分非西方国家曾尝试通过本土化路径实现知识突围，试图挣脱西方理论所设定的框架。然而，超越西方研究的窠臼并非易事，“中心—边缘”学术权力结构的运作方式使得任何本土化尝试均面临“不符合范式要求”的排斥。思想的“再殖民化”依然是非西方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部分非西方国家虽表面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其认知与态度仍不自觉地受西方认识论主导。知识权力的依附结构最终导致学术研究与其所扎根的社会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脱节。

（二）高端人才的悖论：从人才流失到智力依附

国际教育排名不仅塑造大学的评价标准与组织行为，更深刻地重构着学术人才的全球分布逻辑。人才从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国家的单向流动不断加速，表面上看，人才流动是个人职业选择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自然结果，然而竞争背后隐藏着结构性不平等。国际教育排名通过定义“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声望等级体系。高排名大学凭借其累积的声誉、充裕的资源配置以及平台网络优势，对全球优秀学者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对非西方国家的年轻学者而言，拥有在高排名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不仅是学术生涯的重要资本，更是回国后获得学术认可、晋升与资源分配的关键凭证。这种“激励—回报”机制促使大量优秀人才向“中心国家”聚集，形成人才流失现象。

人才向“中心国家”的集中，实际上构成更为隐蔽且深层的智力依附。边缘国对中心国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依附都有着知识、理论、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而这些方面的依附可以统称为“智力

依附”^[28]。智力依附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地理位移，更意味着学术话语权、学术网络、学术规范以及问题意识生成方式等进一步向“中心国家”集中。当非西方国家最优秀的学者纷纷涌入西方大学时，他们在西方学术环境中接受系统训练、建立学术人脉、形成研究方向与兴趣偏好。其学术认同、学术品位乃至对“重要问题”的直觉判断，都在潜移默化中被西方学术传统所塑造。即便部分学者最终返回本国，其带回的也往往是西方的主流研究范式、问题意识框架以及学术评价标准。换言之，智力依附的关键机制在于，通过人才的流动，实现知识生产规则与认知结构的全球化复制。这一机制在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竞争战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提升国际排名，非西方国家的大学积极引进具有国际背景的高层次人才。此类人才的确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大学的科研产出、国际发表与学术声誉，但同时也带来潜在的依附风险。具体而言，引进人才的研究方向通常与西方学术议程高度契合，而非着眼于本土社会的实际需求；其学术网络的中心仍维系于西方机构，而非扎根于本国学术土壤；其评价标准倾向于西方模式，而非适应本国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发展需要。

“以引进求提升”策略在提升排名的同时，可能进一步强化本土学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更为深层的悖论在于，人才流动机制在非西方国家内部也制造新的不平等。在国际教育排名导向下，各国普遍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少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以追求排名的突破。此举在短期内可能提升少数大学的国际可见度与竞争力，但同时也加剧精英大学与大众高等教育之间的断裂。少数大学获得大量财政资源、政策倾斜与顶尖人才，而绝大多数高校则在资源匮乏与边缘化困境中艰难维持。内部分化不仅无助于整体学术水平的普遍提升，反而可能导致学术生态失衡——学术金字塔的顶端与国际接轨，而基底则日益脱离高水平知识生产的条件。长此以往，非西方国家内部的知识生产将呈现出“双轨化”趋势：少数精英机构以西方议程为导向，多数普通机构无力参与有意义的学术对话。最终，人才流动与智力依附不仅强化全球层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在国家内部复制类似的等级秩序，制约非西方国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

（三）学术生态的扭曲：绩效主义、同质化与社会需求的断裂

在国际教育排名构筑的全球绩效压力之下，大学治理机制逐步演化为以量化指标为轴心的绩效主义文化。其表面上有助于提升科研产出的可测度性与管理效率，实则催生短期成果繁盛与长期创新式微之间的鸿沟。绩效主义的运作逻辑，在于将学术活动这一本应蕴含不确定性、探索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复杂实践，粗暴地简化为若干可通约、可比较的量化指标。在国际教育排名的牵引下，论文发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被引频次、高被引学者密度等指标，日益成为评价学者学术能力、分配科研资源、决定职称晋升的支配性依据。这种管理范式虽以“科学化”“客观化”之名自居，实则可能导致学术实践的深层异化。绩效主义通过学术主体异化、学术成果异化与学术生产关系异化三重机制，使学术劳动陷入价值迷失的制度泥沼^[29]。学者的工作动机从追求真理、服务社会转向完成指标、累积积分，研究选题从问题导向滑向发表导向，学术判断的价值内核被技术理性的计算逻辑所替代。

绩效主义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生态整体性地滑向短期主义与功利主义。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发表周期短、研究速度快、引文累积迅速的热点领域受到青睐，而那些需要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回报周期漫长的基础研究与颠覆性探索则被边缘化。面对可计算的考核周期与不可回

避的晋升压力，学者们倾向于选择已经被所谓“主流期刊”验证为可发表、可获得引用的成熟议题，而非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可能孕育范式突破的新兴方向。这种风险规避型的选择偏好，使得学术研究日益陷入路径依赖，研究活动在既有范式的框架内做出边际改进，却难以催生真正的范式革命。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学术生态正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同质化趋势。在国际教育排名施加的“统一评价标准”之下，全球大学纷纷追逐相似的发展目标，即扩张科研规模、提升国际发表数量、引进高被引学者、提高国际化程度。趋同化的发展模式，使大学日益丧失其应有的多样性与文化独特性。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大学而言，同质化意味着在西方大学的镜像中塑造自我，而非在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需求与知识遗产中寻找发展定位。同质化的另一重要维度体现在研究范式层面。当全球学者皆以在西方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为终极目标时，研究议题的设定、理论框架的选取、方法论的操作方式均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对于不符合主流范式的研究，无论是基于本土问题的经验研究，还是跨越学科边界的理论探索，抑或采用非英语表达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获得评价体系的认可。范式的单一化，不仅压制学术多样性，更从根本上抑制创新条件。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审视，学术生态的扭曲还体现为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当学者群体被评价体系驱动去追逐国际学术前沿所界定的热点议题时，本土社会面临的迫切知识需求反而被搁置。脱节现象在全球南方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公共卫生领域，南方国家承受的疾病负担、医疗资源分布的公平性、基层卫生体系的脆弱性等重大议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关注度远不及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罕见病机理研究；在环境科学领域，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正义、可持续生计、生态治理等问题，其国际学术可见度远远低于西方主导的气候变化模型研究；在教育研究领域，本土教育实践中的语言政策、教育公平等现实课题，往往让位于对西方教育理论的验证与应用。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断裂，不仅从根本上削弱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公共责任，也导致非西方国家的学术发展难以获得本土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

四、调适重构：自主体系的南方探索与中国实践

面对国际教育排名内嵌的学术殖民逻辑与指数霸权，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接受西方标准的规训，而是在理论批判与制度实践中展开多层次的调适与重构。探索路径呈现出从认知觉醒到制度突围、再到自主范式建构的递进逻辑。首先是思想层面的祛魅，揭示排名“中立”表象下的知识权力结构；继而是评价体系的替代性探索，通过区域合作、本土数据库建设与多元指标改革打破垄断；最终，部分南方国家尝试构建根植本土、面向世界的自主体系。在多元探索图景中，中国实践构成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取向，以“三大体系”建设为起点，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为超越指数霸权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路径参照。

（一）认知觉醒：全球南方对知识依附的理论批判

知识生产领域的“去殖民化”浪潮正在全球南方集体崛起，全球南方不再满足于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扮演被动接受者与验证者的角色，而是试图构建能够解释自身发展道路、回应现实困境、指导世界未来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30]。全球南方国家对学术殖民的解构，首先体现为对国际教育排名“中立”标准的祛魅与批判。长期以来，国际教育排名被视为“客观、科学”的评价工具，

部分非西方国家也曾普遍接受“追赶西方”的发展逻辑。然而，随着对殖民主义反思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所谓“国际标准”本质上是西方学术传统与价值偏好的投射。

对“中心—外围”权力关系的高度警觉，使得拉美学术界逐渐摆脱西方发展叙事的束缚，形成以自主性为核心的知识批判传统。在此基础上，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31]。然而，理论探索并非在真空中展开，拉美的地缘政治身份始终处于全球权力结构之中：一方面，该地区成为新殖民主义“知识—权力”网络下验证依附理论的经典样本；另一方面，它又持续孕育着解构霸权的创造性实践。这种辩证关系使其成为探究抵抗全球“中心—外围”结构可能性的重要窗口^[32]。植根于全球权力结构和批判传统，学者们进一步提出“去殖民性”的概念，主张重新激活被殖民主义压制、边缘化的本土知识传统，构建“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

非洲的知识去殖民化运动，将学术研究本身作为反殖民斗争的前沿。针对殖民史学遮蔽非洲社会历史主体性的根本性问题，非洲学者将历史研究视为反殖民斗争的深化与延续，其核心任务在于揭露殖民主义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剥削、文化霸权与知识压迫，进而解构西方殖民统治的知识体系，并通过重构本土叙事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重获本土历史与文化的主体性^[33]。塞内加尔的去殖民化实践，将知识批判延伸到教育制度层面。其通过“现代化”改革和教育框架的“本土化”等去殖民化政策和战略，在教育质量、宗教教育、教学语言、基础课程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去殖民化措施，对抗殖民文化的影响^[34]。非洲的知识去殖民化运动不仅停留于理论批判层面，更致力于在基础教育领域重构文化主体性，从而摆脱殖民知识体系的长期依附。

拉美的自主性探索与非洲的主体性重构，昭示知识依附不仅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更是认知框架的支配。国际教育排名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规训力量，不仅因其影响资源配置，更因其深刻塑造全球学术界的“常识”，即什么是“好大学、好研究、好学者”。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权力支配，全球南方国家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实现“认知解放”，认识到所谓“国际标准”的地方性、历史性和权力性。

（二）制度突围：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尝试

理论批判固然构成对抗学术殖民的思想先导，但是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祛魅，尚不足以撼动指数霸权在日常学术实践中运作的根基。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动理论觉醒的同时，亦将抗争的着力点转向制度层面的突围努力。其核心策略在于构建与本土知识体系、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多元评价机制，从而打破国际教育排名对“学术卓越”标准的垄断定义。与理论批判不同，制度突围直面的是评价权力如何具体运作、资源如何分配、学术声望如何生成等实质性问题。

具体实践层面，全球南方国家从区域联盟、本土数据库建设和评价指标改革三个维度展开探索。其一，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地的高校与学术组织积极构建区域性的评价协作网络。例如，拉美大学联盟尝试建立区域内互认的学术评价标准，旨在降低对西方排名的单向依赖；非洲大学协会（AAU）通过推动区域内学者的合作研究与联合发表，致力于增强本土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与对话能力，正如该协会所明确倡导的，“鼓励成员学校之间建

立研究和项目合作的伙伴关系，并为其教职工提供校际流动的工作和培训机会”^[35]。南方国家的区域行动虽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尚不足以与既有全球排名直接抗衡，但其象征意义与实践价值不容忽视，它们证明在西方主导的评价范式之外，替代性制度安排是可能的，并且正在被有组织地推进。

其二，在本土学术数据库建设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投入显著资源。拉美的 SciELO（科学电子图书馆在线）已整合区域内多语种学术期刊，其本身语种的丰富性也使之成为观察母语非英语国家期刊语种变化的窗口^[36]；非洲的 AJOL（非洲期刊在线）则致力于提升本土期刊的国际可见度与可获取性，该平台“通过数字化整合分散的非洲期刊，推动开放获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非洲学术界长期面临的知识获取困难和学术成果传播受限的双重困境”^[37]。学术数据库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商业出版集团对学术传播渠道的长期垄断，为非主流语言和地域的研究成果提供生存与交流空间。

其三，在微观评价指标改革层面，部分国家开始尝试将本土贡献明确纳入教师聘任、职称晋升及科研项目评审的考量范围。具体措施包括：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外，增设对本土问题研究、社会服务实践、文化传承贡献等维度的评价权重。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NRF）首席执行官呼吁，“资助者、大学和科学委员会应在晋升、资助和奖项中奖励具有社会参与和影响力的研究”^[38]。在科研项目评审中，除考察学术创新性外，亦关注研究成果对本土社会发展的实际转化价值，正如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举办“研究的社会影响”专题研讨会达成的共识，研究不仅要关注学术产出，更要回答“研究对社会作出的具体贡献是什么”^[39]。多元指标的引入，尽管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却为打破“唯排名”的单一评价模式积累了经验。

然而，制度突围面临“承认政治”的困境。一方面，如若替代性评价体系无法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其评价成果仍可能被所谓的“主流话语体系”边缘化；另一方面，如若完全拒绝与国际接轨，又可能陷入自我封闭的风险，使本土学术成果失去跨文化对话与传播的可能。全球南方学者普遍主张：自主知识生产不等于自我封闭，更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知识传统^[40]。因此，必须在坚持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就要求南方国家的学术界既不简单排斥国际标准，也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尝试开辟介于依附与隔绝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具体而言，要在技术层面完善评价工具，更在观念上超越二元对立，在多元互鉴中构建既根植本土、又具有全球对话能力的评价新范式。

（三）中国范式：从“三大体系”到“自主知识体系”

在全球南方国家对抗学术殖民的多元实践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形成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取向。战略进程的理论起点，可以追溯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部署。此后，中国学术界逐步实现从“三大体系”建设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度演进。演进绝非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其核心在于超越“对标国际、追赶西方”的传统思维定式，真正以中国自身的实践为根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秉持“以中国为观照”。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应摆脱验证西方理论、回应西方预设议题的路径依赖，转向立足于自身历史传统、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需要，从本

土经验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研究具有本土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学理性的真问题^[41]。知识生产需完成从“解释中国”到“定义中国”的跃升,在理论抽象、概念凝练与方法创新中扎根田野、回应现实、引领实践,使中国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进而在世界知识版图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坐标。具体而言,学者应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实践,如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创新、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创新性提出在国际社会通行、呼应国际议程、彰显共通价值的标识性概念,以有效宣介中国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念”^[42]。原创概念的系统提出与学理阐释,标志着中国学术界正在从西方理论的被动“接受者”向理论创新的主动“贡献者”转型。该转型对打破学术殖民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当中国学者能够运用本土生成的概念体系解释世界时,就不再需要依赖西方理论框架来获取学术合法性,从而在根本上超越大学排名所代表的依附性评价体系。

从“三大体系”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演进,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对知识生产内在规律的透彻理解。“学科体系”侧重知识生产的制度基础与组织保障,“学术体系”强调研究规范与方法论自觉,“话语体系”关注学术表达与文化传播的能力,而“自主知识体系”则指向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文化根基与价值取向,“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随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得以实现的”^[43]。深层次的演进逻辑表明,中国学术界正在从“追赶型”“依附型”的发展模式,转向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自主型”发展模式。然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现实困境。一方面,国际教育排名的结构性压力依然存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评价指标仍然与排名高度关联,短期绩效压力与长期知识自主之间尚未充分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片面强调“自主”可能导致自我封闭,从而脱离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沿地带。如何在自主与开放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如何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不缺失全球学术视野,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面对的关键课题。唯有坚持“以中国为观照”的方法论自觉,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成为对抗指数霸权的有力武器,并为全球南方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参照。

(四) 路径探索: 价值、语言、平台与人才的多维重构

对抗国家教育排名推行指数霸权的运作逻辑,以及借鉴全球南方国家对抗学术霸权的有益实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价值重估、语言突围、平台建设与人才环流四个维度同步推进。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国对抗学术殖民和指数霸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行动框架。其中,价值重估提供方向,语言突围拓展空间,平台建设夯实基础,人才环流注入动力。

价值重估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当前国际教育排名定义的评价标准,实质上将“学术卓越”窄化为以英文发表、影响因子和大学位次为轴心的单维指标。要突破评价霸权,首先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研究”。具体而言,学术评价应当纳入多元价值维度,应包括本土相关性,即研究是否回应中国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文化贡献,即研究是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社会服务,即研究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国际影响,即研究是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多维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系统推进,涵盖评价指标体系调整、科研资源配置改革以及学术文化生态重塑。

语言突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载体与文化根基。当

前英语在全球学术领域的高度垄断，构成隐性的“语言税”，使非英语国家学者在国际发表中承受额外负担，并影响研究问题的选择与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国应当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的同时，大力推动高质量中文期刊建设，提升中文作为学术语言的地位与影响力。具体举措包括，加强中文期刊的国际化运作，提升其学术声誉与可见度；推动中文重要学术成果的翻译与多语种传播，使其进入全球知识循环；鼓励学者在中文语境中展开理论探讨，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命题。语言突围的目标并非排斥英语，而是在英语之外开辟另一种高质量学术表达空间，实现学术语言的多元化与平等对话。

平台建设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当前，西方商业出版集团与引文数据库事实上垄断全球学术评价的关键基础设施，形成固化的“守门人”权力。中国应当加大投入，建设自主可控且具有国际认可度的知识发布与评价平台，包括深化中国知网等现有平台的功能优化与国际化水准；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学术特点的评价数据库，形成有别于SCI/SSCI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台合作与互联互通，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的知识传播网络。平台建设的目标不是另起炉灶、自我封闭，而是打破西方商业垄断、为全球学术界创造可替代的基础设施选项。

人才环流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保障。传统的人才单向流失模式使得非西方国家长期陷入“智力依附”困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改变依附格局，中国应当建设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推动全球智力资源的双向良性流动。具体路径包括，优化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不仅看重其国际学术履历，更注重其与本土学术发展的契合度；加强本土青年学者的有序培养，为其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成长空间；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全球学术治理，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提升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人才环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以我为主、全球配置”的智力资源格局，使人才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赋能者，而非依附结构的加固者。

五、结语

国际教育排名并非中立的学术评价工具，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殖民与指数霸权的权力装置，其通过指标政治、语言垄断与数据守门的机制，将西方学术标准塑造为“全球普适”的规范，固化全球知识生产的“中心—边缘”结构。排名体系以量化技术遮蔽权力本质，推动非西方国家陷入知识主体消解、智力依附加剧、学术生态扭曲等困境，既割裂知识生产与本土社会需求的联结，又侵蚀非西方学术自主发展根基。面对困境，全球南方国家并未被动接受西方标准的规训，而是在批判与实践展开多层次的探索，历经认知祛魅、制度突围到自主建构的递进过程。中国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根基、迈向“自主知识体系”范式建构，为非西方国家突破依附困境提供参考路径，其核心在于立足本土实践重构评价逻辑。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揭示，指数霸权祛魅的关键在于打破单一评价垄断，构建多元共生、平等对话的全球学术新秩序。未来需要在价值维度重估“学术卓越”标准，将本土贡献、社会价值纳入评价体系；在语言维度推动学术话语表达多元化，提升非英语学术话语权；在平台维度建设自主可控的学术基础设施，摆脱西方数据垄断；在人才维度构建双向环流机制，破解智力依附困局。唯有坚守学术主体性，在自主与开放间寻求平衡，才能真正超越学术殖民桎梏，推动全球知识体系迈向公正、多元与包容，为人类知识创新与文明互鉴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 人民日报, 2016-05-17(1).
-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 2022-04-26(1).
- [3]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N]. 人民日报, 2026-05-18(1).
- [4] 陈奇.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3): 148-157.
- [5]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 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J]. 中国记者, 2025(11): 60-64.
- [6] 薛桐. 知识与霸权: 墨西哥现代化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 历史教学问题, 2024(5): 99-107, 179-180.
- [7] 李启咏. 学术殖民、知识霸权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4): 104-112, 132.
- [8] 罗建河. 高等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超越——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5(2): 91-95.
- [9] 吕佳慧, 任超, 林梦泉. 国际大学排行榜的演变逻辑及评价变革[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4(6): 82-88.
- [10] 马璐瑶. 大学排名的历史演进[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5(1): 139-143.
- [11] 赵锋, 余丽. 媒介理论视阈下的大学排名: 迷思、风险与规范[J]. 教育科学探索, 2024(1): 56-62.
- [12] 张睦楚. “被放弃”的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信任危机[J]. 山东高等教育, 2025(3): 1-7, 89.
- [13] 刘自团, 夏子晴. 从热衷到退出: 高校对待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态度再审视——兼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4(4): 53-60.
- [14] 蔡笑天, 李哲, 杨洋. 理性客观看待中国高校的国际排名变化[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0(8): 63-69.
- [15] 刘益东. 科研体系大转型: 从国际论文挂帅到追求原始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以基于国际顶刊论文数量的大学排名体系信誉崩塌为契机[J]. 关东学刊, 2024(1): 46-57.
- [16] 林杰, 王儒雪, 陈妍君. 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的世界格局与中国行动方略[J]. 大学教育科学, 2024(1): 32-40.
- [17] Latifs K, Sidiropoulos A, Evangelidis 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 composite indicator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J/OL]. Frontiers in Research Metrics and Analytics, 1-30 [2026-06-15]. <https://doi.org/10.3389/fma.2026.1828850>.
- [18] QS Top Universities.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ethodology [EB/OL]. (2025-06-12) [2026-04-01].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
- [19]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6: methodology [EB/OL]. (2026-03-16)

- [2026-04-01] .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
- [20] U.S.News&World Report.How U.S.News Calculated the 2025-2026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 [EB/OL] .(2025-06-16) [2026-04-01] . <https://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global-universities/articles/methodology>.
- [21] 康云菲,刘宝存. 话语权力视角下世界大学排名影响力的泛起、强化及消解 [J] . 现代大学教育, 2024 (6) : 74-83.
- [22] Louisa Ha. 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A Vision to be an Innovative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 Model and an Olympic Game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 [J] . 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2022 (1) : 1-5.
- [23] 文秋芳. 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 [J] .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3) : 76-85.
- [24] 陆洪磊,金舒洋. 语言帝国主义: 英语作为国际新闻通用语言的历史与批判 [J] . 青年记者, 2025 (1) : 96-102.
- [25] Carolina Guzmán-Valenzuela.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J] .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25 (124) : 24-25.
- [26] 何祎金. 从学术依附到多元本土化: 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反思与学科重构 [J] . 求索, 2022 (3) : 107-115.
- [27] 彼得·斯科特,丁雅施,刘绪. 全球学术流动格局: 霸权之道还是流动之势? [J] . 高校教育管理, 2025 (3) : 22-31.
- [28] 张康之,张桐. 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智力依附——兼议边缘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J] . 天津社会科学, 2014 (4) : 29-35, 49.
- [29] 王旭燕,张伶俐. 超越绩效主义: 英国高校科研文化建设研究 [J/OL] . 科学学研究, 1-17 [2026-05-03] .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60403.001>.
- [30] 彭成义. 知识博弈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 [EB/OL] . (2026-06-05) [2026-06-15] .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06/t20260605_6016441.shtml.
- [31] 陈岚. 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 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J] . 拉丁美洲研究, 2019 (5) : 116-131, 157-158.
- [32] 芦思姮. 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话语权博弈: 西方霸权叙事投射、拉美本土抵抗及其启示 [J] . 世界社会科学, 2025 (5) : 74-92, 243-244.
- [33] 袁年兴,韦泊逸. 重构历史主体性: 非洲达喀尔学派的知识生产与文明叙事 [J] . 世界民族, 2025 (5) : 64-74.
- [34] 秦婉真,刘巍. 塞内加尔初等教育的去殖民化路径探索 [J] .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4 (1) : 42-53, 92.
- [35] 徐墨,苑大勇.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角色定位与实践路径——以非洲大学协会为例 [J] . 世界教育信息, 2026 (3) : 24-31.
- [36] 曾燕,申艳,顾立平,刘闯. 巴西SciELO平台国际化发展策略及启示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5) : 586-595.
- [37] 马军花,申艳,刘闯. 非洲期刊在线 (AJOL) 平台的国际化发展策略及对我国期刊建设的启示 [J] . 中

- 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5 (9): 1169-1177.
- [38] Eve Ruwoko. Engaged research: A most credible model for excellence [EB/OL]. (2025-11-05) [2026-05-03].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51105064044242>.
- [39]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 Workshop Unpacks How Research Can Deliver Real, Measurable Impact on Society [EB/OL]. (2026-01-28) [2026-05-03]. <https://www.nrf.ac.za/nrf-workshop-unpacks-how-research-can-deliver-real-measurable-impact-on-society/>.
- [40] 刘雨微. 重构知识体系版图 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 [EB/OL]. (2026-05-13) [2026-06-1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06/t20260605_6016441.shtml.
- [41] 陈思思. “筛选问题”: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论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5 [2026-06-25].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623.1843.004>.
- [42] 陈奇.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智库供给机制研究 [J]. 理论导刊, 2025 (9): 41-49.
- [43] 张政文.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 [J]. 探索与争鸣, 2023 (9): 5-9, 177.

责任编辑: 杨稀琴 校对: 王京菁

词元层认知战：语义基础设施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及应对

夏 晴 郑 亮

(暨南大学 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词元（Token）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元，正由可计量、可结算的经济范畴延伸为承载与中介人类认知的语义基础单元，其非中立性使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场域由可见内容层下沉至语义基础设施入口。大模型普及进一步把认知对抗场域由可见内容层推向不可见词元层，由影响人们“怎么想”转向塑造人们“用什么想”。词元层认知战的特殊性在于通过语义基础设施影响大模型组织知识、解释事实和生成判断的方式，使认知塑造发生在用户提问之前、内容生成之前和常规审核之外。本文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词元的意识形态属性，并在实证基础上对词元层认知战作出前瞻性分析。词元的意识形态属性指的是词元与分词层因统计污染、语言不公和境外语料主导，成为意识形态偏向沉淀于表征、显现于输出的结构性通道。实证研究发现，西方大模型中文词表污染、训练数据定向“投毒”可行且隐蔽、涉华议题输出价值倾向可观测，表明词元层认知战已具有现实发生条件。其作用机制表现为“生成性嵌入—传导性放大—主体性绑定”。此机制形成前置性、持久性、不可感知性、跨域性与代际性等特征，衍生语义根基稀释、治理盲区、政治安全隐性扩散、文化与科技主权受制、代际认同潜移等风险。应对之道在于防线前移，沿同一机制链条构建以固本、审源、检测、预警、固制、育人为支撑、贯穿全链条的闭环体系。

关键词：词元层认知战；语义基础设施；大模型意识形态；认知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F49；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6）04-0190-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6.04.015

作者简介：夏晴，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郑亮，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夏晴，郑亮. 词元层认知战：语义基础设施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及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190-20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關鍵阶段，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正由技术创新扩展为经济社会形态重塑。《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1]、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2]关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部署，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3]关于“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的要求，共同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知识生产与社会认知全过程。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元，词元（Token）不仅是可计量、可结算的经济范畴，也因日均调用量快速增长而成为承载和中介认知的底层单元^[4]。词元由经济计量单位转化为认知底层单元，意味着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作战场域正在下沉。词元所携带的认知倾向并非天然中立，而取决于训练语料来源、分词编码规则和价值对齐目标。当相当一部分中文使用者依赖西方大模型获取知识、辅助思考和生产创作时，围绕大模型的国际竞争便触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深层。既有研究认为认知战主要发生在内容层与平台层，由“舆论战”演进为“认知战”^[5]、由平台推荐扩展为“算法认知战”^[6]；大模型普及则进一步把认知对抗场域由可见内容层推向不可见词元层，由影响人们“怎么想”转向塑造人们“用什么想”。认知战的形态和发生位置可能将由此发生范式性变化，这一形态之变正是本文的核心关切。

为理解这一形态之变，本文引入“基础设施”的分析视角。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与鲍克（Geoffrey C. Bowker）的《分类之事：分类及其后果》是基础设施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重点揭示分类系统与技术标准如何在日常运行中塑造社会实践和意义生成。本文引入这一理论视角，借助其关于分类、标准与基础设施关系的分析工具，阐释词元、分词规则和语义表征何以构成大模型时代的认知底层。《分类之事：分类及其后果》中指出，基础设施并非仅由可见的物质技术网络构成，隐入日常运作的分类系统与标准同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组织社会实践并框定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持续参与社会秩序与意义的生成^[7]。大模型对中文世界的理解，正建立在一套类似的“语义基础设施”之上：如同交通基础设施规定物理世界的出行路径，由词元及其统计关联构成的语义底层，“规划”着数字时代的认知路径。这套语义基础设施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沿信息处理的链条分为四层，各有其定位与职能。第一层是训练语料，居于链条源头，决定大模型“读到什么”——大模型对世界的认知，最终取决于其训练语料的来源构成与编选规则^[8]。第二层是分词与词表，是语料进入大模型的入口：分词器依字节对编码（Byte Pair Encoding，简称 BPE）等算法，按字符序列的共现频率反复合并，将语料切分、压缩为一个词元并汇集成词表^[9]；此层只负责“切分与编码”，单个词元是字符串到编号的映射。第三层是语义表征与价值对齐^①，是大模型“理解”与“立场”的真正所在：词元经嵌入向量与网络权重被赋予含义与关联，再经后训练（AI 大模型训练的关键阶段）的“价值对齐”加以调校，概念如何关联、对议题持何立场，皆习得并固化于此^[10]。第四层是输出，是前述各层的最终呈现，即大

① 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等后训练手段，调校大模型输出使之符合特定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的技术过程。

模型对外生成的回答与内容，也是立场显现、可被观测之处。

在这一结构中，意识形态风险并不均匀分布。语料层是风险源头，来源不透明、编选失范的境外尤其是西方语料会把特定价值倾向带入训练过程；分词与词表层是入口和放大器，其要害不在于“立场被写入某个词条”，而在于统计污染会被吸入词元，BPE 等技术路线还可能在中文等非拉丁语系中造成语言生产的不平等^[11]。真正承载偏向的是表征与价值对齐层，偏向在此沉淀、固化，并可能被进一步合法化和放大^[12]；输出层只是这种深层结构的可见症状。据此，本文将“词元的意识形态属性”界定为：作为语义基础设施入口的词元与分词层，因统计污染、语言不公和境外语料主导而具有非中立性，并由此构成意识形态偏向沉淀于表征、显现于输出的结构性通道。这一界定有助于把分析重点从单次回答的立场判断，推进到语义基础设施的入口、表征和输出之间的链条关系，从而解释认知对抗为何可能发生在用户提问之前、内容生成之前和常规审核之外。

现有研究已开始关注词元经济^[13]、词元作为生产要素和计量单元的治理问题^[14]，也注意到大模型并非价值中立的语义机器^[15]；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研究则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化安全风险^[16]及其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属性^[17]。近期，以 AI“投毒”为中心的大模型治理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相关问题研究。有研究将 AI“投毒”概括为针对人工智能逻辑与知识源头的隐蔽侵害，指出其可能发生在训练数据、模型微调、插件接口、知识库更新、搜索排序、用户反馈和供应链等多个环节，并从“数据投毒”、模型后门、供应链污染等方面讨论协同治理路径^[18]。这一讨论说明，AI“投毒”已经从单一技术攻击扩展为贯穿数据、模型、应用和生态系统的综合安全问题。本文关注的词元层认知战与一般意义上的 AI“投毒”存在关联，但分析对象和问题重心有所不同。一般 AI“投毒”治理主要面向模型在训练、部署和应用过程中的污染风险，重点在于防范虚假信息、恶意指令、模型后门或供应链漏洞对系统输出和应用安全的破坏。本文所讨论的词元层认知战，则聚焦中文语义基础设施中的更深层风险：西方大模型在语料选择、分词编码、词表生成、语义表征和价值对齐过程中，可能形成对中文世界知识组织、议题框定与价值判断的结构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AI“投毒”并不必然都转化为词元层认知“对抗”。发生在插件调用、企业知识库、实时检索或应用接口中的污染，可能主要表现为部署端和应用端风险；只有当污染进入训练语料、分词词表、语义表征和价值对齐机制，并在用户长期使用中参与知识框架塑造时，才构成本文意义上的词元层认知战。本文关注的正是这种污染在西方大模型中文语义基础设施中沉淀后，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可能形成的认知风险。

综上，本文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证案例分析基础上作出前瞻性预判，拟回答三个问题：词元层认知战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相较既往认知对抗形式，它呈现何种本质变化并带来哪些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面向“十五五”时期战略需求，应如何构建相应的应对体系？

二、认知战新趋势：词元层认知污染

词元层认知战风险的现实苗头已在三个层面显现：其一，西方大模型中文语义底层的污染已获研究确认；其二，针对训练数据的定向“投毒”被证明可低成本且不可感知地实施；其三，大模型输出端在涉华议题上的价值倾向已可观测。三者表明，词元层认知战的潜在成本之低、隐蔽

性之强已不容忽视，而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系统性后果仍处于潜伏与积累阶段。

（一）语义底层中文词表的“统计污染”

词表污染首先说明，语义基础设施的入口并非天然洁净。词表由 BPE 等算法在训练语料上自动构建，构成大模型理解和生成文本的基础“词典”。正因它直接映射训练语料的统计分布，对词表的检视便成为观察中文语义底层是否被污染的重要窗口。2025 年，清华大学联合蚂蚁集团、南洋理工大学、中关村实验室的研究系统识别了大模型中文训练数据中的“受污染中文词元”（Polluted Chinese tokens, PoC tokens），即因不良中文网页进入训练语料、并在 BPE 合并过程中形成的长中文词元。研究发现，GPT 系列中文词表污染尤为突出：含超过 2 个汉字的长中文词元有 773 个（46.6%）被研究团队标注为 PoC；其中成人内容 219 个、网络赌博 459 个，合计约 40.9%。论文还根据 token ID 与语料频率之间的经验模型，估计某色情相关词元在 GPT-4o 训练数据中的出现频率约为“您好”的 2.6 倍^[19]。这表明，低质中文网页并非停留在外部语料层，而可能经由统计合并沉淀为模型处理中文的基础单位。

这一发现的关键意义，不在于证明某个词条本身具有政治立场，而在于揭示语料统计分布进入语义底层的一般机制。色情、赌博类污染因词面显著而容易被识别；价值倾向和叙事偏向则更可能以弥散方式沉淀于语义表征层，不一定凝结为可一眼辨认的词元。由此可见，词表层的“统计污染”是语义底层入口非中立性的直观证据，也提示西方大模型对中文世界的意识形态偏向可能并不只发生在可见输出端，而是更早地预置于语义基础设施入口处。这正是词元层认知战区别于既往形态、也最值得关注之处，即偏向不在表层内容，而在认知赖以展开的语义基础本身。

（二）认知“投毒”的可行性与不可感知性

所谓“数据投毒”（data poisoning），是指攻击者向大模型训练语料中蓄意混入特制的污染样本，使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习得预设的错误倾向、价值偏向或隐蔽行为。这种污染可以以低成本、定向化、隐蔽化的方式实施。其危险之处并不在于污染样本的规模庞大，而在于污染可以直接作用于模型生成能力所依赖的语义底层：犹如向水源投入微量而特制的污染物，投放量极小，寻常手段难以察觉。

《自然·医学》2025 年的一项研究以医疗领域为例，具体揭示了这一风险的技术可行性：研究者将常用预训练数据集“The Pile”^①中仅 0.001% 的训练词元替换为医疗错误信息，大模型传播错误信息的倾向便显著上升，与此同时，该模型在常规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与未污染模型几乎无异，仍可通过标准评测^[20]。这表明，在特定实验条件下，极低比例的污染即可产生可观察影响，而常规性能评测又未必能够识别其异常，“数据投毒”由此呈现出现实可操作性与技术不可感知性的双重特征。更进一步看，这种不可感知性还会延伸至社会认知层面。已有研究表明，使用者对“数据投毒”的风险感知普遍偏低^[21]，在风险意识尚未充分形成的情况下，外部“投毒”更容

① The Pile 是由非营利研究机构EleutherAI于2020年12月发布的开源英文预训练语料数据集，总规模约825GB（约3 000亿词元），由22个经过筛选的异质子集构成，涵盖学术论文、法律文本、代码、书籍、百科、网页、对话等多种文本类型，是开源大模型生态中使用最广泛的预训练语料之一。

易隐匿于训练、生成与接受的连续链条之中，并经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转化为可传播内容，形成“AI 传讹”的闭环^[22]。因此，“数据投毒”并非单纯的技术漏洞，而是一种深层认知对抗风险：当语义底层能够被低成本污染，并以难以察觉的方式持续作用时，意识形态层面的认知塑造便获得了一条隐蔽而可行的技术通道。

（三）大模型输出端的价值倾向

语义底层的非中立性及其在表征层中的固化，最终会在大模型输出端呈现为可观察的价值倾向。这里的“价值倾向”，并非指模型必然直接表达显性政治立场，而是指其在事实选择、问题框定、因果解释、评价尺度与风险排序等方面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偏向。相较于训练语料和内部表征，输出文本更容易被使用者接触，也更容易被误认为是“客观推理”的自然结果，从而遮蔽其背后的语料来源、训练机制与价值对齐过程。现有研究表明，大模型不是脱离社会结构而存在的中性工具，其输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开发主体所处国家、制度环境与知识生产体系中的价值预设。相关研究指出，各国大模型普遍会反映其创造者的世界观及其所处社会的政治光谱^[23]。这一总体判断在涉华议题和国际政治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有研究对比美国 GPT-4o 与中国 DeepSeek-R1 在国际事务中的地缘政治偏见，发现前者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后者的回答与我国立场保持一致^[24]。大模型价值嵌入具有普遍性，不同模型的输出差异并非偶然，而与其训练语料、开发主体及制度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这种价值倾向在跨语言场景中更为复杂。有研究对双语 GPT 模型的测试发现，以英文和简体中文提出相同政治问题时，模型在涉华问题上的回答不一致性显著高于涉美问题；尤其在英文指令下，模型对中国的表述更为负面，呈现出基于训练语言差异的“内群体偏见”^[25]。这表明，语言不仅是表达媒介，也可能对应不同语料生态、叙事框架和政治语境。胡正荣等学者的研究亦显示，面对相同国际事件，中外平台在价值对齐与评论生成上存在显著的文化与政治取向差异^[26]。由此可见，西方大模型在处理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国家形象与价值观的相关议题时，并非价值中立的客观机器，其内嵌偏向可能经由日常使用持续进入中文使用者的认知过程。

三、词元层认知战的作用机制：从语料污染到认知塑造

输出端的意识形态偏向只是可观测的表象，其背后是一条贯穿“语料—词表—表征—输出”的因果链：训练语料的统计分布经分词器这一非中立入口被合并、编码为基础词元，相关的统计关联沉淀于词元关联与大模型的语义表征，固化为大模型理解世界的“认知前提”；推理时这些被嵌入的关联被自动激活，最终在输出端显现为价值倾向。前文以“路网”为喻勾勒了语义基础设施的静态结构，本节则沿这张“路网”追踪偏向如何被生成、传导与绑定，揭示“词元的意识形态属性”得以成立的底层机制。

（一）生成性嵌入：语料偏向沉淀为“认知前提”

认知战的起点，在于意识形态并非被外在“写入”某个词元，而是随语料的统计分布，经分词这一非中立入口被吸入，沉淀于词元关联与语义表征，成为大模型的默认前提。分词器依据

语料中字符的高频共现概率生成词表，词元背后的统计关联因此直接承袭语料的倾向。前述清华团队的发现正是其最直观的例证：当 GPT-4o 的中文语料充斥色情与赌博网页时，这些不良内容的高频词汇便被结构性地合并为基础词元，导致其超过 23% 的长中文词元被污染^[19]。

这种“生成性嵌入”的技术本质，可由对异常词元（Glitch Tokens）与训练不足词元（Under-trained Tokens）的研究加以解释。LI Y 等人发现，分词器产生的异常词元会在推理时引发大模型崩溃或不可预测的偏向输出^[27]；Land 与 Bartolo 进一步揭示，词表构建与实际训练语料常存在脱节——某些词元虽被编入词表，却在训练中极少出现，大模型遇到它们时只能依赖脆弱或扭曲的局部统计关联进行输出^[28]。这意味着，若西方大模型的中文语料在整体质量与结构上存在偏差，其中文的词元关联与语义表征不仅可能承袭语料的污染，更可能因相关词元“训练不足”而在涉华议题上输出脆弱乃至扭曲的认知关联。分词技术本身即“语言劳动的度量衡”，BPE 等算法对中文等非拉丁语系的不成比例切分，在底层就内嵌了语言与知识生产的不平等^[11]。

（二）传导性放大：嵌入的偏向被固化

语料分布沉淀为认知前提后，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偏向并未停留在底层，而是经后训练阶段的“价值对齐”与人机交互被进一步固化、放大，由“潜在”转为“显在”。被视为安全护栏的“价值对齐”，本身即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传导的放大器。在底层价值无意识难以彻底清除的前提下，对齐过程本身可能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吴静因而称之为“人类控制论的幻觉”，并警示其导致“数据霸权”与“价值殖民”^[29]。多项实证研究则勾勒出偏向被放大、固化的具体路径：它沿数据层、算法层、应用层逐级叠加，对齐与微调往往继承甚至放大、固化训练数据中的既有偏见^[30]。Santurkar 等人的测量则进一步显示，大模型所反映的观点分布并非中立，而是系统性地贴合特定人群；立场一经价值对齐塑定，便相对稳定地体现于输出，难以在不重训的情况下扭转^[10]。这意味着，西方大模型在进行基于西方价值观的对齐时，不仅无法清洗底层中文语料的结构偏差，反而可能叠加创制者的价值立场，使涉华输出的偏向被合法化与固化。

这一传导链条的脆弱，使其极易被定向的“数据投毒”所利用。如前所述，极小比例的训练词元替换即可显著影响输出^[20]；在中文学术语境下，郭小平将这一过程概念化为“AI 传说”——“投毒者”无需篡改全部内容，只需在特定概念的词元关联网络中注入微量污染语料，即可在推理时触发相关议题上的认知偏向，并经算法逻辑实现高效转化与闭环传播^[22]。这种技术脆弱性，为认知战提供了极为隐蔽的攻击切入点。

（三）主体性绑定：认知在使用中被循环塑造

机制的最后一环，是将认知塑造从“大模型内部”延伸至“人—机关系”：认知战作用机制的最后一环有赖于使用者对大模型的深度使用，并在使用中反向塑造。当前我国大模型日均词元调用量已突破 140 万亿^[4]，亿级用户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与大模型高频互动。在这种规模化依赖下，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单纯工具，而成为新型意识形态载体，经由数据偏向与算法治理，将特定意识形态属性潜移默化地嵌入用户的认知框架^[17]，目前这一载体的作用点已下沉至不可见的语义底层。

更深一层的塑造来自“反馈闭环”：用户交互数据可能通过反馈标注、偏好学习、产品迭代、

检索日志和应用优化等方式回流模型生态,从而使既有的语义偏向在循环中被持续强化,可能形成循环巩固之势。这种强化在代际维度上尤为明显。沈阳将伴随大模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称为“硅基文明的第一代原住民”^[31]。对他们而言,由词元及其统计关联与语义表征构成的语义底层,就是获取知识、理解世界的基础环境。当语义底层的结构性偏差、技术对齐的价值叠加与规模化使用的深度依赖三者交汇,认知塑造便具备了完整的实现路径。这一机制虽已完整成立,其在社会层面的整体后果却是累积性的、需经年方能充分显现,目前仍处于早期。也正是这种隐蔽而深远的特性,使词元层认知战风险根本区别于既往的内容层与平台层认知战,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新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四、词元层认知战的本质特征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词元、表征和对齐机制共同构成模型理解与生成文本的基础条件,偏向一旦沉淀其中,便不再局限于个别输出错误,而会影响模型组织知识、解释事实和回应问题的基本方式。《分类之事:分类及其后果》一书中指出,分类与标准系统的社会影响常常来自其嵌入性、稳定性和不可见性^[7]。大模型的语义底层也具有类似属性:它支撑日常知识生成,却通常不被使用者直接感知;它提升交互效率,也可能放大其中预设的价值关联。基于这一机制,词元层认知战呈现出前置性、持久性、不可感知性、跨域性与代际性等特征,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衍生出深层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一) 前置性与持久性:生成性嵌入的产物

前置性指意识形态偏向在用户具体接触信息之前已经进入模型的语义组织过程。传统内容层、平台层认知战主要发生在信息发布、推荐和接收环节,争夺的是用户“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词元层偏向则将作用位置推进到提问和生成之前。大模型据以理解世界的语义框架,可能已在语料选择、分词规则、训练过程和价值对齐中形成预设。使用者尚未提出问题,模型组织答案的概念边界、关联方式和评价尺度已经受到这些预设影响。

基础设施的嵌入性在此转化为风险来源。语义底层沉潜于各类应用之下,平时很少成为用户注意的对象。一旦其中夹带特定价值框架,该框架便可能以默认条件的形式进入后续输出。2024年谷歌 Gemini 图像生成功能争议提供了一个直观例证。为降低种族偏见风险,其图像生成系统在人物生成中被过度施加“多元化”倾向,导致美国建国先贤等具有特定历史语境的人物被描绘为有色人种,并一度拒绝生成白人形象。谷歌随后承认相关历史图像生成存在失真,并于2024年2月暂停人物图像生成功能^[32]。该事件主要说明,预设的价值框架可以先于具体提问影响生成结果。对于涉历史、文化与政治议题的大模型而言,类似机制可能使输出端在用户无感状态下承载特定解释框架。

前置性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集中体现为语义框架的潜在重塑。当面向中文使用者的大模型大量吸纳来源不透明的境外语料时,受到影响的可能不只是某一条具体结论,还包括用户理解世界、判断事件性质和组织价值认同的概念前提。民族历史叙事、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依赖稳定的语义表达体系,若关涉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议题的解释框架长期受到外部语料结构牵引,中文

使用者的认知与叙事可能在日常交互中被逐步重塑。

持久性指意识形态偏向在模型生命周期中具有较强延续性。内容层偏向通常可以通过删除、限流、辟谣、标注等方式进行直接干预；词元层和表征层偏向却更难处理。它们在训练过程中沉淀于参数、语义表征和对齐策略之中，会随着模型调用被反复激活。词表层的统计污染相对容易定位，表征层和价值对齐中的偏向则更加弥散，往往需要通过数据清洗、再训练、模型编辑、再对齐等高成本方式进行系统性校正。在清华团队 2025 年的研究中，即便是 GPT-4o 词表中那 773 个相对可检测的污染词元，亦须重训方能清除^[19]。更深层的表征偏向通常不对应单一词条，其治理难度更高。由此产生的风险在于，输出端审核即使不断加强，已固化于语义表征中的偏向仍可能持续渗出，形成“内容表面合规、底层框架偏移”的治理盲区。

（二）不可感知性与跨域性：传导性放大的产物

不可感知性指意识形态偏向在传播过程中难以被普通使用者识别。词元层偏向通常不以鲜明口号、明确立场或可疑来源出现，而是隐藏在模型流畅、完整、貌似客观的回答之中。其隐匿既源于偏向嵌入之深，也源于输出内容在形式上与客观知识难以区分。使用者面对的是自然语言结果，很难回溯其背后的语料来源、训练权重和价值对齐策略。基础设施只有在故障或专门检视时才显形，语义底层偏向也具有类似特征：它越是顺畅地运行，越不容易引起注意。《自然·医学》2025 年的实验提供了直接证据：经定向“投毒”的医疗大模型能够通过全部标准安全评测、与未受污染的大模型几无差异，其传播错误信息的倾向却已弥散性地升高，且难以为常规评测所察觉^[20]；而周敏等人的调查显示，我国使用者对此类底层“投毒”的风险感知普遍偏低^[21]。技术检测难度大与用户感知不足叠加，使底层偏向更容易以知识回答的形式进入认知过程。若这一机制发生在历史叙事、国际关系、国家形象等议题中，西方大模型已被观察到的涉华偏向便可能在日常使用中持续影响用户判断，削弱社会共识形成的认知基础。

跨域性指意识形态偏向可以突破传统内容流动的空间边界。大模型时代，跨境流动的不只是可见文本、图片和视频，还包括嵌入语义底层的统计关联、知识结构和生成规则。真正隐性的风险恰来自这种不可见的关联，而非可见的内容^[33]。西方大模型的中文能力若主要建立在来源复杂、标准不一的语料基础上，其中文语义底层便可能受到境外知识结构和价值框架的塑造。此类偏向不一定以敏感内容形式出现，它无须以“内容”之名跨境，便能以统计分布的形式编码进语义底层，再经本地化部署直接作用于境内使用者的认知，从而绕开以可见内容为对象的内容审查与多场景监管。这种“隐性跨境”对应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不限于单一场景与地域的属性，带来双重风险。在文化层面，当中文的语义解释权与切分规则由境外词表与算法主导，中文世界在最基础的概念切分层面便可能丧失自我阐释的能力，文化话语权面临旁落风险；在科技层面，语义基础设施长期依赖西方大模型，会使知识生产、信息处理和认知框架形成深层路径依赖，进而影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自主发展能力。

（三）代际性：主体性绑定的产物

代际性指前述各特征在世代尺度上的累积效应：当前置、持久、不可感知而又跨域的意识形态偏向，持续作用于新一代用户时，其影响便不再停留于个体与当下，而沉淀为一代人及后续数

代人的认知底色。如前文所论，词元层认知战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影响的长期累积，既往形态的认知战同样可以长期、累积地发挥作用，而在于作用的位置与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偏向藏身于一个被默认为中性的日常工具，其作用位置更靠近认知形成的基础环节。大模型被广泛用作学习工具、搜索入口、写作助手和决策参考后，年轻用户接触知识、组织观点和理解社会的过程将更深地嵌入模型环境。这种影响具有明显滞后性。它通常不会在某一次问答中表现为剧烈立场转变，却可能在高频调用、持续信任和长期依赖中形成认知底色。新生代用户若从学习阶段起便把大模型视为中性、可靠、便捷的知识入口，模型内嵌的语义框架便更容易被自然内化。其后果可能在多年后才集中显现：某些历史叙事被重新排序，特定国家形象被持续弱化，价值判断的评价尺度发生偏移，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表达基础出现松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代际性风险具有突出的长期性和治理难度。内容层治理可以针对具体文本、账号和平台采取措施，代际性影响则沉淀于用户的知识结构和判断习惯之中，它不在任何单次交互中显现，却可能在十年乃至一代人之后方才充分浮现。等到这种影响转化为群体性的价值认同变化，治理成本将显著上升。词元层认知战的深层风险，正在于其通过日常工具绑定认知主体，在低感知、高频率、长周期的交互中塑造未来社会成员的理解框架。

综上，前置性、持久性、不可感知性、跨域性与代际性并非彼此孤立的风险类型，而是同一机制链条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前置性使偏向进入语义框架的形成环节，持久性使其在模型生命周期中持续存在，不可感知性降低了用户和监管系统的识别能力，跨域性扩大了其作用范围，代际性则使影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认知习惯。五者相互叠加，构成一种隐蔽、持续并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的认知塑造过程。传统治理主要面向可见内容和平台传播，词元层认知战作用于更深的语义基础。仅依赖输出端审核，难以及时处理已经嵌入语义底层的偏向。面向语料来源、词表构建、模型训练、价值对齐和应用部署的全链条治理，已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前提。

五、构建贯穿“生成—传导—绑定”全链条的应对体系

词元层的意识形态偏向沿“生成—传导—绑定”的机制形成、扩散并沉淀，治理便不能止于输出端的事后审核，而须回溯到偏向得以生成、传导与绑定的各个环节。链条本身决定了着力点的分布：越趋上游，可干预的环节越多、根治越彻底；越趋下游，可用的手段越少，至主体性绑定一端，主要依靠的已是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因此，防线应尽量前移，把认知安全的关口从可见的内容层，移至偏向赖以嵌入的语义底层，建立贯穿“生成—传导—绑定”全链条的应对体系。

（一）阻断生成性嵌入：从源头治理语义底层

第一道防线针对生成性嵌入，旨在从源头确立对语义底层的自主塑造能力，针对治理前置性与持久性。

第一，固本，即建设自主可控的中文语义基础设施，以应对前置性风险。前置性意味着语义框架在生成端即被预先设定，相应的治本之策是在生成端重新确立这一框架的自主性。一方面，系统建设权威、高质量、来源可溯的中文语料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训练数据选择”环节即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偏见与歧视^[34]。因此，

应使中文语料在整体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并以足够的数据规模沉淀为大模型理解中文世界的底层基准，从源头稀释境外语料的结构偏向。另一方面，发展面向中文语言结构的自主分词器与词表治理能力。如前所述，BPE等算法对中文的不成比例切分本身即内含语言生产的不平等，分词规则若长期依赖境外技术路线，中文语义的最小切分方式将始终受制于人，因此自主分词器的研发与中文词表的规范化，应被置于较语料规模更为基础的位置。更进一步，鉴于意识形态偏向真正栖身于表征与价值对齐层，境外对齐往往叠加而非清除偏向，固本还须发展自主的价值对齐能力，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重塑大模型的对齐目标，使大模型的立场始终为本国所掌握。语料、分词与对齐三者并举，方能在生成端真正确立语义底层的自主性。

第二，审源，即将训练语料的来源审查前移至数据入口，守住意识形态偏向进入语义底层的第一道关口。语义底层的偏向源于语料，治理因此应从来源端介入，实现由事后响应向主动防控的转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要求提供者使用合法来源数据并提升训练数据质量^[34]，《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进一步对语料来源的安全评估给出可操作指引^[35]。在此基础上，可借鉴欧盟以“透明可溯”为核心的训练数据治理经验^[36]，建立训练语料的来源认证与血缘追踪机制，要求面向公众的中文大模型披露其语料来源构成与编选规则，以减少来源不透明、编选失范的境外语料进入语义底层的可能。

第三，检测，即构建词表层的污染检测与“清洗—重训”机制，以应对持久性风险。来源审查难以穷尽全部污染，需辅以面向词表本身的检测，这也是词元层治理区别于一般数据治理的特殊性所在。词表可作为追溯训练数据污染的“哨兵”，分析其中的异常词元即可定位语料污染源^[19]。据此，应建立常态化的中文词表安全审计：对面向公众的大模型定期开展词表污染扫描，发现结构性污染后即启动“清洗—重训”流程，清除受污染语料、修订词表并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重训，而非仅在输出端进行内容过滤。需要明确的是，词表污染检测所能直接处置的，是数据卫生层面的显性污染；至于已沉淀于表征与价值对齐层的意识形态偏向，则非“扫词表”所能清除，须辅以语料清洗、大模型重训与前述自主对齐方能触及。鉴于偏向嵌入参数后的结构性与不可逆性，这种深入参数层的治理，才是化解“内容合规而底层偏移”盲区的根本途径。

（二）抑制传导性放大：监测、归因与制度固化

第二道防线针对传导性放大，旨在对意识形态偏向向外传导、放大的环节加以抑制与约束，应对不可感知性与跨域性风险。

第一，预警，即提升对“认知投毒”的监测与归因能力，以破解不可感知性所带来的归因困难。预警与前述检测的分工在于：检测针对已经嵌入词表的存量污染，预警针对“投毒”行为本身。“投毒”以统计分布的形式弥散于海量语料，且后果长周期潜伏，其来源与时间节点难以追溯。因此，在被动防御之外，应主动建设监测预警与归因溯源能力，对跨境数据流动与开源语料渠道中的隐蔽污染加强监测，加大对“投毒”样本检测、污染溯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并探索以可信存证等技术记录语料流转全过程，使“投毒”行为尽可能可追溯、可取证。需说明的是，此类研究旨在预警与防范，而非提供可操作的攻击路径。

第二，固制，即完善国内制度并推动与国际规则对接，以回应跨域性所牵动的主权问题。技

术防线需由制度予以固定。在国内，应将词元层安全要求纳入既有治理体系，把训练语料来源审查、词表安全检测、污染处置等纳入面向公众大模型的安全评估与算法备案环节，使“语义主权”转化为可执行的监管举措。在国际，词元的语义标准、分词规则与训练数据披露要求正在成为大国技术博弈的新焦点。我国应立足在中文大模型上的产业优势，主动设置“语义主权”“词元安全”等议题，依托网络空间主权理论^[37]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推动形成兼顾发展和安全、尊重各国语义自主的全球治理框架，避免在新一轮语义基础设施竞争中陷入“数字技术依附”。

（三）解除主体性绑定：培育使用者的辨识能力

第三道防线针对主体性绑定，旨在从使用者一端解除绑定、阻断“使用即训练”的反馈循环，以应对代际性风险。

育人，即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认知安全建设的长远布局。技术与制度防线最终都需落到使用者的认知能力上。我国使用者对底层“数据投毒”的风险感知普遍偏低，而作为“硅基文明第一代原住民”的新生代，更是在语义底层的长期接触中形成认知底色。因此，应面向公众普及“大模型并非价值中立、其输出可能携带底层偏向”的基本认知，引导使用者对大模型输出保持必要的批判意识与多方核验习惯；尤其应面向青少年群体，在其语言与知识习得的关键阶段培养对异质价值预设的辨识能力。这道防线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治理的是链条最末端、也最难技术化处置的环节：唯有使用者具备辨识偏向的能力，前述技术与制度防线才不致因终端的轻信而失效。

综上，三道防线沿生成—传导—绑定的链条依次展开：固本与审源从源头截断意识形态偏向的生成性嵌入，检测与预警遏止其传导性放大，育人则在终端解除其主体性绑定。三道防线并非并列的条目，而是沿同一链条层层咬合的纵深防御机制。

六、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知识生产、信息获取、决策辅助与社会治理过程后，数据污染、模型“投毒”、插件滥用、知识库污染和供应链风险等问题不断显现，大模型时代的认知安全风险愈加严峻。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的是更深层、隐蔽的词元层认知战风险：当西方大模型在中文语料、分词词表、语义表征和价值对齐中沉淀特定知识结构与价值框架时，其影响便不再只是单次输出错误或应用链路失真，而可能转化为对中文使用者认知前提、议题框架和价值判断的长期塑造。由此可见，词元层认知战的特殊性，不在于制造显性的错误信息，而在于通过语义基础设施影响大模型组织知识、解释事实和生成判断的方式，使认知塑造发生在用户提问之前、内容生成之前和常规审核之外。面向未来，应加强高质量中文语料体系、自主分词器、中文词表治理和价值对齐能力建设，完善词元层风险识别、模型偏向评估、跨域传播预警与协同处置机制，并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认知安全建设之中。其根本目标在于，在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增强我国对中文语义体系、自主知识生产体系和价值表达体系的塑造能力，使人工智能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十五五”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5(25): 15-19.
- [2]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 2026-03-14(1).
- [4] 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N]. 人民日报, 2026-03-24(8).
- [5] 喻国明, 郭靖一. 从“舆论战”到“认知战”: 认知争夺的理论定义与实践范式[J]. 传媒观察, 2022(8): 23-29.
- [6] 方兴东, 钟祥铭. 算法认知战: 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J]. 传媒观察, 2022(4): 5-15.
- [7] BOWKER G C, STAR S L.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2-5, 33-35, 41.
- [8] FENG S, PARK C Y, LIU Y, et al. From Pretraining Data to Language Models to Downstream Tasks: Tracking the Trails of Political Biases Leading to Unfair NLP Models[C] //Proceedings of the 6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 Toronto: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3: 11737-11762.
- [9] SENNRICH R, HADDOW B, BIRCH A.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of Rare Words with Subword Units[C] //Proceedings of the 5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 Berl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6: 1715-1725.
- [10] SANTURKAR S, DURMUS E, LADHAK F, et al. Whose Opinions Do Language Models Reflect?[C] //Proceedings of the 4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MLR, 2023: 29971-30004.
- [11] CAFFONI P. The Cost of Language: Tokenization as a Metric of Labor[J]. AI & SOCIETY, 2026: 1-12.
- [12] PEREZ E, RINGER S, LUKOŠIŪTĖ K, et al. Discovering Language Model Behaviors with Model-Written Evaluations[C]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3. Toronto: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3: 13387-13434.
- [13] 蒙慧, 肖丙浩. “十五五”时期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3 [2026-06-06].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520.1717.005>.
- [14] 李国庆.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2 [2026-06-06].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515.1040.004>.
- [15] 蒋慧. 算力计量法治化: 词元计量交易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因应[J/OL]. 广西社会科学, 1-10 [2026-05-19]. <https://link.cnki.net/urlid/45.1185.C.20260506.0912.002>.
- [16] 肖君拥, 刘昊.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应对[J/OL].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25 [2026-06-02].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607.D.20260425.1514.002>.
- [17] 晏青, 陈豪辉. 作为意识形态的AI: 逻辑、风险与调适[J]. 未来传播, 2025(6): 2-14.
- [18] 杜永萍. 协同治理AI“投毒”[N]. 学习时报, 2026-06-19(3).
- [19] ZHANG Q J, WANG D, QIAN H T, et al. Speculating LLMs' Chinese Training Data Pollution from Their Tokens[C] //Proceedings of the 2025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uzhou: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5: 26113-26133.
- [20] ALBER D A, YANG Z, ALYAKIN A, et al. Medic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Vulnerable to Data-poisoning

- Attacks [J]. *Nature Medicine*, 2025 (2): 618–626.
- [21] 周敏, 陈飞扬. 数据之“毒”, 感知几何? ——人工智能大模型使用者对“数据投毒”的风险感知研究 [J]. *新闻大学*, 2025 (10): 1–15, 118.
- [22] 郭小平, 李诚媛. AI传讹: “数据投毒”的生成逻辑与转化 [J]. *青年记者*, 2026 (2): 57–63.
- [23] BUYL M, ROGIERS A, NOELS S, et 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flect the Ideology of Their Creators [J]. *np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6 (2): 7.
- [24] PACHECO A G C, CAVALINI A, COMARELA G. Echoes of Power: Investigating Geopolitical Bias in US and China Large Language Models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6 (1): 675.
- [25] ZHOU D, ZHANG Y. Political Biases and Inconsistencies in Bilingual GPT Models—The Cases of the U. S. and China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1): 25048.
- [26] 胡正荣, 闫佳琦.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比较研究——基于2012—2023年十大国际新闻生成评论的实验 [J]. *新闻大学*, 2024 (3): 1–17, 117.
- [27] LI Y, LIU Y, WANG Z, et al. Glitch Token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C] //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ACM Joint European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on the Foundation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New York: ACM, 2024: 2075–2096.
- [28] LAND S, BARTOLO M. Fishing for Magikarp: Automatically Detecting Under-trained Token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4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iami: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4: 11631–11646.
- [29] 吴静. 价值对齐能否解决人工智能风险 [EB/OL]. (2026-01-30) [2026-06-0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72301.html>.
- [30] 陈晋音, 王泽楷, 沈文杰, 等. 多模态大模型的偏见溯源和危害以及公平性提升研究综述 [J]. *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 2026 (2): 22–40.
- [31] 沈阳. 硅基文明的第一代原住民如何走入未来? [EB/OL]. (2024-09-30) [2026-06-06]. <https://www.tsjc.tsinghua.edu.cn/info/1028/2686.htm>.
- [32] 谷歌暂停人工智能模型Gemini的图像生成功能 [EB/OL]. (2024-02-23) [2026-06-03].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4/2/517892.shtm>.
- [33] 杨胜刚, 李川. 大模型时代数据跨境隐性国家安全风险的敏捷治理模式 [J]. *情报杂志*, 2025 (8): 51–58.
- [34]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EB/OL]. (2023-07-10) [2026-06-06].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35] 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 GB/T 45654—2025 [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5: 6–8.
- [36] 徐伟, 韦红梅.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风险治理: 欧盟经验及其启示 [J]. *现代情报*, 2025 (5): 89–98.
- [37] 方滨兴. 论网络空间主权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63–69.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林华山

“词元税”：AI 时代西方新型文化霸权的形成机制、深层隐忧与中国应对

胡珂¹ 解超^{1, 2}

(1.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党委办公室, 上海 201620)

摘要：大语言模型的规模化应用正在深度重构全球语言权力秩序与文化格局，AI 技术底层的语言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词元税是 AI 时代正在浮现的新型文化霸权形式，其以英语中心主义为底层架构，通过研发主导权的资本垄断、训练语料的英语偏倚、词元切分的英语基准、计价规则的单方制定与算法转译的文化框定五重耦合机制层层叠加固化，以算法技术的中立外衣实现对非英语文化的系统性挤压。作为 AI 与资本逻辑合谋的产物，词元税在固化和扩大全球语言阶级差距、重塑知识生产权力格局、损害非英语国家文化主体性、消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等维度引发深层风险，构成数字时代文化殖民的新形态。对此，中国要坚持自主大模型与中文语料库双轮驱动，筑牢技术根基；坚持规则话语权与全球协作网双擎推进，促进规则重构；坚持本土语言赋能与文化认同培育双维支撑，巩固文化主体性；坚持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双帆引领，弘扬文明共识，最终消解词元税背后的文化殖民逻辑，实现 AI 时代文化多样性的守护与全球语言秩序的公平重构。

关键词：词元税；AI；文化霸权；大语言模型；文化主体性；认知安全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203-13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4.016

作者简介：胡珂，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解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3AKS021）

引用格式：胡珂，解超。“词元税”：AI 时代西方新型文化霸权的形成机制、深层隐忧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4): 203-21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22 年底 OpenAI 推出 ChatGPT 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大语言模型研发与应用的热潮。大语言模型凭借强大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迅速渗透至教育、科研、传媒、医疗、金融、法律等社会生活各领域，深度介入人类知识生产与文化创意过程。然而，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正在浮现：以英语为母语的用户在使用国际主流大语言模型服务时享有近乎“免费”的便利，而非英语用户尤其是低资源语言使用者，则需要支付更高的使用费用、占用更多算力资源，同时承受更慢的处理速度、更差的生成质量，相当于为使用母语缴纳了一笔隐性的“数字税款”。这一现象被学界形象地概括为“词元税”（Token Tax）^[1]。

表面来看，词元税似乎只是技术设计层面的细节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是 AI 时代文化霸权的新型表征与再生产机制。语言是文化的主要承载物，国际语言秩序常成为大国软硬实力的展示舞台，语言战略不仅是一种政策手段或资源调配方式，更是通过话语实践与言语行为来塑造认知框架、安全叙事与国际规范的过程^[2]。“大国往往制定相关的语言战略，为本国的语言在国际语言秩序中寻求制高点，由此扩张自己的软实力。”^[3]冷战以来，英语凭借英美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全球扩张，已成为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也成为西方推行文化霸权的核心工具。比如，美国接连通过“唯英语运动”“关键语言”战略等方式将语言问题安全化，维护英语霸权地位，持续侵蚀非英语国家的母语生态与文化认同^[4]。进入 AI 时代，语言文化间的不对称支配关系并未因技术进步而消失，反而借助大语言模型这一新兴技术形态，呈现出更隐蔽、更精细、更深层的表达特征，形成“词元税”。

国内外学界对这一议题已开展初步探索，但多数成果或侧重于技术层面剖析分词算法的不平等性，或聚焦于宏观层面讨论数字帝国主义的一般特征，而将词元税作为独立的新型文化霸权形式予以系统考察的研究尚付阙如。事实上，词元税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缺陷，而是深嵌于 AI 底层架构的文化霸权装置。它将英语中心主义植入算法的“原子层”，借技术理性的中立外衣掩盖文化偏见的实质，进而深刻塑造全球语言文化格局。因此，亟需解析“词元税”作为新式文化霸权形态的形成机制与潜在风险，并探寻这一难题的应对方案，以有效应对国际文化霸权新演变、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二、“词元税”作为新型文化霸权形式的生成机制

词元（Token）^[5]是大语言模型处理文本的基本单位，是介于字符与单词之间的子词片段。大语言模型接收用户输入信息后，先由“分词器”将连续的自然语言文本切分为一系列词元，再将这些词元映射为数字 ID 进入模型计算；模型输出同样是一串词元序列，最终由分词器反向解码为自然语言文本。看似技术中性的分词规则，实则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权力关系。“词元税”通过研发主导权、训练语料权、切分规则权、计价规则权与算法框定权这五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将英语中心主义层层叠加、层层固化，形成隐蔽而系统的西方新型文化霸权装置。

（一）研发主导权：词元税形成的源头性权力

谁掌握大语言模型的研发主导权，谁就掌握了塑造 AI 认知框架与价值取向的元权力，这是

“词元税”形成的前提。当前全球主流大语言模型，从 OpenAI 的 GPT 系列、Anthropic 的 Claude 系列，到 Google 的 Gemini 系列、Meta 的 Llama 系列，均由美英科技巨头主导研发。这些模型的核心研发团队以英语母语者为主体，产品设计、用户测试、评估基准等全流程均以英语使用场景为默认预设，从概念设计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都深深打上英语世界的烙印。

国际主流大模型研发主导权的高度垄断并非偶然，而是技术资本主义扩张与国家战略加持的双重结果。一方面，美国凭借先发算力优势、学术积淀、资本支持与人才机制占据深度学习革命的制高点，Transformer 架构、GPT 迭代、RLHF 对齐等技术突破均诞生于英语国家的实验室与科技企业；另一方面，美国垄断研发主导权，将 AI 视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以产学研一体构建创新生态，同时借芯片封锁、出口管制、排他性联盟等手段遏制他国技术追赶。比如，《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中明确将中国标记为 AI 领域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在联合国、OECD、G7 等国际组织中反对中国主导 AI 治理标准”“阻击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等行为构建“小院高墙”^[6]。

研发主导权的垄断，从根源上锁定了大模型的英语文化基因。分词器训练、词表构建、模型评估、价值对齐、交互范式等核心环节均按照英语规则进行设计，非英语语言与非西方文化只能作为“附加项”被边缘化纳入，无法成为平等的参与主体，而这损害了非英语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权。人工智能时代国家主权在技术维度的延伸集中体现为技术自主权，技术自主权在产业布局方面表现为主权国家对本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创新路径享有自主决定权，各国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和提升本国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创新能力^[7]。西方垄断大语言模型研发主导权，不仅限制了他国对 AI 技术路径的选择权，更将英语文化的价值预设固化为全球通用的技术标准，使技术自主权的缺失传导为文化主权的被动。

（二）训练语料权：词元税固化的底层数据支撑

研发主导权决定“由谁构建模型”，训练语料权则决定“模型学习什么”，这是词元税形成的数据根基。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能力、知识体系与价值取向，本质是训练语料统计规律的映射，而当前国际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呈现出英语绝对主导的失衡格局。

这种失衡体现在数量与质量的双重维度。数量上，以 GPT-3 为例，其训练语料中英语内容占比高达 92.6%，法语、德语占比仅 1.8%、1.5%，中文、印地语等全球使用人口超十亿的语言，占比不足 0.1%^[8]。作为大模型核心训练来源的 CommonCrawl 数据集，英文内容占比近半，而经过过滤的 C4 等高质量数据集，更是通过语言分类器剔除了大量非英语内容，让“洁净语料”近乎成为纯英语素材^[9]。质量上，高质量语料主要来自互联网，而全球互联网内容生产长期以英语为核心。大量学术论文、新闻资讯、技术资料 and 百科知识以英语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英语语料覆盖学术、技术、文化等全领域高质量文本，而非英语语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语言内容，在数字化、结构化上明显滞后，难以被模型大规模采集与使用。

训练数据的结构性分布不平衡，导致了“数据—能力”的双重压制循环。一方面，模型在学习中深度吸收英语文化的价值观与话语体系，进而形成内生的英语中心偏见；另一方面，语料失衡直接导致模型性能的语言等级差异。研究证实，主流大模型对英语的翻译效果最优，对汉藏语系等与英语差异较大的语言效果大幅下降，即使使用同一模型，英语提示下的答案准确率也远高

于其他语言^[10]。这意味着，非英语用户从根源上就只能获得“次级”智能服务。训练语料的英语主导地位，不仅在数据层面固化了不平等，还在模型性能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

（三）分词规则权：词元切分方式以英语体系为基准

分词规则将语料层面的语言不平等，转化为可量化、可计费的词元差异，这是词元税的直接技术来源。当前国际主流大模型普遍采用字节对编码（BPE）及变种算法（BBPE）进行分词，其核心逻辑是从字符级别出发，按语料中相邻字符对的出现频率，将高频组合合并为新的词元单位，直至达到预设词表规模。这套看似语言中立的算法，在英语主导的训练语料影响下，形成了极强的英语偏向。

由于BPE以频率为合并标准，训练语料中占绝对优势的英语会优先获得算法适配。英语常见单词可直接作为单个词元，高频词根词缀也被压缩为紧凑的子词单位，实现了词元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中文、阿拉伯语、印地语等非英语语言，则因语料占比低，算法无法为其定制高频合并规则，往往被拆分至字节级别。一个常见汉字需3个字节、一个藏文字符需4-6个字节才能完整表示，不同语言的分词长度差异最高可达15倍。用ChatGPT-4处理同一段文本，德语或意大利语所需的词元量比英语多出约50%^[11]。BPE算法对拼写变体、特殊符号、变音符号等“不规范”文本高度敏感，形态复杂、书写变异丰富的语言在分词时会遭遇更严重的碎片化处理，从而进一步推高词元消耗。随着多模态AI服务的普及，词元概念还将扩展至图像词元、音频词元和视频词元等新形态，不同语言+不同模态间的换算关系将使词元收费不平等现象更为加剧^[12]。新进入者即便拥有参数规模相近的模型，也可能因缺少高质量反馈数据而难以快速提升词元效率、扭转词元税现状^[13]。因此，当一套以英语为基准的切分规则被冠以“通用分词器”的名义在全球部署，语言不平等便通过人机交互被无声地转化为词元消耗的差异，为后续“征税”提供了可量化的技术标尺。

（四）词元计价权：定价机制由英美服务商单方制定

如果说前三个环节是技术层面的英语中心化，计价规则权则将技术不平等直接转化为经济层面的“征税”，促使词元税从技术概念转化为实质性的经济剥削，完成了从“差异”到“税”的关键跃迁。当前全球主流大模型服务商无一例外采用“按词元收费”的定价模式，输入与输出的每个词元都需按照既定单价计费^[14]。而这套计价规则完全由英美服务商单方制定，用户无议价空间，更无权改变分词结果。

“按词元收费”看似遵循“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商业逻辑，实则因分词机制的英语偏向，将技术不平等直接转化为经济不平等。表达完全相同的语义，英语用户支付最低成本，非英语用户尤其是低资源语言使用者，需支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费用。研究显示，西班牙语用户使用LLM的成本约为英语的1.5倍，印地语用户的成本可达英语的5~6倍，而宗喀语、奥里亚语等小语种使用者的成本甚至可高达英语的12倍以上^[15]。这笔税在每个词元、每个层级、每个变体上被反复征收，而低资源语言主体往往无力承担。“按词元收费”的定价机制存在透明度缺失与极大的操纵空间。最新研究证实，服务商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刻意选择更长的词元化方案以增加计费数量，即便对外公布分词算法，用户也几乎无法在合理成本内验证收费真实性，而“多报词元”的收益

远高于作弊算法的运行成本^[12]。这意味着词元税不仅是既定规则下的结构性不公，更可能是被主观放大的定向经济盘剥。

从本质上看，计价规则权的集中与垄断，是一种新型数字殖民手段。数字殖民主义的核心在于“对人类生活的数据化、资源化过程中建立的不平等占有关系”^[16]。词元税正是数字殖民主义在语言交互层面的具体呈现，并将数字殖民的逻辑推向极致。词元不仅是价值的载体和计价的标准，更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下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工具^[17]。它将语言差异转换为计价单位，以每次人机交互为触点实现悄然的价值转移。非英语世界的用户在享用大模型服务的同时，被迫承担隐形而持续的“语言税”，这些“税赋”最终累积为英语国家科技企业的利润。这一机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像传统殖民那样诉诸赤裸的暴力或显性的压迫，而是以“自愿购买”的市场契约形式与大批量的“数字劳工”参与，完成对非英语世界的财富攫取和经济殖民。从这一意义上讲，词元税已然超越了一般的技术不公，演化为以定价机制为媒介、以跨国资本为主体、以全球非英语用户为对象的新型经济剥削，从而构建起“技术—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殖民体系。

（五）算法框定权：以“算法转译”嵌入英语中心主义

前四重机制主要在“输入端”制造不平等，而算法框定权则在“输出端”完成文化霸权的最终闭环，使词元税从经济剥削升维成系统性的文化支配。大语言模型不仅是词元转换装置，更是整合了语言理解、逻辑推理、知识呈现与价值评判的复杂系统，当非英语文本被英语标准的分词器拆分输入后，模型的注意力机制与表征空间本身就以英语数据为主训练形成，非英语内容在模型内部必须经历“英语化”的语义转译。然而，算法层次的转译并不坚持语义中立，而是深度内嵌英语中心主义文化导向。一方面，模型处理非英语输入时，普遍采用“先转换成英语—再用英语推理—最后转回原语言”的隐性路径。这种方式在低资源语言中更为普遍，其实质是把非英语文化贬低为“英语的翻译目标”，而非平等的认知原点。另一方面，模型生成的非英语内容，其价值导向、叙事逻辑、知识体系，始终受英语训练数据的深度塑造，极易出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误读。例如，有研究运用准对照实验方法检验 ChatGPT 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倾向，发现 ChatGPT 自身的意识形态观点更靠近资本主义立场。在政府治理表现和政治制度议题上，默认状态的 ChatGPT 会为我国政府贴上“控制”“专制”“威权”等富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污名标签^[18]。

尤需警惕的是，大语言模型的“跨文化转译”过程出现“文化折扣”甚至“文化扭曲”的现象。当非英语文化的独特符号、叙事传统、价值理念被挤压进英语主导的表征空间时，许多精妙而珍贵的文化意义会在算法的“压缩—解压”中被稀释、产生畸变或丢失。已有研究表明，现有 AI 偏见评估基准在很大程度上折射西方观点，严重缺乏非洲文化背景与语境，导致模型常常对非洲文化形成刻板、简化或错误的表征^[19]。算法层面的“文化抹平”，表面上是表达统一，实质上是文化同化。它使得非英语用户在使用大模型时，不仅要支付更高的词元税，还要被动接受文化身份的“二次塑造”，落入语言霸权带来的隐性价值观规训^[20]。

综上，词元税的形成机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研发主导权决定技术路径的英语化走向，训练语料权确立模型认知的英语本位，切分规则权将这种不平等技术化、精细化，计价规则权将其经济化、商品化，算法框定权最终将其意识形态化并完成实质性的文化支配。这五重机制共同构

筑起一座以“词元”为计量单位、以“算法”为运行载体、以“商业服务”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新型文化霸权装置。与传统文化帝国主义通过电影、电视、图书、动漫等文化产品进行的外部输出不同，词元税的霸权逻辑深植于 AI 底层架构之中，以近乎“不可见”的方式嵌入非英语用户的人机交互，其隐蔽性、系统性、渗透性之强，远比传统文化霸权形式危害更大。

三、“词元税”作为新型文化霸权形式的深层隐忧

词元税是 AI 技术的伴生产物，伴随大语言模型的规模化应用向社会文化全域渗透，对人类文化繁荣与文明发展构成深层结构性挑战。结合当前大语言模型的运行现状与演进趋势，词元税的文化隐忧集中体现为固化语言阶级差距、强化知识生产不平等、损害非英语国家文化主体性、侵蚀世界文明多样性四大层面。

（一）固化全球语言阶级秩序，加剧数字时代的“语言不平等”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标识。传统社会的语言阶级差距集中体现为精英语言与大众语言、官方语言与方言的分野，而 AI 时代的“词元税”则以大语言模型的可识别度、使用成本、运行效率为标尺，重构了一套全新的全球语言阶级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英语凭借研发主导权、训练语料占比、分词规则适配、计价成本的绝对优势，稳居体系顶端，成为 AI 时代的“特权语言”；法语、西班牙语等虽获主流模型有限支持，但在词元消耗与生成质量上存在明显短板，处于第二梯队；非洲、东南亚及美洲原住民低资源语言被挤压至体系底层，不仅使用成本数倍于英语，甚至无法实现基本的语义准确理解与自然生成。这一层级划分与语言本身的文化价值无关，完全由技术霸权与资本逻辑塑造，本质是数字时代语言权力的再分配。

这种分配格局直接造成了双重不平等。全球层面，英语使用者可以低成本享受最优智能服务，无障碍获取全球知识、参与国际对话；底层语言使用者则面临无形的“数字语言壁垒”，要么被迫转向英语降低成本，要么承受高昂成本仅能获得次级服务，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智能时代红利之外。国家内部层面，非英语国家的英语精英阶层可绕过词元税束缚，直接以英语与大模型高效交互，获得更强的生产力工具与信息优势；仅掌握母语的普通民众则被困于“高税区”，承担更高成本、享受更差服务。数字鸿沟的表现从“有网与无网”的接入差异，升级为“以何种语言接入 AI”的深层权利差异，最终让语言成为数字生存的新型“阶层身份证”。

此外，语言阶级的固化还会反向侵蚀语言生命力。低资源语言在大模型系统中的边缘化，会导致其使用者逐步减少母语在数字空间的使用，陷入“使用越少—模型优化越差—使用成本越高—使用者越少”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令语言的数字化传承陷入困境，更会加速濒危语言的消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数字时代的语言不平等从技术层面，渗透到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维度。

（二）重塑知识生产权力格局，强化“英语中心—他者边缘”的认知霸权

知识生产是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谁掌握知识生产主导权，谁就掌握文明发展的话语权。大语言模型时代，AI 深度介入知识检索、整合、创造、传播的全链条，而词元税催生的语言不平等，

正通过多重路径向知识生产领域渗透，构筑起新型全球知识生产等级制度。

其一，词元消耗形成知识生产的效率壁垒。非英语文本分词需占用更多词元，直接导致非英语用户交互时的上下文窗口被过度消耗。以 GPT-4 早期 32K 模型版本为例，英语可容纳约 24 000 个单词，低资源语言常因单词语义拆分更细而容量大幅缩水。面对同等规模的科研资料，英语研究者可一次性全量处理，非英语研究者则需反复切片、分段输入，长文献分析、复杂逻辑推理、多轮深度对话的效率与深度被严重压缩。

其二，模型偏向加剧知识生产的质量鸿沟。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以英语为核心，对非英语语言的知识体系、专业术语、本土概念框架的理解深度与表征精度存在天然局限，非英语语境的学术内涵与文化价值常被简化、误读甚至扭曲。叠加词元成本压力，非英语用户往往只能选择基础版本、缩短交互轮次等，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深度推理与知识整合服务；而英语用户则可以低成本解锁高级功能，轻松生成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与创意内容。

其三，成本倒逼强化英语的学术垄断地位。为规避高昂的词元成本，非英语国家研究者不得不优先选择英语作为学术成果的载体，从论文撰写、项目申报到国际会议交流，英语成为降低“语言税负”的最优解。这种个体理性选择将推动全球学术资源进一步向英语集中：英语论文更易被主流大模型索引、分析与传播，学术影响力的扩散效率远超非英语成果；非英语学术文本则可能因词元成本高、模型理解度低，逐步被排除在全球知识共享核心圈层之外。长此以往，英语将从学术交流工具异化为知识生产的“准入门槛”。只有用英语表达的知识，才能获得广泛传播、主流认可与资源倾斜，非英语知识体系被持续挤压至边缘，进而损害其学术自主性^[21]。

其四，算法内嵌同化知识生产的认知结构。大模型的英语本位训练数据与算法逻辑，使非英语用户在知识生产中不得不适配英语的认知框架。借助大模型完成文献综述、假设构建、结论推导时，模型输出内容往往内嵌英语文化的思维路径，这种隐性引导会促使研究者不自觉地向英语认知模式靠拢。长期依赖此类模型开展知识生产，会逐步削弱非英语文化的认知创新能力，导致非英语知识生产脱离本土文化根脉，沦为英语认知霸权下的“二次加工品”，进一步固化“英语中心—他者边缘”的全球知识权力格局。

（三）损害非英语国家文化主体性，消解文化主权的语言基础

文化发展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主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独立塑造文化表达、有效传承文化根脉的关键要素，是文化主权的核心内涵，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数字平台垄断构建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统摄全球文明的“数字世界新文明”，并主要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在全球展开殖民掠夺^[22]。词元税作为深嵌于大语言模型底层架构中的文化霸权装置，正从多重维度对非英语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构成严峻挑战。

一是创作端陷入“被动适应”的路径依赖。非英语文化创作者若想高效利用 AI 工具，必须主动调整语言结构与表达形式，以贴合英语主导的词元切分规则与模型认知框架，比如减少本土语言的复合词、文化隐喻与特色表达，转而采用贴合英语语法逻辑的句式。这种为降低成本的“自我调适”会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创作偏离原生轨道，逐步丧失独立性与内生性，在迎合西方 AI 模型设定的文化框架中降格为英语文化体系的“附属品”。当 AI 工具越来越成为文化生产的必要辅助手段，这种被动妥协将形成不可逆的路径依赖，持续压缩本土文化表达空间，消解非英

语国家自主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能力。

二是载体端削弱本土语言的文化承载功能。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使用范围与活跃程度，直接决定其承载文化的繁荣度。词元税通过双重路径削弱非英语语言的文化承载力。一方面，高额使用成本推动本土语言在数字空间持续边缘化，不少非英语国家的企业为降低 AI 运营成本，将客服系统、内容生产、商业营销等场景从本土语言切换为英语，直接拉低了本土语言在数字空间的活跃度。另一方面，模型效果差异贬损了本土语言的表达价值，当大模型对本土语言的处理能力显著弱于英语时，用户极易产生“母语不如英语智能”的错误认知，潜移默化中动摇对母语的文化自信，消解语言背后的文化认同根基。

三是传播端陷入跨国发声的“失声”困境。在当前的文化对外传播链条中，非英语国家普遍需要借助 AI 工具完成内容翻译、适配与推广，而词元税从三个维度构筑了传播壁垒。首先，高额词元成本抬高了传播门槛，非英语内容的多语言转译需支付数倍于英语的费用，大量中小文化机构与独立创作者可能因无力承担成本而被迫放弃跨国传播尝试。其次，模型对非英语文化的语义理解存在天然局限，本土文化符号与民俗概念的缺失，极易导致转译过程中文化内涵的偏差、流失，甚至掺杂西方视角的误读与偏见。最后，国际主流 AI 平台的算法推荐逻辑以英语内容为核心，使得原本中立的“算法一般”演化为“算法控制”^[23]，非英语文化内容的曝光权重极低，即便投入高额成本也难以进入全球受众的核心视野。目前大模型正逐渐成为全球青年认知世界文化的重要窗口，“高成本+低效果”的传播困境，将使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对外传播陷入持续性“失声”，进一步加剧全球文化传播的失衡。

（四）破坏世界文明多样性，制约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24]而词元税以技术中立之名，行文明筛选之实，将人类语言的千姿百态强行压缩进英语主导的词元空间，深度侵蚀世界文明多样性，对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构成严峻威胁。

第一，加速濒危语言及其承载文明的断代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现存约 7 000 种语言，其中 40% 面临濒危风险^[25]。前大模型时代，语言濒危主要由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徙等因素导致。大模型时代，词元税成为加速语言消亡的新变量。当前主流大模型的语言覆盖不足 100 种，意味着全球超 98% 的语言被排除在 AI 时代的话语权之外^[26]。这些被技术“除名”的语言连同其承载的宇宙观、伦理体系、口传智慧与历史记忆，正加速滑向不可逆的失传深渊。在大语言模型成为人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新工具的趋势下，无法被模型有效处理的语言将持续被边缘化，年轻一代可能因“AI 不懂我的母语”逐步放弃母语使用，导致附着于母语之上的独特文化遗产的同步消亡。

第二，瓦解文明间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基础。文明多样性的存续，核心在于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双向互鉴。但在词元税介导的跨文明交流中，非英语文明的话语必须经过英语中心模型的高成本“转译过滤”，其独特的文化隐喻、价值观念与表达逻辑常被简化、误读，导致对话双方无法触及彼此的文化内核。这种“对话不对称”，不仅削弱了非英语文明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发声能力，更让文明互鉴沦为“以英语为标尺”的单向评判。非英语文明必须将自身表达转化为符合英语模型的话语，才能获得被倾听的机会，而英语文明无需做出任何适配调整，这本质是

“文明优劣论”在数字时代的新型再现。长此以往，全球文明对话将演变为英语主导的“独白”，而非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的“合唱”。

第三，助推全球文明的同质化危机。国际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以英语文化内容为核心，其生成内容天然内嵌西方文化的叙事逻辑、价值取向与审美偏好。非英语国家创作者依赖此类模型开展文化生产时，其作品会不自觉地向英语文化范式靠拢，如本土神话被赋予西方英雄叙事结构、传统艺术被简化为符合西方审美的符号、本土社会表达逐步模仿英语世界的话语体系等。这种“文化削足适履”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词元税机制下的被动结果。非英语文化的独特元素，在词元切分、语义理解、内容生成的过程中被持续“修正”，粗暴融入英语中心的单一化、单向度文化框架，将极大抹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及在“各美”中寻求共识、在互鉴中共同进步的可能性。

四、“词元税”的中国应对方案

面对词元税催生的新型文化霸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新兴 AI 强国，既需守护自身文化主权，也肩负推动构建公平普惠的 AI 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使命。

（一）筑牢技术根基：自主大模型与中文语料库双轮驱动

自主可控的大模型和民族语料是破解“词元税”困局的治本之策。一国语言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水平，决定了其国际竞争中的安全权重与位势。唯有打造对中文友好、算力均衡、自主可控的大模型，构建高质量中文语料库，才能从技术源头瓦解英语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一方面，我国需加大对自主大模型研发的战略性投入，优化中文分词与词元效率。国家需加大国产大模型战略投入，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在模型架构、训练算法、分词机制、对齐技术等核心环节实现突破。尽管 DeepSeek、Qwen、文心一言、豆包、GLM 等国产大模型正在跻身国际第一梯队，部分指标已实现对国外主流大模型的超越，如 DeepSeek-V4 采用字节级 BPE 优化分词器，词表规模 128K，显著提升了中文及多语言压缩效率，降低词元消耗，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需重点研发适配中文形体繁难、语义复杂等表意特性的分层分词、语义认知分词方案，替代以拉丁文字为核心的传统 BPE，从底层减少中文词元拆分数值，解决“中文高税”痛点。同时，要开源多语言技术成果，推动国际分词标准向多元公平演进。

另一方面，高质量中文语料库的建设是自主大模型得以真正发挥优势的前提。语料库是大模型能力的材料支撑，也是破解词元霸权的基础工程。当前国内多数大模型训练数据中，中文占比较高，但全球占比仍严重失衡。阿里研究院 2024 年发布的《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显示，互联网上中文语料与英文语料占比极为悬殊：在全球网站中，英文占比高达 59.8%，而中文仅占 1.3%。尤其是文言文、传统文化内容、本土主流媒体文本等反映中华文化价值取向的语料严重匮乏。对此，需系统推进三大举措。一是文化资源数字化，加速中华典籍、古代文献、学术论文、新闻档案、俚语成语等五千年文明资源的结构化、标准化转化，完善文化资源数字化采集存储机制，优先推进数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27]，加强中华文化数据标注，将文化瑰宝转为高质量训练数据。二是中文生态规范化，鼓励原创优质中文内容创作，规范互联网中文数据治理，提升中文

数据质量与多样性。三是多语种库协同化，建设覆盖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一带一路”语种的多语种语料库，支撑多语言大模型研发。依托国家关键语料库共建共享计划，建成国家语言文字大数据中心，从根本上扭转中文语料弱势局面。

（二）促进规则重构：规则话语权与全球协作网双擎推进

词元税的形成与扩散，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 AI 治理规则的不完善与不公正。破解困局需在国际规则层面展开持久博弈，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多元包容的 AI 全球治理新秩序。

其一，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将“语言公平”等观念纳入国际 AI 治理核心框架。2023 年 10 月，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六项基本原则^[28]，明确主张“助力全球南方真正接触和应用 AI，推动 AI 包容普惠发展”；2025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29]，进一步将倡议从理念落地为行动方案，为全球 AI 治理提供了与“美式霸权”截然不同的东方方案。词元经济关系到智能时代的语义秩序和文化安全^[30]，未来需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系统提出“词元公平”专项倡议，反对以词元计价变相实施语言歧视，推动建立跨语言词元换算的中立标准，出台多语言分词标准、AI 模型语言公平性评估标准、AI 服务计费透明度标准等硬性规范，并呼吁主流模型降低非英语语言使用成本、开放低资源语言支持技术，从规则层面遏制词元霸权扩散。

其二，团结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反霸权技术合作网络。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与负责任大国，应发挥自身在 AI、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以“造船出海”的模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打造本土化 AI 基础设施与大模型产品，发展开放性战略自主的“主权人工智能”^[31]。具体而言，可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中国自主大模型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的本地化部署，为当地用户提供价格合理、语言友好、文化契合的 AI 服务；通过开源社区开放共享中国在多语言处理、低资源语言支持等领域的技术成果；通过国际培训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本土化 AI 人才，提升其自主发展 AI 的能力。以务实合作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形成抵御词元霸权的协作网络，推动构建普惠均衡、团结互助的 AI 发展模式。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本土语言赋能与文化认同培育双维支撑

本土语言的数字生命力与全民文化认同，是破解词元税文化侵蚀、守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内生防线。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载体，唯有筑牢本土语言在 AI 时代的数字生存根基，厚植全民对母语文化的价值认同，才能破解英语中心主义的文化同化逻辑，自觉守牢国家文化安全的底线。

一方面，全面推进本土语言数字生态建设，为中文及多民族语言的 AI 应用深度赋能。需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统领，推动政务服务、国民教育、主流媒体、实体经济等公共领域与关键场景建立 AI 应用规范，从制度层面保障本土语言在 AI 交互中的主体地位。当前，国内政务服务智能终端、基础教育领域智能教辅、国家级媒体智能创作平台已全面实现中文原生交互，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智能助手完成本地化适配，初步构建起本土语言 AI 应用的基础框架。未来需重点破解本土语言在 AI 场景中的适配痛点，推动国产大模型持续优化各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分词效率与生成质量，全链条降低本土语言 AI 应用的使用成本，打破“用母语

成本高、体验差”的恶性循环。同时，搭建本土语言数字创新孵化平台，鼓励内容创作者、技术开发者围绕中文及多民族语言打造特色 AI 产品，深度激活本土语言在数字空间的传播力与生命力，让母语成为 AI 时代的“优先选择”而不是“高成本选项”。

另一方面，全民母语文化认同的培育是本土语言生态得以持续繁荣的价值前提。“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素养。”^[32]文化认同是语言使用的内生动力，也是抵御词元税背后文化霸权的精神根基。一是实施母语价值普及工程，面向全社会厘清词元税的本质与文化危害，破除“母语效率低下”“母语交互能力弱”等错误认知，讲清 AI 时代母语使用对文化安全的不可忽视意义，提升全民母语自信。二是实施文化根脉活化工程，依托 AI 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语化、年轻化、数字化传播，打造以中文为核心载体的 AI 文化产品，让年轻一代在 AI 应用中深度接触本土文化内核。三是实施全民参与共建工程，鼓励学界、产业界、文艺界与普通公众共同参与本土语言 AI 生态建设，形成“爱护母语、乐用母语、传承母语”的良好氛围，从认知端筑牢文化主权的全民防线。

（四）弘扬文明共识：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双帜引领

词元税的深层危害是文明霸权对多样性的扼杀。破解困局需超越技术与经济层面，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树立“文明平等、多元共生”的核心理念，取代文明优劣、单极支配的思维，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超越文明冲突割裂的逻辑。

一方面，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 AI 时代文明新秩序。202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33]。这一重大倡议超越了“文明的河流只有西方这一条”的一元文明论^[34]，为应对 AI 时代包括词元税在内的各种文化霸权挑战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指南。在 AI 领域践行这一理念，需要反对文明优劣论、文明阶级论等错误思潮，拒绝以语言技术优势判定文明高下；倡导各美其美，为每一种语言、文化保留 AI 时代的表达空间；推动美美与共，以 AI 为桥梁促进文明平等对话，摒弃“英语独白”的霸权模式，构建多元文明“合唱”的新格局。

另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 AI 治理变革。词元税引发的语言歧视、文化失衡、文明多样性消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反对词元税、破解文化霸权、维护文明多样性，不仅是维护非英语国家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与实践者，应以更加自觉的使命担当，将全球 AI 治理的改革推向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新阶段，为人类文明在 AI 时代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实现繁荣发展贡献应有的大国力量。需在全球 AI 治理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词元规则向公平普惠倾斜；批判将 AI 作为西方霸权工具的狭隘做法，倡导 AI 技术造福全人类，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全球 AI 词元治理迈向更加公平、包容、多元的新阶段，为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LUNDIN J M, ZHANG A, KARIM N, et al. The Token Tax: Systematic Bias in Multilingual Tokenization [C] // Proceedings of the 7th Workshop on Africa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abat: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6.

- [2] 曹一轩. 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战略: 功能、目标与机制研究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6 (3): 20-29, 160.
- [3] 周明朗. 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 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 (教育) 战略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45-56, 154.
- [4] 陈新仁, 方小兵.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 [5] 张守营. Token定名“词元”AI时代有了自己的“度量衡” [N]. 中国改革报, 2026-03-30 (1).
- [6] 肖茜. 两份文件凸显中美AI发展理念差异 [N]. 环球时报, 2025-08-08 (14).
- [7] 赵精武. 人工智能治理中的技术自主权 [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5 (1): 94-112, 154-155.
- [8] BROWN T B, MANN B, RYDER N, 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Learners [C] //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3 (NeurIPS 2020). Virtual: Curran Associates, 2020.
- [9] RAFFEL C, SHAZEER N, ROBERTS A, et al.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ransfer Learning with a Unified Text-to-Text Transformer [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20 (140).
- [10] ZHU W H, LIU H Y, DONG Q X, et al. Multilingual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Empirical Results and Analysis [EB/OL]. (2023-04-10) [2026-06-15]. <https://arxiv.org/abs/2304.04675>.
- [11] PETROV A, LA MALFA E, TORR P H S, et al. Language Model Tokenizers Introduce Unfairness Between Languages [C] //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6 (NeurIPS 2023). New Orleans: Curran Associates, 2023.
- [12] 蒋慧. 算力计量法治化: 词元计量交易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因应 [J/OL]. 广西社会科学, 1-10 [2026-06-16]. <https://link.cnki.net/urlid/45.1185.C.20260506.0912.002>.
- [13] 欧阳日辉, 黄芝萱. 词元 (Token) 经济的内涵特征、基本规律与发展策略 [J/OL].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15 [2026-06-16].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521.C.20260609.0929.002>.
- [14] SENNRICH R, BIRCH A, CURREY A, et al.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s Neural MT Systems for WMT17 [C] //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achine Translation. Copenhage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7.
- [15] ARTOLA VELASCO A, TSIRTIS S, OKATI N, et al. Is Your LLM Overcharging You? Tokenization, Transparency, and Incentives [EB/OL]. (2025-05-27) [2026-06-15]. <https://arxiv.org/abs/2505.21627>.
- [16] HUANG K Y, MO F R, ZHANG X Y, et al. A Survey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with Multilingualism: Recent Advances and New Frontiers [EB/OL]. (2024-05-17) [2026-06-15]. <https://arxiv.org/abs/2405.10936>.
- [17] 蔡万焕.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词元的性质及对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的重构 [J/OL]. 天府新论, 1-12 [2026-06-15].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035.c.20260414.1518.002>.
- [18] 朱尉, 高强. ChatGPT对美国两党和中美两国的政治偏见及意识形态风险 [J]. 阅江学刊, 2025 (1): 102-118, 173.

- [19] LE BEUX Y, AUDU O, ANKELI O D, et al. AfriStereo: A Culturally Grounded Dataset for Evaluating Stereotypical Bia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C] //Proceedings of the NeurIPS 2025 Workshop on Centering Low-Resourc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Ag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Vancouver: NeurIPS, 2025.
- [20] 张耀军, 杨隽瑶.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语言安全风险及应对路径 [J]. 世界社会科学, 2025 (5): 59-73, 243.
- [21] 王春辉. 人工智能时代语言研究“第五范式”论略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6 (3): 14-27.
- [22] 王海建.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 (3): 128-137.
- [23] 黄岩, 余杭佳. 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应对 [J]. 实事求是, 2025 (6): 64-72.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464.
- [25] UNESCO. La UNESCO celebra el Decenio Internacional de las Lenguas Indígenas. [EB/OL]. (2022) [2026-06-15]. <https://www.unesco.org/>.
- [26] 世界经济论坛. 生成式AI仅训练全球少数语言 [EB/OL]. (2025-10-06) [2026-06-15].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5/10/generative-ai-languages-llm/>.
- [27] 曾志辉, 翁培滨.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主权安全的三重审视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4 (6): 14-16.
- [28]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EB/OL]. (2023-10-20) [2026-06-15].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10/t20231020_11164831.shtml.
- [29]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 [EB/OL]. (2025-07-26) [2026-06-15]. 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507/t20250726_11677803.shtml.
- [30] 李国庆. “人工智能+”背景下词元经济的技术内涵、产业逻辑与治理体系 [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2 [2026-06-16].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515.1040.004>.
- [31] 张书言, 陈志敏. “主权人工智能”在“全球南方”的兴起及中国的合作应对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6 (3): 104-132, 159-160.
- [32] 罗常培. 中国语言与文化 [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7: 24.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435-436.
- [34] 秦龙, 李维光. 深刻把握全球文明倡议的文明境界 [J]. 2024 (10): 44-48.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新门罗主义与联盟交易化互构下美国霸权形态转型及中国应对

戴维来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面对全球霸权承诺成本飙升、相对优势收窄及国内政治约束加剧的多重挤压,美国正加速重塑其霸权控制模式。新门罗主义聚焦于强化西半球控制与抢占全球关键功能节点,重划霸权经营的地缘空间圈层;联盟交易化则通过将安全承诺条件化、安全与经济议题嵌套化、联盟决策权力集中化,试图将前沿防务成本与地区安全责任转嫁盟友。二者交织互嵌,共同构建条件控制型霸权这一全新形态。美国在保留既有制度安排与联盟体系外壳的前提下,缩减普惠性公共产品供给,转而凭借差序准入、动态对价与可控不确定性来规训并钳制他国。这一模式虽能暂时缓解美国的资源压力,但势必加速制度信誉透支,倒逼盟友谋求战略自主,推升国际秩序的阵营对立与体系分化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由局部零散的具体摩擦,演变为周边安全、海外利益、产业链重塑与全球治理机制等相互传导的结构性约束。为此,中国应深耕稳固周边战略依托,筑牢海外利益安全屏障,强化产业科技自主韧性,主动拓展多边制度空间,全面提升对外部环境的长周期、系统性塑造能力。

关键词: 美国霸权; 新门罗主义; 联盟交易化; 条件控制型霸权; 中国安全环境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4-0216-17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17

作者简介: 戴维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三期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25FDLDGC03)

引用格式: 戴维来. 新门罗主义与联盟交易化互构下美国霸权形态转型及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4): 216-23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视角

2025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集中体现美国对外战略重组的基本方向，并释放出两个核心信号。其一，美国将西半球重新界定为必须稳固控制的核心战略空间。文件明确提出要“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反对“域外竞争者”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控制关键资产或深度介入基础设施与供应链布局。西半球在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其二，把盟友关系纳入成本核算框架。美方强调不再无条件承担全球秩序的主要维护成本。未来，各国唯有分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出口管制等议题上与美国协调配合，方能获取优厚的商业待遇。安全保护的强度将依据伙伴国的实际贡献动态调节^[1]。配合该战略，美国在多条战线同步推动军事与经济部署。2025 年 6 月，北约海牙峰会在美方持续施压下达成协议，承诺于 2035 年前将成员国军费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2]。2026 年 1 月起，美国在拉美和中东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共同印证美国重划战略空间、重估盟友关系的清晰政策主线。

冷战后美国霸权的长期韧性，根植于物质实力与制度建构的双重协同优势。美国通过将自身实力嵌入全球制度体系，使之转化为国际通行规则，依托开放市场、金融维稳、安全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塑造出盟友主动追随的理性秩序格局。霸权稳定与联盟政治研究反复强调，秩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实力供给、信誉积累与盟友预期的可兼容性。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和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则进一步指出，霸权国依靠利益分配机制与正当性叙事塑造，即可稳固次级国家的秩序认同^[3]。伊肯伯里提出的“战略克制”理论，更为精准地揭示制度领导型霸权的存续核心，即霸权国通过制度约束自身权力、克制单边行为，消解中小国家的安全顾虑，以此维系长期领导力与制度黏性^[4]。该逻辑也是冷战后美国制度领导型霸权的核心支撑。但近年来，美国力量衰退打破这一平衡。制造业外流、社会分裂、债务高企与政治极化持续消耗美国战略资源，高昂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与海外防务投入，使美国传统霸权运作模式难以为继。霸权国采取一系列的护持行动，新兴崛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5]。为此，美国主动收缩调整战略布局，一方面收紧西半球核心地缘控制权，另一方面重构同盟责任分担机制，开启霸权形态的系统性转型。

学界围绕美国本轮战略变革形成三条核心研究脉络。第一，新门罗主义研究。现有成果多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当代实践，重点分析其对华竞争属性及对拉美地缘格局的冲击^[6]，探讨了“新门罗主义”的前景^[7]，但普遍将其局限为拉美区域政策工具，较少纳入美国整体霸权重构的宏观框架，也少有关同盟体系变革展开整合分析。第二，交易式外交研究。学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未创设全新外交逻辑，只是将美国长期潜藏的霸权矛盾显性化，彻底解构传统自由主义制度叙事。辛科宁（Ville Sinkkonen）将特朗普主义定义为交易导向的现实主义^[8]。布兰兹（Hal Brands）指出，特朗普对同盟、负担分担和国际领导方式提出系统性质疑^[9]。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特朗普对传统联盟与自由国际主义叙事的冲击^[10]，但关于联盟交易化与地缘空间优先序调整的结构性关联及二者是否共同塑造新型霸权形态，现有解释仍有拓展余地。第三，对华战略竞争研究。2017 年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后，技术脱钩、盟友动员、战略遏制成为研究热点^[11]。孙兴杰^[12]、曹玮^[13]等揭示战略收缩与同盟牵连之间的关联，刘丰则系统梳理了美国的联盟管理逻辑及其对华影响。综上，既有研究尚未解答新门罗主

义与联盟交易化究竟是孤立的政策调整,还是美国霸权体系重构的一体两面,二者的耦合逻辑及对全球秩序、中国战略环境的重塑机制,仍有待深入阐释。

破解这一问题,需要突破单一区域、单一机制的碎片化研究视角,立足霸权运作的两大核心支点展开整合分析,即地缘空间控制与同盟成本动员。从霸权运作底层逻辑来看,全球霸权的维系始终依托双重支撑,一是精准的地缘空间分层管控,明确核心腹地与前沿地带的治理差异,排他性阻隔域外力量介入;二是高效的同盟动员机制,通过权责分配撬动盟友分担战略成本,支撑前沿战略存在。当前美国战略转型呈现清晰的差异化、联动化特征。西半球作为核心战略腹地,实施排他性管控,聚焦供应链安全与战略纵深建设;欧洲、印太等前沿区域,大幅压降美国直接战略投入,全面推行利益置换、条件捆绑的交易式同盟模式。由此,空间面与机制面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西半球腹地的稳固,降低美国对前沿盟友的战略依赖,大幅提升同盟议价能力;而前沿安全承诺的条件化、工具化,加剧盟友对美国战略信誉的质疑,倒逼美国进一步巩固本土周边与西半球战略基本盘。整体而言,美国正摒弃依托制度信誉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传统霸权模式,转向成本导向、差异化管控的新型霸权形态,通过核心区域排他治理、前沿区域条件置换的双重路径,实现战略收缩与资源聚焦的精准落地。它是美国霸权被动调适、提质降本的战略结果。

二、新门罗主义与美国霸权重组的空间逻辑

霸权秩序的存续始终以空间控制为物质根基,权势投射必须依托特定地理单元、战略通道与资源节点落地生效。冷战后较长时期内,美国凭借制度优势、全球联盟网络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以相对均质的治理模式维持广覆盖、分层级的全球空间秩序。进入大国竞争新阶段,传统高投入、广辐射的空间经营模式面临成本与效能的双重失衡,关键资源、供应链与战略通道的竞争价值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启动地缘空间优先序的系统性重构,为条件控制型霸权构筑稳固的空间底座。

(一) 西半球从后院到战略腹地的功能升级

门罗主义是贯穿美国外交史的核心地缘政治传统,本质是划定西半球排他性秩序边界,从法理与政治层面排斥域外大国介入美洲事务。自 19 世纪提出以来,该原则随美国实力地位与国际环境演变不断纳入新内涵,从最初的洲际政治隔离原则,逐步拓展至安全干预、经济支配与区域秩序主导等多重维度,成为美国构建周边秩序的核心话语工具。赛克斯顿(Jay Sexton)认为,门罗主义是一种不断获得新解释、持续注入新内涵的政治传统,具体指向随美国实力地位与外部环境演变而动态调整的政策^[14]。由此可见,美国长期试图把西半球塑造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排他性空间,并在其中确立由自身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

新门罗主义承袭门罗主义的核心逻辑,同时推动西半球的战略功能完成本质升级。传统“后院”定位以地理邻近性与历史影响圈为核心,侧重发挥安全缓冲与势力范围维护的防御性功能。当前美国将西半球升级为支撑国家安全、资源保障、产业韧性与全球竞争力的核心区域,将其定位全面转向战略腹地建设,兼具地理纵深与功能支撑双重属性,既是保障本土安全的战略后方,也承载关键矿产供给、近岸制造业布局与战略通道管控职能,为本土经济韧性与全球大国博弈提

供底层支撑。

这一变化源于美国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所面临的成本约束。全球投入持续推高财政和政治负担，国内社会分化与战略疲劳削弱美国维系全球承诺的能力。全面收缩会损害美国影响力，均衡投入又难以为继，因而美国转向重划空间优先序。两难之下，美国通过重划空间优先序实现战略资源聚焦。西半球凭借毗邻本土的低管控成本、优越的资源禀赋、密集的战略航道与紧密的制度联系，成为成本收益比最优的战略锚点。

（二）西半球腹地化的推进逻辑

第一，经济安全空间的再边界化。新门罗主义的现实指向，是把西半球从传统势力范围进一步塑造为经济安全空间，将关键矿产、近岸制造、港口网络、航运咽喉和产业韧性纳入同一套半球控制体系。关键矿产在当代大国竞争中的价值迅速上升。拉美拥有全球约 61% 的锂储量，主要集中于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构成的“锂三角”；自 2004 年以来，拉美贡献了全球铜矿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巴西稀土储量可观，占全球储量的 23% 左右，居世界第二位^[15]。在美国看来，效率优先的全球化配置已难以适应战略竞争需要，关键资源、关键中间品和关键通道必须更多置于本半球或美国可持续施压的区域之内。由此，美国逐步将西半球纳入经济安全内层圈，并要求其承担稳定资源供给、提供产业备份、保障战略通道和支撑本土产业安全的复合功能。所谓“腹地化”，首先表现为美国收紧经济安全边界：美国不把拉美单纯视作市场、能源来源地或政治影响圈，而将其作为本土经济韧性与全球竞争能力的外部延伸。

第二，域外存在的泛安全化。西半球腹地化需要一套能够改变议题性质的解释机制。新门罗主义的核心话语操作，是将域外国家与拉美国家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合作，系统性纳入国家安全与半球安全的解释框架。一旦美方给港口运营、矿产开发、通信基建、物流节点布局等常规经济活动贴上“战略渗透”“关键资产失控”的标签，这些活动便会从市场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直接进入美国的政治干预议程。安全化在此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抬高中国等域外力量参与拉美合作的政治成本，使相关国家在项目审批、融资安排和技术选择中承受更强的制度与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将经济管控包装为维护区域共同安全的责任，为美国的审查、干预、施压和排斥提供正当性资源。该机制重塑区域合作的合法性边界。当决策者反复用“可信供应商”“数据主权”“供应链韧性”等安全滤镜审视企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数字技术合作时，地缘政治合规性检验便会首先筛选技术标准、融资模式和运营主体，从而将效率、需求和发展收益推向次要位置。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由此悄然收缩。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2026 年 3 月，特朗普召集 12 位拉美领导人举行“美洲之盾”峰会，以安全名义施压拉美国家减少对华合作^[16]；美国将中国在拉美的基础设施合作污名化为“情报收集与太空能力拓展工具”，均是安全化话语的典型实践。当然，这类话语并不限于拉美，也服务于美国对盟友的交易化动员。只有把对华竞争持续框定为共同安全问题，美国才更容易要求盟友在技术管制、供应链重组和市场准入等议题上让渡自主空间，并把相关配合包装为共同安全责任。

第三，工具手段的复合化。新门罗主义已突破传统军事威慑和政治干预范围，形成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多维度嵌套的政策工具矩阵，通过差异化施策与多手段协同，构筑起立体式空间控制网络。政治层面，美国通过支持特定政治力量、介入他国内政和推动政权更迭议程影

响地区政治走向。经济层面，美国灵活搭配制裁胁迫、关税威胁、投资审查与金融支持等工具，频繁援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实施次级制裁，迫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利益与对美关系之间选边站队。针对不同国家的战略价值与博弈态势，美国采取精准差异化策略：面对巴西卢拉政府的强硬立场，美方在关税施压上有所克制，避免推高国内消费品价格、倒逼巴西进一步靠拢域外大国^[17]；对陷入经济困境的阿根廷，则通过美元互换、汇率支持等金融工具强化经济绑定，巩固对美依赖^[18]。法律与监管维度上，美国通过合同审查、特许权重估、司法干预等方式争夺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2025—2026年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权更迭事件中，美方通过推动司法裁定、高层外交施压等手段，迫使巴拿马废除原有合同并将运营权移交西方企业。舆论普遍将该事件视为中美在拉美地缘博弈的典型缩影，彭博社将整起事件定性为中美在拉美的“代理之战”^[19]。在必要情形下，美国还会诉诸军事威逼乃至直接干预，呈现出“炮舰外交”的极端形态。2026年1月3日，美军入侵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总统马杜罗夫妇。随后，特朗普声称美国将“管理这个国家，直到完成权力过渡”，并进一步提出吞并委内瑞拉、使它成为美国第51个州^[20]。美方过去长期顾忌军事冒险可能推高能源成本，但当前态势已明显变化。美国实质性掌控西半球石油资源，直接支配全球约四成石油产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采取极端地缘行动的后勤约束，也为颠覆马杜罗政权、军事打击伊朗提供更大底气。外交施压贯穿上述行动链条，美国依托高层互访、强硬辞令和国际组织话语权，持续向拉美国家传递政策信号，要求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议题上对齐美国立场。学界与舆论将当代实践统称为“特朗普门罗主义”（简称“唐罗主义”）。该模式彻底背离原初克制精神，异化为以半球安全为名的权力扩张工具^[21]。

（三）新门罗主义的空间外溢效应

若仅将新门罗主义定位为美国对西半球“后院”的秩序整肃，不足以把握深层战略逻辑。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提出“特朗普式门罗主义推论”，禁止“半球外竞争者”在美洲部署力量或掌控战略性关键资产；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进一步将管控范围延伸至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与“美国湾”等节点，构建起从北极到南美大陆的连续空间管控链条^[22]。伴随战略边界拓展，美国的空间治理逻辑发生根本转向。美方建立以资源供给能力、产业链嵌入度、战略通道控制力与本土安全支撑功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评估体系，功能重要性正式取代地理邻近性，成为空间管控优先序的核心判定标准。所有触及美国经济安全底线、供应链韧性或战略机动能力的地理单元，均被纳入新型安全管控范畴，统一适用高排他性治理框架。在此逻辑下，拉美仅为新型空间治理模式的先行试验区，而非战略布局终点。近年来，格陵兰岛稀土资源、北极航道、全球核心海运节点持续进入美国战略视野，美方曾公开提出收购格陵兰岛计划，将它与巴拿马运河并列为新门罗主义向极地与全球物流要道扩张的战略支点。新门罗主义本质是一场全局性空间重组行动，对内将西半球打造为安全、资源与产业深度耦合的战略腹地，对外则将经济安全审查、关键资产排他管控、通道垄断的治理逻辑，系统移植至全球所有具备战略功能的地理单元。空间维度的重构，同时为美国前沿控制体系转型提供坚实物质基础。随着西半球战略腹地控制力持续强化，美国对前沿区域盟友的安全与经济依赖显著降低，获得推进责任转移、抬高同盟要价、重构防务分工的充足战略回旋空间。关键资源、产业备份与战略通道全面转入高可控区域，使得美国在前沿外交博弈中掌握绝对议价主动权，传统安全承诺的条件约束与利益交换属性随之全面

升级，空间重组与机制重构实现无缝对接。这一路径与波森（Barry R.Posen）提出的“克制”大战略逻辑高度契合，通过保持对全球公域的控制优势压缩过度海外承诺，迫使富裕盟友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23]。

三、联盟交易化与美国霸权重组的机制逻辑

新门罗主义重构美国霸权的空间底座，划定排他边界；联盟交易化则作为机制维度，解决前沿成本分担问题。美国向西半球腹地集中资源，并保留欧洲、印太影响力。美国通过重塑同盟规则，将安全承诺转化为基于成本分担和站队的条件化交换，引导盟友承接防务风险，自身保留主导与调度权。交易化联盟模式与西半球腹地化相互配套，共同构成美国霸权重组的空间面与机制面。

（一）联盟运作逻辑的条件化重塑

战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得以维持数十年，主要依赖三大支柱。其一，共同威胁感知构成联盟凝聚的外部动力。沃尔特（Stephen M.Walt）指出，国家选择结盟，主要取决于对威胁来源及其严重程度的判断^[24]。其二，集体防御条款、统一指挥体系和常设磋商机制，将安全承诺转化为稳定的制度预期。其三，自由国际秩序叙事为美国领导权赋予规范正当性。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通过规则和组织约束自身权力，在降低盟友疑虑的同时扩大其追随收益^[25]。威胁认知、制度保障与秩序叙事彼此支撑，使美国同盟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兼具安全效能与政治黏合力。

冷战终结后，单一外部威胁的消解直接动摇联盟的凝聚基础，盟友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进一步弱化共识根基，此后联盟运转更多依靠历史合作惯性，呈现制度框架的路径依赖特征。拜登政府曾试图以“美国回来了”修复盟友信心，以议题性联盟和小多边方式提升结盟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实效性，增进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26]，力图恢复传统制度框架，但未能充分回应欧洲战略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及责任分担失衡等深层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则把这些矛盾推向联盟政治的中心。他把盟友关系纳入成本收益核算，根据防务投入、政策配合与现实效用重新确定合作边界。历史身份和价值归属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盟友能否提供可量化的战略回报，成为美国调整安全承诺的重要依据。波特（Patrick Porter）的研究证实，费用分摊与收益核算本就是美国外交决策中长期潜伏的隐性议题，特朗普只是将它从幕后推向前台，彻底打破自由制度主义叙事的掩饰^[27]。这一转向表明，美国提供安全承诺的逻辑已从基于信誉的“无限责任制”，转变为基于利益对等的“有限责任契约制”。建设排他性的西半球“新门罗主义”空间底座，必然要求美国集中调配有限的战略资源；而前沿同盟体系的成本控制，则为战略重心回流提供财政支撑与调整空间。联盟存续的核心问题，也随之从共同维护何种秩序，转为盟友愿意付出多少代价、美国准备提供何种程度的保障。

（二）联盟交易化的运作机制

第一，联盟义务浮动化与条件化。斯奈德（Glenn H.Snyder）的联盟理论指出，联盟关系始终

存在“抛弃-牵连”双重困境：盟友既担忧主导国在危急时刻背弃安全承诺，也恐惧主导国将自己拖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传统制度型联盟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明确的条约承诺与程序化决策机制，缓解盟友因主导国可能抛弃自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管控牵连风险，以稳定预期维系联盟凝聚力^[28]。而交易化模式不去消除盟友的抛弃顾虑，反而主动保留并利用这种焦虑作为施压杠杆，将安全承诺与盟友的防务投入、政策立场直接挂钩，稳固的安全支持必须以持续证明战略价值与投入意愿为前提。北约军费目标的持续升级是义务浮动化的集中体现。从传统的 2%国防开支基准，到 2025 年海牙峰会提出的 5%新目标，美国不断推动防务支出范畴从常规军事开支，向基础设施防护、供应链韧性、国防工业基础等广义安全领域拓展，本质是持续抬高联盟义务的准入门槛，将原本相对稳定的制度承诺，转化为高强度、高门槛的条件性分担框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拒绝 5%军费目标后，特朗普立即以关税报复相威胁^[29]，直观展现对价交换的运作逻辑。安全保证与经济惩罚由此进入同一谈判过程。义务条件化使联盟从相对固定的制度支出转变为可调节的政策杠杆，美国可以依据战略优先序调整承诺力度，同时将更多前沿防务成本转移给盟友。

第二，安全议题与经济关系深度嵌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立“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核心原则，强力将联盟合作边界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推向技术管制、产业布局、供应链重组、出口管制等经济领域。在不对称的全球网络结构中，处于枢纽位置的行为体可以凭借掌控的关键节点，主动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为胁迫性权力，把经济联系当作实现安全目标的杠杆^[30]。这一逻辑已全面渗透到美国的联盟治理当中，经济工具与安全诉求的深度绑定，成为交易化联盟的核心运作特征。关税是安全与经济嵌套最直接的表现。格陵兰岛争端中，特朗普曾威胁对丹麦等 8 个欧洲国家加征关税，把领土和安全诉求直接置入贸易谈判^[31]。2025 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飙升，并创下自 1930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的历史峰值。即便 2026 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关税违宪，特朗普仍迅速援引美国《贸易法》第 122 条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 10%的“替代性关税”，这凸显经济胁迫工具的常态化使用倾向。美国由此将市场准入、关税优惠和技术合作当作筹码，强行要求盟友的安全配合。美国将既有的安全承诺用作工具，向盟友索取军费、投资和产业让步。在实际操作中，美方主要配合使用三种手段：单方面施压迫使盟友改变选择、以延续安全承诺为诱饵索取额外让步，以及利用政策反复无常来制造持续的不确定性^[32]。盟友与竞争对手之间原本清晰的政策界限随之淡化，经济胁迫同样可以施加于安全伙伴。该机制也与美国强化西半球控制的空间布局相配合：在战略腹地限制域外力量的投资与产业存在，在欧洲和印太推动盟友按照统一标准调整技术管制和供应链布局。不过，要价过高也会损害美国信誉，促使盟友开辟替代市场、加强自主防务或寻求多元合作，交易化因而存在明显的成本边界。

第三，联盟决策日益呈现总统个人化特征。传统同盟关系依靠官僚体系、规则程序和多边磋商维持连续性，领导人更替通常不会立即改变联盟义务。特朗普政府则将政策重心转向首脑外交和个案交易，即时要价、双边谈判与个人裁断的分量显著上升。总统及核心幕僚掌握主要决策权，专业外交部门和常设协调机制的影响相对减弱。决策机制的个人化直接推动联盟应对格局的碎片化。由于多边集体协调机制持续弱化，盟友难以通过统一框架稳固对美关系，纷纷转向双边渠道寻求利益缓冲。各盟友试图通过高层交往、采购承诺、投资项目和议题配合争取例外安排，降低

遭弃与牵连风险^[33]。集体协调能力的下降进一步放大个人化决策的权力效应。各国分别对美谈判，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美国便可以利用盟友之间的利益差异实施分层要价。制度原本通过稳定规则降低不确定性，个人化决策却使每次谈判都成为重新议价的窗口。领导人偏好、互动氛围乃至临时判断，都可能影响安全承诺的具体内容。由此产生的不可预测性成为主导国可以运用的权力资源，盟友越难判断美国下一步行动，越可能提前增加投入、减少公开批评并作出预防性让步，以换取有限而分阶段的确定性^[34]。义务条件化、安全经济嵌套和决策个人化相互强化，最终使联盟关系从规则约束下的长期合作，逐渐转向由美国掌握定价权、解释权和调整权的连续交易。

（三）变化背后的深层驱动力

如果简单地将联盟交易化归结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就极易把这场结构性调整误读为短期的政治奇观。虽然特朗普通过轻视程序、强调回报和直接施压等手段，确实强力推进同盟关系的交易化进程，但真正将这套交易逻辑推上美国大战略核心议程的，依然是霸权成本、盟友分化与实力变迁所释放的共同压力。

第一，霸权维持成本持续上升。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稳定运行，以安全承诺、公共产品供给和秩序维护的长期投入为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压倒性优势延续霸权体系，遍布全球的联盟与伙伴网络也带来沉重的财政和战略负担。随着大国竞争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和国内政治极化，美国同时维持多方向安全承诺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国内社会对外部安全支出的成本敏感度明显上升，为盟友长期承担防务责任的政治正当性不断遭到质疑。美国战略界由此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既要避免全球影响力过快收缩，又难以继续承担高成本、广覆盖的安全供给。联盟交易化正是对此作出的制度回应。基本思路是减少无条件承诺，提高盟友分担比例，以较低的直接投入维持前沿存在和关键时刻的控制能力。

第二，盟友利益结构日益分化。冷战时期相对集中的威胁认知已难以复现。欧洲国家在对俄政策、对华关系、军费投入、产业保护和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断扩大。美国在乌克兰和东欧安全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又削弱了欧洲对美国承诺稳定性的信心，加剧欧盟内部路线分歧。印太盟友同样面临安全依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复杂权衡，对华经贸联系、地区风险判断以及配合美国战略的意愿并不一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欧洲盟友普遍缺乏积极响应，显示西方联盟虽保持组织完整，共同战略意志却已明显弱化。统一规则难以覆盖日趋分散的利益诉求，美国遂更多采用差异化施压、分层定价和双边议价的方式。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要求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承担主要地区防务责任，也体现了从统一供给转向责任外包的政策取向。

第三，相对实力变化推动大战略重新核算。当前，美国虽然仍是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却已无法像单极时期那样以较低代价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相对优势变小不会自动导致全面收缩，却会迫使决策者区分战略方向的轻重缓急，重新划定必须直接控制的核心空间、可以转移的地区责任以及需要附加条件的安全承诺。莱顿大学学者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将其概括为资源约束下的优先序政治，决策者将不同地区视为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性单元，进而推动美国战略由全面维持逐步转向重点防守与责任外包^[35]。美国对长期秩序建设的关注，让位于重新谈判有利条件、追求即时收益的政策冲动。事实上，美国国内长期蛰伏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外交建制派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本就存在深刻裂痕，特朗普的政策只是将这种潜流显性化。就此而言，

联盟交易化是美国相对实力演变与大战略再评估的必然产物。

盟友的应对又强化这一进程。针对美国承诺波动和要价上升，各国普遍采取自保优先、分散交涉的策略，通过双边沟通争取例外安排，建立自主防务与多元合作渠道，降低遭弃和牵连风险。碎片化应对削弱联盟内部的集体约束，也扩大美国分化施压的空间。因而，只要霸权成本压力、国内政治反弹和盟友利益分化继续存在，联盟交易化就较难回到传统轨道。前沿承诺越趋条件化，美国对可直接控制的战略后方越为倚重，西半球的地位也越突出；西半球越稳固，美国便越有条件压缩欧洲和印太的常态投入，提高联盟合作要价。空间收缩与机制交易由此相互推动，构成美国以有限资源维持全球主导权的两条基本路径。

四、条件控制型霸权空间重构与机制转型的互构机理

新门罗主义推动的空间秩序重构，与联盟交易化带来的机制形态变革，是同一霸权转型进程中相互嵌套、双向强化的两个核心维度。空间维度通过西半球腹地化与全球功能空间管控，划定霸权体系的核心排他边界，筑牢战略安全底座；机制维度通过联盟义务条件化与成本转嫁，重构前沿控制的运作规则，实现霸权维系的降本增效。二者形成空间稳固提升机制议价权、机制转型反哺空间建设的互构循环，共同推动美国霸权从战后的制度领导型，向以排他性腹地为空间基础、以条件性交换为运作核心的条件控制型霸权转型。

（一）条件控制型霸权的概念内涵

第一，霸权组织方式由制度供给转向条件设定。战后美国以安全保障、市场开放、国际货币和多边规则等公共产品换取盟友追随与体系稳定。该模式依赖承诺连续性，使体系成员相信规则可以预期、合作收益能够延续。条件控制型霸权依然提供安全、市场、技术和制度资源，却不再把这些资源作为相对普遍的体系性供给。各国能够获得何种支持、进入何种合作层级，取决于其战略位置、政策配合、成本分担和现实效用。安全保证随防务投入调整，市场准入同外交立场挂钩，技术合作依据安全标准收放，产业优惠也成为换取政策配合的筹码。公共产品由此趋于俱乐部化，成员资格受到筛选，使用权益附带门槛，收益分配因国而异。美国维系追随关系的主要手段，逐渐从扩大共同收益转向掌握准入权、定价权和解释权。

第二，霸权空间结构由广域覆盖转向分层经营。自由主义霸权强调制度、规则和市场关系的全球扩展，条件控制型霸权则依据战略价值配置有限资源。美国将与本土安全、资源保障、产业能力和战略通道直接相关的区域，划入排他性较强的核心腹地；直接重点控制影响全球力量投射的关键节点；主要依靠盟友分担那些仍需维持影响却不宜继续承担高额成本的前沿地区；而对边际价值较低的区域，则实行弹性介入或主动收缩的策略。分层超越传统势力范围对地理边界和领土控制的关注。空间价值还取决于资源禀赋、制造能力、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枢纽和海上通道。西半球构成美国最重要的地理后方，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关键矿产、港口航道、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供应链则构成功能性节点，由此形成核心区域排他化、关键节点控制化、战略前沿外包化、一般区域弹性化的空间结构。

第三，霸权治理模式由规则稳定转向弹性调控。制度领导型霸权依靠规则确定性和承诺连续

性稳定成员预期。条件控制型霸权则把弹性、浮动和可控的不确定性纳入权力运用。条约与组织继续存在，规则解释权、责任调整权和承诺定价权却进一步向霸权国集中。美国可以提高准入门槛、增设附加条件，也可以根据对象和议题选择性适用规则。体系成员必须持续证明自身价值，方能维持原有地位和合作权益。条件控制型霸权由此区别于依靠公共产品和稳定规则维持追随的制度领导型霸权，也不同于建立在领土占领和直接强制之上的传统帝国。它保留制度外壳，却改变制度用途，使规则更多承担压力传导、成本分配和行为校准功能，控制关系的重心也随之由规则约束转向条件约束^[36]。

（二）条件控制型霸权运行机理

第一，资源腾挪与成本转嫁。西半球腹地建设需要在基础设施、矿产开发、制造能力、军事部署和战略通道等方面持续投入。美国若要增加本土防务和关键技术产业投入，须降低其他方向的常态负担。联盟交易化正是实现资源腾挪的机制。北约海牙峰会将军费、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纳入新的防务目标，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印太双边同盟、AUKUS和小多边机制，也在推动伙伴扩大军事投入、基地保障和军工协作。美国由此更多扮演总体协调者、核心能力提供者和最后担保人的角色，盟友承担前沿部署、地区防卫和产业动员责任。美国仍控制情报、指挥、核威慑、尖端装备和战略调度能力，在压缩常态投入的同时保留危机主导权。前沿成本的重新分配为资源向战略腹地集中创造空间，腹地提供的产业和资源支撑又反过来增强美国干预前沿的能力。空间面腹地化与机制面联盟交易化，由此在资源流向上形成直接衔接。

第二，跨领域工具的联动。美国将关税、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军售、技术许可、产业合作和安全承诺纳入同一政策链条。在西半球，这套组合工具主要用于港口、矿产、通信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安全审查，压缩域外竞争者的经济存在；在欧洲和印太，则表现为将军费分担、技术标准、供应链调整 and 外交立场同安全保证捆绑起来。跨领域联动把美国分散于不同网络中的结构优势汇聚为综合控制力。贸易争端可以牵动安全承诺，技术合作可以受制于外交立场，军售和情报共享也能成为产业谈判的筹码。受压国家面对的往往是一组可能连续触发的后果，单项让步难以切断整条压力链，安全、经济和技术依赖因而彼此叠加。

第三，差序准入与等级化开放。对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强化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和供应链隔离；对盟友和伙伴，则依据政治关系、安全配合和投入程度，提供不同层次的市场、技术与制度准入。防务收益具有成员资格、排他边界和可分割性，可能表现为俱乐部产品^[37]。条件控制型霸权将这一逻辑扩展到高端技术、情报网络、军工体系和产业链领域。成员只有增加防务支出、开放国内市场、配合技术管制并调整产业政策，才能维持较高合作层级。开放因此不再只是利益供给，也成为持续规制成员行为的权力工具。美国在牢牢掌控关键空间、核心技术及核心产业链的同时，通过动态校准准入条件引导盟友战略取向。

第四，安全化叙事的自我证成。条件控制型霸权把某项议题建构为生存性威胁，从而为超常规措施获取正当性。美国将竞争对手参与港口经营、矿产开发、数字通信和产业投资描述为战略渗透或安全风险；同时将对盟友提出的军费、采购和政策对齐要求，解释为维护共同安全的必要责任。安全化叙事与政策实践共同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美国利用盟友增加军费来证明威胁

判断获得认同；将关键资产重归美国控制，作为安全担忧拥有现实依据的证据；又将竞争对手寻找替代合作渠道的行为，视为其战略意图的进一步显现。决策者不断将这些政策结果重新吸纳进威胁叙事，为推行新一轮限制措施提供理由。话语建构与政策实践在此形成循环，相互背书并持续强化条件控制型霸权的制度韧性。

（三）条件控制型霸权的形态特征与内在张力

第一，秩序供给具有动态分层与排他性。条件控制型霸权依然提供安全保障、市场机会、技术合作等秩序产品，但所有供给均附带差异化条件。一国在秩序中的层级位置、可获取的支持类型与需承担的责任边界，取决于其战略区位、政策配合度与成本承担能力，形成等级分明、准入有别、条件各异的差序秩序结构。传统霸权等级关系植根于相对稳定的权威契约，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具有长期固化的特征；而条件控制型霸权下的等级结构具有显著的动态性与浮动性，盟友与伙伴的层级位置随它们配合程度、投入意愿与即期战略价值持续调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地位保障，必须通过持续的投入与站队维系资格。

第二，控制方式呈现弹性化与工具化。制度和条约继续充当霸权运作的平台，功能重心却逐渐转向压力传导、责任分摊和行为调整。美国约束他国时强调规则刚性，维护自身行动自由时则扩大制度解释空间。行为体会依据承诺成本、不确定性和主权代价选择制度形式。在条件控制型霸权下，刚柔转换进一步成为支配技术，对伙伴提高门槛，对自身保留例外。弹性控制扩大美国的政策空间，但也持续消耗制度信誉。

第三，后方腹地与前沿地带功能性协同。与传统帝国的领土扩张、自由主义霸权的全球制度覆盖不同，条件控制型霸权构建起“核心腹地排他管控+前沿地带责任外包”的新型组合架构。后方控制越稳固，美国在前沿就越有底气压缩固定投入、抬升安全要价；前沿关系的交易化属性越强，美国对可靠战略后方的依赖就越深，二者通过成本转嫁与功能互补形成双向强化。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38]。这一判断恰恰构成美国空间架构调整的底层逻辑，霸权护持的根本在于维系经济与技术优势，而优势存续的前提是将核心生产要素、关键资源与技术节点置于高可控的空间范围之内。条件控制型霸权吸收克制战略的成本意识，却保留全球干预能力；延续势力范围政治的排他倾向，又把控制对象从领土扩展到产业链、技术网络和基础设施。

从演化趋势看，驱动条件控制型霸权生成的结构性力量在中短期内难以消退。大国竞争的战略压力不会消解，霸权维系的高成本格局难以逆转，美国国内政治无法重建对高成本外部承诺的共识，盟友的利益分化与自主诉求也将持续深化。这些因素共同赋予条件控制型霸权较强的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倾向。但同时，这一霸权形态也内含三重难以化解的结构性张力：其一，制度信誉的持续消耗，盟友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同时，战略自主性也会同步提升，对美国压力的抵御能力逐步增强^[39]；其二，过度条件化激发盟友离心倾向，倒逼盟友探索替代性合作渠道，反而抬高美国的控制成本；其三，秩序碎片化带来的战略空隙，为竞争对手在美国控制力松动的区域构建替代性合作框架创造空间。中期来看，条件控制型霸权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重塑全球权力分配、同盟关系形态与地区安全架构，内在矛盾的演化也将成为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

五、对中国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冲击与应对思路

条件控制型霸权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已超出单项政策调整的范围。空间上，美国强化西半球控制，争夺全球关键节点；机制上，通过联盟交易化向盟友转移成本，推动安全、技术、产业和规则体系相互嵌套。两者共同形成覆盖中国周边、海外利益、供应链、全球治理空间等复合压力。因此，中国的应对不能停留在点状回应层面，必须立足整体环境变化，构建面向长期的系统性结构策略。

（一）结构性冲击的四重表现

第一，周边安全压力加速网络化。以往中国周边安全压力虽然来源多样，主要矛盾仍集中于中美直接博弈。当前，美国正把更多地区防务责任、能力建设任务和安全功能交由盟友承担，并将分散的双边关系连接成多节点联动网络。情报共享、基地使用、联合演训、装备协同和政策协调相互贯通，使局部事件更容易引发跨区域、跨机制的连锁反应^[40]。美日菲三边合作持续机制化，AUKUS 向先进军事能力和国防工业协作延伸，美印防务合作在后勤、演训和装备领域不断深化，各类双边、三边与小多边机制交错叠加。日本在美国推动下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约束，扩大防务预算，发展远程打击、两栖机动和联合作战能力，由传统基地提供者转向前沿能力提供者。随着日本国内对华威胁认知强化，再武装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美国联盟网络的前沿进攻性随之上升，形成快速耦合、相互强化的中国周边压力网络。

第二，海外利益承受更强安全化挤压。传统语境下，市场波动、法律纠纷、政局变动等常规因素构成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风险来源。当前，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将中美正常的商业投资、港口运营、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纳入“战略渗透”“关键资产失控”等安全化叙事框架，强力推动经贸议题向政治安全议题转化，进而同步推高项目的合规风险与政治风险。西半球是这种变化最集中的区域。美国借助新门罗主义叙事强化对拉美国家的政治施压，并通过规则塑造、盟友动员和舆论放大，把局部商业争议推向制度性排斥。类似逻辑还可能向其他地区扩散，使中国企业同时面对经营、政治、制度和声誉风险。海外利益的脆弱性由项目自身条件决定，也受大国竞争、属地政治和跨国叙事的共同影响，单纯依靠企业合规已不足以化解风险。

第三，供应链排斥趋于规则化。条件控制型霸权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把供应链安全与战略忠诚捆绑在一起。美国把供应链安全同战略立场相联结，借助“可信赖供应链”、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技术标准建立新的准入门槛。盟友能否获得美国市场、技术和产业合作机会，越来越取决于其对华政策配合程度。某些国家即使同中国不存在直接安全矛盾，也可能因担忧失去制度资格或遭受政策惩罚而缩减对华合作。美国负责设定规则，盟友和第三方承担供应链调整成本，通过提高合规成本、扩大安全审查、收紧技术许可和附加政治条件逐步推进，持续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美国推行的渐进式制度排斥，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较强的路径锁定效应。

第四，全球治理空间出现分层收缩。条件控制型霸权倾向于在规模较小、门槛较高、政策对齐度更强的机制中塑造规则，将安全保障安排、产业标准和技术体系结合起来。传统多边机制虽然继续存在，议程设置和资源配置能力却可能受到小多边机制分流。部分制度仍保留开放性表述，实际准入资格已同安全立场、技术标准和政策配合挂钩，原本开放的全球治理空间变为层级分明

的准入结构。全球治理的开放性、普遍性持续弱化，分层性、筛选性显著增强，形成不同层级机制并行、不同国家分属不同制度空间的格局。美国霸权从规则约束滑向资源本能驱动，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动荡与全球治理赤字^[41]。联合国等普遍性多边机制虽继续存在，但小圈子机制的挤压促使其日益陷入议事空转困境；外部力量也企图稀释中国原本具备较强议程塑造能力的多边平台功能；新的环境压力则在压缩全球治理制度的拓展空间。此外，特朗普不可预测的行为将直接增加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42]。

（二）四条应对路径

第一，以周边稳固为重心，削弱网络化联动效应。中国应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优先位置，统筹配置外交资源、深化战略沟通、完善危机预防。针对东盟、南亚、中亚和南太平洋国家的不同关切，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分类的政策对接，以防止外部力量将具体矛盾整体嵌入阵营对抗的框架。围绕海上执法、灾害救援、能源运输、跨境犯罪和公共卫生等议题，提供持续、可靠、可感知的地区公共产品，以务实合作巩固共同利益。对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潜在风险点，应完善危机通报、军事沟通和风险隔离机制，增强战略威慑的可信度与政策沟通的可预期性。核心目标是阻断局部矛盾的跨机制传导，把外部联盟网络可能形成的联动压力限制在特定议题和可控范围内。

第二，以全链条风险治理为抓手，提升海外利益保障能力。海外利益保护需贯穿项目准入、投资建设、日常运营、危机处置和损失恢复全过程。对港口、矿产、能源、电网、通信枢纽和物流节点等敏感项目，在进入前开展政治安全、舆论环境、法律合规和合同可逆性评估，建立覆盖国别、行业和项目风险分级机制。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布局时，需主动由单点经营转向在地化嵌入。企业应当通过扩大本地就业、增加税收贡献、培育产业配套、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第三方合作，主动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防止竞争对手孤立并打击相关项目。尤其在拉美、非洲和部分欧亚国家，相关部门与企业应将海外利益保护同双边关系经营紧密结合起来，避免让自身项目孤立地暴露在大国竞争的最前沿。应完善法律援助、国际仲裁、政策沟通、金融保险和应急撤离机制，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金融机构与行业协会协同参与的保护网络。加强海外利益保障能力建设，扩大力量投射范围，对于蓄意损害中国海外利益的行为，要采取必要措施坚决反制，切实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第三，以产业科技韧性为基础，构建包容性供应链合作网络。破解美国主导的排他性供应链规则，需坚持“内强韧性、外拓联结”的双向发力。对内，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与关键原材料保障体系建设，重点突破高端制造、工业软件、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领域的瓶颈，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从根本上消解制度性排斥的卡脖子效应。对外，通过共建产业链、扩大市场开放、深化本币结算、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式，巩固与周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及欧洲务实经济体的经贸黏性，让对华合作保持足够的利益吸引力。针对第三方国家分类采取差异化施策，对因同盟约束被动跟进者，以利益绑定对冲安全压力；对因产业竞争主动配合者，以对等博弈明确合作边界；对犹疑观望者，以合作红利引导其保持中立，阻断对华排斥的跨区域连锁传导。

第四，以多边制度经营为战略高点，拓展规则与叙事空间。应对全球治理的分层化收缩趋势，

需将多边机制维护、国际规则塑造与全球话语建设摆在更突出的位置。一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普遍性多边体系，巩固对发展、气候、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融资等议题的制度影响力，并将其持续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守住普遍多边主义的主阵地。二是深耕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广泛团结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等强国，提供稳定的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与规则协同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小圈子式治理”提供可行替代方案，夯实开放多边主义的力量基础。三是同步强化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系统阐释中国海外投资、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参与的发展属性与互利属性，主动回应针对正常经贸活动的泛安全化、污名化的负面叙事，提出更具吸引力的互联互通方案、开放合作规则和发展导向型倡议，拓展制度层面的战略回旋空间。

六、结语

大国战略调整，历来是权力结构变迁的深刻投射。本文意在打破区域政策与同盟政策相互割裂的分析传统，提出条件控制型霸权这一总体性研判框架。其中，新门罗主义重划霸权经营的地理圈层，联盟交易化重构安全承诺的兑现规则，二者同源同向、互为表里，共同构成美国霸权转型的空间版图与机制杠杆。循此线索可见，美国维系霸权支配的逻辑已悄然换轨，通过设置准入资格与动态对价机制规训他国。制度的外在框架得以保留，但其功能内核已发生置换。

这一研判的理论启示，或许不止于美国本身。守成大国在相对优势收缩之际，未必选择全面战略收缩，反而可能通过体系内部重组延续支配地位。它们大可保留既有框架，把原本普遍供给的“公共产品”转化成附带门槛的俱乐部产品。问题也随之浮现：当安全、技术与规则越来越多地纳入差序准入与动态对价，国际秩序是否整体走向条件化？若这一趋势持续演进，秩序稳定的根基将因之动摇。届时，比起实力的绝对厚度，霸权国能否说服并撬动追随者接受其设定的交易条件，将成为决定霸权存续的关键变量。

从更深层看，当今世界正迎来两种秩序组织原则的系统性竞争。一种以排他性壁垒、等级化秩序与可控不确定性维系霸权地位，将相互依存关系异化为实施规训的权力工具；一种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与稳定预期凝聚合作共识，推动相互依存关系成为共同发展的纽带。

前者或能在短期内压低霸权的控制成本，却在加速透支其战略信誉；后者虽非一日之功，但更契合世界多极化与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大势。归根结底，国际秩序重构的主导权，终将归属于能够提供更具公信力的规则体系、更具普惠性的共同利益与更具确定性公共产品的行为体。这既是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逻辑的核心标尺，也是判断新兴力量发展前景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L]. (2025-12) [2026-03-0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2] NATO. The Hague Summit Declaration [R/OL]. (2025-06-25) [2026-03-07]. <https://www.nato.int/en/about-us/official-texts-and-resources/official-texts/2025/06/25/the-hague-summit-declaration>.

- [3] G. John Ikenberry,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J]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0 (3) : 283-315.
- [4]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J]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8 (3) : 43-78.
- [5] 李巍. 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未来 [J] . 国际政治研究, 2023 (6) : 30-53, 5-6.
- [6] 潘雨祥. 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霸权逻辑及其对中拉合作的冲击与应对 [J] . 战略决策研究, 2026 (2) : 62-80, 127.
- [7] 严谨, 王飞. “新门罗主义”的内涵、缘起和前景初探 [J] . 和平与发展, 2025 (5) : 48-70, 184-185, 190-192.
- [8] Ville Sinkkonen. Contextualizing the “Trump Doctrine”: Realism, Transactionalism and the Civilizational Agenda [EB/OL] . (2018-10) [2026-03-07] . https://fiia.fi/wp-content/uploads/2018/11/analysis10_trump_doctrine3.pdf.
- [9] Hal Brands. The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J] . Survival, 2017 (6) : 7-40.
- [10] Randall L. Schweller. Trump's Realism [EB/OL] . (2021-04-28) [2026-03-17] . <https://issforum.org/policy/ps2021-26>.
- [11] Victor D.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J]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 (4) : 509-551.
- [12] 孙兴杰.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J] . 国际问题研究, 2021 (1) : 69-85.
- [13] 曹玮, 张瀚暘. 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 [J] . 国际政治科学, 2023 (2) : 26-60.
- [14]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in an Age of Global History [J] . Diplomatic History, 2023 (5) : 845-870.
- [15] 巴西认为能成为最大稀土生产国 [EB/OL] . (2025-08-13) [2026-03-20] . https://geoglobal.mnr.gov.cn/zx/kydt/hyyxdt/202508/t20250813_9951034.htm.
- [16] Edward Helmore. Trump convenes ‘Shield of Americas’ summit with 12 Latin American leaders [N/OL] . The Guardian, 2026-03-07 [2026-03-22] .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mar/07/trump-shield-of-americas-summit>.
- [17] Brian Winter. Understanding Trump's Shift on Brazil [EB/OL] . (2025-09-29) [2026-03-23] . <https://www.americaquarterly.org/article/understanding-trumps-shift-on-brazil/>.
- [18] Trump Boosts Argentina's Milei with \$20 Billion Lifeline as U.S. Buys Pesos [EB/OL] . (2025-10-09) [2026-03-23] . <https://www.cnn.com/2025/10/09/us-buys-argentina-pesos-agrees-to-20-billion-swap-line-bessent-says.html>.
- [19] Michael McDonald, Filipe Pacheco. Panama to Occupy Canal Ports After Court Scraps CK Hutchison Deal [EB/OL] . (2026-02-24) [2026-03-25]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6-02-23/panama-to-occupy-canal-ports-after-court-scraps-ck-hutchison-deal>.
- [20] Callum Sutherland. Trump Again Floats Idea of Venezuela Becoming America's 51st State [EB/OL] . (2026-03-18) [2026-03-26] . <https://time.com/article/2026/03/18/trump-venezuela-annexation->

- 51st-state-america/.
- [21] James R. Holmes. The ‘Donroe’ Doctrine Should Be About Restraint, Not Intervention [J/OL].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2026 (1) [2026-03-29].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6/january/donroe-doctrine-should-be-about-restraint-not-intervention>.
- [2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R/OL]. (2026-01-23) [2026-03-3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 [23]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6-162.
- [2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1, 32-33.
- [25]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79.
- [26] 赵明昊. 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23 (5): 19-47, 5.
- [27]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 (4): 9-46.
- [28]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J]. World Politics, 1984 (4): 461-495.
- [29] Trump Threatens Tough Trade Deal for Spain After It Refuses to Meet NATO Defense Spending Target [EB/OL]. (2025-06-25) [2026-03-31]. <https://www.cnbc.com/2025/06/25/trump-vows-to-make-spain-pay-for-avoiding-new-nato-spending-target.html>.
- [30] 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1): 42-79.
- [31] Trump says 8 EU countries to be charged 10% tariff for opposing US control of Greenland [EB/OL]. (2026-01-17) [2026-04-03]. <https://www.npr.org/2026/01/17/nx-s1-5680839/trump-eu-greenland-tariffs>.
- [32] Marko Milanovic. Trump's Coercion of America's Allies: Part II [EB/OL]. (2025-03-09) [2026-04-03]. <https://www.ejiltalk.org/trumps-coercion-of-americas-allies-part-ii/>.
- [33] Hugh Piper. The new transactional era: Australia’s US alliance needs review [R/OL]. (2025-03-19) [2026-04-0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new-transactional-era-australia-s-us-alliance-needs-review>.
- [34] Gorana Grgic. Pax Transactionalis: The Trump Foreign Policy Agenda [R/OL]. (2025) [2026-04-07]. <https://www.research-collection.ethz.ch/server/api/core/bitstreams/1e79e0f8-6a86-456a-9690-679d1e1a8dca/content>.
- [35] Andrew Gawthorpe, Catherine Wood. Competing and complementary regions in US foreign policy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 (4): 1499-1509.
- [36] 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5-58.
- [37] Todd Sandler, Keith Hartley. Economics of Alliances; The Less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3) : 869-896.
- [38]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M]. 蒋葆英, 等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538-539.
- [39] Brian Blankenship. Managing the Dilemmas of Alliance Burden Sharing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4 (1) : 41-61.
- [40] Michael Beckley, et al. Strengthening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R/OL]. (2025-04) [2026-04-07].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5/03/strengthening-us-alliances-in-the-indo-pacific/>
- [41] 戴维来.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内在张力与实践路径——基于2026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 235-251.
- [42] 王明国.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张及其多重影响 [J]. 国际展望, 2025 (2) : 25-48, 181.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关成龙¹ 袁 征^{1,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 要：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着眼于全球变局与国内发展新阶段，对两国相处之道提出的重大范式创新，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自觉。这一新定位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核心内涵，指向中美战略互动中合作的可拓展性、竞争的有界性、分歧处理的原则性和专业性，以及两国和平的可持续性。该定位创新的实质在于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从侧重原则宣示向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化框架跨越，将竞争要素纳入正向管控轨道；既是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的具象化践行，也是对美方“竞赢”叙事的有力纠偏。就生成逻辑而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并非临时起意或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实力稳步提升的客观现实、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的理论自觉，以及对过去 10 年中美关系状况的深刻反思共同作用下的顺势而为。面向未来，构建这一关系需依托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通过推动全方位交流合作重塑多层次互信格局，并坚持“以斗争求合作”严控分歧与竞争外溢。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标志着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达到了新的理论自觉与实践高度。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4-0233-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4.018

作者简介：关成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格式：关成龙，袁征. 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4): 233-244.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1]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在今后较长时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和指南,也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016年至2026年这10年间,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荆棘载途、倍经考验的历程。两国关系经历了从自由落体式下坠到低位盘旋,稍显企稳便又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剧烈动荡时期。2017年,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战略竞争,在各领域公开打压中国,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新冷战”论调甚嚣尘上,对华极端鹰派频繁登台,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自由落体式下坠。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反而屡受各类突发事件冲击,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制度化和外部化,美国战略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见顶论”“中国冲击论”等叙事更是此起彼伏。与美方不同,中国始终从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秩序演进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主张以对话沟通处理分歧,鼓励两国交流合作,成为两国关系中致力于维护稳定的一方。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2013年6月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3]。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时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4]中美元首在这次会晤期间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一共识为当时陷入低谷的双边关系注入了重要的稳定预期。2021年,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入新阶段的紧要关头,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框架^[5]。这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指南。

2025年标志着中美博弈进入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战略相持期。2025年,中美关系呈现高度震荡的态势,两国博弈从美方单方面发动的“关税闪电战”转入漫长的“谈判持久战”。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举措的相继落地,明确展示了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已具备抵御美国关税大棒并进行实质性反制的能力。谈判期间,美方立场的几经反复和言行不一又加剧了双方谈判的困难和复杂性。但在先后四轮的中美元首通话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的推动下,双边谈判获得了关键的动力与方向指引,中美关系也逐渐企稳,步入了“谈判休战”阶段。下半年,中美双边关系保持总体稳定,美国政府于年底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呈现出明显的对华敌意“降调”特点,在政策表述上更趋克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方维护谈判势头的意愿。

在有关中美关系状态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存在实然与应然两种分析路径。在实然层面,美国

战略界曾试图以所谓“新冷战”论调来定义两国状态^[6]，但在中国学者看来，“新冷战”是一个完全经不起历史和逻辑推敲的“话语陷阱”，国内学界对此多有批驳^[7]。与此同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战略竞争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中美关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且这种竞争并不必然导向大国冲突或“新冷战”。吴心伯认为，“中美战略竞争”萌芽于小布什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时期，在特朗普首次执政后完全显现。不过，这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当务之急^[8]。赵可金认为，中美关系依然具有明显的“复合体”特征，表现为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并存的独特结构^[9]。在关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应然层面，国内学者在维护两国战略稳定和推进务实合作上存在高度共识。王缉思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会为整个世界带来更大风险，两国关系不应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应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关系正常化”^[10]。杨洁勉提出，中美关系正处于艰苦磨合的关系阶段，止跌企稳和稳中求进应当是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11]。

总体而言，中国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两国应着眼于战略稳定、风险管控与“新范式”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结合中美关系的10年进程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演进，从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三个方面对这一新范式进行系统阐释，以期揭示中美关系新定位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价值，并探索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有效路径。

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主席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1]这四重内涵各有侧重且缺一不可，分别对应了合作的可拓展性、竞争的有界性、分歧处理的底线性和专业性，以及两国和平的可持续性。“四个稳定”共同构成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支柱，每一支柱对应着一种稳定状态，而每一种稳定又事关建设性战略稳定全局。这意味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积极、良性、常态、持久这四种稳定基础形态之上。

（一）“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

合作理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大国之间存在着对抗、竞争、合作或结盟等多种战略选择。以“合作为主”的战略选择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始终愿同美方构建平等尊重的伙伴关系。过去10年，美方将“战略竞争”作为对华政策主轴，其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战略竞争严重挤压了两国的合作面，非但没有给两国关系开出良方，反而屡屡将彼此推向剑拔弩张的危机边缘。更进一步而言，持续的对华竞争助长了美国国内“有毒”的战略氛围，导致那些倡导两国对话合作的声音弱化，美国战略界的理性讨论空间也被不断压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26年5月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12]

只有以合作为主才能促成两国关系的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震荡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缺

乏合作压舱的双边关系是高度不稳定的，两艘巨轮只会面临在风浪中愈益逼近相撞的危险。唯有以合作为主，才能实现中美关系的积极稳定，而非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消极共存”。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核武器发展所带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美苏之间的合作也被基本限定在军控谈判和少量的人文交流。这种低限度稳定或“消极稳定”带给世界的恰恰是极不稳定的后果，各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大国对抗的风险之下。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经历曲折，也给双方带来一些启示。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13]从2026年特朗普访华来看，随行阵容汇集了来自美国金融业、制造业、农业和科技领域的17位商界代表，这一高规格的代表团释放出两国合作空间极为广阔明确信号。“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要求中美双方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层面的“再挂钩”到科技和投资的“去安全化”，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合作，从地区热点降温到反恐与防核扩散，将中美共同利益的清单拉长、做厚，使之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二）“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保证

中美关系竞合交织，但整体上应是合作大于竞争、合作支配竞争的局面。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要素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能无所约束，而必须是有前提、有界限且有规范的。一是合作主导下的适度竞争，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轴，竞争只能在这一主轴下适度存在，而非取代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基调。二是竞争要服从于战略稳定的总体要求，竞争本身不是目的，其外部性必须为正。竞争的方式和结果都应是良性的，不以损害中美双方乃至其他各方利益为前提，而应有助于增进而非削弱中美总体的战略稳定。三是竞争要有明确的边界，把握适度原则。这要求中美双方应从竞争的领域、内容、方式到后果，全方位地管理竞争，任何超出边界的竞争都是不必要的竞争。为此，双方需共同制定规则，将竞争纳入可控轨道。例如，在科技领域，竞争应是研发效率与创新能力的比拼，而非动用国家力量对另一方企业进行全球围猎；在经贸领域，竞争应是市场与服务的公平较量，而非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实施单边制裁。

竞争有度与否决定着中美关系稳定状况。所谓“良性稳定”，追求的是一种在竞争中各有所进、在较量中有所不为的状态。竞争既不应以压制和消灭对方为终极目标，也不应带来较大的战略消耗与关系失稳，而是以提升自身为内在驱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各自过去的状态相竞争。2026年4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访问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期间，应邀在印州工商界圆桌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不怕也不回避竞争。相互激励，你追我赶，共同提高，才是竞争的真谛。”^[14]归根结底，“竞争有度”的本质要求在于竞争不应淹没合作，更不能滑向冲突。唯有让竞争在合作的框架下运行、在规则的轨道上运转、在稳定的边界内运作，才能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不可或缺的必要保证。

（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支撑

中国一贯正视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历来主张合理管控分歧。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

调,即使一家人之间也存在分歧,有分歧不要紧,问题在于如何管控分歧,化解分歧。有效地管控分歧才能实现中美关系的常态稳定,这要求中美应明确彼此红线,绝不试探、触碰和逾越对方的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沟通对话的热线,将分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让这些分歧演变成全面危机,冲击双边关系稳定大局。在台海、南海、经贸、人权、意识形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长期存在。这些问题既有深层的认知差异,也有具体的利益分歧,而稳定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全部分歧,而在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沟通,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对话渠道,确保即使发生摩擦,也能及时降温 and 止损,防止意外升级为冲突。回顾近几年情形,尽管拜登政府多次将“为竞争加装护栏”挂在嘴边,但其实际行动却始终回避中方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致使中美关系竞争无界、对抗无度、沟通时断时续、误判风险高企。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言行不一的做法也再次表明,真正的分歧可控不应是单纯依赖所谓的“危机管控”机制,也绝非建立形式上的热线那么简单,它必须立足于对彼此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必须体现在停止打压对方、停止干涉对方内政、停止挑战对方红线底线的具体言行之中。

“常态稳定”具有特定内涵。它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时期的短暂平静或局部稳定,而是在承认中美整体关系存在分歧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对话接触,确保双边关系的大盘保持总体平稳。这种稳定既承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也强调两国在管控和化解分歧过程中主动作为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中美之间还可能出现新的这样那样的分歧,但这些分歧都应置于平等对话的框架下得到管控,通过交流协商加以化解,而不应危及总体稳定。在 2026 年这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这一论述表明,“台独”势力早已成为破坏中美常态稳定和战略稳定的首要因素,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分歧管控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

(四)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长远目标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既是上述三种稳定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真诚期许。只有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的互动模式实现中美关系的积极、良性和常态稳定,中美关系才能走向持久稳定的正轨。“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有着推动两国关系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坚定决心,也直接回答了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有的相处状态。这同样为美国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终局”辩论提供了中国答案。中美相处的目标,既不是“谁干掉谁”的零和博弈,也不是所谓“大国合谋”共同主宰世界,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可预期、可持续、具有正外部性的长期和平共处模式,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确定性与稳定性。过去 10 年,面对美方的经济脱钩、联盟围堵、军事威慑,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一方向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因外部打压而走向封闭,反而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没有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而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在不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的战略耐心与定力,正是源于对“和平可期”这一长远目标的坚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但这并非中美关系的终点。大国战略稳定的最高形态不

是避免战争或实现脆弱的和平，而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谓“建设性”，正是指明了中美两国不能停留在低程度的“消极共存”和相互消耗，其最终目标应指向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

“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15]

综上，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着眼全球变局与国内发展新阶段，对两国相处之道提出的重要创新范式，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动作为。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锚定了阶段性方向，为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一范式既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的具体践行，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例证。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生成逻辑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提出，既不是偶然，也非临时起意，更非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实力稳步提升的客观现实、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的理论自觉，以及对过去 10 年中美关系震荡的深刻反思共同作用下的顺势而为，具有实践、理论和历史三重生成逻辑。

（一）实践逻辑：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与两国博弈的“新均衡点”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新实践的最新范例，这一概念首先根植于中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博弈新态势。过去 10 年，中国在经济、科技、产业、金融、国防等领域取得了全面而坚实的发展。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完整性经受住了贸易摩擦与科技封锁的多重考验，全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巩固；科技创新能力加速跃升，以深度求索（DeepSeek）、字节跳动（ByteDance）等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彰显了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金融基础设施自主性显著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持续拓展；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优势日益凸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或缺性进一步巩固；国防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虽未使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但也直接推动了双边博弈态势的深层演变。这一结果宣告了美国政府对华“围堵”政策的失效，也宣告了美国战略界“对华颠覆论”的破产，更让“速胜论”或“碾压论”的算盘彻底落空。这一互动的客观现实表明，中国已具备在大国博弈中有效捍卫核心利益、进行实质性对等反制和以斗争求合作的能力。

中美在经过多轮激烈交锋后，也逐渐达成了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是一种超越冷战时期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新型大国关系状态。这种状况源于双方经济、科技、产业链、金融等多领域的深度相互依存，表明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打压，都会反过来重创自身。这一复杂的新形势也让双方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所有领域保持领先，也无法片面追求压倒性优势。最终，双方还是要回到对话合作的轨道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中美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

称性相互脆弱”格局，美方不得不承认对华战略竞争的边际效应递减，中方则始终为两国合作预留空间，强调对抗冲突没有出路。中美新的力量现实和依存格局，以及 10 年间的相互博弈推动了这一新均衡点的出现，也使得构建一个容纳长期共存、管理分歧的稳定框架成为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这一力量格局的范式回应。

美方态度的演变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尝试寻求为两国的“战略竞争”加装“护栏”，强调不追求对华“脱钩”而是强调所谓的“去风险”。这一表述本身即是对“速胜论”失败的间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美关系的“共存”前提。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再度经历了密集的关税交锋与谈判拉锯，这一高强度博弈通过“以快打快”的方式，让双方更早地确立了这一均衡的现实，尤其让美方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两国相互依赖的复杂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不追求全面脱钩^[16]。

（二）理论逻辑：对中美大国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美应携手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建立在“四个稳定”之上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无不体现中国不称霸、不扩张，始终坚持大国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反对零和对抗、强调共生共济的政治智慧，也统一于中国对大国之间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并具有鲜明的发展性。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和发展，走的是一条先提出概念、指明方向，再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内涵的发展路径。2010 年 5 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17]。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 年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这一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新型大国关系从萌芽到内涵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在 2026 年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直接以概念与内涵一并托出的方式完整呈现。这一时空路径的差异，深刻反映出两国关系在历经 10 年跌宕起伏后，中国对双边关系基本规律和大国相处之道已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认知与把握，对中美关系的主动塑造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从内涵的深化角度来看，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较早地确立了中美相处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在此基础上，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大支柱共同构筑起一个更为系统、更具操作性的关系框架。具体而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是对“不冲突、不对抗”的具象化展开，为其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路径；“相互尊重”的精神贯穿于对底线红线的坚守和对分歧管控的必要性安排之中；“合作共赢”则被提升为双边关系的主基调，这就要求合作不仅在总量上大于竞争，更应在结构上居于两国交往内容的主导位置。“四个稳定”之间的逻辑关联更为紧密，对中美关系的指导也更为系统全面。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范式的提出，既彰显了中国的战略意志与持久定力，也体现了中方对大国关系走向的深刻洞察与主动塑造。几十年来，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态度始终未变，在战略认知、战略定位和政策推进上也保持着充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持久定力在近 10 余年的大国关系变局中经受住了考验。反观美方，其对华战略则在所谓“战略竞争”的内容、范围、方式乃至终局目标上分歧重重，手段与目标混淆不清，战略叙事前后矛盾、反复更变。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高度凝练的“四个稳定”内涵，再次确认了中方立场的确定性，用以对冲美方政策的不确定性。

对两国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把握，还体现在中国对待竞争的态度上。中方一贯强调不能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竞争要素在两国互动中的客观存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首次在两国外交叙事框架中纳入了竞争元素，进而主动寻求管理竞争和塑造竞争。这一调整不是对美方战略竞争叙事的被动接受，而是基于对两国战略互动实质进程的精准判断。既然国家间竞争无法回避，那就应主动为其划定边界、确立条件、建立规范。“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正是对中美竞争现实的回应。也正因如此，这一新范式才能够更加贴合中美关系的实际，也更具可操作性与持久生命力。

（三）历史逻辑：对中美关系十年震荡的深刻总结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不仅根植于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与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基于对过去 10 年中美关系在艰难中前行的深刻总结。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到拜登政府的“竞赢”叙事，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高强度关税交锋，这 10 年构成了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最剧烈、最持久的一段震荡时期。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范式，正是这 10 年互动沉淀下来的科学认知，将为未来 3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曾经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18]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态度，始终带有这种跳出当下时代局限的历史自觉，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着眼于两国关系的长远未来，着眼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2023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时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并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19]。202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的复信中指出：“这充分说明，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期待更多美国青少年加入到中美友好事业中来，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在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的背景下，这些举措和呼吁体现了中方着眼于更为长远的代际交流与源远流长的民间情谊的主动作为。

10 年间，美国经历了四届政府，对华政策几经调整，但其底色始终未能摆脱竞争思维与对手意识。而中国的回应方式，不是简单地在对方设定的剧本中作出条件反射或过度反应，而是超出既有战略格局，将两国关系拉到一个更宽阔的时空维度上审视。从“小红书”上偶然兴起的中美民众“对账破冰”，到越来越多美国网络博主走进中国、记录中国，自下而上的民间交往与社会纽带，正在逐步撬动这 10 年间累积的误解与隔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按照某些

对抗性叙事所期待的那样越拉越远，反而在缓慢地、不失韧性地重新走近。同样，10 年来的对华战略竞争，也没有让美国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战略方位。以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3C 战略”为例，美国试图一边持续打压中国，又一边寄望于中方能够在美方需要的方面予以配合，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平等尊重的矛盾逻辑。美国所谓“民主—专制”的对抗性叙事也难以被中国、世界乃至美国国内所接受。

当前，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战略竞争极端化的反思迹象已经出现。“鹰派通胀”这一概念被摆上台面加以审视，美国国内开始重新讨论中美“再挂钩”的可能性，美国战略界的“弃台论”也在逐步兴起，对华理性声音呈现总体复苏态势。事实证明，中国对两国关系高度负责的态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在此背景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及其内涵的充分阐释，既超越了美方片面的战略竞争叙事，也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期待，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大国关系稳定向好的普遍愿望。

可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博弈现实、理论自觉与历史反思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时代产物。这一新范式的提出既顺理成章，又实属不易。它深刻表明，唯有基于现实、正视历史、主动作为才能开辟出一条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相处之道。

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践进路

本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白宫在其发布的情况说明中也以“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呼应了这一新定位^[21]。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与具体合作成果，正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受制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境况和美国国内政治实际，这一关系的建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前路也将面临多重挑战。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从三个方面积极实践。

（一）深化元首外交，引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元首外交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是两国关系的“定海神针”，既能在关系低谷时注入破冰前行的动力，又能在危急时刻规避迎头相撞的风险。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低位徘徊，而受制于多方面原因，拜登总统本人更是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继吉米·卡特之后首位未能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这实际上为中美关系开了一个坏头。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跨越半个世纪的中美交往史反复证明，元首外交的战略视野与政治决断往往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两国关系校准航向、开辟新局。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两国元首已实现五次通话、两次面对面会晤以及多次书信往来，这一高频、多维的沟通密度为中美关系在震荡中企稳、在博弈中寻机提供了关键的政治保证。尤其是在双方接触谈判的困难阶段，中美元首间的直接沟通成为打破僵局、注入动力的决定性力量。展望未来，中美元首在 2026 年内有望实现至少四次面对面会晤，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总体改善注入持续动能，更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原则性共识走向具体化落地。

（二）推动中美全方位交流合作，构建多层次互信格局

中美双方有关工作机构要将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部门工作方案，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收获成果尽快落地，为两国部门间建立初步互信和未来的元首会晤开拓良好局面。两国立法机构互访和地方交流也应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支撑。在官民结合层面，我国还应高度重视“一轨半”和“二轨”对话的独特价值，努力开拓中美智库交流新局面。与此同时，我国还宜主动运用智库交流、高校合作、媒体对话等多元渠道，向美国社会系统阐释我方核心立场与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特征，推动美国各界对华认知的理性和良性转变。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基础也应牢牢扎根在民间。我国应持续推动中美两国“再挂钩”的具体领域和内容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两国企业、就业者和消费者可感知的直观利好，为两国关系增强抵御波动的韧性。在中美谈判中，我国还应明确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扭转当前两国人文交流尚存的不利条件，批判其将两国人文交流甚至是中国在美留学生“武器化”“筹码化”的错误逻辑，严正要求美方撤销阻碍正常学术交流的限制性政策，停止对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的无理滋扰与盘查，并推出切实举措支持中美民间交流和青年对话。

（三）坚持“以斗争求合作”，严控分歧和竞争外溢

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策略具有明显的“双线”特征，在“明线”层面，特朗普政府积极对华示好、表达尊重，并将对华“交易”奉为头等大事。然而，一旦两国谈判出现困难，美国对华博弈在越来越难以占据优势的形势下，便可能会转向在“暗线”方面“搞小动作”来积累筹码，如通过强制外交和军事干预胁迫他国疏远对华关系，破坏中国对外合作布局 and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放任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和“对外干预派”施压部分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2025年的中美多层面密集交锋已充分表明，美方多次试图在“暗线”凭空造牌，以挤压中国战略空间来换取谈判桌上的筹码。我国应对特朗普时期中美博弈竞合的“双线”特征，一是要将中美合作打造为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正资产”，避免其对华政策被国内鹰派再度绑架。二是将美方任何企图凭空造牌、破坏两国关系和中国外部环境的行径，与中美正在进行的谈判明确挂钩。三是避免“暗线”博弈冲击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在“暗线”层面主动布局、积极作为，以合纵连横的方略抬高美方全球及地区战略的推进成本，对其形成有效制衡。目前看来，美方在中东、拉美等方向战略推进愈加受阻，其对华施压的底气和声势就越弱。四是我国应对中美两国在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展开的合作秉持开放态度，在技术援助、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全球性议题上，主动塑造两国合作议程，持续挖掘中美“第三方合作”潜力。

五、结语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大国对抗并非宿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才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负责的应有之义。处理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的再次伟大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展望未来，前路虽非坦途，但阶段性方向已然明确。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范式，既是中国长期以来志在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

阱”的战略自觉，也是着眼百年变局，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福祉作出的郑重承诺。中国将继续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高度负责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保持战略定力与政策连续性，既坚定捍卫核心利益，又积极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中美关系在“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框架下行稳致远。历史终将证明，当中国与美国选择并肩而非对抗、对话而非隔绝、合作而非冲突时，两国人民会更好，世界也会更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N]. 人民日报, 2026-05-15 (1).
- [2] 习近平.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 (2012年2月15日, 华盛顿) [N]. 人民日报, 2012-02-17 (2).
- [3] 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 [EB/OL]. (2013-06-09) [2026-05-17].
https://www.gov.cn/ldhd/2013-06/09/content_2423489.htm.
-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N]. 人民日报, 2019-06-30 (1).
-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6] Hal Brands and John L.Gaddis.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J]. Foreign Affairs, 2021 (6): 10-21.
- [7] 陶文钊. 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 [J]. 前线, 2021 (6): 26-29.
- [8] 吴心伯. 论中美战略竞争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5): 96-130.
- [9] 赵可金. 为什么新冷战是不可能的?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7): 15-25.
- [10] David M.Lampton and Wang Jisi. America and China at the Edge of Ruin——A Last Chance to Step Back From the Brink [J]. Foreign Affairs, 2026 (2): 64-75.
- [11] 杨洁勉. 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周期规律和阶段变化刍议——兼论中美关系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趋势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4 (2): 3-18.
- [12]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会晤，达成丰富成果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6-05-16 (1).
- [1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5-10-31 (1).
- [14]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 有竞争就会有输赢, 不能预设竞争结果, 应该倡导良性竞争 [EB/OL]. (2026-04-15) [2026-05-18]. https://us.china-embassy.gov.cn/chn/dshd/202604/t20260415_11892241.htm.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2025)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127.
- [16] Jeff Cox.Bessent Sees Tariff Agreement as Progress in ‘Strategic’ Decoupling with China [N/OL]. (2025-05-12) [2026-05-20]. <https://www.cnbc.com/2025/05/12/bessent-sees-tariff-agreement-as-progress-in-strategic-decoupling-with-china.html>.
- [17] 戴秉国. 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 [EB/OL]. (2010-05-25) [2026-05-20].
<https://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25/2302977.shtml>.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87.
- [19] 习近平. 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2023年11

月15日,旧金山) [N]. 人民日报, 2023-11-17 (2).

[20] 习近平复信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 [N]. 人民日报, 2026-01-12 (1).

[2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Historic Deals with China, Delivering for American Workers, Farmers, and Industry [EB/OL]. (2026-05-17) [2026-05-19].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historic-deals-with-china-delivering-for-american-workers-farmers-and-industry/>.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王京菁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共同提高稿件论证质量和审稿效率，以期形成更好的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统一战线学科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一、常设专题

- （一）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
- （二）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
-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 （四）“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五）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 （六）研究现状与动态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立足大统战，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建构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投稿注意事项

- （一）篇幅。不少于13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 （二）文风。贯彻加强和改进文风要求，聚焦问题、论述晓畅，坚持讲道理和摆事实相统一。
- （三）版式体例。提倡稿件用宋体5号字、1.5倍行距统一排版体例，不需要做过多格式设置，确保版式清爽和良好审稿阅读体验。详见本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投稿模板和体例规范》。
- （四）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敬请条件允许作者投稿时附上查重报告。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 （五）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 （六）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 （七）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唯一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 （八）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xj。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6年第4期

共58期 第十卷

双月刊

2026年7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编：王 鸿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编：400064
电话 / 传真：023-62874725
电子邮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汪奇峰 苏 慰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定 价：20.00元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